

民国 无间道

三大特工机构博弈纪实

安子◎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无间道 / 安子著.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317-3350-8

I. ①民… II. ①安… III. ①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1448 号

民国无间道

作者 / 安子

责任编辑 / 李庭军 于金苗

装帧设计 / 视觉传达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址 / www.bfwy.com

邮编 / 150080

经销 / 新华书店

地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刷 /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 695 × 975 1/16

字数 / 306 千

印张 / 21

版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 201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978-7-5317-3350-8

定价 / 44.00 元



目录

MULU

第一章 响在汪伪 76 号成立之前的军统枪声

- 第一节 双重叛徒李士群 / 1
- 第二节 军统刺杀李士群未遂 / 15
- 第三节 汪精卫其人其事 / 34
- 第四节 军统跨国追杀汪精卫 / 50
- 第五节 汪伪 76 号“投胎”上海 / 63
- 第六节 汪伪 76 号的内部结构 / 81

第二章 被汪伪 76 号暗算的军统、中统特工

- 第一节 第一名被汪伪 76 号抓捕的军统特工詹森 / 88
- 第二节 军统上演现实版无间道 / 98
- 第三节 叛变投靠汪伪 76 号的军统特工 / 111
- 第四节 汪伪 76 号摆下迷魂阵，军统要员连连中招 / 126
- 第五节 高陶事件始末 / 133
- 第六节 那些背叛中统加入汪伪 76 号的特工们 / 147

第三章 小叛徒制造大灾难

- 第一节 军统特工张北生投敌 / 159
- 第二节 军统试图劝说叛徒回头未果 / 165

第三节 小叛徒引发的“蝴蝶效应” / 178

第四节 投靠汪伪 76 号的女特务 / 185

第五节 “小鬼”吴道坤叛变，带给军统大灾难 / 189

第四章 军统伏魔，血洒十里洋场

第一节 游走于汪伪 76 号魔窟的军统卧底 / 196

第二节 被汪伪 76 号摧毁的军统青岛站 / 212

第三节 军统再次派人屡屡暗杀汪精卫 / 220

第四节 军统上海特工与汪伪 76 号的又一次鏖战 / 237

第五章 军统和日伪的货币战争

第一节 汪伪 76 号发行汪伪中储券 / 259

第二节 军统变身“盗版商”，抢先发行中储券 / 272

第六章 暗战中功绩卓著的美女特务们

第一节 中统特务郑如萍色诱丁默 / 281

第二节 情报战中的美女将军 / 290

第七章 败绩初显，汪伪 76 号人心动荡

第一节 汪伪 76 号头号杀手吴世宝之死 / 297

第二节 军统完美反间，李士群自食恶果 / 304

第八章 日薄西山，三大特工组织的穷途末路

第一节 日暮之时，军统再三改组 / 317

第二节 陈氏兄弟失宠，中统淡出历史 / 327

第三节 树倒猢猻散，汪伪 76 号群奸落网 / 330

第一章 响在汪伪 76 号成立之前的军统枪声

1937 年，日本侵华战争正式开始后，中国的爱国人士不分党派，不分年龄，纷纷加入了抗日的革命洪流当中，他们或者投笔从戎、或者毁家纾难，以各自的方式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斗争。此时，军统真正的老板蒋介石也暂时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做法，命令他的“锦衣卫”——军统局，展开了与以汪伪 76 号为代表的各种日伪特务组织的殊死斗争。在蒋介石的命令之下，一直忠于蒋介石的军统“掌柜”戴笠也发出了“这时我们一定要打，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我们期盼的自由、平等、和平的，哀兵必胜”的抗日号召。就这样，军统人员走上了抗日锄奸的秘密战场。

根据史料记载，在与汪伪 76 号为代表的日伪特务机构斗争的过程中，军统正式在册的人员牺牲者达到 18 000 多人。

第一节 双重叛徒李士群

说到汪伪 76 号，就必须说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军统局和中统局的眼中钉、肉中刺，汪伪 76 号的头号筹建人——李士群。在整个暗战的过程中，李士群是贯穿汪伪 76 号成长始终的一个人，他不仅仅是一名汉奸，更是一名双重叛徒，他叛变了中国共产党，又叛变了国民党，最终，成为日本政府的爪牙，成为臭名昭著的汉奸，组建了汪伪 76 号。

心机重重的李士群

1940年，正当国共两党的爱国人士同心协力抗日的时候，在中国的古都南京出现了一个臭名昭著的汉奸政府——汪伪政府。之所以称这个政府为“汪”伪政府，是因为这个所谓政府的傀儡领导人不是别人，正是中国近代史上最高调、最“铁杆儿”的汉奸——汪精卫。

如果说汪伪政府是日本人的一条恶狗的话，那么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可以说是恶狗的利爪与毒牙。因为这个“特工总部”位于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因此在民国时期，汪伪76号就成了这个组织的简称。

汪伪76号是在1939年9月5日，也就是先于汪伪政府而成立的。

汪伪76号成立后，不仅为汪伪政府的建立保驾护航，在抗战期间，对国民党军统、中统的上海站、天津站和南京站等诸地，也进行了大规模毁灭性的打击。从某种程度上说，汪伪76号比汪伪政府更令人毛骨悚然。

那么汪伪76号的“老板”是谁呢？如果我们认真地追根溯源，汪伪76号的真正的后台老板自然应该是侵略者日本军方，而本节的主人公李士群虽然一直被外界视为汪伪76号的“老板”，实际上，李士群只是日本侵略者的走狗。从李士群后来的种种行径来看，李士群真的是日本军方的忠诚走狗。

1907年，李士群出生在浙江丽水一个普通的农民家中。幼年时期的李士群也算“苦出身”，在他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全家人的生活都靠母亲种地维持。

李士群的母亲倒是一位善良、坚韧的农妇，虽然家贫无隔夜之粮，但她为了让李士群有一个好前程，毅然将李士群送到私塾念书。李士群也不负母亲的期望，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后来还进入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学习。1926年，李士群进入上海大学读书。

在当时，哪个农家子弟可以成为大学生，那就不亚于在科举时期成为举人，一步登天。

大学的环境，自然要比乡下复杂得多，李士群一个乡下孩子，看到大上海的灯红酒绿以及家境优越的同学那“奢华”的生活，心里渐渐不平衡起来，于是他暗下绝心：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母亲和妹妹过上好日子！

上海大学是国共两党一起建立的大学，有“革命摇篮”一称，瞿秋白、陈望道、邓中夏等多位优秀共产党员都曾经在此任教。上海大学中浓重的共产主义氛围，深深地影响了李士群，于是他在同学的介绍之下，加入了共产党。但是与其他虔诚信仰共产主义的热血青年不同的是，李士群是因为他看到了共产党的发展前景才加入共产党的。因为对他这样一个没有任何背景的穷学生而言，加入当时刚刚发展起来的共产党远比加入当时已经发展成熟的国民党有更大的上升空间。

抱着这样的投机心理，李士群开始了他在上海大学的“表演”之路，此时的李士群为了个人的前途，积极参加校内共产党组织的革命活动，高调地支持各种革命活动，最终慢慢地在学校中积累了一定的名气和声望。

李士群之所以能够迅速扬名全校，也与上海大学本身的规模有关，在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之下创办的，由于它在建校初期校址身在上海弄堂，因此一度也被学生们自嘲为“弄堂大学”，但是对那些追求革命、民主、自由、平等的上海大学的师生们来说，不管这所大学怎样简陋，都丝毫不会削弱他们对理想的追求。

上海大学成立之初，在该校任教的共产党员不到 10 人，直到 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国共合作正式拉开帷幕之后，很多共产党人才逐渐进入上海大学为学生讲课，传播革命思想。1925 年，上海大学和其他进步学校一起，走在了“五四运动”的最前列。1927 年，国共合作遭遇了危机，就在同一年的 4 月 12 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向他们曾经的盟友共产党举起了血腥屠刀。4 月 19 日，国民党发布红色通缉令，通缉共产党 190 余人，其中就有在上海大学任教和学习的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侯绍裘等人。1927 年 5 月 3 日，蒋介石以“赤色大学”的名义查封上海大学，第二天，上海大学被国民党军官白崇禧接管，很快，上海大学更名为“国动大学”，成为国民

党组织旗下的又一学府。虽然上海大学存在的时间很短暂，但是在这段时间里，它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许多革命的中流砥柱，为日后抗战成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正是有了许多忠诚于共产主义革命理想的师生，所以在当时，上海大学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共产党第一学府”，被人称为“红色学府”、“革命熔炉”，上海大学走出了一批批的志士仁人。与“黄埔军校”相较而言，如果说黄埔军校培养的是武官，那么上海大学培养的就是文官。

同样出自这所学校的李士群，心机就比其他同学更多一些，和周围的同学单纯是为了中华崛起而革命、而奋斗的学习热情不同，李士群所图谋的，不过是个人利益和私人前途。李士群为了出人头地，大肆在师生面前表现自己，逐渐成为当时校园里的“风流人物”。而李士群所做的一切，并不是真的为了共产主义革命而努力奋斗，而是为了获得中国共产党有关领导人的赏识，进而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自己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私人企图。所以，李士群非常高调地支持革命，支持中国共产党，积极组织同学举行各项党内活动，于是，他逐渐成为了上海大学的名人，甚至连中国共产党上海分部、总部的中国共产党的相关领导人，也都对李士群有所耳闻。

李士群的“表演”没有白费，他终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在入党后不久，他就被派到前苏联的莫斯科大学去学习，随后，因为表现出色，又被选拔到前苏联特种警察学校接受特工训练。前苏联特种警察学校是特工的摇篮，在这所学校里，李士群学到了特务需要的各种知识和技能，这些本该用于获取日本情报的知识和技能，成为他在成为汉奸后，对日本主子奴颜媚骨，出卖祖国的主要手段。

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到1927年10月的6个月里，中国共产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损失了许多优秀的党员，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决定成立隶属于中央的特工机构：中国共产党特别行动科，简称中共特科。中共特科主要有三大任务：搜集情报、惩处叛徒、执行各种特殊任务。

李士群从前苏联学习结束，回国后便被中共特科的主要领导人

一——周恩来安排到了中共特科第一科实习。中共特科第一科是中共特科的总部，也是中国共产党最至关重要的部门之一。李士群在中共特科第一科，跟随周恩来、李克农这些身经百战的前辈们学习了各种特工工作的实战知识和谍战经验，积累了不少的工作经验。

1928年，中共特科派李士群到上海做地下情报工作，为了便于收集日本军队和国民政府的情报，李士群的社会身份是一名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各种事件的新闻记者，他在当时由中统特派员丁默邨主持的《社会新闻》手下做编辑，在对外活动时，李士群则以“蜀闻通讯社记者”的身份出现。

正当李士群踌躇满志地准备大干一番的时候，1928年下半年，李士群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李士群第一次被捕

李士群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正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濒临崩溃之际，内战开战在即。中国共产党为了建立苏维埃共和国，誓要掀起土地革命；国民党为了独掌大权，抵制甚至消灭共产党，宁可错杀万人。眼看内战即将开始，中国共产党的实力却尚未充分发展，和国民党的实力相比差距悬殊。面对国共两党巨大的实力差距，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们开始筹划，如何在白色恐怖区生存下去，只有生存下去，才有可能继续发展，不断壮大。然而，由于国民党中央局、军统局等特务组织的疯狂破坏和打击，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虽然存在，却很难抱团，也很难开展活动。眼看一些地下党员被国民党的军统局和中统局抓捕，中共特科的地下工作者焦灼起来，在军统局和中统局的强势打击下，他们很难营救被捕入狱的同志，也很难对敌人展开积极有力的反击。当时的中共特科，只能够尽量防止更多的同志暴露，尽量防止党内信仰不够坚定的党员苟且偷生叛变，形势极为严峻。

而李士群之所以被公共租界巡捕房抓捕，就是因为被国民党怀疑是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所以，国民党借公共租界巡捕房之手，抓捕了李士群。

1928年，李士群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后，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

想了许多办法，联络到当时上海青帮“通”字辈头目季云卿，才将李士群从巡捕房里救了出来。

因为在下文中，要涉及的不少人物都出自青帮，或者和青帮关系密切，所以，这里笔者简要介绍一下当时的青帮。

青帮建立于清朝中期，原本是为了“反清复明”而建立的，因此青帮在建立初期其实是叫作“反清帮”的。

后来，列强进入中国，在自家矛盾和民族大义面前，“反清帮”的首领选择了后者，于是就把“反清帮”改名为“青帮”。更名之后，青帮的“革命目标”由“反清复明”变为“扶清灭洋”。后来，为了避免被清朝统治者迫害，青帮又改名为“安清帮”，因为“安清帮”的人大多信奉道教，因此，“安清帮”也被人们称为“安清道友会”。

青帮改名为“安清帮”之后，得到了清朝统治者的支持，顺利地统一了当时的漕运、粮帮和脚行的所有成员，并且顺利地大开香堂，广收门徒。由于“安清帮”的成员不少是漕运、粮帮和脚行的成员，他们大多常年在南北两地穿梭，因此该帮的门徒迅速遍布了全国。

后来，为了便于称呼和书写，“安清帮”又逐渐被称为“青帮”。

全盛时期的青帮，势力强大，拥有 128 帮半人马，后来，由于清政府对帮派的大肆打压以及清末时期的战乱，到了民国时期，青帮的势力就只剩下“江淮泗”、“兴武泗”、“兴武六”、“嘉白”、“嘉海卫”和“三杭”六大联帮。但即使青帮势力大不如往昔，它依然是令人望而生畏的，不管是哪个政府，都不能忽视青帮的庞大势力。

季云卿是青帮的通字辈，在青帮中辈分排在前 24 代，也就是说，季云卿在青帮中属于长老级别。这个 24 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拿青帮大亨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做对比，这三人，同属青帮的“大”字辈，而季云卿仅比他们小了一代，由此可见，季云卿当时在青帮中地位显赫。因此，季云卿拥有足够的影响力，在当时的黑帮、政界、军界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里顺便说一句，青帮的前 24 代排序依次为：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理、大、通、悟、学，这 24 代对青帮的影响力最为巨大。

1928年前后，季云卿与青帮的大字辈长老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交往甚密，与大字辈黄金荣还是结拜兄弟。季云卿在上海、江苏广开香堂，大肆招收徒子徒孙，许多国民党政客、乡绅、兵痞等三教九流的人物，皆拜在季云卿门下，这些徒子徒孙们为季云卿绑架勒索、赌博贩毒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并且还还为作恶多端的季云卿撑起了一把又一把保护伞。

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请到了季云卿，季云卿出面，公共租界巡捕房就不得不卖他一个面子，将尚未定罪的李士群给放了出来。

这次被捕经历，让李士群明白了一个道理，个人的能力再强，没有一个有势力、有背景的人为自己撑腰，在这个纷乱的时代，个人也不过是蝼蚁一样存在。因此，李士群一出巡捕房，就跑到季云卿面前道谢，然后鞍前马后颇为殷勤地伺候了季云卿一阵子，最终，李士群被季云卿收为了门徒。

此时的李士群，虽然投靠了季云卿，却并没有脱离中国共产党，促使他最终下定决心叛党的，还是他的妻子叶吉卿。

再次被捕，走上叛党之路

上一节说到，促使李士群最终下定决心叛党的，还是他的妻子叶吉卿。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是位从小受尽万千宠爱的千金小姐，她也跟随李士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而，她并不热爱革命、热爱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自由”的思想，她不过是夫唱妇随而已。叶吉卿对丈夫的期望，也和革命没什么关系，她不过希望自己的丈夫能够出人头地，让自己扬眉吐气，高人一等而已。因此，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叶吉卿很担心李士群会被国民党的军统局或者中统局抓捕，因而，她一次又一次劝说李士群脱离中国共产党，做一名商人算了。叶吉卿对李士群也算是忠心耿耿，为了李士群，她做了很多那个年代，一般妻子都做不到的事情，李士群前后被捕三次，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安全出狱，叶吉卿功不可没，当然，这都是后话。当下，因为李士群的第一次被捕，叶吉卿强烈要求李士群脱离中国共产党。

李士群理解妻子的担心，但李士群不甘心脱离中国共产党，他不

甘心，不是因为爱党，爱革命，而是认定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只有权力才是唯一可靠的东西，只有权力才能让自己过入上人的日子，一个没有权势的商人，只能沦落为别人的“钱袋子”，因此他一边安抚妻子，一边继续在中共特科工作。

然而李士群的第一次被捕，却让叶吉卿惶惶不安到了极点，作为一名妻子，她不想看到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家庭支柱出现任何意外。因此，在李士群被释放后，叶吉卿三番五次泪眼朦胧地劝说李士群脱离中国共产党，这就使得李士群萌生了退党之心。然而李士群却没有正式向中国共产党提出退党申请，他担心失去了中国共产党这把保护伞后，再被国民党追捕，自己就如同丧家之犬无路可走了。因此，李士群在向叶吉卿阐述了利害关系后，对妻子发誓，只要有机会，自己就退出中国共产党。叶吉卿如此坚决地劝说李士群退出中国共产党，总算得到了李士群的誓言，于是，在听到丈夫发誓，一旦有机会，就脱离中国共产党后，叶吉卿也就没有再逼迫李士群当即退出中国共产党。

转眼，到了1932年6月，叶吉卿担心的事情又发生了，李士群再次被捕，这次逮捕他的，是国民党中央局上海区的特务们。李士群被国民党中央局逮捕后，由于其在中国共产党内身份低微，对党内事务了解不多，因此，国民党中央局的特务们并没有特别在意他，就把李士群关了起来而已，但也没有将李士群短期内就释放的意思。

当时，国民党严惩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即便是李士群这样的基层共产党员，一旦被国民党抓捕，最终的下场也是被国民党当局枪毙。但是因为李士群不能为中统局提供多少有关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情报，因此他被审问和拷打的次数较少，只能每天提心吊胆地在监狱里等待死讯。但是李士群并未完全绝望，他期盼中国共产党会将他们这些被捕的党员营救出狱。这时候，叶吉卿又一次为了营救丈夫出狱，四处奔波。

为了救出李士群，叶吉卿来到当时负责逮捕李士群的国民党中央局上海区特务马绍武面前，请求他放了李士群。关于叶吉卿到底是如何说服马绍武放了自己的丈夫，而马绍武到底是怎样逼降李士群的，

笔者查询了很多资料，却还是无法甄别到底以下说法是否确切属实。

有资料表明，在马绍武的严刑拷打下，李士群并没有低头。当叶吉卿出现在马绍武面前时，马绍武突然有了主意，他将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押到了李士群面前，指挥手下特务，当着李士群的面侮辱他的妻子，而李士群则是在马绍武所指挥的特务们即将强暴叶吉卿的最后时刻，才叛变的。

事实上，这种说法未免有些缺乏考证，因为当时李士群虽然是中共特科的地下党员，但是并没有参与过太多的行动，也没有太高的职位，所以按理说，用不着马绍武大动干戈，亲自审讯，那么事实究竟如何，历史已经过去，真相已无可考证。总之，1932年6月，李士群叛变了！

然而被捕后的遭遇，在李士群心中留下了深深的阴影，这也就是为什么李士群在组建汪伪76号后，对中统局和军统局从不手软的重要原因。

虽然李士群叛变了，但是他却不敢向任何人公开透漏自己叛变了中国共产党，他害怕中国共产党会抓捕自己，所以，他打算做个双料间谍，一边获取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情报，为国民党中统局效力；一边获取国民党中统局的情报，为中国共产党效力。

李士群盘算得很好，但是他却没有想到，在他叛党投敌后，却接到中国共产党给他的任务——刺杀丁默邨。

自编自导暗杀马绍武

说到丁默邨，这里要交代一句，丁默邨也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1924年叛变，加入了国民党。

李士群加入国民党阵营后，依旧以一名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各种事件的新闻记者的身份公开出现，他依旧在当时由中统特派员丁默邨主持的《社会新闻》手下做编辑。然而此时的李士群和丁默邨，因为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同为中统局的特务，工作中朝夕相处，一起打牌、一起行动，关系已完全不同以前，也称得上一条船上的知己。所以，当李士群接到中国共产党交给他刺杀丁默邨的任务后，便不假

思索地将这件事情告诉了丁默邨。

当然，李士群对此事，早已有了对策，然而，他却不肯全盘向丁默邨托出。当丁默邨听到李士群说，中国共产党下令李士群制裁自己时，也颇感头疼，一时间难免有些手足无措，李士群这才向他献计，建议采取“李代桃僵”的办法。那么，什么是“李代桃僵”呢？也就是李士群先向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组织提出一份申请，申请将刺杀丁默邨的计划延后，先行刺杀中统上海区负责人马绍武，这样，丁默邨可以暂时保命，让马绍武带自己先行受死。

李士群为什么要这么筹划呢？前文说过，李士群曾经被马绍武审讯，而且审讯时还让手下的中统特务侮辱了自己的妻子叶吉卿，所以，李士群能够想到的“李代桃僵”的人，自然就是马绍武。同时，马绍武当时对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威胁更大，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十之八九会同意李士群的建议。再者，这样既能保住丁默邨的性命，李士群自己又不会被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怀疑已经叛变。最后，借助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名义将马绍武除掉，李士群自己还不会引起中统局的怀疑。这样“一石四鸟”的计策，李士群想了很久才确定下来。

李士群的这个计策，让丁默邨对李士群刮目相看，也让丁默邨更加信任和感激李士群，李士群也就此为自己后来拉丁默邨上汪伪 76 号的贼船奠定了基础。最重要的是，能够借助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的手，为自己和叶吉卿出一口憋在心里很久的恶气，李士群胸中大快。

于是，李士群向中国共产党上海区负责人申请先行刺杀中统上海区负责人马绍武，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地下党组织经过研究，一致认为马绍武对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的威胁性远大于丁默邨，于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地下党组织同意了李士群的请求，并派出“打狗队”协助他的行动。这样一来，李士群“一石四鸟”的计划得以实施。

“打狗队”是中国共特科为了对抗国民党的白色恐怖而特别成立的组织，这个组织相对独立，不与上海当地党组织发生直接的联系。“打狗队”单独作业，内部称其为“打狗队”，而其正式名称为“红色恐

怖队”。“打狗队”的主要职能是清除信仰不坚定，被捕后背叛组织，出卖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中国共产党带来巨大损失的叛徒。“打狗队”成员各个身怀绝技，在当时，国民党军统局和总统局在军事方面和情报力量方面占据了绝对优势，然而“打狗队”的成员们却屡屡突破国民党对中国共产党的叛徒们的严密保护，将一个又一个害群之马扼杀。当接到李士群的申请后，上海区地下党组织在决定暂缓对丁默邨的追杀，展开对中统上海区负责人马绍武的暗杀后，中共特科决定由李士群为中国共产党提供关于马绍武的一切情报，由“打狗队”队员负责行动，将上海区最积极的反共、反革命的国民党中统局上海区负责人马绍武击杀，以便于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党组织能够获得喘息和发展的时间。

马绍武时任国民党特工总部上海区区长，在白色恐怖时期，他指挥抓捕了多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破坏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组织活动处，给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造成了巨大的打击。马绍武就像是扎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地下党组织后背上的一根毒针，随时可能让共产党上海区地下党组织受伤，所以，马绍武一直让上海区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们坐立不安，只有除掉他，地下党们才能安心工作。所以，不管李士群提议先行刺杀马绍武的初衷如何，除掉马绍武，对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地下党组织来说，都是当务之急。于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地下党组织没有过多地犹豫，在1933年6月14日晚，根据李士群提供的线索，安排“打狗队”埋伏在了马绍武即将出现的东方饭店附近。

当晚，当马绍武从东方饭店附近的一家妓院走出，李士群就对着暗处的“打狗队”队员和跟在马绍武身边的丁默邨打了手势，随后，几声枪声响起，马绍武被击中倒地，而丁默邨在枪声响起那一刻，也佯装被击中倒地。于是，“打狗队”顺利地杀死了马绍武。

因马绍武案再次入狱

马绍武的死，令他的顶头上司——时任国民党中统局局长的徐恩曾感到十分震惊，也十分愤怒，通过调查，徐恩曾得知，这是中国共

产党上海区地下党组织所为，他把共产党此次暗杀马绍武，视作一种挑衅，决心严厉搜查，抓捕刺杀马绍武的凶手。

然而，心思缜密的徐恩曾却认定，如果没有内奸，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地下党组织绝对不会知道马绍武究竟在哪里出没，因此，为了有力反击共产党上海区地下党组织，也为了给马绍武报仇，给中统局涨涨士气，徐恩曾决定揪出藏在中统局内部的叛徒，抓捕杀害马绍武的真凶。

经过中统局的多方侦察，最后，徐恩曾认定，李士群和丁默邨的嫌疑最大，于是将二人一起扣押审讯。后来，丁默邨被好友保释，无罪释放，而李士群则被押送到中统局南京特工总部继续接受拷问。

这一次被捕和前两次被捕不同，这一次，李士群重案在身。作为要犯，在中统局南京特工总部，李士群第一次尝到了国民党特务对付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各种刑罚手段：老虎凳、皮鞭、插针……这一次，李士群遭到了各种非人的折磨，但是他终究还是没有说出是他提供情报给中国共产党上海区地下党组织，因为如果不说，他也许还有活命的机会；如果说了，他就会被认定是真凶，只有死路一条了。

这一次，肯不顾一切去营救国民党中统局要犯李士群的，自然还是李士群的妻子叶吉卿。

李士群被捕后不久，叶吉卿就携带大量珠宝首饰，找到了当时负责审理李士群的马啸天、苏成德等人，在送了大量的珠宝首饰后，李士群终于不再被严刑拷打，刑讯逼供。然而，由于此事被中统局局长徐恩曾严密关注，所以马啸天、苏成德等人绝不敢私自释放李士群，于是，他们给叶吉卿出了个主意，那就是在马啸天、苏成德等人的斡旋下，由叶吉卿自己去见徐恩曾。

徐恩曾是当时国民党中统局的第一把手，抓捕李士群的命令自然是他下达的，所以，要他释放李士群，可能性并不大。然而，徐恩曾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嗜好，也是他的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好色。可以说，徐恩曾的好色，在国民党内部尽人皆知，稍有姿色的女人，哪怕是自己的朋友、同事的妻女，只要有可能，只要不危及自己的性命和官职，他都要染指。于是有些无耻之徒，为了讨好徐恩曾，四处网罗美女、

或者将自己的妻女送与徐恩曾，以图从他这里谋得一官半职或者一次升迁。所以，大多数国民党官员都知道，只要不违背蒋介石、陈立夫和陈果夫的命令，求徐恩曾办事，送美女给他比送什么都管用。这也是马啸天、苏成德等人让叶吉卿自己去见徐恩曾的真正原因。

当徐恩曾看到大家闺秀出身，气质独特、楚楚可怜的叶吉卿后，几乎把什么都忘记了，他心痒难耐地想要拥有这位美人。叶吉卿自然也看出了徐恩曾的心思，为了救出自己的丈夫，叶吉卿使出浑身解数，终于让徐恩曾心满意足。果然，在叶吉卿满足了徐恩曾的欲望后，徐恩曾没有再深究李士群是否与杀死马绍武有关，而是很快就下了一道指令，释放了李士群，并任命他为“南京区侦察股”股员。在妻子叶吉卿的努力下，李士群又一次被释放出狱，恢复了自由，这次死里逃生，让李士群更加坚定，只有成为人上人，拥有无上的权势，自己和妻子才能不再任人宰割，万事无忧。

叛国，在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抗日战争爆发伊始，日本以迅猛的攻势攻陷了中国多个城市，而南京的沦陷，把胆小怕死的李士群吓破了胆，李士群迅速逃往汉口。李士群害怕日本很快就要全线胜利，占领中国，于是贪生怕死又渴望权力的李士群萌生了脱离国民党，投靠日本政府的心思。

萌动了投靠日本政府的心思后，李士群就再难将它熄灭，于是李士群越来越坐不住，想要早日和日本政府搭上线，成为第一批投靠日本政府的“领头人”，早日被日本政府重用。于是，李士群从汉口偷偷前往香港。到了香港，李士群就与当时日本驻香港大使馆总领事中村丰一取得了联系，在与李士群的接触中，中村丰一认为李士群在香港能够发挥的能量，远不如在内地搞情报工作更重要，于是中村丰一将李士群介绍给了当时日本驻上海大使馆的书记官清水董边。

随后，李士群又回到了上海，见到了日本驻上海大使馆的书记官清水董边。清水董边为了探测李士群的能力，以及李士群对日本的忠诚度，命令李士群先自行上海大使馆搜集国民党内部的情报资料，

李士群为了在清水董边面前表现自己，在接到清水董边分派的任务后，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下来，就这样，李士群从一个叛党投敌的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又变成了叛党投日的中国国民党的叛徒。

说到李士群叛国投敌，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李士群之所以能够这么快就和日本政府取得联系，还和日本间谍川岛芳子有关。川岛芳子原本是清朝的格格，却成为了著名的日本特务。

在七·七事变发生后，中统局就曾命令南京总部的中统局特务们严密监视日本间谍和叛国汉奸们的行动，作为中统局的特务，李士群也参与了此项任务的实施。就是在执行此项任务的过程中，他见到了川岛芳子，面容姣好、婀娜多姿的川岛芳子让李士群心动不已，然而身为日本间谍的川岛芳子警惕性却很高，李士群很难找到机会靠近川岛芳子。在南京沦陷，李士群潜逃到汉口后，他竟然再次看到了让他神魂颠倒的川岛芳子。

在汉口，李士群再次伺机接近川岛芳子，而川岛芳子此时，也在物色能够为她提供情报的中国特务，于是二人逐渐熟识。一次，酒后，李士群不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这让川岛芳子认定，李士群能够为己所用，于是，她用“美人计”诱惑了李士群，令本来就有心投靠日本政府的李士群不仅向她透漏了大量国民党中统局的内部机密，还对她生出了唯命是从的所谓感情来。后来，在川岛芳子的多次诱惑后，李士群沉溺在川岛芳子的温柔乡里无法自拔，只好任由川岛芳子摆弄，多次泄露中统局的各种重要机密，从那以后，李士群就走上了汉奸之路。

只是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纸里包不住火，李士群与川岛芳子事情被李士群的其他同事察觉，报告给了中统局的相关负责人，然而谁也没想到，这份报告并没有交到中统头子徐恩曾的手里，而是落在了丁默邨的手中，于是，与李士群交往甚厚，还曾经被李士群救过一命的丁默邨擅做主张，将报告压了下来，还将这件事情告诉了李士群。

于是，李士群这才与川岛芳子商议，为了避免被中统局怀疑，由川岛芳子将李士群引荐给日本驻香港大使馆总领事中村丰一，李士群

这才算正式投靠日本政府，走上了叛国的不归之路。

后来，川岛芳子又将李士群介绍给了日本驻上海特务机构“梅机关”的负责人土肥原贤二和晴气庆胤，由此，李士群叛国投敌，迫害中统局、军统局，杀害中国共产党党员、各界进步人士以及爱国人员的汉奸生涯正式开始。

第二节 军统刺杀李士群未遂

李士群叛变了国民党后，就成为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叛国者，他的民族良知已经湮灭，原本，对于他来讲，中国的哪个党派发展形势好，能让他敛财，他就抱紧哪个党派的大腿，如今，为了得到最大的个人利益，他宁可成为日本政府的走狗，被中国人所唾弃，所不齿，也丝毫不感到羞耻了，他毫不犹豫地向着钱、权看齐。

李士群入住大西路 67 号

李士群投靠日本政府后，有心立刻为日本主子做出一番成绩，以表现自己的能力和忠心，但基于以下几个原因，心机颇深的他却并没有立刻公开组建特务组织。

原因一：李士群当时囊中羞涩，拿不出足够的资金招兵买马，拉拢人马。

原因二：日本军队刚刚占领上海不久，在上海的势力还不够强大，英、法、美等帝国在上海还拥有一些既得利益，李士群担心自己若是贸然行动，会触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倘若真的触怒了这些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恐怕到时候日本政府就会把他李士群推出去，用他去消除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怒火。

原因三，在李士群成为汉奸之前，许多汉奸都死在了国民党上海区中统特务和军统特务的手里，李士群势单力孤，尚不能自保，一旦被国民党的特务盯上，恐怕性命难保。

出于这三点原因，当时的李士群，不敢公开建立服务于日本政府

的特务组织。

自从李士群投靠了日本政府，他就开始担心自己的安危。李士群十分清楚，一旦自己成为汉奸的事情被公开，那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都不会放过自己，自己就会马上登上“打狗队”和“抗日锄奸团”的暗杀名单。所以，为了自身安全，李士群并没有将自己叛国的消息“广而告之”，而且，他着手为自己寻找一处住宅，以便加强自身的安全防范。经过多次挑选，李士群选中了上海大西路 67 号，这栋房子的周边环境让李士群十分安心，他甚至称这栋房子为“保险房”、“防弹房”。

那么，大西路 67 号的周边环境究竟怎样呢？

大西路 67 号西边，是日本走狗谢筱初的家。谢筱初虽然并没有直接参政，但他却是个不折不扣的不法商人、经济汉奸，他将中国商品低价卖给日本，将日本的垃圾产品高价卖给中国人，为日本积累战争所需的资金。对于这样一个邻居，李士群很放心，他不但丝毫不担心谢筱初会出卖自己，向国民党和共产党透漏自己的行踪，还觉得有这样一个有钱有势、防守严密的邻居，自己也相对安心一些。而大西路 67 号的东侧，则是美国驻上海的一所兵营。美国势力强大，国民党在很多地方都要依靠美国，除非万不得已，国民党军队绝对不会骚扰美国兵营，给自己惹麻烦，所以这所美国驻上海兵营，无形中成了大西路 67 号，也就是李士群选择的住处的义务护卫。大西路 67 号的对面，是云飞汽车行，汽车行和大西路 67 号之间，有一条马路，云飞汽车行外是一道几十米长的墙，这就使得从大西路 67 号向外看，几十米的道路上的情况一览无遗、毫无阻挡。所以，李士群对大西路 67 号的周边环境非常满意，所以，他满意地认定自己找到了一栋保险房子。

于是，李士群全家搬进了保险房子大西路 67 号，而且，从入住大西路 67 号以后，李士群再也不轻易离开大西路 67 号，即便必须要离开住处，他也会在离开之前大摆瞒天过海的阵势，让人摸不清他是否还在大西路 67 号内。自 1938 年底到 1939 年上半年汪伪 76 号建立之前，李士群一直在大西路 67 号办公和居住。

有了安全住所后，李士群开始放心地小规模拉拢人马，他先后拉拢了中统驻上海情报员唐惠民、国民党驻上海特派员章正范，并且通过章正范的关系，将杜月笙的徒弟汪曼云也拉拢了过来。拉拢汪曼云是李士群一直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因为汪伪 76 号成立后，许多事情证明，汪曼云不仅帮助李士群获取了大量情报，还一次又一次挽救了李士群的性命。

军统局密谋刺杀李士群的行动被泄露

李士群拉拢国民党高官要员的事情做得虽然隐蔽，但很快还是被戴笠察觉，经过调查，戴笠大为震惊地发现，李士群已经背叛了中统局，认贼作父，投靠了日本政府。虽然军统局和中统局一直竞争激烈，李士群背叛中统局这件事让戴笠颇感幸灾乐祸，但是李士群为了在日本主子面前表现自己、立功求赏，频频与国民政府乃至军统局作对，阻扰军统的锄奸计划，无疑也撸了戴笠这只老虎的虎须，让对蒋介石始终忠心耿耿的戴笠感觉自己的威严受到了挑衅。于是，1938 年 12 月，戴笠亲自下达命令，要求军统局上海区密谋暗杀李士群。

接到暗杀李士群任务的军统上海行动组组长于松乔，在接到“家长”戴笠的命令后，颇有些不以为然，李士群是谁，他长什么样子，做过什么事情，有什么权势，于松乔全然不知。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当时的李士群，的确不过是个小人物而已，也没啥值得大家关注的作为。所以，对于这样一个什么都没有的小人物，“戴老板”亲自下令给予松乔，颇让于松乔感觉有些杀鸡用牛刀，大材小用的味道！于松乔认为，凭他的能力，暗杀李士群就是信手拈来的事。于是，于松乔便开始着手准备执行暗杀李士群的任务。

于松乔通过调查，终于知道了李士群的种种经历，于是，他很快就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李士群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工作期间，因为太不起眼，所以很少有人认识李士群，也就更少有人能够清楚描述李士群究竟长成什么样子。于是，于松乔找到在上海交际较广，有一定影响力的汪曼云，请汪曼云为自己找到一张李士群本人的照片。

于松乔之所以找到汪曼云，不仅仅是因为二人同为杜月笙的门生，

还因为汪曼云不仅是青帮新一辈中的“一把手”，还兼任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委员，所以以汪曼云的社会交往，于松乔理所当然地认为他能够找到李士群的照片。

然而，于松乔万万没有想到，汪曼云也是贪生怕死之辈，他和李士群早就勾搭上了，他上了李士群的贼船，成为隐藏在国民政府中的一条日本走狗，暗中也为日本政府提供情报。

所以，当汪曼云听于松乔说，想要一张李士群的照片时，便貌似漫不经心地问于松乔，要李士群的照片干什么，于松乔对汪曼云没有丝毫的戒备之心，他毫不隐瞒地将戴笠的命令对汪曼云全盘托出，于是汪曼云便获知了李士群已被军统局查明是汉奸，并上了“锄奸”黑名单，戴笠下令于松乔暗杀李士群的情报。

汪曼云既然已经被李士群拉上了贼船，投入了日本政府的怀抱，自然不会把李士群的照片给于松乔，为了避免引起于松乔的怀疑，进而连累到自己，汪曼云推说自己手头也没有李士群的照片，让于松乔等几天，他找找看。于松乔听后也没有怀疑，他也正好趁着这几天时间，到李士群所住的大西路67号周围去查看查看，好根据情况制订暗杀计划，这样，自己拿到李士群的照片后，就能迅速展开暗杀行动了。于是，于松乔满怀感激之心走了，他等待着汪曼云给自己找到李士群的照片。

于松乔一走，汪曼云就秘密联络了李士群，告诉他军统局的“老板”戴笠已经下令军统特务秘密暗杀他，这些日子，军统特务们会埋伏在他的房子四周，伺机暗杀他。李士群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惴惴不安，连连向汪曼云表示感谢。

果然，没几天，大西路67号前的街道上就出现了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李士群的“看家狗”们由于早早就接到了李士群的命令，所以对大西路67号周围出现的陌生人进行了严密的监视。

最让李士群怀疑的，就是一个打着“测字问卜”的幌子的道士，这个道士在大西路67号前面的街道上转悠了好久，这让李士群的“看家狗”们颇为紧张。于是，李士群的“看家狗”之一就走到了这名道士面前，请他到大西路67号院内来，为自己的主人算一卦。这名道

士就是于松乔伪装的，他听了这话心中生疑，随后，一把手枪抵在了于松乔的后腰上，于松乔迅速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而此时，于松乔还没有拿到李士群的照片，也不能冒死进入大西路 67 号行刺李士群，于是，于松乔只得收了算卦的幌子，对李士群的“看家狗”拱拱手，说自己这点算卦的本事不过是骗人的把戏，登不得大雅之堂，还请长官饶了小人吧。于松乔就此撤离了大西路 67 号附近，而其他军统特务，也就此撤离，刺杀李士群的行动就此暂告一段落。

当时，李士群还没有扯起汪伪 76 号这张虎皮，也没有足以威慑人心的特务组织，所以于松乔在刺杀李士群的行动被泄露后，并没有马上再次刺杀李士群。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在于松乔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却在以后的日子里，屡次让军统局的特务们领教了他的狡猾、警惕和狠毒。

军统局暗杀张敬尧，吓坏汉奸李士群

李士群在得知军统意欲暗杀自己后，陷入了极度的恐惧，开始整夜整夜睡不着觉，尽管后来汪曼云送来情报，于松乔刺杀李士群的行动暂告一段落，李士群还是忧心忡忡。特别是在得知军统局成功暗杀了大汉奸张敬尧之后，李士群开始噩梦连连，他十分惊恐，担心自己有天也会被军统局暗杀。李士群怕死，他还没有享受到自己想要的荣华富贵，还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权势，他当然不想死，所以每每想起死在军统手里的特务张敬尧，李士群都心惊肉跳。

那么，军统局到底如何暗杀了张敬尧？

1937 年 7 月 7 日晚，日本军队以失踪了一名日本士兵为由，意欲从卢沟桥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进行搜索，日本军队的无理要求被驻守在卢沟桥的中国守军拒绝，日本军队立刻利用这件事，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战争。

战争开始后，中国军队与日本军队展开了堪称惨烈的战斗，当时，中日双方的伤亡比例是 5 : 1。也就是说，在战斗中，牺牲五个中国军人，才牺牲一个日本军人。国民党内的许多高层官员，在看到日本军队在中国战场上迅速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后，被来势汹汹的日军吓

得屁滚尿流。一些贪生怕死之徒变节失守、卖国求荣，甚至心甘情愿地成为了趴在日本人脚边苟延残喘的汉奸走狗。

那些曾经的国民党高官的叛变，令身为军统局“老板”的戴笠深恶痛绝，虽然这些人的叛党叛国，让他能借此在国民党各个重要部门安插更多的军统局特务，从而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但是这些人的叛变却自然引起了他的顶头上司蒋介石的震怒，戴笠因此就遭受了多次的无妄之灾，多次无故被蒋介石责骂，因此，戴笠恨不得将这些汉奸一一斩杀，以平息蒋介石的怒火，也好让自己在蒋介石心中的地位有所提升。

抗日战争期间，戴笠领导手下的军统局特务们在国内外广泛展开了大规模的抗日锄奸行动，虽然戴笠如此积极努力，是为了个人的职位迁升，但是这些行动的确有力地惩处了部分卖国投敌的汉奸。而戴笠手下的许多热血青年、有志之士，也真心实意地为了中国的解放，为了百姓过上安居乐业的日子，在抗日锄奸的战场上忘我工作，甚至奉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在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局锄奸成绩斐然，军统局的锄奸成绩单上，记录着一个又一个惊心动魄的锄奸故事。

在军统局的锄奸成绩单上，第一人就是皖系军阀张敬尧。

张敬尧是皖系军阀的首领之一，曾担任过北洋军第三混成旅旅长、江西南昌镇守使等官职。张敬尧年轻时放浪形骸，未加入军队时，当过盗贼杀过人，因此，在张敬尧成为军阀后，依然没有改变自己残暴的本性，处处欺压百姓。曾经有人写过一副对联，讽刺张敬尧，说他堪比虎豹豺狼，这副对联的内容是：堂堂手张，尧舜禹汤，一二三四，虎豹豺狼。显然，这样残暴的军阀，是得不到百姓的支持的，而其他的军阀，也因为他的暴虐，不愿与他为伍。

1928年9月，张宗昌被国民党军队打败，连夜逃往大连，到了大连之后，张敬尧本打算投奔其他的军阀，找一个暂居之所，却发现没有一个军阀愿意接受他，于是，他最终蜗居在大连的一处民居中，期待能有“伯乐”赏识他这匹“千里马”，重新起用他，支持他招兵买马重整旗鼓。张敬尧苦苦等待了四年，四年后，他终于遇到了所谓“赏

识”他的“伯乐”，这个“伯乐”，将他永远地推向了中华民族的对立面。

1932年，日本占领热河后，决定在热河建立傀儡政权，于是，日本政府开始寻觅能够在傀儡政府中任职的中国人，这些中国人必须是亲日的、有能力的、在中国曾经有或者现在还有政治影响力的。为了找到符合条件的中国人，日本政府想到了北洋军阀的军官们，日本政府打算从北洋军阀的军官中挑选一位，成为傀儡政府的主持人。

最后，日本政府经过多番的调查和讨论，将目标锁定在原北洋军阀干将张敬尧身上。正因为张敬尧已经败落，所以日本政府认为以张敬尧目前的处境，最容易接受日本政府开出的条件，出任傀儡政府的主持人。

于是，日本政府派出人员到天津找了张敬尧好几次，承诺给他种种好处，劝他叛国投日，做日本在热河建立的傀儡政府的主持人。

张敬尧根本就不在乎什么民族大义，他已然如丧家之犬，自然对日本政府的“好意”颇为感激，于是，他欣然同意了日本政府提出的条件，接受了日本政府的任命，担任了所谓的“平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随后，日本政府给了张敬尧700万元的活动经费，命他迅速组建傀儡政府。

张敬尧拿到这笔巨款后，迅速开展行动，化名“常石谷”，偷偷潜入了北平，住进了六国饭店，开始招揽人手，准备筹建傀儡政府，并联合日军一起发动“北平暴动”。

张敬尧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一切都做得很周密，殊不知他的行踪早已被军统局的特务们察觉，并且军统局的特务们已经秘密监视了他许久。从张敬尧与日本人接触，到离开大连进入北平，直到住进六国饭店，所有的行动，都被军统局的特务们毫无遗漏地汇报给了军统局局长戴笠。

戴笠将张敬尧的一系列行踪和所获得的关于日本政府给付张敬尧700万元活动经费组建傀儡政府的情报如实汇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听后颇为重视。虽然当时张敬尧退出政坛已经四年有余，但是如果张敬尧广为收买国民党军官、网罗人员组建傀儡政府，那么那些在官场

上失意的原北洋军阀的军人和政客，就有可能真的成为张敬尧的属下。这些失意军人和政客的辉煌虽然已成昨日黄花，但是如果张敬尧成功地将他们聚集在一起，这些人还是能够掀起风浪，破坏国民政府的稳定的。于是，蒋介石当即下令戴笠制裁张敬尧，除掉这个叛国投日的大汉奸。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十分谨慎地开始筹划暗杀张敬尧。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戴笠亲自点将，起用了会说一口流利的广东话和标准南洋话的军统局老牌特务郑介民。郑介民曾经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地居住过一段时间，所以郑介民的马来话说的和当地人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不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的常住居民，根本就听不出郑介民不是当地人，而且郑介民还会说英语，因此他能够利用自己的语言优势，很好地隐藏自己的身份。此外，郑介民是一名老牌特务，他的警惕性高，经验丰富，所以戴笠认定，他是暗杀行动的最佳人选。

为了确保此次行动万无一失，戴笠还特意将自己的左膀右臂，军统四大金刚中的两位——王天木和陈恭澍从天津抽调到北平，协助暗杀张敬尧。

经过多次商议，戴笠最终确定了暗杀张敬尧的方案。

暗杀方案确定后，郑介民乔装打扮成南洋富商，以回国做人参生意为由，入住六国饭店。

这六国饭店，是当时北平一等一的饭店，是当时各国公使、达官贵人、各行各业的巨商和社会名流聚集地。它始建于1901年，由一位专做火车车厢生意的比利时人建造，外形类似教会教堂，是当时北平最豪华的西式宾馆。1905年，由英、法、美、德、俄、日六国合资改建，并改名为六国饭店。改建后的六国饭店一共五层，地上四层，地下一层，是当时北平最高的楼房之一。由于六国饭店的投资者关系复杂，实力庞大，因此入住六国饭店的大多是非贵即富的名流，一旦有重大聚会，就都选定六国饭店。因此，六国饭店的人气越来越旺，而许多下野的军政要员，也逐渐将六国饭店作为庇护地，长期包房居住在六国饭店。所以，许多巨商和政客来到北平后，下榻的第一个选择，就是六国饭店。

1933年4月底，郑介民带着十多个沉甸甸的箱子来到了六国饭店，为了彰显身份，他包下了六国饭店的一个豪华包间。郑介民所扮演的南洋富商刚一住进六国饭店，张敬尧的随从就开始注意这个南洋富商了。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动荡不安，富商们几乎成了军阀、黑社会、国民党等武装组织的“钱袋子”，回国做生意赚得到赚不到钱另说，在当时混乱的局势下，携巨款回国做生意，能不能保住性命都难说，所以，并没有几个华侨愿意回国做生意。当然，也偶有华侨回国做生意，但偏偏是在张敬尧住进六国饭店没几天，这个南洋富商就出现了，要说是巧合，也未免太赶巧了。于是，张敬尧的随从心生疑窦，开始关注这位南洋富商。

经过几天的观察后，张敬尧的随从们发现，这名华侨入住六国饭店仅仅几天，就凭借高超的交际手腕和阔绰的出手，和饭店里身份低下，却消息灵通的茶房、侍从、跑堂的混得跟亲哥们儿一样，甚至和这些人称兄道弟，这让这些随从们更加不安起来，一位身份高贵的商人，如果不是有特殊的目的，怎么可能会自降身份和那些“低贱”的人混在一起呢！为了主子的安全，随从们将这件事情迅速报告给了张敬尧，希望他能够提高警惕，提防这位南洋富商。

然而张敬尧一心拉拢人马组建傀儡政府，无暇顾及此事，而且从郑介民扮成南洋富商入住六国饭店后，张敬尧就注意到了这位南洋富商，他通过观察，发现这位南洋富商的行为、言谈举止、语气语调，与他接触过的南洋当地的富商并没有什么差别，所以也就没有把随从们的提醒放在心上。而且张敬尧以为自己行动缜密，一定没有人知道自己已经离开天津，秘密进入北平，而且他入住六国饭店用的是“常石谷”这个化名，不会有人将他和已经隐退政坛四年的张敬尧联系起来。

不过，张敬尧还是坚持了一贯的谨慎小心和严密防卫，他还是要求随从们随时向他报告南洋富商的行踪，然后还是小心隐匿自己的行踪。

张敬尧行踪不定，他每次出门都很诡秘，外出途中会换乘好几辆

黄包车。张敬尧在六国饭店订了几个房间，有时，他让随从将自己约好的人带到六国饭店来见面，却并不在自己居住的包间与客人见面。由于张敬尧在六国饭店订了好几个房间，就算是住在六国饭店里的人，也摸不清楚他每天到底住在哪个房间。就算是张敬尧的随从，也摸不清张敬尧的行踪，因为他随时可能从六国饭店的这个房间到那个房间去，即便是半夜三更，也会调换房间睡觉。这就给郑介民等军统特工们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暗杀的最好时机是半夜三更，人们深度睡眠之时，此时睡眠中的人大脑反应最迟钝，暗杀成功率最高，然而由于张敬尧太过小心谨慎，给郑介民等人的暗杀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虽然郑介民早就调查清楚张敬尧和他的手下居住的包房的房间号、位置和周围环境，但是由于张敬尧“狡兔三窟”，郑介民等人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机会。

这一天，王天木带着军统特工白世维，装扮成生意人，到六国饭店找郑介民，他们和郑介民商讨了进一步的行动计划。中午时分，白世维等人从郑介民的房间走出来，准备出门去吃饭，看到一个裁缝，胳膊窝里夹着一个蓝色小包裹，走进六国饭店，王天木认识这名裁缝，他是西服店的掌柜。

于是王天木走上前去和掌柜的寒暄，问他到这里来干什么？掌柜随口回答，说有人前两天到店里来，说要做两套西服，让我今天来量尺寸，顺便确定一下西服的样式。王天木凭着多年的特务经验，对掌柜的话产生了兴趣，虽然王天木并没有再接着探问，但他却惦记上了这名西服店的掌柜。

王天木和白世维走出六国饭店后，来到陈恭澍的住所，把和郑介民沟通的情况告知了陈恭澍，郑介民告诉他们，张敬尧化名常石谷，下巴上有一撮毛，可以凭此名字和特征辨认并暗杀他。随后，王天木还将遇到西服店掌柜的事情也说给了陈恭澍，由于刚才在六国饭店门口，人多口杂不方便细问西服店的掌柜，所以王天木打算午饭后，到西服店去找西服店老板打听，到底是谁要做西装。

午饭后，王天木、白世维、陈恭澍三人来到西服店，掌柜的恰好就在店里，掌柜的以为王天木等人要定做西服，还没等王天木等人开

口，就表示自己最近这两天很忙，恐怕要过些日子才能接几位的活，他得先把常先生的服装和其他人的服装赶出来，常先生急着要，后天下午他就准备回天津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王天木突然意识到，这个常先生，十之八九就是张敬尧。随后，三人返回六国饭店，悄悄查询了六国饭店登记入住的人员名单，只有常石谷这样一个姓常的房客。于是，王天木等人开始紧张起来，如果西服店老板说的没错，那么过两天张敬尧就要离开北京了。也就是说，在这两天里，他们必须迅速完成“老板”戴笠交代下来的任务，可现在他们还没找到暗杀张敬尧的最佳时机。

就在王天木等人一筹莫展之时，一个绝佳的机会突然出现了。

1933年5月7日上午11时左右，王天木带着白世维来到六国饭店，准备开一个房间，住在六国饭店里，随时洞察张敬尧的行踪。因为三、四楼已经没有空房间了，所以王天木订了二楼的一间空房，订好房间后，王天木和白世维一起去看房间。看完房间，王天木和白世维跟在茶房伙计的后面，想跟着伙计抄近道走到饭店的大堂去，就在这时，他们路过走廊南侧的一间房子，从窗户外，他们偶然间看到一个人，这个人正侧身坐在床边，手里摆弄着一个小物件，下巴上正好有一撮小胡子。

王天木突然想到郑介民所说，张敬尧的下巴上有一撮小胡子，那么这个人是不是就是张敬尧呢？王天木担心自己看花眼，于是停下来，扭过身子朝窗户内仔细窥探，没错，此人下巴上就是有一撮毛，而且，王天木仔细回忆了一下，在所谓的常石谷登记入住的几套包间中，也的确有这一间。

白世维见王天木停了下来，也随着王天木的视线往窗户里面看，此时，王天木不再犹豫，拉过白世维，指着窗内的那个人悄声对白世维说，就是他，他就是张敬尧。

白世维二话没说，掏出手枪，对着窗户里的人，砰、砰、砰连开三枪，然后二人转头就往六国饭店门口飞奔，转身时，白世维用余光看到，窗内那个人被击中倒地。

当张敬尧的随从反应过来，携带枪械封锁了六国饭店时，王天

木和白世维早就逃出了六国饭店。随从们想到了那名可疑的南洋富商，便去南洋富商的房间里查看，却发现南洋富商早就不见了人影，房间里留下了十几只沉甸甸的箱子，随从打开箱子一看，里面竟然全是砖头。

5月8日，也就是第二天，报纸上就刊登出一条消息：巨商常石谷，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内遇刺，伤重不治身亡，凶手逃逸，尚未抓获。

张敬尧被暗杀一案，当时并没有在社会上激起多大的浪花，许多人以为，他只是被仇家暗杀，或者被人劫财不成反遭杀害，前面已经说过，当时的商人很多自身难保，而这两个原因，又是导致商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因为当时屡有商人遇害的案件发生，所以此事也并没有受到广泛的关注。

只有知晓张敬尧身份的一些人，隐约猜到他有可能是被军统局的特务们暗杀的，但是知晓张敬尧身份的那些人，不是张敬尧拉拢来的汉奸，就是打算跟着张敬尧一起做汉奸的人，谁也不敢公开站出来寻找暗杀张敬尧的凶手，于是此事就此不了了之。

直到几天后，国民党在北平机关报上发出报道，报道内容主要是：北洋皖系军阀首领之一张敬尧因叛国通敌，被“锄奸救国团”击毙在北平，此事才算真相大白。

这是军统局第一次对汉奸亮出自己锋利的刀锋，自此，以张敬尧被暗杀一案为开端，军统局的锄奸行动广泛展开，后来，不仅仅是汉奸，就连日本军官也屡屡被军统特工暗杀。

军统局的行动，让日本驻华特务机构紧张不已，他们再也不敢轻视中国特工，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他们迫切需要建立一支能够与军统局和中统局相抗衡的特工组织，找到一个在情报、暗杀、绑架等工作上皆不逊色于戴笠的特工的人来主持一支为日本政府服务的特务组织，从而制约和反击军统和中统的锄奸和暗杀行动。于是，李士群终于得到了日本驻华特务机构的重视，而李士群本人，也因为张敬尧被军统局暗杀惊恐不已，迫切希望组建一支能够保护自己、对抗军统和中统的特务机构，于是，李士群开始积极筹建汪伪76号。

攀上杜月笙的“大船”

虽然日本驻华特务机构认识到了李士群的重要性，但是要正式确定帮助李士群筹建亲日特务机构的计划，尚需时日。但是李士群却一刻也等不及了，他在遭遇军统暗杀后，已经忧心忡忡，而在张敬尧被军统局特工暗杀后，则更加坐卧不宁。李士群恨不得当下就杀到军统局的大本营去，将戴笠一干人等杀得片甲不留，以图彻底安心，不过他当然明白，自己这个想法不过是妄想而已，以他现在的实力，别说是杀到军统局的大本营了，就连走出大西路 67 号后，自己能不能再安全地回到大西路 67 号都是个问题。所以，李士群更加抱紧日本人的大腿，为日本人鞍前马后地效力，为了获取日本人更多的信任，他开始四处拉拢人马。

李士群苦于没钱没兵，自然就没有反击军统局的资本，于是李士群想到了拉拢社会各界的人来为自己服务。

为了拉拢社会各界人士，李士群想到了汪曼云，前文已经说过，汪曼云被李士群拉上了贼船，投靠了日本政府。当下，李士群便想通过汪曼云的社会关系，拉拢更多的人为自己服务。汪曼云是杜月笙的门徒，李士群于是盯上了杜月笙，倘若自己能够攀上杜月笙这条大船，那么必然可以联络到更多的人，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李士群是个心思活络的人，他非常清楚，能被杜月笙这样的大亨看得上眼的人，要么有强大的实力，要么有过人的能力，那么，当下，能力不足，实力平平的自己，又怎样才能进入杜月笙的法眼呢？

就在李士群正在为如何才能顺利与杜月笙攀上交情发愁之时，日本特务机构为李士群“送”来一份“大礼”——一份文件，文件名为《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就是这份文件，解决了李士群的燃眉之急。

这份文件是怎么来的呢？

当时，杜月笙在上海势力庞大，与政要名流的关系更是盘根错节，可以说，谁能得到杜月笙的支持，谁就能获得上海至少 1/3 的各界名流的支持，面对如此巨大的势力，贪婪无比的日本政府怎么可能不眼红？日本驻上海特务机构早就盯上杜月笙，他们威逼利诱杜月笙的门

徒为他们搜罗杜月笙的各种信息，还拉拢到一名杜月笙的亲信，为他们撰写了一份详细的文件，那就是《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

撰写此文件的，是杜月笙的亲信张师石，里面详细地记录了杜月笙的家庭、生辰、住址、爱好、产业、势力范围、弟子名单以及杜月笙和青帮黄金荣、张啸林、季云卿等人的关系，这份文件几乎囊括杜月笙的所有信息，如果谁想刺杀杜月笙，那么这份文件里就有足够充分的情报和信息。

李士群从日本驻上海特务机构看到这份文件后，如获至宝，他迅速想到，凭借此文件，他可以迅速进入杜月笙的法眼。于是，李士群拿到《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一文件后，迅速请汪曼云到大西路67号来做客。

汪曼云来到李士群的府邸后，李士群便将这份材料拿了出来，请汪曼云过目。李士群一边悄悄地观察汪曼云的神情，一边假仁假义地痛斥欺师灭祖的张师石不是个东西，应该被处以青帮“三刀六洞”的极刑，杀一儆百，让所有人都知道背叛青帮的下场。

汪曼云看完《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一文件后，顿时倒抽了一口冷气，如果日本特务机构按照这份文件，按图索骥搜捕文件中涉及的青帮门徒，不消数日，杜月笙耗费几十年精力建立起来的强大势力，就可能被日本特务们毁灭殆尽。

汪曼云握着这份文件，心情十分紧张，他把目光投向李士群，希望他能够对此事有所应对。既然李士群把这份文件拿了出来，那么李士群一定有应对之策。最后，李士群佯装无奈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之后，很严肃地对汪曼云表示，应该将这份文件交给杜月笙本人，相信杜月笙看完这份文件后，自然知道会怎么应对。

亲自将这份文件交给杜月笙，自然是汪曼云求之不得的事情。汪曼云也知道，李士群向来无利不起早，既然肯送给自己如此一份“大礼”，自然肯定有所要求。于是，汪曼云向李士群保证，到了香港之后，一定向杜月笙推荐李士群，并且一定向杜月笙说明这份文件是李士群费尽心机才得到，托他汪曼云呈给杜月笙的。

于是，李士群将这份文件送给了汪曼云，汪曼云火速赶到了香港，

将这份至关重要的文件交给了杜月笙，并信守自己对李士群的承诺，对杜月笙说明他能获得这份文件，全拜李士群所赐。汪曼云还对杜月笙说，李士群十分敬仰杜先生，希望能拜在先生门下，所以李士群甘愿冒被日本特务机构发现的危险，费尽心机获取了这份重要的文件，并托他带给杜先生，请杜先生对此事作出定夺。最后，汪曼云还恳请杜先生收李士群为门徒。

杜月笙拿到这份文件后，十分重视，不过他并没有立即答应收李士群为门徒，但是杜月笙却当即表示，以后如果李士群有什么解决不了的事情，他都会鼎力相助。汪曼云迅速想到李士群已经上了军统局“锄奸”的黑名单，于是汪曼云趁热打铁，请求杜月笙帮李士群通融一下，将李士群的名字从军统局的“锄奸”黑名单中删除。杜月笙与戴笠交往甚厚，这件事对杜月笙来说不过小事一桩，于是，杜月笙当着汪曼云的面给戴笠打了电话，戴笠当即在电话里答应杜月笙，将李士群的名字从军统局的“锄奸”黑名单中删除。

汪曼云从香港回到上海后，立即将香港之行的成果告诉了李士群，李士群颇为满意。

从此，李士群搭上了杜月笙这艘“大船”。搭上杜月笙这艘“大船”后，李士群在上海才算是彻底站稳了脚跟，不仅有日本政府为他撑腰，还有众多青帮门徒为他撑腰，李士群不再害怕被军统局暗杀，也更加大胆地开始招揽人马，筹备组建特务机构。

站稳脚跟后，李士群为了讨好日本主子，积极策反昔日的中统同僚，并通过各种关系积极策反军统官员和国民政府中抗日决心不坚定的官员，这些人贪图李士群抛出的金钱、权力和美色的诱饵，放弃了中国人最根本的民族气节，成为了汉奸。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李士群就成功地收买了数名国民党要员，并在军统内部安插了自己的“鼯鼠”，这些汉奸将国民政府和军统的机密情报偷偷泄露给了李士群，李士群将这些情报悉数汇报给日本驻上海的特务机构，导致军统局在江苏、安徽、浙江等地的行动一次又一次失败，军统局因此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在此之前，日本政府虽然已经开始重视李士群，但是并没有真正

重用他，只把他当成一名小卒，每个月仅仅发给他 3000 日元的活动经费，而且没有给他配备枪械。

而在李士群一次次提供了有效的情报，为日本特务机关一次次卖命之后，日本政府终于意识到，还是中国人了解中国人，利用中国人来对付中国人的特务组织，所取得的成绩将远远高于用日本特务来对付中国特务。自此，日本政府才逐渐将帮助李士群组建特务组织，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自此以后，李士群在日本主子面前也算立稳了脚跟，开始了他所谓的“平步青云”的政治仕途。

拉丁默邨上“贼船”

李士群对于筹建亲日特务组织，还有很多想法。李士群深知，虽然自己已经攀上了杜月笙这艘大船，也因为表现出色而得到日本主子的赏识，但他个人在上海滩并不具备强大的影响力，单靠自己，不足以拉拢更多的国民政府的官员，除非能找到一个参加革命更早，在国民政府中有一定资历和号召力的人来，和自己一起组建亲日特务组织。

那么，谁是那个有资历、有影响力，并且愿意和他李士群一起组建亲日特务组织的人呢？在李士群所认识的国民政府的诸多官员中，大多数人的职位都不高，所以势力和影响力都不足，这让李士群颇为头疼。就在李士群为找到这样一个人而冥思苦想之际，他安置在军统内部的“鼯鼠”送来消息，那就是他的老朋友丁默邨，竟然被蒋介石免去了一切职务，当下，丁默邨以病重为由，离开了南京，正在昆明养病。

这则消息让李士群眼前一亮，怎么把老朋友丁默邨给忘了！丁默邨不就是自己苦苦寻找的那个人吗？丁默邨和自己有着过命的交情，丁默邨曾经在川岛芳子一事中救过自己一命，而自己也曾在刺杀马绍武一案中，帮助丁默邨躲过了中国共产党的暗杀。丁默邨在国民政府中任职已久，人际关系广泛，社会影响力较大，如果将丁默邨推到前台，和自己一起组建亲日特务组织，那么肯定可以拉拢到更多的人马，更快地建成亲日的特务组织。

至于把丁默邨推到前台后，会不会给丁默邨也招来狂风暴雨般杀

身之祸，会不会让丁默邨也登上军统局或者中统局的暗杀黑名单，那就不是他李士群需要考虑的事情了，毕竟“死贫道不如死道友”嘛。而且李士群打算，让丁默邨做亲日特务组织的一把手，这也算肥差一件，总好过赋闲在家。而且凭着自己和丁默邨多年的交情，如果丁默邨真的主持了亲日特务机构的大局，自然也不会亏待他李士群。如果丁默邨当了亲日特务组织的一把手后，真的总也“不上道”，李士群也不担心，亲日特务组织的班底是他李士群组建的，他既然能将丁默邨推上一把手的位置，也就肯定能将丁默邨从这个位置上推下来。左思右想，考虑周全后，李士群派人前往昆明，请以“养病”为由窝在昆明的丁默邨来上海商讨要事。

那么，丁默邨为什么被蒋介石免除了一切职务呢？

原来，在李士群上蹿下跳跳梁小丑般为日本政府卖命之时，丁默邨也没闲着。在刺杀马绍武一案中，丁默邨被“CC”系老友——上海社会局局长吴醒亚保释，这让丁默邨也意识到，只有获得更高的官职和更多的权力，才能更好地保全自己。于是，丁默邨开始积极在国民政府内活动，图谋得到更高的官职，不久，他迎来了他在国民政府中的事业顶峰。1938年，陈立夫命丁默邨接待叛变的中国共产党要员张国焘。

张国焘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谁也想不到张国焘会叛党。曾经发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贡献生命的张国焘，在1938年4月18日，居然来到武汉，找到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然后在戴笠的引荐下，见到了蒋介石，从此便叛变了中国共产党，投靠了国民党。

蒋介石对于张国焘的到来大喜过望，张国焘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广泛的影响力，他的到来，不仅仅能够带来许多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情报，还能促使更多的中国共产党的要员投靠国民党。于是，蒋介石找来陈立夫，要他负责安排好张国焘的接待工作，陈立夫将这个任务交给了丁默邨，要求丁默邨一定要款待好张国焘。

后来，丁默邨在接待张国焘的工作中表现出色，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这使得他终于走上了事业的巅峰。然而，丁默邨被嘉奖后，却

被戴笠盯上了。当初，当戴笠得知，蒋介石居然将自己介绍“投诚”的中国共产党要员张国焘交由陈立夫负责接待，便心生不满，结果陈立夫居然又将接待张国焘的肥差，交给了丁默邨，自然心中更是郁闷。在丁默邨因为招待张国焘而受到蒋介石的嘉奖后，戴笠坐不住了，他认为这个靠着和陈立夫的裙带关系上位的丁默邨，不配得到蒋介石的青睐和嘉奖，他认为这个嘉奖应该属于为蒋介石鞍前马后效力，宁可豁出性命的自己。最后，出于嫉妒和不满，戴笠命令手下特务们搜集了大量丁默邨在招待张国焘的过程中，贪污公款的证据，在蒋介石面前狠狠地告了丁默邨一状。

蒋介石一向信任戴笠，在看到戴笠提供的丁默邨贪污的诸多证据后，大为震怒，他的确极其重视张国焘的“投诚”，他认为张国焘必定能够带领国民党，给中国共产党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可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可以容忍手下官员贪污招待费。震怒之下，蒋介石撤销了丁默邨的一切职务，只留给丁默邨一个“少将参议”的军衔，一份微薄的军饷，丁默邨就此被搁置起来。

丁默邨所谓的“事业巅峰”就此结束，他如坐过山车一般，一下子就滑入了人生的谷底，郁闷不已的他借口病重，躲到昆明独自窝火去了。

就在丁默邨为蒋介石对自己的严厉惩罚而满心怨恨之时，李士群派出的说客找到了他，他当时并不知道李士群已经投靠了日本政府，对于李士群专程请他到上海去也颇为奇怪。但是，对于当时门可罗雀的丁默邨来说，老友李士群派人来请，颇让他心生暖意。于是丁默邨决定到上海去和李士群叙叙旧，看看能不能为自己找到新的出路。

丁默邨来到上海后，就随着李士群的说客一起到了大西路67号，当丁默邨意识到，李士群所谓的要事，就是要他做汉奸，来主持亲日特工组织筹建工作时，颇感为难。虽然丁默邨也并不是什么爱国之人，而且当下已经在国民政府内失去了所有的权力和地位，但是他从没想过要成为一名汉奸，毕竟做汉奸这种事情，还是背叛国家，遭人唾骂的。

对于丁默邨的犹豫，李士群并不感到意外，他利用各种条件诱惑丁默邨，“苦口婆心”地劝解丁默邨，他以丁默邨当下在国民政府中

的落魄局面为突破口，一步步说服丁默邨。丁默邨当时也的确颇为失落，靠着国民政府给的一点点微薄的军饷生活，不管在权力还是在物质上都极大贫乏。

李士群对丁默邨说了很多很多，直到最后，李士群看丁默邨还是犹疑不决，便孤注一掷地从腰间掏出了一把枪，然后用力地拍在桌子上，视死如归般对丁默邨表示，反正自己是死心塌地地跟着日本人干了，你丁默邨要是不愿意，就杀了我这个汉奸，去蒋介石面前邀功请赏吧！

李士群这最后一招，让丁默邨终于无路可走，最后，丁默邨不得不同意和李士群合作，叛党投日。于是，丁默邨住进了大西路 67 号，开始担任亲日特工组织的筹建人，而李士群的确也信守承诺，将筹建亲日特工组织的主要权力全部交给了丁默邨。也就是说，丁默邨就此成为未来的汪伪 76 号的一把手。

1939 年春节刚过，丁默邨和李士群便拜访了日本驻华特务机关的负责人，日本老牌特务土肥原贤二，向土肥原贤二阐明了二人组建亲日特工组织的详细计划和在上海开展特工行动的主要步骤。

丁默邨和李士群将自己的计划和步骤分为以下三种策略：

第一种策略：由丁默邨和李士群搜集情报，获取国民党中统、军统人员名单，提供给日本特务机关，然后由日本特务带头抓捕这些人员，将国民党的特务们逐一铲除。

第二种策略：由李士群去找杜月笙，利用杜月笙和戴笠的关系，协调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对立的关系，并商定双方以后不再展开相互的暗杀行动。

第三种策略：由丁默邨和李士群组建一支亲日特务组织，由日本政府定期拨款支持，这支亲日特务组织的工作就是将国民党中统局和军统局在上海的地下组织一网打尽，并积极策反国民政府特务机构中的特工，将他们收为己用，再用这些人对付他们昔日的同事，“以夷制夷”。

其实，丁默邨和李士群明知，前两种策略并不可行，他们之所以给出土肥原贤二这样三种策略，不过是为了衬托最后一种策略的必要

性和可行性。

土肥原贤二在听了二人的叙述后，十分高兴，认为选择“以夷制夷”才是上策，决定促成亲日特务组织的加速成立，于是，抗日战争期间令人闻之胆战的“魔窟”——汪伪 76 号的建立正式启动！

第三节 汪精卫其人其事

那么，丁默邨和李士群建立的亲日特务组织，为什么最终被称为汪伪 76 号呢？这还得从汪精卫说起。

在李士群和丁默邨积极筹建亲日特务组织的同时，日本人也在挑选伪政府的领导人，他们之前看好的人选，有的被暗杀，有的誓死不与日本政府合作，这就让日本政府最终将目光投向了国民党创始人之一——汪精卫。汪精卫在国民政府中的影响力较大，而且当时，汪精卫被蒋介石挤下了国民政府主席的位置，颇为寥落，所以日本政府决定将汪精卫从国民党政府中拉拢过来。后来，在汪精卫叛国投日后，为了保证汪精卫能够安全组建伪政府，日本政府就派丁默邨和李士群组建的亲日特务组织去为汪精卫保驾护航。在这个过程中，丁默邨和李士群所组建的亲日特务机构被汪精卫所用，因此，这支特务组织最终成为了汪伪 76 号。那么汪精卫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又如何从国民政府主席变成了人人唾骂的大汉奸呢？

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汪精卫

汪精卫是同盟会发起人之一，同盟会成立时，汪精卫担任同盟会评议部部长，虽然当时的汪精卫只是一个部长，但由于当时同盟会刚刚成立，只有三个部门——执行部、评议部和司法部，所以汪精卫当选为评议部部长，相当于坐上了同盟会的前三把金交椅之一，而且当时的汪精卫只有 22 岁，因此，后来的他，称得上国民政府中影响巨大的元老级人物。

汪精卫原名汪兆铭，他出身于书香门第，精通“四书五经”，受儒家影响颇深。汪精卫在同盟会担任评议部部长时，常常为《民报》撰稿，在《民报》上，他以“精卫”为笔名发表了多篇文章。当时，汪精卫的文章积极热情、逻辑缜密、针砭时弊、一针见血，引起了不少读者的共鸣。当时的汪精卫，主张只有暴力革命才能救国。

同盟会成立后，吸引了不少志同道合的爱国人士，发展速度极快。可好景不长，随着同盟会势力的不断扩张，引来了清政府的不满，清政府开始干预和打击同盟会。1907年，在清政府的压力下，孙中山不得不“出走”。

当时，汪精卫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随着孙中山一起出走越南、马来西亚等地，在这些地方宣传民主革命。经过这次“出走”，孙中山更加信任汪精卫，视汪精卫为自己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在汪精卫跟随孙中山“出走”之时，依旧担任同盟会评议部部长之职，而当时清政府正在严查“革命党”，于是，清政府在国内发布了针对汪精卫的通缉令。在清政府的通缉令发布后，汪精卫为了避免殃及家人，专门写了封信给他的哥哥汪兆镛，信中大意为：

汪精卫不才，有愧于家庭，使得家人因为自己从事革命而担惊受怕，精卫唯恐家人因自己受到牵连。

但革命之事精卫绝不能放弃，哪怕在革命中丢掉性命也矢志不渝。

为了不连累家人，从今日起，汪精卫与汪家断绝一切关系，汪家再也没有汪精卫这个不肖子孙。

另，精卫至此与家中早有婚约的未婚妻解除婚姻关系，以免牵连他人，请未婚妻另行改嫁。

汪精卫狠心与家人断绝关系，不仅仅是因为他心系革命，还因为他看到清王朝命不久矣，而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正在被人们所接受。当时的国民党，算得上最有群众基础的革命党派，同盟会一旦

推翻了清政府，那么自己就必将成为开国元勋之一，那么既然如此，当下所有的恩断义绝又有什么关系呢？

陈璧君苦恋汪精卫

汪精卫出任同盟会评议部部长期间，经常发表文章，他从没有想过，有个妙龄女生仅仅是通过他的文字就对他十分倾心，见到他的人后，这个女孩更是忘我地追求他，这个女孩就是后来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

人们常说男女关系是“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但是这话放在陈璧君和汪精卫身上却是大大的不符。陈璧君追求汪精卫，岂是隔了一座山，可以说她是翻过了好几座大山，最终才用自己的一片赤诚之心打动了汪精卫，让汪精卫同意与她结为夫妻的。

为什么汪精卫面对陈璧君的追求百般推脱，一直不肯接受陈璧君的感情呢？这是有很重要的原因的。汪精卫不肯接受陈璧君的感情，不仅仅是因为他心系革命的缘故，更重要的是陈璧君的长相实在是中等偏下，让汪精卫实在没有兴趣和她卿卿我我，谈情说爱。虽然当时陈大小姐只有二八年华，但相貌却如同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一样，而且性格比较刁蛮和任性。汪精卫可是堂堂民国四大美男子之一，貌赛潘安，才高八斗，不知有多少怀春的少女为之心动，若是汪精卫想要娶妻，从这些少女中随便选择一个都比陈璧君的样貌好看百倍，性格温柔、可人许多。不过碍于陈璧君的家庭背景，他也不能直白地拒绝陈璧君，否则若是伤了陈璧君的自尊心，她的父亲陈耕基肯定会找自己的麻烦，这件事甚至还会成为他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汪精卫如此忌惮陈璧君的父亲，那么这个陈耕基究竟是何许人呢？

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基祖籍广东新会县，十几岁的时候为了生计离开家乡远渡南洋，到了马来西亚，他花费身上所有的积蓄买了一块橡胶园，从事橡胶生意，靠着橡胶生意发家致富。随后，陈耕基看到矿产业的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又投资矿产，买下几座矿藏丰富的矿山，经过十几年的积累，陈家成为马来西亚数一数二的富翁。当时好事者给陈璧君的父亲起了“陈百万”的外号，这些人给陈耕基起这个外号，

不但有表示他很富有的意思，其中也有嫉妒的成分，因为陈耕基自从富有后，恨不得将手指头上戴满了金灿灿的戒指，出门就向人炫耀自己的富有，这种典型的小人得志式的暴发户作风，让许多人鄙视不已。

俗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有这样一位“暴发户”父亲，陈璧君自然有样学样，被培养得傲慢、自私、任性，对钱财、权力看得极重。这种性格在追求汪精卫的时候，陈璧君还能稍微收敛一下，成为汪精卫的妻子后，她的这些恶习暴露无遗，更是深深地影响了本就野心十足的汪精卫，让他最终做出叛国投敌的事情，这是后话。

陈璧君一直生长在马来西亚，据说六七岁那年，小璧君跟着母亲出去散步，刚走出家门没多远，就敏锐地察觉到有人对着她指指点点，小璧君立刻甩开母亲的手，走到那些人边上，就听到这些人嘴里嘟囔着：看，这就是“陈百万”的女儿。听了这话，小璧君可不高兴了，她心想也就你们这些穷鬼才会认为我家只有百万元，于是她大声地冲着那些人嚷嚷：哼，我家可不止百万，你们应该管我爹叫陈千万嘞！

陈璧君的妈妈听到她的话后，吓出一身冷汗，赶忙过去拉起小璧君的胳膊，把她带回陈府宅院中，到了院子里，陈璧君的妈妈拍了下陈璧君的小屁股，严肃地对陈璧君说了一些话，大致意思是：以后不管在哪都不要说自己家里有钱，要不然那些坏人把你绑走了，让你以后再也见不到爸爸妈妈了怎么办？万一这些人谋财害命，得了钱还把你咔嚓了怎么办？

谁知道小璧君年纪虽小，胆子却很大，她听后一点都不以为然，小璧君嘟囔着：自己的兄弟姐妹那么多，哪那么倒霉坏人就绑架我了；再说，谁不知道绑架男孩比绑架女孩更有用，要钱要的更多呀。

陈璧君的妈妈听到小璧君的话后哭笑不得，她决定好好教育陈璧君。陈璧君的妈妈心想，即便不求小璧君能成为才女，知书达理，至少也要让她懂得人情世故，懂得如何保护自己，懂得如何获取更多的利益。可以说正是陈璧君妈妈做了这种决定，才让日后陈璧君得以对汪精卫一见倾心，久久难以忘怀后，依靠锲而不舍的“橡皮糖”精神，最终博得汪精卫夫人的头衔。

陈璧君的妈妈为了教育女儿，费尽心思挑选了一所适合女儿的女

子学院，同时她的妈妈为了让陈家的几个孩子不忘祖，不忘记自己的根是有着上下五千年悠久文化的中国，还专门从国内请来一位国学老先生，出任孩子们的国学老师，教导孩子们诗词歌赋。正是因为陈璧君的妈妈们的决定，陈璧君对儒家思想也了解一二，对中国历史也知道得比较多一些，正因此，后来，她和汪精卫相处的时候，才有话题，不至于言之无物。

陈璧君在女子学院求学时养成了每天读报的习惯，有一天，她读到《民报》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针对当前中国的局面，做了深刻的剖析，并分析只有暴力革命才能解决中国内外交困的现状。陈璧君读着读着，就被这篇文章吸引了，她反复阅读这篇文章，越读越认可作者所分析的一切。放下报纸后，她看到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个署名为“精卫”的人，于是她开始发动同学，让她们帮她找来所有“精卫”发表过的文章。那段时间，陈璧君就像一个追星到走火入魔的粉丝，无论说什么总是提到“精卫说”、“精卫说”。夜深人静的时候，陈璧君抱着同学为她找来的文章，默默地幻想着“精卫”长什么样子。看“精卫”文章笔锋犀利、老练，文字功力深厚，陈璧君就想象“精卫”应该和自己的国学老师一样，头发斑白，胡子一大把了。她还想，如果有朝一日，自己能够遇到这位“精卫”，她一定要请他做自己的国学老师，这样自己能更多地收集他的文章，更多地学习他的思想。

陈璧君疯狂地收集了“精卫”的文章一年，终于，才找到机会见到“精卫”本人，见到“精卫”后，陈璧君才发现自己以前的幻想是多么可笑，自己想象中的“精卫”与现实中的“精卫”相差甚远。

陈璧君第一次见到汪精卫本人纯属偶然。一天，她正在马来西亚槟城大街购物，就在她走到一家商场门前时，看到商场边上围了一群人，人们的视线集中在一位年轻男士的身上。这位男士身着白色西装，留着一头干净利落的板寸，此时，他正在大街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有“帅哥控”的陈璧君看到这位男士后，再也移不开自己的目光，她心想：我终于见到了什么叫剑眉星目、鼻梁高挺、嘴唇薄而坚毅、貌赛潘安的人了。只这一见，就让陈璧君此生心念汪精卫一人，别人再也入不了她的眼了。

此时陈璧君虽然才 16 岁，但是在她周围有许多 16 岁的女孩已经嫁人，甚至有些人已经初为人母。所以陈璧君对这样一位有貌有口才有志向的男士倾心也是很正常的。只是陈璧君的倾心和别人不一样，当她看到这样一位帅哥时，陈璧君想的是，她一定要收服这位帅哥，一定要让他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上文说到陈璧君的长相实在让人难以恭维，甚至后人评判陈璧君是“民国八丑”之一，但她却丝毫不自知，反而自以为自己有杨贵妃的风姿和样貌，任何男人只要自己勾勾手指头，都会像狗一样爬到自己身边，恭维自己，而这个男士能被自己看上，也是他的福分。

眼看这位男士的演讲很快就要结束了，陈璧君拽着身边的人问，演讲的人是谁？当她得知这位才貌双全的男士就是她爱慕已久的“精卫”时，陈璧君觉得这一定是天定的缘分，否则她怎么会在第一次读到精卫写的文章就深陷其中呢？现在上天又让她见到精卫，而他的相貌，居然和自己所幻想的白马王子一模一样，这不是上天注定要自己和精卫在一起吗。陈璧君一边想着，一边开始追随着汪精卫的脚步，一场不落地听他在马来西亚各地的演讲。

一波三折，汪精卫终娶陈璧君为妻

自从见到汪精卫后，陈璧君就像是被施了魔咒一样，不管汪精卫在马来西亚的哪个城市演讲，她都会准时出现在汪精卫演讲的地方，用爱慕的眼神眷恋地看着台上演讲的汪精卫，不仅如此，她还发动女校的同学、自己的家人，到汪精卫的演讲现场为汪精卫捧场。陈璧君的爱慕如此明显，感情如此热烈，汪精卫又不是块木头，当然早就发现了他有这样一位“狂热粉丝”，但他看到这位粉丝的容貌，就没有关注的兴趣了，因此，他从来没有对陈璧君做过任何一点点回应，只是继续演讲，鼓舞群众参加同盟会，参加革命。

陈璧君看到汪精卫久久不肯回应自己，大小姐的脾气立刻上来了，她发誓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得到汪精卫，哪怕是用绑架，也要让汪精卫记住她。她差一点就真让她家里的随从绑架汪精卫了，还是她的父亲阻止了她的行动，提醒陈璧君，她已经定亲了，过两年就要和

父母给她选的未婚夫结婚了。

陈璧君听了父亲的话后，绑架汪精卫的心思顿时熄灭了。是啊，父亲早已给自己定下一门亲事，那户人家有钱有权，和自己家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她的未婚夫也不难看，以前自己也觉得这辈子也就嫁给他了，但那时她还没见到过汪精卫，现在她见到汪精卫了，心里脑袋里全是汪精卫，怎么可能再看得上那个相貌平平才华平平的未婚夫！陈璧君在心里拿定主意，她不管父亲有多看好她的未婚夫，她就要嫁给汪精卫。为了能没有后顾之忧地追求汪精卫，陈璧君对父亲表示：自己绝对不会嫁给父母给她选定的未婚夫，并且她表示，只要能跟在汪精卫的身边，哪怕不能结婚，哪怕没有名分，她也心甘情愿。如果真的要勉强她嫁给她现在的未婚夫，陈璧君宁愿死在父亲面前。

陈璧君的父亲虽然儿女很多，但却从小疼爱这个性格和他最像的女儿。他打心眼里不希望女儿跟一个革命党生活在一起，他经历的事情多了，知道革命党的生活大多是颠沛流离、朝夕不保的。陈璧君打小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从来没有吃过苦。但他也清楚，没有人能改变女儿的决定，因此，陈耕基不得不同意将陈璧君的亲事退了，让她去追求汪精卫。

陈父虽然答应陈璧君追求汪精卫，但他却没有完全放手不管，而是派人调查汪精卫，待他看到调查结果，秘密和汪精卫接触了几次后，他也被这个器宇轩昂的年轻小伙所征服，终于认可了陈璧君的行为。但父亲终究是父亲，为了保护女儿不受伤害，陈耕基警告汪精卫一定不能伤害他的女儿，即使拒绝他女儿的感情，也不能说是因为不喜欢，必须找其他借口。汪精卫迫于陈家的势力只得答应陈父的要求，这也是以后，汪精卫从没有直接拒绝陈璧君的感情的原因之一。

告诫完汪精卫后，陈父回到家中，看到女儿闷闷不乐地坐在沙发上，当他了解到女儿是因为没有和汪精卫私下接触的机会，根本无法向汪精卫袒露自己的情怀才不高兴时，就拜托自己的朋友将汪精卫请到家中，特意为女儿制造二人单独相处的机会。

陈璧君来到父亲的朋友的家中，果然看到了爱慕已久的汪精卫。她终于得到机会与汪精卫单独相处，当她和汪精卫在院子中散步时，

陈璧君向汪精卫吐露了自己的情怀，表达了对他的爱慕之心。而汪精卫早已被陈父警告过，自然不会说出令陈璧君难堪的话，他以自己正在进行革命为借口，向陈璧君表示：革命一日不取得成功，他就一日不结婚，总算拒绝了陈璧君的感情。

陈璧君听到汪精卫的拒绝后，反而认为他是一位真男人，对他更加倾心了，丝毫不知汪精卫拒绝她另有原因。

汪精卫拒绝陈璧君的感情主要原因是他根本就看不上陈璧君。那年汪精卫刚 24 岁，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纪，而且他的心中也有一位暗恋对象，这个女生是他的革命战友，长着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樱桃小嘴，白皙的肌肤，姣好的身材，性格也温柔，很懂他的心思，汪精卫心中对这位女生的爱意颇深，但汪精卫性格柔弱，在感情上很怯懦，一直不敢向那名女生表白。如果汪精卫当时有勇气向那名女生表白，日后他的妻子也不会是极为重视权力和财富的陈璧君，也许他也因此不会成为后来的汪精卫。

陈璧君不知道汪精卫虚伪的面孔，还以为他真是一位高风亮节的革命党人，这一次的表白虽然没有被汪精卫接受，但她没有气馁，反而更加悉心地照顾汪精卫。为了与汪精卫有共同的话题，离汪精卫的世界更近一点，陈璧君读了许多关于革命的书籍，这让她迅速积累了许多国外的革命成功的知识，所以在同盟会的行动陷入停滞时，她往往能够提出让人感到耳目一新、豁然开朗的意见。后来，因为她对同盟会帮助颇多，她逐步成为汪精卫身边的左膀右臂。汪精卫心中也慢慢被这个巾帼英雄征服，但他此时对陈璧君依然没有爱情，只有同事之情，并且还有利用陈璧君的才华，为自己提高声望的心理。

汪精卫既然想要利用陈璧君，必然要对她好一些，他的态度刚一发生变化，陈璧君就感觉出来了，在她看来，自己已经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但她丝毫不知，自己只是汪精卫手中的一颗棋子，还以为汪精卫真的被自己的真心感动，心里有了她的位置。

被爱情冲昏了头脑的陈璧君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卖力地为汪精卫出谋划策，为了获得汪精卫的爱情，她甚至想过要和汪精卫一起死去，追求爱情怎么还和死亡产生关系了呢？难道是汪精卫最终忍受不了陈

璧君的纠缠，口出恶言吗？其中的原因还是和同盟会有关。

同盟会六次起义，六次都以失败告终，许多人对同盟会倍感失望，认为革命永远不会成功了，他们准备脱离同盟会。不得已，汪精卫只能表态他要去暗杀清政府摄政王，挽回大家对同盟会的信心。这个任务十分危险，一旦失败，随时有牺牲的可能，汪精卫能够主动提出执行这个任务，他的考虑自然十分周全。在汪精卫执行任务前夕，他特意和陈璧君在一起，对陈璧君表示自己此行可能将一去不复返，陈璧君激动地表示自己愿意和她同生共死，与他一起执行这个任务。汪精卫的目的达到了，故意表示：如果能活下来，他一定在革命成功后，娶陈璧君为妻子。他的这句话让陈璧君立志不管付出多少代价，也要保住汪精卫的生命。

汪精卫暗杀清政府摄政王失败，被捕入狱后，陈璧君先是用重金收买狱卒，给汪精卫送来几个鸡蛋，其中一个鸡蛋里夹着一封她写的亲笔书信，在狱中的汪精卫读完后，热泪盈眶，觉得自己临行前夕的安排果然没错，陈璧君果然能为了自己奉献一切，他当即回了一封《金缕曲》对陈璧君诉衷肠。

得到汪精卫的亲笔书信后，陈璧君在伤心的同时，为了能保住汪精卫的性命，用钱四处为汪精卫打点。直到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汪精卫才终于得以重获自由，二人相聚在上海，汪精卫随后履行自己的诺言，娶陈璧君为妻子。

汪精卫娶陈璧君为妻后，对革命反而没有了以往的坚持，开始提出和平谈判的意见，逐渐沦为一个高举和平大旗的出卖中国国土的汉奸。

汪精卫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和陈璧君结婚后，变化非常大，就连孙中山都看出来汪精卫对民主革命的热忱大不如从前，孙中山认为，汪精卫是因为牢狱之灾导致心情巨变，过一段时间后，也许又会成为从前那个热血青年，殊不知，此时的汪精卫，正在思考如何才能安全地把控同盟会的巨大权力。因此，不久后，汪精卫便向同盟会申请，去法国留学，孙中山先生批准了他的请求。

在法国的日子里，汪精卫和陈璧君二人过着看似远离国家、政治和革命的日子，实则，汪精卫经常和他埋在同盟会中的“棋子”联系，不断获取同盟会的最新消息，他虽然人不在同盟会，但是他对同盟会的关注和掌控程度却没有丝毫的减弱。几年后，汪精卫觉察到，清政府的灭亡即将来临，同盟会很快就能掌握国家大权，恰好此时，孙中山来信邀请他回国，主持同盟会的事宜，汪精卫觉得机会来了，便立刻带着陈璧君从法国回国。

汪精卫回国后，立刻被孙中山委以重任，此时，孙中山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由于身体原因，无法亲自处理国民党内部的诸多事务，于是，孙中山将党内事务暂时交给了汪精卫负责。汪精卫虽然在法国几年，远离国民党，但他的威望还在，而且在法国的日子，他和陈璧君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国民党的关注，因此，汪精卫对国民党内部事务的处理上手也很快。

1925年，孙中山病重不起，在弥留之际，孙中山将当初组建同盟会的一千人等召集起来，对国民党今后的发展做了一些安排，但他还没来得及指定接班人，就撒手人寰，这也就导致了日后，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持续不断。

孙中山死前没有指定接班人，而国民党内又没人敢主动继承总理之位，为了表示孙中山先生对国民党的重要意义，以及对他的尊重，国民党政府决定取消总理制。也就是说，国民党的总理只有孙中山先生一人。

孙中山先生的逝世，对国民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开始争夺领导权，总理只有孙中山一人，但是国民党总要有个领导人，国民政府的主席，还是要有人来当的。

上文说过，汪精卫在同盟会中的威望，仅次于孙中山先生，因此，在国民党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汪精卫以全票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成为当时国民政府的一把手。

此时的汪精卫，虽然实现了自己的政治野心，但由于汪精卫受儒家思想影响太深，所以他从参加革命以来，都只在意所谓的“思想”上的势力控制，而从未着手建立起一支属于自己的“汪家军”，所以

他在国民党政府的各个派系的争夺中，劣势明显。因此，汪精卫也很清楚，自己这个一把手，就像是大海中的一只小船，随便一个风浪打来，自己就有翻船的危险，因此，汪精卫打算找一支武装队伍，牢牢地抓在手中，以增强自己的军事力量，保住国民党主席这个职位。

当时，国民党军队几乎都掌握在私人手中，没有汪精卫插手的余地，于是他将主意打到了刚刚兴起尚未壮大的中国共产党身上。他依仗自己是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打着孙中山先生留下的“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旗帜，积极和中国共产党接触。

汪精卫任命了许多中国共产党员在国民政府担任重要职务，例如共产党员谭平山，被汪精卫任命为国民政府中央党部组织部部长；毛泽东，被汪精卫任命为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后来被称为“中共五老”，也就是林伯渠、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之一的林伯渠，被汪精卫任命为国民政府秘书长。这一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势力发展最快，进步最大的时期。

但是汪精卫只看到了拉拢中国共产党后，自己能拥有一股具有威慑力的武装力量，却没有察觉到国民党内部官员对他的所作所为的极度不满。汪精卫还以为自己对国民政府有了掌控的力度，却没有看到国民党内部各个派系之间的斗争逐渐升温。最终，国民党内部分成两大派系，一派是支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左派，一派是反对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右派。

国民党右派是反对联共的，汪精卫上台后，积极地和苏联、中国共产党合作，遭到了国民党右派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汪精卫在分裂国民党对国家的掌控权，并认为汪精卫是削弱国民党军官获得国家权益的罪人。但反对归反对，国民党右派却不能将汪精卫从主席的位置上拉下来。直到一位会拍上司马屁，会对上司的指令阳奉阴违、麻痹上司，并将上司的权力掌控在自己手中的年轻人出现，国民党右派才获得了声讨汪精卫的机会，这个年轻人，就是日后的国民党主席蒋介石。

那么当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是怎样行动的呢？

蒋介石举着支持“联共”的大旗，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接近

汪精卫。为了获取汪精卫的信任，蒋介石曾公开发表声明痛斥右派的反共行为，此举让备受左派压制的汪精卫将蒋介石视为知己、亲信，并不断地将权力下放给他。于是，蒋介石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扩大了自己的权力，很快就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在拥有了与汪精卫相抗衡的权力后，蒋介石才脱掉了自己的伪装，公开拉拢右派反共势力，成为导致汪精卫下台的关键人物。

蒋介石能够如此轻易架空汪精卫的权力，和他步步为营的精心筹划不无关系，但也与汪精卫的性格有关。汪精卫的性格略有些软弱，虽然他在同盟会中倡导暴力革命，但他并不知道应该如何开展暴力革命，而且汪精卫受孙中山先生的影响较深，总幻想能够和平解决问题。当然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没有重视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武装部队，汪精卫更加在乎的是自己能否站在国民政府的最高点上，并且能否维持自己所处的地位，其他具体事务，他并不操心。正是因为汪精卫将党内事务全都交给信任的属下去办理，自己也很少检查亲信族将们将事情处理得怎么样，因此才使得蒋介石有机会，在汪精卫的眼皮底下，将他的权力全部掏空。

这里还要说一句，在个人生活方面，汪精卫表现给外人的，永远是忠于自己的妻子、不抽烟、不受贿、不喝酒、温良诚实的形象，而且他曾有过为革命自我牺牲的英勇事迹，因此尽管“右派”反对汪精卫“联共”，但他还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在国民政府的最高点上坚守很久。不过正应了中国那句俗语“水至清则无鱼”。在官场里，过于清廉的人得不到他人的追随，像汪精卫这样将自己打造成“道德圣人”的人，显然不适合当时的政治环境，也正因为他和周围的国民党官员格格不入，才会使得他这个迅速上位的“一把手”，最终被支持过他的国民党官员合力推下“圣坛”。

踉跄下台，图谋叛国

汪精卫是早期的革命党人，并且曾经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一把手”，为何他要离开几乎是自己曾经坚守的国民党，投入日本人的怀抱，成为历史上最“铁杆”的汉奸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下定决心，

成为被世人唾弃的人？也正是因为汪精卫的出走，促成了汪伪 76 号的成立；而后来，汪精卫也正因为有了汪伪 76 号的保驾护航，才顺利召开了汪伪南京国民政府的诸次重大会议。

这里要说一句，汪精卫尊重孙中山先生，是孙中山带领他参加革命，如果没有孙中山先生，他汪精卫也成不了国民政府的“一把手”；同时，汪精卫所信任的人，还有他的妻子陈璧君。在汪精卫后来的政治道路上，陈璧君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陈璧君身上那种杀伐果断的性格，不仅深深地吸引着汪精卫，也促成了汪精卫后来的投敌卖国。这里插一句，关于陈璧君其人的性格，笔者断不敢杜撰，她的性格，从建国后坚持拒绝认罪，并且拒绝毛泽东认罪特赦的决定，坚决不承认自己和汪精卫是汉奸的事情便可窥见一斑。

在当时，汪精卫遇事拿不定主意时，都会询问陈璧君的意见，最后，汪精卫常常是根据陈璧君的意见行事。其实，汪精卫和陈璧君是性格截然不同的两种人，如果说汪精卫是水，陈璧君就是火；汪精卫是土，陈璧君就是风。汪精卫享受着国民政府主席至高无上的地位所给自己带来的优越感，却并不享受将所有权利把握在手中的感觉；而陈璧君则热衷政治，她想要将权力抓在自己手中，享受被人恭维、被人讨好的感觉。所以，当汪精卫的权力被蒋介石掏空，陈璧君空有“第一夫人”的头衔，却没有相对的权力时，就心生不满。于是陈璧君对汪精卫所处理的国民政府的日常事务，开始干预。

1938 年 3 月，蒋介石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大权旁落，这个结果让野心十足的汪精卫和爱慕虚荣的陈璧君心里十分不舒服，尤其是陈璧君，她已经习惯了“第一夫人”的位置，再也见不得任何一个女人的地位能够高过自己，排场比自己的还大，可如今她的丈夫下台了，而新任的“第一夫人”，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可是比她强上许多倍的“中国夫人”。在各种社交场合，宋美龄举止得体、端庄大方，所以陈璧君的内心充满了失落和不满，恨上了夺了夫君地位，抢了自己风头的蒋介石夫妇。

1935 年，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召开，隆重的开幕仪式后，全体参加会议的人员合影。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一个身着黑衣的男子，穿过重重守卫，向汪精卫开了几枪，汪精卫立刻重伤倒地。守卫迅速去抓捕刺客，其他随从七手八脚地将汪精卫送到了医院。幸好，刺客的几枪都没有伤到汪精卫的要害部位，只是有一颗子弹深入后背难以取出，不过汪精卫虽然重伤，但并没有性命之忧。

对于这次暗杀，汪精卫以及很多人都猜测是蒋介石派人下的手，因为蒋介石自从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后，就与汪精卫结下了解不开的梁子，虽然表面上二人还是一团和气，但背地里却相互给对方下绊子；而他们的“后院”，更是斗争激烈。最值得怀疑的一点是，当天参加会议的人中，只有蒋介石一人没有参加合影，而汪精卫恰恰是那个时候被暗杀的，如此巧合，怎么能不让别人怀疑呢。

陈璧君见丈夫汪精卫被刺杀，受伤住院，火冒三丈，不顾警卫的阻拦，闯进蒋介石的办公室，冲着蒋介石就破口大骂，说蒋介石忘恩负义，不是个东西。还说，如果蒋介石不愿汪精卫在国民政府担任职务就直接提出，没必要使出这种暗箭伤人的下三滥手段。蒋介石百口莫辩，面对陈璧君的怒骂只能压下心头怒火，好言好语地安慰陈璧君。为了给汪精卫讨回个公道，也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蒋介石还表示，他一定会找到凶手，但陈璧君对此嗤之以鼻，根本不信蒋介石的说辞。

刺杀汪精卫之事发生后，陈璧君就开始在汪精卫身边唠叨，说在国民政府里，有汪精卫就没有蒋介石，有蒋介石就没有汪精卫，然而，汪精卫和陈璧君一时也找不到比国民党更好的靠山去投奔，所以只能委身国民政府。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政府盯上了汪精卫，而李士群和丁默邨二人也意欲投靠汪精卫，日本政府派人请汪精卫出任伪南京国民政府的领袖，主持伪国民政府的大局，汪精卫就动了叛国投日的念头。

发表“艳电”，卖国求荣

汪精卫叛国投日，当然少不了陈璧君的鼓动。当陈璧君得知日本政府的意图时，颇为开心，她觉得机会来了。虽然汪精卫尚在犹豫中，但陈璧君相信，只要她在汪精卫耳旁吹吹风，好好分析分析汪精卫在

当下的国民政府所受到的排挤和江河日下的地位，以及在日本的帮助下建立南京伪国民政府所可能取得的光辉前景，汪精卫自然会清楚两条道路之间的天壤之别，就一定会不再犹豫，投靠日本政府。

然而，尽管陈璧君将所有的好处和坏处掰开了揉碎了摆在汪精卫面前，汪精卫却还是犹豫不决，他担心自己一旦和日本人合作，就会成为人人唾骂的汉奸，汪精卫也曾经是被人尊敬的无畏英雄，如果沦为中国人人唾骂的卖国贼，他的心理落差实在太太大，所以汪精卫一时难以下定决心和日本政府合作。

陈璧君再三劝说汪精卫，仍然未能让汪精卫断然决然地和国民政府决裂，坚决投靠日本政府，无奈之下，陈璧君对汪精卫破口大骂，说汪精卫在国民政府没地位也就算了，难得日本政府准备让你做“老大”，却还这么犹豫不决，一点都不像个男子汉大丈夫！难不成非要等到日本占领中国，你才肯抱着日本人的大腿，那时候，日本人早就不需要你了！最后，陈璧君看汪精卫还是犹豫不决，便咬牙切齿地表示，她是一定要投靠日本政府的，如果汪精卫愿意在国民政府里做万年老二，那就干脆在国民政府里窝到老死为止吧！

汪精卫对陈璧君的话从来都言听计从，陈璧君也算得上汪精卫的主心骨，见陈璧君宁可舍弃自己，也要投靠日本政府，汪精卫也决定豁出去了，而且他也知道，蒋介石已经完全掌控了国民政府的领导权，自己在国民政府中不会再有什么作为。最后，汪精卫决定，接受日本政府的邀请，做伪国民政府的执政人。1938年12月18日，“想通”了的汪精卫毅然叛变，和妻子陈璧君一起，走向了投敌卖国的深渊。

就在汪精卫从国民党政府出走的当晚，蒋介石就失眠了，他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的不安，他这样写道：“汪去后，对党政军以及各地之关系，应特加慎重。”蒋介石自然知道，汪精卫的出走，对国民党的影响巨大，但他怎么也没有想到，随后，汪精卫竟然完全抛弃了国家，抛弃了民族，因此当时，蒋介石对汪精卫的出走，并没有做出处理。

然而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汪精卫在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投日的“艳电”。1938年12月29日，蒋介石看到各大报社上有关汪精卫发表“艳电”的新闻，看到香港《南华日报》

上汪精卫发表的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为主要内容的叛国“艳电”，终于勃然大怒，最终下令在元旦当天，也就是1939年1月1日，召开国民党临时会议，讨论对汪精卫的处理问题。

之所以称呼汪精卫的叛国电文为“艳电”，是因为“艳”字，在电报中代表当时的日期。在当时的中国，电报的发报时间还比较长，为了尽可能多地节省时间，就将日期用一个汉字表示，而“艳”字就代表29号。

而在汪精卫被日本人拉拢，到发表“艳电”这段期间里，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1938年11月中旬，汪精卫先逃到了香港，然后在香港发表声明，公开表示赞同日本在中国建立“东亚新秩序”。在汪精卫发表声明后不久，四川、云南等地的亲日派纷纷表示要举兵响应汪精卫，在该地建立亲日政权。正是这些地方的响应，让汪精卫具备了足够的信心和胆量，在《南华日报》上公开发表“艳电”，呼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放弃对日本的战争，主动站出来与日方“和平”谈判。

然而，出乎汪精卫意料的是，汪精卫卖国求荣的“艳电”却非常不得人心，不仅四川、云南等地的亲日派并没有热烈响应他的号召，而且全国人民对汪精卫认贼作父的做法纷纷表示愤怒，各大媒体纷纷对汪精卫予以强烈的谴责。在这种情况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自然也对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汪精卫表现出了强烈的反对。

全国上下对汪精卫的声讨之声，也让日本政府对汪精卫的影响力产生了怀疑，于是，日本政府对汪精卫的态度，也有所冷淡。汪精卫在逃往热河时，日本政府给予汪精卫的支持不够有力，以至于汪精卫险些被军统特工暗杀。当然，这是后话。

1939年元旦，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国民党临时中常会，在会议上明确批判了汪精卫叛国投日的汉奸行为，并在此次会议上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解除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除此之外，为了避免众多爱国人士，特别是有心加入国民党的人士被汪精卫利用，蒋介石要求全国各大中小报纸，深刻揭露汪精卫从国民党政府出走，叛国投敌的过程，以这种办法掣肘汪精卫，力图将汪精卫置于孤立无援、无

人信任的处境之中。

最后，蒋介石还做出了一个决定，那就是，派戴笠的军统局去刺杀汪精卫。由于汪精卫是国民党元老，一直在党内担任要职，所以对国民党的内部机密、情报和重要人员的情况了如指掌。如果汪精卫将自己所知全部告知日本军方，那么日本军方就有可能有针对性地对国民党的各部分力量分散打压、各个击破，国民党就有可能面临灭顶之灾。所以，为了防止此种灾难的发生，蒋介石在会后秘密下令，要求戴笠派人刺杀汪精卫！

第四节 军统跨国追杀汪精卫

汪精卫出走后，蒋介石对戴笠下达了追杀汪精卫的命令，此时日本政府正处于政权交替时期，加之汪精卫的“艳电”引起了全国上下的强烈反对，也让日本人对汪精卫的信心略有减弱，所以日本政府没有对汪精卫给予太多的支持。因此，汪精卫的安全问题成了他出走时期最担心的问题。此事，正好给了汪伪 76 号的主任丁默邨一个大好机会，丁默邨和汪精卫之前并无深交，甚至还小有矛盾，丁默邨想，不如趁此机会，派人保护汪精卫的安全，日后汪精卫一旦登上伪国民政府领导人的位置，自己以及汪伪 76 号的工作也便于开展。于是，军统暗杀汪精卫和汪伪 76 号保护汪精卫的暗战就在越南河内展开了。

戴笠部署刺杀汪精卫

戴笠接到蒋介石的命令后，颇感棘手。他认为，刺杀汪精卫并不是最难的，难就难在究竟要不要致汪精卫于死地，这次，他的确猜不透蒋委员长的心思。如果汪精卫在河内被人暗杀身亡，肯定许多人都会认为，这件事是蒋介石指使的，事后，国民党内的许多高官就会对蒋委员长产生戒备之心；可如果不刺死汪精卫，万一汪精卫被日本政府保护起来，汪精卫向日本政府泄露大量国民党内部的机密，那事情就严重了，而这份责任他戴笠是承担不起的。因此，戴笠接到命令后，

就究竟是刺死汪精卫还是仅仅刺伤汪精卫的问题，和军统局的几位骨干商量再三，最后他们一致认为，蒋介石一定是要置汪精卫于死地的，所以此次刺杀，一定要刺死汪精卫，而且这件事情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随后，戴笠开始筹划刺杀汪精卫一事。他派出全国各地的军统成员，找到了帮助汪精卫出逃的人，并将这些人逮捕入狱，并从这些人的口中，问出了汪精卫的出逃路线。很快，戴笠便得知汪精卫已经逃到了越南河内，而且将很快离开河内，到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

于是戴笠迅速着手部署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刺杀汪精卫一事关系重大，戴笠决定亲自坐镇指挥，以确保此次行动万无一失。

为了便于部署行动计划，接收各方行动人员的消息，并保持此次暗杀的隐蔽性，戴笠先后考虑了三个地点作为此次行动的临时指挥所。

戴笠首先想到的第一个地点就是昆明，但很快，昆明就被他排除了。昆明虽与河内距离较近，但昆明地处内陆，交通十分不便，一旦河内的行动人员出现问题，消息很难及时送达昆明。同时，因为昆明交通不便，人员的派遣也十分不便，所以，在昆明建立临时指挥所，灵活性、机动性都较差，所以昆明这个地点，迅速被戴笠否定了。

戴笠想到的第二个地点是越南河内，这个地点更便于戴笠确切地观察汪精卫的处境和情况，及时作出部署。但问题是，如果戴笠进入河内指挥部署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并在越南河内逗留，时间稍长，就会被居心不良的人发现自己不在国内。如果自己身在河内的消息一旦走漏，国民党内部的高级军官就都会猜出他戴笠身在河内的原因，并且对他部署暗杀汪精卫的事情妄加猜测，消息还极有可能传到汪精卫的耳朵里，这样就会打草惊蛇，令计划失败。倘若国民党内其他派系的与他戴笠素来不睦的军官借此事背地里给他下个绊子，那么他在蒋委员长面前就会颜面尽失，从而失去蒋委员长的信任。

最后，经过再三考虑，戴笠最终决定将刺杀汪精卫的指挥中心设立在香港。戴笠选择香港作为此次行动的指挥所，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当时的香港是一个自由港，人员出入十分自由，没有任何限制；而且从香港到越南，乘坐海轮只需一昼夜便能到达，两地之间距离不算远，一旦出现紧急情况，他也能迅速进入越南，亲自坐镇指挥。并

且香港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香港的交通四通八达，水路可通上海、天津、广州、澳门，空路有飞机直飞重庆，人员派遣也十分便利。基于以上几点原因，戴笠最终将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指挥所设立在了香港。

1939年1月中旬，戴笠从重庆秘密飞往香港，到香港后，为了保密，戴笠没有入住他在香港的寓所，而是派随从联系了军统局驻香港区区长王新衡，吩咐王新衡分别在香港岛、九龙租了几间公寓，然后戴笠轮流居住在这几间公寓中。戴笠召集军统局驻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等军统驻香港特务一起研究刺汪计划的过程中，行动非常隐秘，每日住在哪儿，去哪儿开会，除了戴笠本人，谁也不可能预先猜到。并且，为了保证刺汪行动的成功，戴笠还随身带来两部电台，指定报务人员24小时轮流值班，随时接收重庆军统局和越南军统行动小组的电报，并要求报务人员将所有往来电文全部交付他的手中，每日由他亲自处理这些电文。

戴笠对于此次暗杀行动非常重视，因为汪精卫从前曾经被暗杀过，汪精卫本人也有暗杀行动的相关经验，所以，军统如果采用以前采用的老旧的暗杀手法，必将被汪精卫识破。然而，作为国民党内部最出色的特务，戴笠深知暗杀的基本要领，以及提高暗杀成功率的秘诀。所以，他对此次行动进行了特别严密和谨慎的筹划。

同时，戴笠清楚地认识到，要确保刺汪成功，不但要有周密的计划，还要有严格按照计划执行行动的有效人员。可是选谁去执行此次刺杀行动呢？戴笠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军统的王牌杀手陈恭澍，陈恭澍不仅拥有丰富的暗杀经验，而且非常善于应变。除了陈恭澍，戴笠还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军统训练营的魔鬼教头余乐醒，这个人同样拥有丰富的暗杀经验，而且他的侦察技术和分析能力在军统特务中都是数一数二的。如果由这二人联手负责在河内主持刺汪计划，戴笠相信刺汪计划的成功率可以达到60%以上。当然，戴笠要的是百分之百的成功，所以他在选择此二人作为河内刺汪行动的负责人后，还挑选了拥有丰富暗杀经验的唐英杰、王鲁翹等16位军统特务精英加入此次行动，于是，陈恭澍一行人成立了“刺汪行动组”，奔赴越南河内。

陈恭澍一行人在接到戴笠的命令后，分批秘密前往越南，对于他们来讲，越南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地方。在越南，他们不仅语言不通，而且对周围的环境、地形也并不熟悉，这些客观条件的阻碍，让他们的暗杀计划面临重重困难。而且在暗杀过程中，他们不仅要保证不打草惊蛇，被汪精卫察觉；还要注意隐藏自己的身份，避免引起当时占领越南的法国驻军的察觉，以免遭遇牢狱之灾。所以，刺汪行动组在进入越南后，各自伪装成了当地人。但问题很快又出现了，汪精卫在河内停留多久，谁也不知道，刺汪行动组获得的情报只是汪精卫正在积极和日本政府联系，推促日本政府将他从河内安全护送回南京。而陈恭澍一行人也到军统驻越南行动处寻求过帮助，希望能借助越南行动处的力量，多获取一些支持，以便开展刺汪行动。可是越南行动处的情报人员虽不少，但大多数都是搞情报工作的，行动能力非常薄弱，能够提供给他们的帮助十分有限，这难免让陈恭澍一行人感到有些失望。于是，刺汪行动组在越南举步维艰。首先，他们不熟悉环境；其次，他们不熟悉当地人情，即便有军统越南行动处的支持，他们也很难像过去在国内进行暗杀行动一样顺利开展。困难虽然摆在面前，暗杀行动却还是要继续的，那么，他们究竟该如何开展暗杀汪精卫的行动呢？

军统特工绑架和刺杀所使用的主要方法

这里，笔者向诸位读者先介绍一下军统特工绑架和刺杀所使用的主要方法，以便读者们对军统和汪伪 76 号彼此之间的暗战手法和暗战策略有更详致更透彻的了解，也对后面即将详细描述刺汪行动有更直观的了解。

军统特工的暗杀手段分为软性行动和硬性行动两种方法。软性行动是指用无声武器，比如刀、斧子、毒药等工具将目标击毙；硬性行动是指用有声武器，也就是手枪等枪械将目标击毙。军统特工一般会根据刺杀的目标、当时的环境、所处的地理位置，有针对性地选择刺杀的方式。

军统特务暗杀、绑架的手法种类繁多，他们为了完成“家长”戴

笠交代的任务，还自创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行动方法。当时，军统特工最擅长的专长之一就是绑架，国民党内部曾有传言，军统特工能在任何地方，成功绑架任何人，这句话虽然包含水分，但却从另一方面表现出军统特工策划绑架的成功率是很高的。

先绑架再暗杀，属于软性行动方式。

军统特务使用的先绑架再暗杀的软性行动方式之所以常常行之有效，是因为特务不依赖所拥有的武器和设备开展行动。

在某些经费不足的军统行动处，军统特工没有汽车，甚至缺少枪械，他们只能想办法在不引起骚动的前提下，引出目标，进而实施绑架或者暗杀。这就要求军统特务将被劫持人引至环境较为偏僻的地点，在被劫持人身边没有太多保护人员的情况下，实施行动。但是军统特工在行动过程中发现，被劫持人往往出现在人群密集的地方，如果贸然将被劫持人绑架，便会引起人群的慌乱，一旦不能迅速绑架或者杀害被劫持人，被劫持人就会趁乱逃走。因此，军统特工发明了一种行之有效的劫持“骗局”。这种“骗局”大大提升了军统特务暗杀和绑架的成功率。当军统特工发现目标后，一般会安排一个穿黑衫的特工，手拿一根木棒，装成是拦路打劫的强盗，将袭击目标，也就是把被劫持人打昏，随后守在附近的另外一两名特工，就佯装是目标，也就是被劫持人的亲属，在目标被打昏后，装作非常焦急，冲过来一把将被击昏的目标从黑衫特工手中夺过来。随后，劫持了目标的特工会拦上一辆人力车，大声叫嚷车夫赶紧去医院，然后就把目标，也就是被劫持人绑架走了。而当人力车远离现场后，这名带着目标的所谓“亲属”，也就是军统特工就会告知人力车夫先把人送到家里，于是人力车夫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成了军统特工的帮凶，将目标送到了军统特工的“虎口”中。这样，军统特工就能顺利地把目标劫持走，然后进行暗杀等行动了。

在拥有汽车等先进交通工具的军统行动处，军统特工则乘坐汽车绑架和暗杀目标。起初，军统特工就是简单使用汽车来从事绑架或者暗杀，方法非常粗糙，就是先派特工跟上目标，然后用枪顶在目标身后，然后将目标粗鲁地推进在路边等待的汽车里。这种方法最初一直被军

统特工使用，是军统特工最初经常使用的典型的绑架手法，但这种方法弊端很大，如果目标和车子的距离稍远，目标，也就是被劫持人就很容易利用这段路程制造混乱，然后趁乱逃脱。当军统特工用此种方法绑架和暗杀，屡次失败后，戴笠因此而大发雷霆，便命令特工琢磨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利用汽车作为交通工具的绑架和暗杀的方法。后来，军统特工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和实践，琢磨出了一套几乎称得上完美的绑架和暗杀的手法。

这种绑架方法分为以下四步：

第一步是观察：对目标进行跟踪，直到完全掌握其日常活动规律为止。

第二步是控制：在掌握了目标的活动规律后，特工们筹划好步骤，就可以开始行动了。他们将车停在目标的活动范围内，当目标走到车子附近时，两名特工就从目标的前后走过去，后面的特工用枪顶在目标的后背上，另外一只手则揽住目标的肩膀，佯装和目标很熟悉，以掩人耳目；而前面的特工则走上前去，做出和目标握手的姿势，实则用拳头向目标人的腹部猛击，导致目标疼痛不已，无法大喊“救命”，随后，两名特工假装是目标的熟人，大声寒暄，然后将目标连拖带拽地带到汽车的车门前。

第三步是绑架装车：在军统特工将目标带到车门前时，车里等待多时的其他军统特工就打开车门，将目标拽上车后座，然后迅速关上车门。目标左右两边会各坐一名军统特工，这样不仅便于控制目标，也可以随时制止目标呼救。目标被绑架、装车的过程只有两三分钟时间，随后这辆装着目标的汽车便若无其事地常速行驶在街道上，最终慢慢远离事发现场。

第四步是暗杀：待汽车行驶至人烟稀少处，或者指定的目的地后，军统特工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杀害目标，也就是被劫持人了。

这种使用汽车作为行动中的交通工具的方法非常高效，然而在戴笠的“高标准、严要求”之下，特务们还发明了更多的更“艺术性”的绑架和暗杀的软性行动方法。

军统特工绞尽脑汁地想出了很多“软”性行动方法——将目标在

光天化日之下绑架，而且不会引起别人注意。为此，不少军统特工还专门学习了“江湖失传”了很久的点穴。当目标走在街上时，路边的“警察”会和目标搭讪，导致目标不得不站住脚，和“警察”交谈，而目标也就就此落入了军统特工精心设置的圈套之中。这个和目标交谈的“警察”并非是真正的警察，而是军统特工假扮的警察。当目标和“警察”交谈时，一名军统特工就会悄悄地走到目标身后，迅速用双手蒙住被劫持人的眼睛，并且用大拇指猛摁目标耳根下的“命门”穴，令目标暂时失语。随后，另一名特工会走到目标面前，抓着目标的双手，制止他乱动，并且笑闹着大声叫嚷：“你猜猜他到底是谁。”这一幕在旁人眼中，多半都会被当作是旧友重逢，基本没人会认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绑架，更不会有多少人关注这一幕，于是，军统特工就可以这样明目张胆地将被劫持的目标带进汽车里绑架走。

除了这些软性行动方法，军统特工还创新发展了美人计等软性行动方法。由于被绑架的人里有不少是有钱、有身份、有影响力的人，所以他们爱慕虚荣、拈花惹草。针对这些特点，军统在绑架这样的目标时，就会使用美人计。选择一名样貌姣好的女特工，浓妆艳抹，衣着性感风骚，一副情妇或者舞女的打扮。在目标出现后，派女特工从人群中径直走向目标，然后泼妇般指着目标，大骂目标，也就是被劫持人是负心汉、现代陈世美，为了另一个女人弃她于不顾。目标由于不认识眼前的女特务，自然会感到莫名其妙，碍于脸面，会不断向女特务解释她认错人了，这时，在一旁隐蔽多时的另一名女特工便走了出来，装作是那名风骚“情妇”的好友，好言好语地劝说目标和她们一起找个地方谈谈，把话说清楚了，目标听了这话之后，更会感到百口莫辩。此时，两名男特工就会走出来，佯装认出了略有名望的目标的身份，然后以为目标着想的口吻劝说大家不要在大街上吵嚷，实在有损面子，劝说这几个人找个地方坐下来谈清楚比较好。一般情况下，在如此多的劝说下，略有社会地位的爱面子的目标自然会认为应该找个僻静的地方说清楚，这时候，几名特工就会把目标拉进车里，目标并不知道，一旦进入汽车，再想出来就难如上青天了。

绑架还只是暗杀的前提，杀害目标才是最终的目的，除了直接枪

杀或者用刀子等器械杀害被劫持人，军统特工杀害被嫌疑人的手段也多种多样。

首先说暗杀。暗杀是指被杀者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被他人杀死，军统如果采用暗杀，那么基本上就会使用软性暗杀方式，而不会直接用枪对目标的脑袋，开枪将其打死。

军统特务在暗杀中，所使用的成功率较高、隐蔽性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毒杀。毒杀是暗杀手段中最古老、最难防范的一种方法。军统特工研究了一种更为隐蔽的毒杀方法，那就是并不使用单一的毒药暗杀目标。很多药品，甚至食物，单独出现时，对人体没有任何危害，但是，某些药品或者食物和其他药品或者食物混合后，就会变成致人死亡的“毒药”，例如牛肉和栗子单独吃，一点问题都没有，一旦将二者同食，就会发生腹泻、腹痛的食物中毒现象，这不过是最轻微的中毒，那么只要掌握了能够致命的食物的混合方法和混合剂量，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目标毒杀。

其次，军统特工还常常使用匕首、斧子等无声工具暗杀，这种方法没有声音，不容易引起他人注意，还能够趁目标不备，置目标于死地。比起枪械，这些冷兵器比枪械容易获得，而且不会发出声响。

那么在刺杀汪精卫的行动中，陈恭澍领导的刺汪行动组，首先想到的当然还是软性行动方法，所以，他们先从软性行动方法着手，刺杀汪精卫，后来未能得手，才采取了硬性行动方法。

刺汪小组在行动

就在刺汪行动组为如何成功刺杀汪精卫绞尽脑汁的时候，汪精卫也正在河内焦虑地等待着日本政府派人将他从河内安全护送回南京。

从汪精卫从国民党出走，投靠日本政府的那天开始，他就知道蒋介石一定不会放过自己。因此汪精卫逃往河内时，带了许多随从保护自己，可是他依然十分恐惧，担心自己随时会丢掉性命。这种恐惧在汪精卫抵达河内后，愈演愈烈，因为越南法律规定，任何人的随身侍卫都不能携带任何武器，这就意味着，汪精卫带了那么多的随从，但是这些随从手中却没有一支枪，如果他在外出时遭遇混乱的局面，就

很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用枪射杀。而汪精卫的随从没有一支枪，对他保护的力度非常微弱，即使他不被人用枪射杀，可一旦被人盯上，也难保安全。所以，汪精卫担心自己的性命，为了保命，在河内期间，几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他将大部分事情都交给了妻子陈璧君和秘书曾仲鸣处理。

然而，不仅仅是汪精卫的随从不能携带武器，“刺汪行动组”的成员同样也受到了越南法律的限制，不能携带武器。

可能会有读者提出，越南不过是个小国，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苛刻的法令呢？

因为当时越南是法国的殖民地，所以这些法令是法国驻军制定的。法国驻军对越南的管理十分严格，对枪支弹药的限制十分苛刻，所以除了法国军队，不管是谁，进入越南都不能携带枪械。碍于法国驻军的威慑，那个时候，不管是哪个国家的人进入越南，都会自觉遵守越南法律，避免和法国驻军发生冲突，因此汪精卫和“刺汪行动组”的人才会被束缚了手脚，放弃携带枪支进入越南。当然，如果有人想携带枪支进入越南，总还是有空子可钻的。

“刺汪行动组”在汪精卫居住的府邸附近秘密调查了很久，发现汪精卫老奸巨猾，几乎从来不出府邸，就算在屋里，也几乎从来不走到窗边上来，这就让军统杀手们很难摸清汪精卫的生活作息以及活动规律。不得已，军统杀手们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入室锄奸。

为了查清汪精卫府邸内的警力情况以及汪精卫的活动规律，陈恭澍派刺汪行动组的特务乔装打扮想尽办法进入了汪精卫的宅邸，该成员伪装得非常成功，在汪精卫的府邸内做了一名勤杂工，而汪精卫一家一直都不知道他们身边潜伏着一名军统特工。这名特工在进入汪精卫的府邸后，虽然没有成为汪精卫的亲信，但却查明了整个府邸的情况，探明了汪精卫夫妇的卧室位置以及汪精卫的作息时间。陈恭澍等人得到这些情报后，就准备寻找时机，进入汪精卫的府邸，将汪精卫击毙。

陈恭澍等人收到有关汪精卫的确切情报后，首先想到的是软性暗杀的手段，希望能较为隐秘地将汪精卫杀死，于是他们想到了在面

包里下毒。

军统特务将毒药用注射剂注入面包中，然后将带毒的面包送进了汪精卫的府邸，企图用毒面包暗杀汪精卫。但是他们随后就发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注射了毒药的面包，面内部会出现变色、结块的现象，一眼就能看出面包不新鲜了，所以这样的面包，汪精卫不吃。最终，军统杀手采取的这种软性暗杀手段以失败而告终。

这对陈恭澍所领导的刺汪行动组来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挫折，这并不能够阻挠他们击毙汪精卫的决心，他们再次寻找机会接近汪精卫。汪精卫不可能永远窝在家中不出来，一旦汪精卫外出，他们就有机会将汪精卫击毙。

陈恭澍一行人又一次筹划好了刺杀汪精卫的计划和步骤，但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们和汪精卫的侍卫一样，都“手无寸铁”，想要在汪精卫外出时暗杀他，必然要用到枪支，可刺汪行动组如何在对枪械管理非常严格的越南获取到枪支呢？

陈恭澍将他们这个问题报告给了戴笠，戴笠迅速买了两支美国制造火力强大的手枪，通过自己的朋友，找到一位正在法国军队服役的华裔军人。因为这位华裔在驻越南的法国军队工作，所以这位华裔军人可以不受越南法律所规定的禁止携带枪支的限制，随意携带枪械出入越南。于是，戴笠将这两支枪和子弹交给了这位华裔军人，他果然没有辜负戴笠的信任，进入越南境内后，秘密地将这两支枪交到了“刺汪行动组”的组长陈恭澍的手中。

拿到枪后，“刺汪行动组”的成员开始严密关注汪精卫的行动，等待时机刺杀汪精卫。而与此同时，因为在越南河内不能携带枪支，汪精卫越来越感到不安，他频繁向日本政府提出要转移到更安全，并且能有拥有私人武装力量，能有携带枪支的地方去。但是让汪精卫失望的是，日本政府一直没有答复他，更没有为他提供任何的保护人员，因为和汪精卫达成组建伪国民政府协议的日本近内卫阁突然倒台，新一届内阁自顾不暇，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理会汪精卫的事情。

在汪精卫屡次请求，都得不到日本政府的答复后，汪精卫开始怀疑自己的选择，为了权力，他背叛了国民党、背叛了祖国，投靠了日

本政府，然而现在他却觉得，自己就是日本政府养的一条狗，高兴了摸几下，赏几根骨头，不高兴了，连理都不理。当下正是春节，如果自己在国内，没有背叛国民党，没有背叛祖国，好歹现在自己还在国内喜气洋洋地过春节，可现在，他汪精卫却只能像丧家之犬一样孤独无助、万分恐惧地在河内忐忑度日。

刺汪小组刺杀汪精卫失败

在河内孤立无援的汪精卫，内心十分抑郁，1939年3月19日，河内的天空晴空万里、微风拂面，汪精卫的家人为了舒缓他的情绪，提议开车去踏青，一起出去散散心。受家人鼓动，汪精卫随家人一起外出散心，汪家人全家出动。汪精卫全家开车来到野外，在一座小桥前停了车，见周围环境十分优美，便一起下了车，在小桥四周悠闲地游玩起来。就在汪精卫全家享受红花绿草、碧水蓝天之时，刺汪行动组就追上了他们的车辆，渐渐靠近了小桥。

在汪精卫一家刚从宅邸开车出来时，在汪精卫的府邸外埋伏多时的“刺汪行动组”就开车远远地跟在汪精卫一家人的汽车后，当汪家人在小桥停车，下车活动时，陈恭澍催促刺汪行动组的汽车迅速跟上，然后陈恭澍和另外一名特务掏出手枪，对准了在小桥附近散步的汪精卫，准备击毙汪精卫。

然而，就在汪精卫刚刚进入陈恭澍等人的射程时，汪精卫一家却突然纷纷上车，并且就此掉头往回开了。

无奈之下，陈恭澍只好下令刺汪行动组的汽车尾随其后，但是却再也没有机会刺杀汪精卫了，因为汪精卫一家人就此开车回了府邸。

这次刺杀失败，让陈恭澍大失所望的同时，也倍感疑惑，为什么在他即将射击之时，汪精卫能如此幸运地躲过死亡的危机。

事后，据汪精卫的家人回忆，当时，他们一家正在附近活动，一辆汽车突然从前面开来，停在了他们身边，从车上走下一位法国人，他手持越南警察局的证件，十分严肃地对他们说，他们接到情报，有人企图谋害汪先生，希望汪先生一家能够尽快返回家中，并且尽量不要到偏远的地方去。虽然汪精卫一家对这位自称是警局工作人员的话

并不完全相信，但出于谨慎，他们还是决定立刻掉头回家。正是因为如此，“刺汪行动组”才错过了一次千载难逢的刺杀汪精卫的机会。而当时刺汪行动组的汽车在汪精卫的汽车之后，所以陈恭澍并没有注意到从前面开来的那辆汽车。

这件事情有许多诡异的地方，到底是谁向警察局告的密呢？难道陈恭澍一行人当中有内鬼？然而，不管陈恭澍一行人中究竟有没有内鬼，也不管是谁向警察局告的密，这次机会都已经错失了。

很快，陈恭澍等人又得到情报，说汪精卫一家即将离开河内，再不行动，将再也找不到任何机会刺杀汪精卫，无奈之下，“刺汪行动组”不得不铤而走险，连夜翻墙进入汪府内部，兵行险招，强行入室刺杀汪精卫。

“刺汪行动组”潜入汪府内部的暗杀计划虽是被逼无奈的举动，但他们依然还是考虑得十分周密。

在这次刺汪计划中，陈恭澍负责在车内接应，另外两名特务负责在宅院外望风，四名特务翻墙而入，进入位于三楼的汪精卫的卧室，在汪精卫的侍卫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迅速将睡在床上的汪精卫夫妇乱枪打死。随后，这四名特务趁侍卫们乱作一团之际，逃离现场。

这个计划完成得非常顺利，一切都如陈恭澍的刺汪行动组所料，而他们也的确乱枪打死了睡在汪精卫夫妻的卧室的床上的一对男女。

就在刺汪行动组认为此次汪精卫必死无疑之际，就在他们欢呼此次任务终于得以圆满结束之时，汪精卫宅邸的内线竟然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陈恭澍当时就愣住了，原来，昨晚被乱枪打死的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

这个消息让陈恭澍的心情瞬间跌到了谷底，他不敢相信，自己这个无往不利的军统金牌杀手居然失手了！这个结果让陈恭澍无论如何也不能接受，他质问内线，为什么汪精卫当天晚上没有在他的卧室休息，内线这时才告诉了他一个被他们忽略的细节。

这次暗杀失败，主要是由于“刺汪行动组”忽略了一个细节，正是这个细节，让军统金牌杀手陈恭澍尝到了失败的滋味。这个致命的细节和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有关。

原来，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的妻子方君璧那天正好从国内来到河内，汪精卫为了收买秘书曾仲鸣，当晚，就将自己的卧室临时让给曾仲鸣夫妇居住，而他和陈璧君则搬到曾仲鸣原来住的小房间去了，这件事发生在晚上临睡前，所以除了汪精卫和曾仲鸣夫妇以外，谁也不知道。正是由于没有人知道这件事，潜伏在汪府的军统特工才没能及时获得消息，没能将此事告知刺汪行动组，因此，当晚，军统的刺汪行动组的特务冲进三层汪精卫的卧室，乱枪打死的是曾仲鸣夫妇，而汪精卫夫妇却逃过了此劫。

就在“刺汪行动组”紧锣密鼓地开展刺杀汪精卫的行动的同时，当初和汪精卫签订协议的有关的日本政府官员则极力游说新内阁成员，希望他们能够重视汪精卫在对华战争中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尽快将汪精卫从越南接到上海，让其早日出任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主持大局。而新内阁在听说军统在河内刺杀汪精卫失败一事后，也终于对汪精卫的生命安全重视起来，于是他们安排上海的日本特务间谍机构重光堂做好了迎接汪精卫回上海的准备。

为了安全、顺利地将汪精卫从河内护送回上海，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将汪伪 76 号的李士群和丁默邨二人找了来，让他们到河内去保护汪精卫，负责护送汪精卫回国。

土肥原贤二之所以对李士群和丁默邨十分重视，就是因为他认为，这两个人能在短时间内将《上海抗日团体》搜集整理成册，便证实了他们对危险的警惕能力和对情报的收集能力，让他们护送汪精卫，不仅能考察他们的行动能力究竟如何，还能完成日本政府所布置的重要任务，是一件一举两得的事情。

当陈恭澍一行人看到，汪精卫一家，在李士群等人的护送下离开河内回了国，终于不得不垂头丧气地低下了头。他们明白，河内暗杀汪精卫的计划已经彻底失败，他们只能将暗杀战场转移到上海，在那里继续执行戴笠的命令，暗杀汪精卫。

然而，刺汪行动组在回到上海后，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刺杀汪精卫，汪精卫一直住在李士群的府邸，几乎从来不出门，偶尔出门，身边也有李士群和丁默邨等人的保护，汪伪 76 号的特务，像栗子壳一样，

将汪精卫守卫得严严实实的，使得军统的特务没有机会刺杀汪精卫。

不得已，以陈恭澍为首的刺汪行动组只得暂时放弃暗杀汪精卫，向戴笠报告行动组此次暗杀汪精卫失败，全组成员只有接受戴笠的处罚了。

第五节 汪伪 76 号“投胎”上海

李士群等人将汪精卫安全护送到上海后，就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开始积极筹建特务组织。日本政府为什么如此积极地支持李士群、丁默邨建立汪伪 76 号呢？因为 1939 年大年初一，日本在南京成立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箴被军统特工暗杀，军统的这一暗杀行动触动了日本政府的神经，也让一些已经答应为日本政府做事的原清政府高官和军阀们改变了态度，开始观望。为了给这些人吃颗定心丸，也为了杀杀军统的气焰，日本政府决定投入更多的资金、武器和精力，支持李士群、丁默邨等人建立特工组织。

大汉奸陈箴被军统特工刺杀

1939 年 2 月 19 日这天，农历大年初一，正是全家团聚一堂的日子，上海的天空飘着雨夹雪。在这个国难当头、战乱频发、人人自危的岁月里，在上海沪西愚园路 25 号的一栋花园洋房里，一位花甲之年的老人却得意扬扬地带着全家祭拜祖先。然而，就在此时，两名手持枪械的年轻人闯入了洋房。其中一名年轻人举枪对着正在祭拜祖先的老人就是一枪，老人应声倒地。随后，另一名年轻人发现老人还没断气，就举起手枪，又冲着老人的头部连开两枪。屋里的人还来不及反应，这两名年轻人就迅速撤离了，他们一边向屋外跑，一边撒传单，直到撤出了洋房，还高声呼喊：“大家不要怕，我们是杀汉奸的中国人。”这两名年轻人还没走远，祭祖的老人就已经一命呜呼了。

这位被枪杀的老人就是陈箴，陈箴时任日本在南京成立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他出生于 1878 年，早年曾担任清政

府司法部制勘司主事、外务部考工司郎。到了民国时期，由于陈箬曾经在法国学习过法律，对国家法非常熟悉，并且对法国的风土人情了解得较为详细，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因此中华民国第一任外交总长陆征祥委任陈箬为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主抓中国对法国等国家的外交事务。

公正地讲，陈箬在担任中华民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期间，的确也曾为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做出过一些贡献。

当时，陈箬担任外交部政务司司长，中国被各国列强压迫，连许多实力不如中国的国家都敢向中国挑衅，外蒙古王公举起了独立的大旗，要从中国脱离出去。陈箬为了解决外蒙古的主权问题，与沙俄、外蒙古王公进行了历时长达9个月的斗争，一共与沙俄和外蒙古王公进行了48次正式会谈，最终签订了《中俄蒙协约22条》。在这个协约中，虽然中国不再保有对外蒙古的实际统治权，但却为中国保有了对外蒙古的名义上的统治权。虽然只是名义上的统治权，但是陈箬能在民国时期，在中国政府遭受日本政府“二十一条”的巨大压迫下，在没有军事手段作为后盾的条件下，凭借一张嘴舌战群儒，其中的艰辛可想而知，取得这样的成绩，陈箬也算是功不可没了。

由于陈箬在处理外蒙古的事务中为民国政府争得了面子，所以在1917年底，陈箬被升任为外交部次长代行外交部总部长兼驻法公使，至此，陈箬的仕途走到了顶峰。

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许多民国时期的官员被免职，陈箬也位列免职人员名单。陈箬被解除了外交部次长代行外交部总部长兼驻法公使的职位，走下了政治舞台。被卸任后的陈箬黯然神伤，他离开官场后，只得利用自己在法律上的专长，做一名律师，以养家糊口。可陈箬却并不甘心，虽然他衣食无忧，但他已经习惯了从前在官场上众星捧月般的生活。然而离开官场后，他几乎没有了参加任何社交活动的机会，而从前那些拜访过他，求他办过事的人，也都人走茶凉，没有一个人再来看望他，以前的门庭若市变成了门可罗雀，这种巨大的反差，让陈箬心里实在难以接受。正是出于这种心态，在陈箬“卸甲归田”后的第十年，当日本政府找到他，对他许以高官厚禄，

请他为日本政府效力时，陈箴想都没想，就做了汉奸，答应为日本政府卖命，自甘堕落，成为日本在南京成立的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部长。与此同时，年逾花甲的陈箴还担心自己的家族败落下去，为了后辈的升官发财，他将自己的儿子陈友涛也拉到了日本政府的战车上，与他一起成为了日本人的走狗。陈箴公然叛国投敌，被日本政府视为对华侵略的一大胜利，日本政府甚至在报纸上大肆宣扬，说昔日的民国高官陈箴，自愿成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的外交部部长。陈箴的叛国，则给了蒋介石一个狠狠的嘴巴，让蒋介石颇感颜面无光，因此，恼羞成怒的蒋介石下令戴笠，铲除汉奸陈箴！

军统上海区的特工们，在接到戴笠下达的铲除汉奸陈箴的命令后，积极准备暗杀陈箴一事，却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这主要是因为日本政府对伪政府的官员们实施了严密的保护，他们严密提防军统局或者中统局暗杀投靠他们的晚清和民国官员。因为日本政府出动了许多警卫，将陈箴严密地保护了起来，所以军统特工们一直找不到机会暗杀陈箴。

军统特工刺杀陈箴始末

1939年，军统特工暗杀陈箴成功，要归功于戴笠的两大亲信——王天木和赵理君之间的争风吃醋和争权夺利。王天木是军统“大掌柜”戴笠的亲信，1938年，军统上海区区长周伟龙因唐绍仪一案被捕后，上海区一时群龙无首，特工工作陷入混乱，为了重整军统上海区，戴笠紧急命令时任军统天津区区长的王天木前往上海，出任军统驻上海区区长，要求他带领军统上海区特工，做出更多的鼓舞士气的工作成绩来。

这里笔者先介绍一下王天木其人。王天木早年就读于东北讲武堂，后加入国民党，并迅速成长为军统局的金牌特务，和陈恭澍、赵理君、沈醉并称为军统四大金刚。此时的王天木，担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为军统局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后来，王天木在上海被汪伪76号逮捕，并被李士群成功策反，从此成为汪伪76号中的一名犬牙，当然这是后话，这里只讲暗杀陈箴一事。

1933年，王天木协同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成功除掉民国第一汉奸张敬尧，这次暗杀奠定了王天木在军统中牢不可破的地位。1938年，戴笠调任王天木担任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后，王天木开始了与军统在上海的“地头蛇”赵理君的争斗。赵理君是军统上海区的老牌特务，他为了个人利益，不顾戴笠的命令和整体的利益，处处与王天木作对。当时，王天木刚从天津抵达上海，对上海的一切都不熟悉，在上海也没有根基，上海的军统成员也大都不听从王天木的指挥，所以在王天木担任军统上海区区长初期，他的工作难以顺利展开，这就导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王天木所领导的军统上海区，没有什么令戴笠刮目相看的工作成绩。

王天木的无所作为，给了赵理君暗箭伤人的借口，赵理君理直气壮地向戴笠告状，状告王天木在上海消极怠工，导致军统上海区没有丝毫的工作成绩。当时身在香港的戴笠，听了赵理君的汇报后很是恼火，立刻给王天木发去电报，命令王天木到香港汇报工作，接到电报后，深知戴笠凶残狠毒的王天木感到十分恐慌。

正在王天木为前往香港向戴笠汇报工作而感到惴惴不安之时，他的一个亲信给他出了一个好主意，这让王天木一下子对此次香港之行充满了信心。这个亲信就是后来被称为“汉奸阎王”的军统杀手刘戈青。

这里，笔者先介绍一下刘戈青其人。

刘戈青的人生很有意思，他一生出入监狱21次，而且这21次，几乎都是不同的监狱，调侃地说，刘戈青待过的监狱数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其实，刘戈青最初也是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他最初的理想是开一家矿业公司，做一个老实本分的商人。1935年，刘戈青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家乡勘探矿藏时，发现了一处地方储藏有丰富的锰矿。这个发现让刘戈青十分兴奋，于是他立刻请父亲的好友——原上海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出面，帮自己注册一家矿业公司，杨虎很爽快地答应刘戈青的请求。

一天晚上，刘戈青父亲的另一位朋友邀请刘戈青到杨虎的住宅做客，共同商议开办矿业公司的事情。当晚，刘戈青准时到达杨虎家中，但是他到了之后，却发现不但父亲的朋友没在，就连杨虎也不在家。

刘戈青想也许二人因为什么别的事情耽搁了，就在客厅里等候二人的到来，就在他坐下后不久，一位四十多岁的男子也来到了杨虎的住宅。这位男子虽然是初见刘戈青，却没有一点的生疏，很快与刘戈青攀谈起来。刘戈青虽然很礼貌地回答男子的问题，但内心却对这个初次见面就刨根问底的陌生人厌恶不已。过了一会儿，刘戈青父亲的朋友打来电话，说今天有事来不了了，于是刘戈青起身告辞。

第二天，刘戈青再次来到杨虎家中，杨虎夫妇这才告诉他，昨天那位中年男子，竟然就是蒋介石的亲信戴雨农戴笠先生。此时的刘戈青，尚未听说过戴笠的大名，他依然希望继续做自己的矿业公司，但是杨虎夫妻却给他讲了一些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道理，在这些大道理的“狂轰滥炸”下，刘戈青答应加入国民党，为戴笠效力，从那以后，刘戈青就成了军统局的一员。

刘戈青加入军统后，一直积极努力。上海沦陷后，刘戈青主动申请留在上海，在战争的最前线从事地下工作，他的初衷是很好的，他打算在日本占领区制造骚乱、伺机锄奸。但是刘戈青没有想到，他被顶头上司排斥，周伟龙和赵理君一行人不用他，不仅闲置他，而且还打压他，试图将刘戈青排挤走，使得他早日离开军统上海区，回军统总部去。刘戈青受不了周伟龙和赵理君的排挤，但是心高气傲的刘戈青，为了做出一些成绩给戴笠看，还是坚持留在了军统上海区。

也就是在刘戈青正在军统上海区郁郁不得志之时，王天木奉戴笠之命来到了上海，经过一番挫折后，王天木意识到，自己急需从军统上海区的特工中找出几个可以作为亲信的得力助手，而当王天木从其他特工的口中听说了刘戈青的事情后，便认定刘戈青是个可以重用的人才，也是可以被自己拉拢的人才。

于是，王天木摆出一副谦逊的态度，亲自登门拜访刘戈青，他的这种态度让刘戈青受宠若惊。后来，经过数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刘戈青对王天木心悦诚服，终于成为王天木手下的第一员大将，二人结拜为异姓兄弟。因此，当王天木接到戴笠的命令，要求他奔赴香港汇报工作后，王天木将此事告知了自己的心腹兄弟刘戈青。

那么，王天木在告诉刘戈青此事后，刘戈青究竟给王天木出了什

么好主意呢？

原来，刘戈青听了王天木的倾诉，想了片刻，就拍着胸脯表示，自己一定会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给王天木长脸，让他到了香港后，能够理直气壮地跟戴笠汇报，以表示并非自己无能，也不是自己没有尽心尽力地工作，而是赵理君有意暗箭伤人。

刘戈青的话，说出来很容易，可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又究竟是什么呢？他到底打算暗杀谁呢？而暗杀谁，才能够给王天木带来足够分量的功劳呢？

刘戈青想到了不久前，公然叛国投敌的陈箴，戴笠下达命令刺杀陈箴已久，可军统上海区始终没有完成这项任务。既然陈箴让蒋介石勃然大怒，直接下令戴笠严惩此人，那么如果除掉他，肯定可以让蒋介石“龙心大悦”，那么王天木在戴笠面前，也肯定算是大功一件了。

于是，刘戈青告诉王天木，自己要去刺杀陈箴，王天木听后自然立即表示支持，并且，为了刘戈青的刺杀计划能够成功，王天木专门安排手下特工林之江为刘戈青找几把好枪，让他有趁手的枪械。眼看刘戈青行动在即，王天木的心情自然也就舒缓了很多。就在刘戈青筹划刺杀陈箴的时候，王天木离开上海，到香港向戴笠汇报工作去了。

刘戈青虽然在王天木面前表现得很有信心，但他也知道，暗杀陈箴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于是刘戈青从陈箴周围的人开始调查，力图找到可以利用的人，在暗杀陈箴时获取必要的情报。很快，刘戈青就查到，陈箴与张学良是亲家，陈箴家中的许多保镖都是张学良手下的兵士，而张学良又是个积极抗日的军阀，所以他手下的兵士，也有不少人看不惯陈箴的卖国投敌行为。于是，刘戈青找到曾经担任过张学良的警卫队队长的朋友刘海山，通过他的关系，和陈箴家中的保镖取得了联系，获得了陈家大宅的房屋分布图。而且，为了确保暗杀计划的成功，陈箴将刘海山也拉进了暗杀小组。除了自己和刘海山，刘戈青还找来了上海军统区的另外几名老牌特工组建暗杀小组，参与此次暗杀陈箴的行动。

人员齐备后，却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情，那就是当刘戈青找王天木之前介绍的林之江取枪时，林之江并不在家，也并没有为他们准备

枪械。林之江的妻子在刘戈青等人的威胁下，终于说出真相，原来，林之江早已暗中投靠了日本人，所以他不仅不支持刘戈青刺杀陈箴，反而打算把这个消息迅速通知陈箴。刘戈青对此十分愤怒，当即表示要惩处林之江，因为林之江当时并不在家，所以刘戈青打算绑架林之江的妻子，林之江的妻子恐惧极了，赶忙将家中暗藏的 14 颗子弹全数交给了刘戈青，这才让刘戈青心中的怒火稍有平复。

刘戈青等人唯恐林之江将他们刺杀陈箴的计划泄露出去，于是决定立即展开行动，刺杀陈箴。

1939 年 2 月 19 日下午，刘戈青等人带着两支几乎快要生锈的手枪和 14 颗子弹，开始实施暗杀陈箴的行动。当时，上海淅淅沥沥地飘着小雨，到了晚上雨也没停，这种坏天气，巡捕房、警察局的人早早地就窝在了办公室里，鲜有巡警在街上巡逻。于是，刘戈青一行人畅通无阻地来到了陈公馆门前。

这一天，刘戈青等人的运气非常好，当他们偷偷溜进陈府时，发现陈箴的保镖们竟然都在值班室里打牌，没有一个人冒雨在外站岗。直到刘戈青等人进入值班室后将他们捆绑起来，他们才意识到陈府闯进了刺客。

然后，刘戈青带着谭宝义、徐国琦、尤品山三人从花园偷偷进入陈家大宅的厨房。在刘戈青和徐国琦捆绑好厨房里的厨子和杂工后，谭宝义、尤品山二人便留下来看管这些人，以免他们逃跑或者喊叫。接着，刘戈青和徐国琦从厨房进入客厅。

一进客厅，二人就看到了正在祭祖的陈箴等人。徐国琦看到陈箴后，心情十分激动，当即对着陈箴的脑袋就是一枪，刘戈青担心这一枪不足以令陈箴致死，于是向前走近几步，冲着陈箴的脑袋和颈部又补了两枪，在看到陈箴血如泉涌后，二人便将事先写好的标语撒向空中，迅速逃跑了，这才出现了本节开头的那一幕。

陈箴被刺身亡一事，很快就被各大报纸刊登了出来，这件事在上海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陈箴的影响力，在当时投靠日本政府的汉奸中是数一数二的，日本政府对他的保护也是十分严密的。然而这样一位被严密保护的汉奸，竟然让军统杀手如入无人之境般在家中杀死，这

不能不让其他已经投靠和准备投靠日本政府的汉奸心生恐惧。陈箬在日本政府的保护下依然被军统特工刺杀身亡，这让日本政府下定决心，迅速扶植李士群等人建立完善的特工组织，与军统、中统和中国共产党的特工组织相抗衡。

陈箬被刺身亡，对军统局来说也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陈箬的被刺身亡，是军统局在正面抗日战场上的巨大胜利之一，也是王天木在戴笠面前挺胸抬头、站稳脚跟的成绩之一，他终于在和赵理君的争斗中胜出，保住了自己在戴笠心中金牌杀手、百战不殆的重要地位。

汪伪 76 号正式落户上海极司菲尔路 76 号

陈箬被刺身亡之前，李士群和丁默邨虽然已经投靠了日本政府，并且像模像样地开展了特务工作，但是当时日本政府正处于新旧内阁的交替阶段，自顾不暇，所以并没有对汪伪 76 号的建立给予过多的支持。而日本的新内阁上台后，对李士群、丁默邨提出的“利用国民党，展开和平运动”的计划也丝毫不感兴趣，自然对二人也没有过多关注。

直到 1938 年 9 月 30 日，日本特务机构在上海的工作屡屡失败，日本政府原本准备的以唐绍仪为首，在南京成立新傀儡政府的计划由于国民党军统局暗杀了唐绍仪而没能实施，日本驻上海的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才决定大力支持李士群和丁默邨组建汪伪 76 号。当时，唐绍仪被军统局的特务暗杀，而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拉拢原北洋军阀吴佩孚失败，这一系列的失败，让土肥原贤二焦头烂额，也让他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的特务机构自有一套自己特殊的办法，任凭日本政府如何加大对陈箬、唐绍仪等投日人员的保护力度，也难以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只有中国人才最了解中国人，所以，只有利用中国特务来对付那些一直和日本政府作对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特务机构，才能取得成功。

于是，土肥原贤二在得到日本政府的认可后，开始大力支持李士群和丁默邨建立特务组织。

为了支持李士群和丁默邨建立亲日特务组织，土肥原贤二派属下晴气庆胤到日本东京拜见了日本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就支持李士群

和丁默邨建立亲日特务组织的事情进行了认真的汇报。影佐祯昭虽然觉得李士群等人的变节，有可能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设下的一个圈套，但他却并不反对土肥原贤二组建一个能够制约国民党特工组织和中国共产党的特工组织的亲日的特务组织，他认为，不管李士群等人的变节是真是假，他们都可以先支持李士群等人组建一支亲日的特工组织，大不了等这个组织建立后，除掉李士群和丁默邨，将其归入日本特务组织的管辖。于是，晴气庆胤在东京逗留了三天后，就坐飞机飞回了南京，带回了日本东京参谋总长于1932年2月10日发布的关于组建特务组织的工作命令，自此，土肥原贤二正式开始支持并督促李士群和丁默邨组建汪伪76号。

晴气庆胤带回的日本东京参谋总长于1932年2月10日发布的关于组建特务组织的工作命令全文如下：

致晴气少佐的训令

一、大本营确定，将援助丁默邨一派的特务工作，作为对付上海恐怖活动对策的一个环节。

二、你在上海应与丁默邨进行联络，援助特务工作，协助华中派遣军推行其对付租界的对策，并处理土肥原机关所遗留的工作。分派土冢本诚宪兵大尉和中岛信一少尉，作为你的部属。

三、在援助特务工作时，宜就下列事项与丁默邨进行联络：

专事杜绝在租界内发生反日活动时，尤应避免与工部局发生摩擦；

不得逮捕与日本方面有关系的中国人；

与汪兆铭的和平运动合流。

三月份后，每月贷与三十万日元，借与枪支五百支、子弹五万发以及炸药五百公斤。

（该训令全文摘自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谍魔》第一版）

1932年2月15日，就在李士群和丁默邨由于长时间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回应，坐在大西路67号李士群的家中长吁短叹之时，晴气庆胤来访。李士群和丁默邨本以为，日本政府一定不会重用他们了，他们将再无出头之日，一辈子只能像缩头乌龟一样窝在这个小小的大西路67号院。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晴气庆胤竟然不请而来，他来到李士群的家里，并且要求李士群和丁默邨尽快在意大利警备区中，日军所占领的房子中挑选一栋房屋作为特务基地。晴气庆胤还告知他们，从3月份起，日本政府每个月将给予他们30万日币的财政支持，还将给予他们500支和5万发子弹，作为他们筹建特务组织的经济支援和实物支援。这个消息，让李士群和丁默邨欣喜若狂，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能够这么快得到日本政府这么多钱财、房屋和武器的支持，于是二人迅速着手建立特务组织。

在李士群和丁默邨兴高采烈地建立特务组织的过程中，军统局和中统局对汉奸的暗杀行动也在轰轰烈烈地展开，日本政府责令李士群和丁默邨二人尽快建立特务组织，以尽快制止和对抗军统局和中统局对亲日分子和日本相关人员的暗杀行动。于是，李士群和丁默邨将军统局和中统局作为组建特务组织后打击的首要目标。对于李士群和丁默邨来说，军统局和中统局的特务们，就是阻碍他们发财升官的巨大障碍，只有制止他们的行动，他们才能从日本政府那里获得更多的支持和更大的利益。

李士群和丁默邨老老实实在地听从日本政府的吩咐，在意大利租界内选择了一栋房子作为特务总部。当时，上海公共租界的所有国家中，只有意大利对日本的态度是最为友好的，因此日本政府让李士群和丁默邨二人将特务总部建在意大利警备区，因为在意大利警备区建立特务总部的安全系数最高，意大利巡警经常在警备区内执勤，治安良好，可以为李士群和丁默邨的特工总部的工作提供强有力的安全保障。

后来，李士群和丁默邨选定了意大利警备区内的极司菲尔路76号。极司菲尔路上的住宅大多集中在静安寺至曹家渡一带，这条路上的大部分建筑的门牌号都是白底黑字的，唯有74、75、76号房屋的门牌号是蓝底白字。这门牌号的颜色到底代表什么呢？可别小看只是

门牌颜色不同的 74、75 和 76 号房屋，这个门牌意义重大，能用蓝底白字做门牌的，都是在洋商挂号，经过旧清上海道台衙门登记的认可“道契”的房屋。所谓“道契”，就是指近代上海租界最基本的土地制度，虽然名为“租地”、“永租”，实际上就是一种将土地完全私有化的产权登记制度。也就是说，这三栋房子完全属于个人所有。在蓝底白字做门牌的这三栋房子中，属 76 号房屋面积最大。

极司菲尔路 76 号其实也是大有来头的，它原本属于清末一户官宦人家，民国时期，这栋房子被军阀头子陈调元占据，后来陈调元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上将，任军政委员，在国民党内部的势力逐渐扩大。后来，蒋介石担心陈调元变成第二个唐绍仪，就在 1938 年底，借故将陈调元调往了香港。日本政府也因此失去了劝说陈调元投日的机会，但却霸占了陈调元的旧宅——极司菲尔路 76 号。

李士群选定将特务总部建立在极司菲尔路 76 号后，便开始着手改造极司菲尔路 76 号。1939 年 3 月，李士群不但将日本人拨给他的 30 万日元全部用光，还倒贴了 8 万元，改建了极司菲尔路 76 号，使其具备了更多的功能。由此可见，李士群为了在日本主子面前立功，对成立汪伪 76 号是多么上心。不过话又说回来，李士群为了改造极司菲尔路搭进去的 8 万元根本不算什么，他清楚得很，花出去的钱，日后都能成倍收回，等日后，自己掌握了汪伪 76 号的实权，日本政府会给自己大把大把的“银子”的！

经过李士群改造后的极司菲尔路 76 号，从外面看，像是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魔鬼，让人不寒而栗。那么，李士群到底把极司菲尔路 76 号改造成了什么样子呢？

为了让 76 号看上去更有震慑力，李士群将 76 号院子中的二门向后移动了许多，这样，大门和二门之间的距离就加宽了很多。二门从前是洋式风格，被李士群改成了中国古典牌楼的样式，牌楼上方还书写着孙中山先生提倡的“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似乎是为了彰显自己支持国民政府的。

李士群将极司菲尔路 76 号的外墙加高加厚，并涂成了青灰色调。然而，即使是将围墙加高加厚，李士群依然觉得安保措施做得不够好，

他命人在围墙上安装了电网，使得极司菲尔路76号昼夜处于“电刺猬”的保护下。为了防止敌人从周围的房屋跳进极司菲尔路76号，李士群将极司菲尔路76号周围的居民全部赶走了，然后在西边的华村弄堂口筑上了一堵墙，将路堵死，然后在华村东面的墙上开了一个仅容一人通过的便门。赶走周围的居民后，位于极司菲尔路76号周围的空住宅，就都被李士群当作了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办公室和宿舍。

李士群考虑，如果仅仅在极司菲尔路76号建立特工总部的办公室和宿舍，显然有些浪费空间，于是决定将特工训练营和犯人拷问室也建在这里，这样不仅方便控制特工和犯人，更便于集中管理。因此，李士群在极司菲尔路76号的院内做了很多改建工作，他在院内的东西两侧各建了四排平房，分别作为训练特务和审讯、关押犯人的地方。也可以说，这四排平房是极司菲尔路76号内最黑暗、最血腥、最残酷的地方。

李士群、丁默邨等人本就怕死，做了汉奸后更是担心自己的小命朝夕不保，因此他们即使是住在安全系数高的意大利管辖区，也依然执着地为自己的性命加上无数的保险。因此，李士群特意让手下的特工在极司菲尔路76号的西墙下开了一家铁匠店，还在距离极司菲尔路76号不远的路口开了一家杂货店，这两家店的主要职能是为极司菲尔路76号望风，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李士群等人便能及时获得情报，并有足够的时间从极司菲尔路76号撤离。李士群还在极司菲尔路76号外设置了许多流动的小摊铺，这些小摊铺的主人，都是极司菲尔路76号的特务们装扮而成的，目的是监视在极司菲尔路76号周围活动的人群。

就这样，汪伪76号正式定址极司菲尔路76号，当时最臭名昭著、最血腥、最令人痛恨的汉奸特务组织汪伪76号就此正式“开张”。

汪伪76号的主要“骨干”

极司菲尔路76号改造完毕后，李士群有了安全的办公场所，但他手下的特务却并不多。一个组织想要成势，势必少不了人手。李士群和丁默邨在确定了特务总部的办公场所、确定了特工组织的组建步

骤后，就开始使用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从青帮、黑社会和其他社会群体中寻找可以拉拢的特务人员，二人还从国民政府和中统局、军统局内部策反了一部分意志不坚、贪生怕死、贪财贪权的国民党军官和国民党的特务人员。于是，这些人就跟随李士群和丁默邨，成为了日本政府的鹰犬，开始为金钱和权力，将枪口对准了中国人。这些人中的一部分，后来成为了汪伪 76 号的“业务骨干”，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残害了许多中国人，成为日本政府屠杀中国人民的罪大恶极的刽子手！

汪伪 76 号第一杀手吴世宝

在抗日战争时期，汪伪 76 号之所以让人闻之毛骨悚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对待被俘人员施以极刑，还因为汪伪 76 号里有很多冷酷的杀手，他们杀人不眨眼，作恶多端。这里，我们先说说汪伪 76 号的第一杀手，长期占据汪伪 76 号第一杀手的位置的，是吴世宝，那么此人究竟是什么人？他又为什么被称为汪伪 76 号第一杀手呢？

吴世宝原名吴四宝，他身材高大，满脸横肉，一眼看去像个屠夫，此人爱财爱色，非常冷酷，杀人不眨眼。吴世宝看起来像个大老粗，却是个很会钻营的人，他知道自己出身贫寒，要想出人头地，只有攀附权贵。可吴世宝自知没有什么文化，不能为上司出谋划策，要想得到上司的重用，只能像只忠心耿耿的哈巴狗一样，对上司恭顺，为上司拼命，于是，吴世宝的出路，就只能是成为上司的打手和走狗了。

吴世宝是这样盘算的，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在加入汪伪 76 号之前，吴世宝是青帮头子季云卿手下的一名打手。在一次黑帮争斗中，季云卿遭到暗杀，吴世宝舍命保护季云卿，救了季云卿一命。从那以后，季云卿将吴世宝视为心腹，还将自己的干女儿余爱珍嫁给了吴世宝。

吴世宝成为季云卿的亲信后，最经常处理的一件日常事务，就是帮助青帮的弟兄们修理枪械。因为当时，吴世宝的一名同乡是开汽车修理行的，所开的汽车修理行规模比较大，车床等各种机械设备齐全，所以每次青帮里的兄弟们手里的枪械有所损坏，季云卿就会派吴世宝

拿着损坏的枪械去汽车修理行修理。吴世宝别的本事没有，忠心倒是有的，所以为了修理好这些枪械，他对所有修理好的枪械都非常上心，每把枪修好后，都会拿到郊外去试枪，看看修理的到底怎么样。就这样，吴世宝间接地练习了自己的枪法，不仅枪法越来越准，而且还学会了处理枪械的一些小毛病。后来，季云卿发现吴世宝枪法极好，对自己又始终忠心耿耿，便让吴世宝担任自己的司机兼保镖。久而久之，吴世宝就在上海滩混出了名头，人称“枪神”。

吴世宝加入汪伪 76 号，与他的干岳父季云卿脱不了干系。

在李士群建立特工组织之初，曾向自己曾经的保护伞季云卿讨要过人马。当时，季云卿给李士群介绍了在沪西地区开赌场的两名手下，一名叫朱顺林，另一名叫许福宝，这两人在上海也算人脉颇广，手下也有些人手。然而，当李士群找到这两人后，却发现，这两人虽是混黑帮、开赌场的，但也有自己的立场，他们不愿意当汉奸，也不愿意为汉奸李士群服务，碍于季云卿的面子，他们推说不能胜任特务工作，婉言拒绝了李士群的邀请。季云卿也没想到自己这两个门徒会拒绝李士群的邀请，为了在李士群面前挽回颜面，季云卿大手笔地将自己的干女婿——亲信吴世宝介绍给了李士群，吴世宝因此加入了李士群和丁默邨组建的亲日特务组织——汪伪 76 号。

吴世宝是打手出身，所以做事拼命，下手狠毒，在加入汪伪 76 号后，做了许多别的特务们做不到或者不敢做的恶事。譬如江苏农民职工宿舍集体被枪杀事件、中国银行定时炸弹惨案，都是吴世宝所为。吴世宝的凶残，让他成为了汪伪 76 号第一杀手，也让汪伪 76 号成为百姓心中的魔窟。

在汪伪 76 号建立初期，由于特务人手不足，专业素质不强，李士群派出的特务，经常不能完成任务，而且不但不能击中目标，还常常打草惊蛇。只有吴世宝几乎次次都能顺利完成任务，不仅枪法准，而且做事狠。因此不到半年时间，吴世宝凭借自己“枪神”的实力，坐上了汪伪 76 号第一杀手的金交椅，他的出色表现让李士群对他颇为信任，后来任命吴世宝担任汪伪 76 号的警卫大队长。

吴世宝为了荣华富贵，为非作歹，后来，竟然发展到为所欲为，

连“日本主子”的东西都敢抢的地步，最终惹怒了日本驻华特务机构。后来，日本驻华特务机构协同日本宪兵队将吴世宝抓进了监狱，准备严惩吴世宝，以期杀鸡儆猴，好让张狂的汪伪76号的特务们有所收敛。为了保命，吴世宝的妻子苦苦哀求李士群，请李士群为吴世宝向日本人求情。后来，在李士群的劝说下，日本特务机关决定不公开惩处吴世宝，以便稳定汪伪76号的人心。然而，最后，日本特务机关还是给吴世宝的饭菜里放进了慢性毒药，尽管他们释放了吴世宝，但是吴世宝出狱没两天，就毒发身亡，死在家中了。

汪伪76号的“合伙人”周佛海

汪伪76号除了有王牌杀手吴世宝以外，还有一个最会变脸，最爱见风使舵的墙头草般的“合伙人”，他就是周佛海。

关于周佛海这个人，曾经有后人这样评价他：周佛海其人，是中国现代史上少有的风云人物，他的风云，在于他的多变。他从信仰共产主义到鼓吹卖国主义，从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到蒋介石的亲信之一，再到汪伪王朝的股肱，从革命者到卖国巨奸，其变化多端、朝秦暮楚，在中国近代史上无人能出其左右。

所以，周佛海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唯利是图、有奶便是娘的小人，他其实并没有信仰，或者说他的信仰就是金钱和权力，为了金钱和权力，他可以出卖自己的人性、良心，也可以对祖国的苦难视而不见。在周佛海心里，并没有什么国家利益和是非之分，更无所谓忠诚，只有对他个人来说有利可图，他就可以一次次地叛变，一次次地改弦易张。

这里，笔者简要介绍一下周佛海的经历。

周佛海于1920年从日本留学归来，回国后，他与陈独秀等人一同在上海组建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所以周佛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周佛海不仅是与会代表，还兼任代理书记一职。

然而到了1924年9月，周佛海就为了所谓的个人仕途和丰厚的物质利益，退出了中国共产党，加入了国民党。

在1924年国共合作时期，周佛海担任国民党宣传部秘书。1924

年年底到 1938 年 9 月之前，周佛海在国民政府内步步高升。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唯利是图的周佛海看到日本军队在中国的国土上大肆践踏，看到中国许多城市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唯恐国之不存，更害怕自己手中的权力和财富就此毁于一旦，于是萌生了投靠日本政府的想法。

当时，周佛海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他（蒋介石）过去一误再误，中国竟亡于国民党之手，千秋万世，决不为吾人谅，吾人岂为历史之罪人！去年沪战发生，余与希圣、思平、宗武早已料及，唯人微言轻，莫挽危局奈何！

从周佛海的这段日记可以看出，周佛海认定中国必亡，所以，他最终还是叛国投日，成为了日本政府的走狗。

周佛海投靠日本政府后，就在汪伪政府中安插了许多自己的亲信，为了拉拢人马，周佛海还特意在位于上海威海路的太阳公寓里成立了一个“招贤馆”。不管是投机分子还是失意政客、不管是叛变中国共产党的和叛变中国国民党的变节者，哪怕是地痞流氓、街头混混，只要有意“投诚”，周佛海都一概接纳，并尽量委以重任，周佛海就此逐渐组建了自己的一批人马。

周佛海在加入汪伪政府，并在汪伪政府中安插好自己的人手后，又看上了李士群和丁默邨组建的汪伪 76 号。于是周佛海在汪伪国民党“六大”后，利用自己在汪伪政府中的权力，将李士群和丁默邨组建的汪伪 76 号正式命名为汪伪国民政府特务委员会，并由他自己担任特务委员会主任，而由李士群、丁默邨二人担任特务委员会副主任。

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汪伪 76 号成为周佛海获得利益的工具之一，他利用汪伪 76 号的力量，窃取汪伪政府中的大部分权力，并意欲架空汪精卫。

周佛海在掌握了汪伪 76 号后，开始架空汪精卫。1939 年，周佛海背着汪精卫，先后两次同日本签订秘密的卖国条约，并且，他利用

手中权力，在汪伪 76 号内建立了“行动总队”和“警卫总队”，将汪伪 76 号的势力从上海扩展到了南京、杭州、苏州、青岛等沦陷区，他在这些地方筹划组建了汪伪 76 号的特工分部。而这些，都不是汪精卫授意周佛海所为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虽然周佛海对汪伪 76 号指手画脚，但正因为他的推动，汪伪 76 号才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规模巨大、功能齐全的全国性特务机关，才成为了为汪伪集团保驾护航的首要的武装力量，所以汪伪 76 号的发展，周佛海也算功不可没。

周佛海的插足，让汪伪 76 号发展越来越快，规模越来越庞大，因此李士群和丁默邨二人也就乐得让周佛海干预汪伪 76 号的相关事务，三人因此合作愉快。有意思的是，周佛海和李士群、丁默邨最终之所以发生分歧，并不是因为三人之间争夺对汪伪 76 号的管理权，而是因为周佛海的妻子和李士群的妻子。

周佛海和李士群两人有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惧内！

李士群惧内，是因为他一直愧对妻子叶吉卿，李士群三次被捕入狱，都是叶吉卿想尽办法才将他救了出来，而在后两次营救李士群的过程中，叶吉卿受尽委屈，做了别的妻子不能或者不愿去做的事情，才使得李士群得以获救。所以，李士群对叶吉卿一直深怀愧疚，因此，不管叶吉卿做什么，李士群都毫无怨言地支持和忍让。

而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则出身名门，杨淑慧的父亲是上海总商会主任秘书，因此杨淑慧算得上富家千金。周佛海第一次见到杨淑慧的时候，就惊为天人，为了娶得美人归，他不惜抛弃为了他生下一双儿女的结发妻子郑妹。所以娶了杨淑慧后，周佛海对杨淑慧可谓百依百顺。在周佛海管理汪伪 76 号期间，和李士群的关系一直不错，可有一次，为了统一汪伪政府的警服，周佛海和李士群发生了争执。当时，这二人的“后宫娘娘”杨淑慧和叶吉卿，为了争夺汪伪政府的警服承包权而争斗了起来，两个女人为了各自的利益争得不可开交，谁也不肯让步，正因此事，她们结下冤仇。事后，这两名“后宫娘娘”开始在各自的丈夫面前挑拨离间，最终导致周佛海与李士群的关系逐渐冷淡，最后反目成仇。

这里，交代一下周佛海最后的结局。

1945年9月9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向中华民国政府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呈交投降书。日本正式投降，抗日战争彻底结束。

战争结束后，民众要求严惩汉奸的呼声日益高涨。

1946年4月1日，国民党政府司法部正式任命赵琛为高等法院院长，陈光虞为代理首席检察官，高等法院即在南京朝天宫正式成立。据有关资料记载，从1946年4月到1947年2月，国民党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530余件，结案381件。其中14人被判处死刑，24人被判处无期徒刑，265人被判处有期徒刑。而公审周佛海，则是当时高等法院所审判的最大的汉奸。

1946年10月21日，国民政府在南京红纸廊朝天宫公开审理伪国民政府第二号人物周佛海，当时，南京公民一万多人赶去参加旁听。

当庭，检察长宣读了对周佛海的起诉书，起诉书列举了周佛海“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为日寇提供大量的资金和粮食，杀害沦陷区无辜民众等等罪行，提出应予严惩。

10月21日一审结束后，11月7日，高等法院再次公审周佛海，并当庭判处周佛海死刑。

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后，他的妻子杨淑慧经过多方周旋，1947年3月26日，蒋介石下达特赦令，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在国民党逮捕和判刑的所有汉奸中，周佛海是唯一得到特赦的汉奸要犯，然而周佛海入狱后不到一年，就于1948年2月，病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终年51岁。

奠定李士群地位的汪曼云

说到汪伪76号，有一个人不能不提，这个人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汪曼云。

前面说过，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军队节节败退，国内形势严峻，在这样的境况下，一些国民党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势和财富，在既不舍弃国民党内部职位的前提下，暗中投靠了日本政府，汪曼云就是其中之一。

汪曼云是浙江杭州人，1926年加入国民党，曾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干事、委员。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就上了李士群的贼船，开始私下为李士群提供情报，成为一名潜伏在国民政府内部的汪伪76号的间谍。可以说，李士群和汪曼云的联手，就像一个锅一个是盖一样，绝配。汪曼云不仅救过李士群的命，帮助李士群搭上了杜月笙的大船，还帮助李士群策反了不少国民党军官。

汪曼云虽然没有过多地参与汪伪76号的事务，但是他对汪伪76号的“贡献”却是毋庸置疑的，他挽救了李士群的性命，并加速了汪伪76号特工组织的成立。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汪曼云被以汉奸罪处以有期徒刑15年。

1949年2月，汪曼云提前出狱。

1954年，汪曼云被再次逮捕，罪名是反革命，被判以无期徒刑。

在狱中，汪曼云开始反思自己过去的罪行，并联合曾经一起为汪伪76号汉奸的马啸天，在狱中写下了《我所知道的汪伪特工内幕》一书。

第六节 汪伪76号的内部结构

随着汪伪76号的人手越来越充足，李士群和丁默邨身为对日本政府的“铁杆”走狗，也越来越重视汪伪76号的内部结构，他们不仅从人员结构上进行了严密的分派和布置，而且对汪伪76号的房屋分配和周边建筑的使用，进行了严密的分派和布置。

极司菲尔路76号内部结构

为了工作需要，也为了安全需要，李士群和丁默邨，对汪伪76号的内部人员进行了严格的等级划分，并将这些人的活动范围限制在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的各个区域内，从而使得汪伪76号的所在地——极司菲尔路76号内部结构严密而有序。

首先，汪伪76号人员复杂，为了便于管理，增强机动性和灵活性，

李士群将汪伪 76 号分设了几个部门，每个部门都安排专人负责管理。

汪伪 76 号设置有机要处、总务处、情报处、电务处、无线电侦察总台、督察室、审讯室、化验室、专员室、主任办公室、招待所和特工总部看守所。在上海愚园路的汪伪 76 号的分部，还设有复兴兵工厂、南市看守所。

位于极司菲尔路 76 号正中的洋房，是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的主建筑。

进入洋房大门，中间是穿堂和扶梯。

扶梯东面是会客室，会客室的北面是交际室。

交际室后面还有一间储物室，储物室的外面是电话接线间，电话接线间 24 小时有人值班，采取三班倒工作制度，每人轮值八小时。

会客室对面是餐厅，餐厅并非单纯用餐之地，里面内有乾坤。

餐厅的最里面有一道隐藏的小门，这道门的后面，是汪伪 76 号特工们被“洗脑”的地方，汪伪 76 号的特工们经常在门口的大房间里接受培训和教育，特工们称其为会议室。

沿着洋房中间的楼梯走上二楼，位于一楼会客室上方的房间，就是丁默邨的卧室兼办公室。

丁默邨的卧室里各种家具应有尽有，各种设施齐全，然而胆小谨慎、贪生怕死的丁默邨却从来不在卧室的大床上睡觉，而是每天晚上跑到浴室里去睡觉。

丁默邨在自己的浴室里放了一张棕床，棕床是用棕榈树上的棕片丝打成线绑在木框上编成的床。白天丁默邨出门时，都会将棕床藏好，晚上睡觉前再将棕棚拿出来，放到浴缸里。即使如此小心翼翼，丁默邨还是不安心，他还将浴室的四壁都装上了防弹钢板，每天睡觉时，都将浴室的门锁得死死的。

因此每天晚上，大家都会看到丁默邨走进卧室休息，然而几乎没有人知道丁默邨从来不睡在卧室的大床上。

丁默邨之所以这么做，因为他自知，自己叛国投日，必然为世人所不容，不但会被军统局、中统局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列入锄奸黑名单，许多爱国人士也都想将他除之而后快，所以，他为了保命，

只好取此下策。然而尽管如此，丁默邨每晚还是提心吊胆，这种心理上的不安，始终跟着他。

位于丁默邨的办公室兼卧室的前面的房间，就是李士群的办公室。

丁默邨在李士群的办公室里也摆了一张桌子，但是丁默邨从来没有去李士群的办公室办过公。

在李士群的办公室的对面，就是李士群的卧室。

李士群的卧室门前是一条走廊，这条走廊直通洋房西头的石库门。

走廊中间还岔出一条甬道，这条甬道通向吴世宝的宿舍，以便于李士群和吴世宝及时来往。

甬道两旁有两间房子，是汪伪 76 号关押军统局、中统局、中国共产党和爱国人士中的女革命者的地方。

洋楼的三层只有两间屋子，这两间屋子是汪伪 76 号关押人员的所谓“优待室”。与其说它是优待室，不如说它是一间刑具齐全的拷问室。这两间屋子的刑具种类、数量是汪伪 76 号所有拷问室里最齐全、最多的。各种各样的刑具挂在墙上，搭在凳子上，而且“优待室”里没有窗户，因此，屋子里血腥味散发不出去，所以进入“优待室”后，仅仅是浓郁的血腥味和满眼的刑具就令人胆战心惊。而且，为了防止关押在“优待室”里的犯人逃跑，李士群专门在三楼的楼梯口处安装了一个铁栅栏，栅栏门外有带枪侍卫 24 小时值班。

李士群的卧室门前的走廊所直通的洋房西头的石库门四周是走马楼。走马楼是南方特有的一种建筑，四周都有十分宽敞的走廊可以通行，即使在里面骑马也不会感觉拥挤，故名走马楼。

走马楼的中间是一片露天空地，李士群在这片空地上建起了一座连接走马楼与洋房一楼客厅的大厅，并在大厅内部搭建了一个讲台，这就是汪伪 76 号的礼堂。

洋房的前面，是一片花园，李士群将花园四周也做了改造。

花园西面建了两排看守所，用来关押革命党人和汪伪 76 号秘密绑架的爱国富商等爱国人士。

看守所的西边还建了两间房子作为无线电接收室，情报人员每天在那里监听电台，力图截获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秘密情报，并向汪

伪政府和日本特务机构收发汪伪 76 号的情报。

看守所前面是三间洋房，专供日本宪兵居住、生活和娱乐。

安排好内部房屋，丁默邨和李士群还要求汪伪 76 号的特务不管在汪伪 76 号内，还是外出，都要注重衣着打扮，要时刻保持干净的外表。

过去汪伪 76 号的特工总是黑衣衫裤、敞胸露怀，嘴里叼着香烟或者牙签，帽子歪歪斜斜地戴着，一副地痞流氓的打扮，汪伪 76 号正式办公后，丁默邨和李士群就要求他们换上整齐的衣裤，随时注意自身形象，以免出门就被人认作不轨之人，被军统局、中统局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认出是汪伪 76 号的特务。

下面笔者手绘了一幅汪伪 76 号的平面示意图，以便大家更容易了解极司菲尔路 76 号内部结构。



A 铁门

B 钢筋水泥碉堡

C 瞭望塔楼

D 钢筋水泥高围墙

E 正房（一楼房间设计 a 大门 b 楼梯 c 盥洗室 d 会议室 e 办公室）

- f 食堂 g 厨房 h 地下太平门)
- F 无线电铁塔 (高 20 米) G 平洋房 (1 会客室 2 卧室)
- H 拘留所 (1 看守值班室 2 牢房) I 无线电室
- J 密码破译室 K 情报室
- L 武器修理室 M 印刷所
- N 兵营 O 卫生所
- P 武器库 Q 鉴别室
- R 车库 S 宿舍

(汪伪 76 号示意图按照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5 年出版的晴气庆胤的《沪西“七十六号”特工内幕》中的有关图示绘制。)

汪伪 76 号主要人员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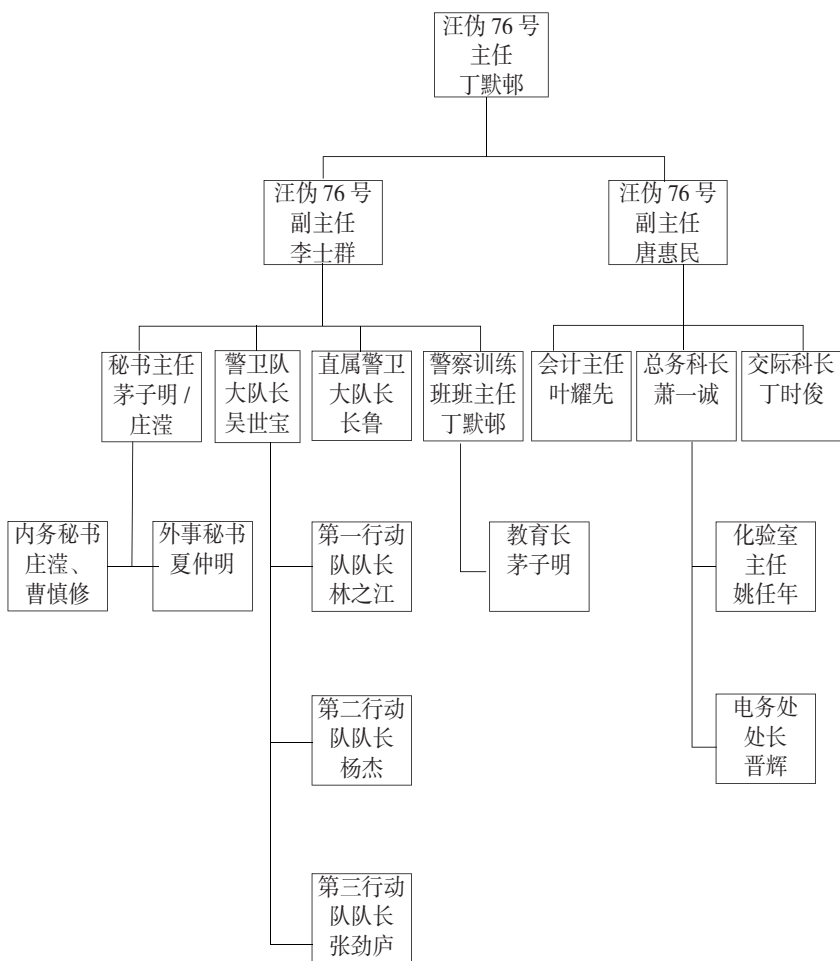
在处理好汪伪 76 号的房屋分配后，丁默邨和李士群又对汪伪 76 号的人员进行了认真的分配，这里，笔者用图表的形式为读者解读汪伪 76 号的主要人员结构，以便读者对其内部主要人员各自的权力有更明确的了解。

在汪伪 76 号成立后，其内部的权力争夺非常严重。不说别人，就说李士群和丁默邨这两个“生死之交”，他们在合作不久后，已经貌合神离。李士群和丁默邨二人为了得到汪伪 76 号最高控制权，私下里做了许多小动作。

从汪伪 76 号自 1939 年 9 月成立至 1940 年 3 月，短短 7 个月，人事频繁变动。汪伪 76 号的人事机构最终在 1940 年 3 月才确定下来，当时，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才正式宣布了汪伪 76 号的人员组成。

后来，李士群利用丁默邨犯下的两个错误，一是如同电影《色戒》所演，丁默邨被中统间谍郑如萍诱惑；二是张小通之死，最终将丁默邨排挤出了汪伪 76 号。

至于中统间谍郑如萍诱惑丁默邨，笔者在后文的章节中会详细叙述，这里就此打住。



如何进入汪伪 76 号

汪伪 76 号改建完毕后，李士群为了汪伪 76 号的安全，特意在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设置了几道“关卡”，只有经过层层筛选，外面的人才能被放行进入汪伪 76 号。

极司菲尔路 76 号的第一道“关卡”就是它的大门，能进入这道大门的人，必须持有汪伪 76 号下发的淡蓝色通行证。这个淡蓝色的通行证，大小约为 $100 \times 77\text{mm}$ 大小，通行证的一面印着“始昌中学”四个大字，“始昌中学”四个字下面是持证人的名字、编号；另一面是持证人的照片，照片上盖有汪伪 76 号特制的印章，照片下则是发

证日期，这种通行证外人很难仿造，因此持有这种证件的人基本都是汪伪 76 号的特务。

进入极司菲尔路 76 号大门后，若想再向内迈进，就必须持有淡红色的通行证，如果拿不出淡红色通行证，想要硬闯第二道门的，恐怕就有性命之忧。因为在第二道门的左右两边各有一个枪眼，上面架设着机枪，这两挺机枪可不是吃素的，会射杀擅自闯入者。如果没有淡红色的通行证，就只能在二门边上的招待室等候，由招待室的人通知洋楼里的人，让里面的人出来将人领进去。

进入二门已经很不容易了，更难的是进入洋楼。

想进入特工总部的洋楼，还得有个特别的“证件”，这个证件不是卡片，也不是铁牌，而是别在西装翻领背面的一个小小的标牌，能够拥有这个标牌的人，大多是汪伪 76 号的领导层。

在后来李士群卸磨杀驴，将丁默邨踢出汪伪 76 号后，为了防止丁默邨一系人员进入洋楼，他将进入大门、二门和洋楼的“特别通行证”全部更换。这是后话。

通过上面的描述，可见汪伪 76 号作为亲日特务机关，是何等的防守严密、等级森严。

第二章 被汪伪 76 号暗算的军统、中统特工

1939 年 9 月，就在军统特工和中统特工如火如荼地进行铲除汉奸工作的同时，以李士群和丁默邨为首的汪伪 76 号特务组织筹备完毕。汪伪 76 号刚刚筹建完毕，李士群和丁默邨就组织汪伪 76 号的特工，悄然发起了一场针对军统特工和中统特工的“大搜捕”行动。在此次行动中，军统和中统的许多优秀特工纷纷落马，尤以军统特工损失惨重。汪伪 76 号的“大搜捕”行动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汪伪 76 号特务所到之处，一片风声鹤唳、血雨腥风。

第一节 第一名被汪伪 76 号抓捕的军统特工詹森

在军统暗杀了“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篆后半年，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展开了针对军统局的大反击。在这次反击行动中，詹森是汪伪 76 号成功捕获的第一名军统高级特工，汪伪 76 号将其公开枪决，以示众人，以此表示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和军统对决的信心和已经具备的和军统对决的能力。

军统特工詹森暗杀汪伪 76 号的支持者季云卿

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成立之初，就像是一只张牙舞爪的小猫，虽然表现得十分凶狠，却并没有多大的战斗力，因为威胁性并不大，因此，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成立初期，迫切需要得到一个有财、有人、有武器、

有地位的人支持。

在第一章中，李士群第一次被捕时，他的妻子找到了青帮头子季云卿，才救出了李士群，后来李士群投靠了季云卿。于是，在汪伪 76 号成立初期，李士群急需帮助之时，他要求助的第一个人，就是青帮头子季云卿。

于是，李士群和季云卿频繁交涉，最后季云卿派了几名颇具实力的打手加入李士群的汪伪 76 号。在汪伪 76 号成立之初，季云卿派的这几个打手屡立奇功，比如前文所提到的汪伪 76 号第一杀手吴世宝，这就使得汪伪 76 号逐渐从一个不具威胁性的小猫，成长为一头凶恶的老虎。也正因如此，汪伪 76 号自上而下也都十分尊重十分忌惮季云卿，李士群和丁默邨都将季云卿奉为汪伪 76 号的座上宾。

然而汪伪 76 号成立不久，就传来了季云卿被人暗杀的消息。听闻这个消息，李士群和丁默邨顿时呆住了，心中对暗杀季云卿之人和这个暗杀组织又惊又恐，连季云卿这样的青帮大佬都被暗杀了，说不定哪天，厄运就会降临到他李士群和丁默邨的身上。然而，从某种角度讲，暗杀季云卿，就是对汪伪 76 号的赤裸裸的挑衅，在惊恐之后，李士群和丁默邨二人恼羞成怒，决定不计任何代价，将暗杀季云卿的凶手抓捕。

在前面，笔者介绍过季云卿，那么，季云卿明明是青帮大佬，地位、权力和钱财样样都不缺，而且也算是江湖中人，按理说应该是比较重仁义讲义气的，他怎么会和李士群这些汉奸扯上关系，走上出卖国家的不归路呢？

季云卿是个上海闻人，闻人的意思就是知名人物，这算是当时对于黑社会人物的一种雅称，其实用俗话说，季云卿就是个白相人，也就是现在所指的无业游民一类的没有职业的闲人。季云卿虽然在上海黑道有很大的名气，然而他却一直心有不甘，他在青帮的地位虽然很高，入帮的时间也很早，可他却怎么也拼不过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三人，可以说，杜月笙、黄金荣和张啸林三人，把揽了民国时期上海滩的整个黑道。季云卿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风头被这三个后生晚辈抢走，心有不甘却无可奈何。直到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他才算看

到了自己“重新崛起”的希望，才找到了能与杜月笙三人并立成为上海滩黑道巨头的途径。

这个途径，就是叛国！

李士群是季云卿的门徒，他在成立汪伪 76 号时来向季云卿寻求帮助。

季云卿正为快速上位苦思冥想，李士群的到来无异于“瞌睡了有人送枕头”，在听李士群说完来意后，季云卿十分爽快地将吴世宝、张鲁等人分派给李士群，并嘱咐这几人侍奉李士群要和侍奉自己一样，决不能违背李士群的命令。就这样，季云卿成了汪伪 76 号的座上宾，他也就逐渐凭借汪伪 76 号，和日本人搭上了线，取得了称雄上海滩的有力支持。

季云卿成为汪伪 76 号的支持者，对此，他并没有保密，相反，他将此事当成了迅速上位的资本，大肆宣扬，虽然每隔数日，就有汉奸、走狗、卖国贼被军统、中统、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或爱国人士暗杀的消息传来，但季云卿依旧每日大摇大摆地行走上海街头，并没有因为这些组织的锄奸行动而感到惶恐不安。这也难怪，许多欲将季云卿除之而后快的军统、中统特工，都拿他没办法，因为季云卿每次出来，身边都围着密不透风的帮众、保镖，特工难以找到刺杀季云卿的机会。

“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季云卿做了汉奸还如此嚣张，这让军统局局长戴笠下定决心，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要将其铲除！于是，军统局派出了一名经验丰富的优秀特工——詹森，执行暗杀季云卿的任务。

詹森是军统局众多特工中非常出色的一名，他在执行暗杀任务时，通常只需一把枪，就能将目标成功击毙，他接手过的任务，从未有过失手，而且在行动时也从来不曾引起过旁人的注意，暴露过自己。因此，詹森的大名，让汉奸、走狗和卖国贼们心惊肉跳，恨不得出钱雇杀手将他除掉，然而，詹森自己就是一名出色的杀手，要想除掉他，恐怕比登天还难。

当詹森接到暗杀季云卿的任务后，也非常头疼，也找军统局的同事、好友等商量了好久如何暗杀季云卿，甚至连他的好友都沮丧地认

为，詹森的不败神话有可能因此终止，因为季云卿的确防守严密，太难下手。然而，詹森却没有垂头丧气，他胸有成竹地向同事和好友们保证，他完全可以顺利完成任务。从此，詹森耐心地观察、跟踪季云卿，没多久，他就逮到了一个暗杀季云卿的机会。

这天，季云卿和往常一样，带着一帮保镖和帮众到澡堂去洗澡。当季云卿洗完澡，在保镖和帮众的簇拥下走出澡堂的时候，在澡堂门口埋伏已久的詹森，突然冲过来，推开站在季云卿前面的保镖和帮众，轻扣扳机，还没等周围的人反应过来，就听一声枪响，帮众和保镖们就看见老头子季云卿倒在了地上。

詹森速度之快让人惊诧，保镖和帮众们都没有看到凶手是如何拔枪，如何开枪的。当呆滞的众人回过神来，扶起老头子季云卿的时候，季云卿的胸口流出了一大片殷红的鲜血，这些帮众和保镖立刻叫嚣着要抓住刚才那个开枪的凶手，让他好看，却发现刚才那个年轻人早就没影了。这么多人，居然没能拦住凶手，而季云卿竟然也就这样在这么多人的保护下，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枪杀了，这个事实，让季云卿的保镖和帮众们感到颜面无光，更让他们恼羞成怒。然而当下要紧的，是赶紧送季云卿去医院，可惜不管大家如何紧张忙碌，找到的医生如何鼎鼎大名，凶手当胸一枪，还是让季云卿就此命丧黄泉。

季云卿被暗杀身亡后，他的帮众和保镖、门徒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寻找凶手，可发现线索不够，人手也不足，于是季云卿的门徒立刻打电话给李士群，告知他老头子季云卿在澡堂门前被人杀害一事，然后求助李士群，动用汪伪 76 号的力量来抓捕凶手。

李士群得知季云卿被杀后，惊怒交加，他是季云卿的门徒，正是因为季云卿的支持，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才顺利发展起来，然而这样一个对自己有恩的人，居然在那么多的保护下被杀害了，这件事，不仅仅让李士群心惊胆战，也势必会让那些对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采取观望态度的人因此而退缩，再不敢加入汪伪 76 号，这必然会导致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发展缓慢，而且，季云卿的死，也会对现有的特工人员的积极性造成严重的影响。于是，李士群决定动用所有可能动用的力量，抓住刺杀老头子季云卿的凶手。

在李士群派出特务抓捕刺杀季云卿的凶手之前，季云卿的老婆金宝师娘竟然还跑到李士群前面去狠狠地撒了一场泼。金宝师娘要求李士群一定要抓住凶手，严惩凶手，而且不能让凶手轻易地死掉，要让他受尽一切酷刑，然后，在众多的民众面前处死他！面对金宝师娘的哭闹，李士群迫不得已表了态，他怒气冲天地对派出的抓捕暗杀季云卿的凶手的汪伪特工们说，抓住凶手后，一定要将凶手抽筋扒皮，让他不得好死。李士群的表态，终于安抚了金宝师娘，金宝师娘哭哭啼啼地走了。金宝师娘走后，李士群咬牙切齿地和丁默邨商量，一定要抓住凶手，用凶手的死来安抚那些青帮的帮众、汪伪 76 号的特务和社会上的亲日分子，让他们看看，汪伪 76 号不是吃素的，只要投靠了汪伪 76 号就不用担惊害怕，同时也给那些想要暗杀亲日分子的军统、中统、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和爱国人士一个警告，让他们知道汪伪 76 号的厉害！

李士群几乎调派了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的全体特务，在上海全面搜查杀害季云卿的凶手。李士群还将季云卿被暗杀一事报告给了日本宪兵队，请日本宪兵队协助找到杀害老头子季云卿的凶手。

然而，尽管汪伪 76 号和日本宪兵队倾巢而出，几乎昼夜不息地在上海的大街小巷搜查，却还是找不到一点有关于杀死季云卿的凶手的蛛丝马迹，难道，凶手早已安然无恙地离开了上海？

一个女人要了詹森的命

正当汪伪 76 号和日本宪兵队焦急地寻找杀害季云卿的凶手时，凶手詹森却过得优哉游哉，完全没有被追捕者该有的紧张和不安。

或许是因为艺高人胆大，詹森在成功刺杀季云卿后，并没有选择立刻离开上海，他无比自信，认为汪伪 76 号和日本宪兵队那帮“蠢货”，想找到他詹森的藏身之所，简直就是天方夜谭。詹森不是傻乎乎的蛾子，他知道火车站、码头、长途汽车站这些地方肯定会被汪伪特工和日本宪兵控制起来，所以他决不能自投罗网，为了逃离上海而到那些地方去抛头露面。俗话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所以，詹森没有离开上海，他住进了他的相好卢文英的家。说起来，詹森的

这一决策是非常正确的，卢文英的家本来也是个十分安全的藏身之所，可詹森没有想到，卢文英会在无意之中透漏了他的行踪，最终，詹森的性命因他的女人而终结。

卢文英是当时上海滩十分著名的交际花和女流氓之一，原本是位于南京路的一家舞厅的舞女。卢文英柳腰丰胸、秀腿圆臀，说一口嗲得让人骨头都要酥软的吴侬软语。很多男人见到卢文英眼中含泪，楚楚可怜的样子都会感觉心疼，所以卢文英有不少追求者，甚至有追求者甘愿为她做任何事情，只求换得美人一笑。詹森也是男人，自从见了卢文英后，一直对她念念不忘。后来，在詹森猛烈的爱情攻势下，在詹森温柔而幽默的追求下，在詹森挥金如土、豪放大度的做派下，卢文英倾心于詹森，两人很快就开始了热恋。

倾倒在卢文英石榴裙下的詹森，对卢文英倍加呵护，而卢文英对詹森也十分温柔体贴，一心一意想要跟随他，这二人情投意合，相互信任，所以，詹森在暗杀季云卿后，就到卢文英的家中躲了起来。

詹森百分之百地信任卢文英，住在卢文英家中，一边与卢文英耳鬓厮磨，一边向卢文英炫耀自己暗杀季云卿的过程。

在詹森看来，汪伪 76 号的这帮跳梁小丑，怎么也不可能抓到自己。于是，每当马路上响起警笛声，詹森就会搂着卢文英走到窗口，冷冷地看着窗外汪伪 76 号特工和日本宪兵队在街头忙碌的身影，不屑地骂他们是蠢货。詹森认定李士群不可能知道自己的藏身之处。

然而好景不长，就在詹森像个胜利者一样，高高在上地看着汪伪 76 号的特务和日本宪兵队队员徒劳无功地在街上搜捕的同时，汪伪 76 号的特工竟然查明，刺杀老头子季云卿的凶手詹森，就在卢文英的家中。

于是，1939 年 12 月的一天，一队装备齐全的汪伪 76 号特务，粗暴地冲进了卢文英的家中，将詹森抓个正着，这些特务对折腾了他们颇多时日的詹森恨之入骨，自然不会客气，非常粗暴地将詹森捆了起来，带到了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的审讯房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詹森藏得好好的，怎么会突然被汪伪 76 号的人发现了呢？

詹森以为，汪伪 76 号的特务是在自己上街时，偶然间发现了自己，跟踪自己来到卢文英的家中，逮捕了自己。詹森根本没有想到，把他的行踪泄露出去，让他陷入汪伪 76 号毒手的人，正是他最信任的女人卢文英。

詹森在成功刺杀季云卿后，来到卢文英的家中，对自己心爱的女人大肆吹嘘了一番，不仅将暗杀季云卿的经过对卢文英说了，还把当时刺杀季云卿所用的武器——一把“掌心雷”手枪送给了卢文英，让她用以防身。卢文英看到詹森对自己信任有加，感动之余对詹森更加倾心，也更加百依百顺。

在当时，“掌心雷”还是一种比较罕见的手枪，它比一般的手枪枪身要小很多，这种手枪用一只手就能把玩，可以藏于手掌之中。这种手枪个头虽然小，但性能却丝毫不比一般的手枪差，并且射击时发出的声音也比一般手枪要小很多。

卢文英在家中陪着詹森温存了好几天，不过她毕竟要维持自己的交际生活，因此，她离开家去拜见她的干爹张德钦，以图通过干爹的关系，拓宽自己的交际圈。张德钦曾经留学英国，回国后，张德钦做了一名律师，不过这只是他表面上的工作而已，实际上，张德钦是青帮“大”字辈的流氓之一，而且他早已和汪伪 76 号的丁默邨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当然，这一切，张德钦从没有对外人说过，包括自己的干女儿卢文英，因此，卢文英也不知道她的干爹和她的恋人詹森的政治立场是针锋相对的，她只知道她的干爹是一名能力超群的律师。

卢文英到了张德钦家，为了讨好张德钦，将詹森送给自己的“掌心雷”拿了出来，转送给干爹张德钦。张德钦接触的枪械很多，然而，当他看到卢文英手中的“掌心雷”时，还是大吃了一惊，“掌心雷”在当时颇为少见，看到这把“掌心雷”，张德钦立刻就想到了季云卿的死。季云卿死后，李士群派人为季云卿做过尸检，法医从季云卿的身体里取出了一枚比一般的子弹弹头要小很多的弹头，因此李士群推断，凶手使用的手枪一定非常小，过于小的手枪不容易获得，也不容易操作，只有经过专业训练的特工才能拥有并且运用自如。张德钦从丁默邨那里听说过季云卿的尸检结果，所以，当他看到自己的干女儿

卢文英手中，居然有一把“掌心雷”手枪，心中一惊。张德钦还发现，这把手枪的弹夹里少了一颗子弹，这个发现让张德钦感到莫名的兴奋，如果这把手枪是卢文英为了送给自己而专门购置的，那么这把手枪里要么没有子弹，要么弹夹就是满的，这才是正常的，然而这把手枪里少了一颗子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于是，张德钦留了个心眼，装出爱不释手的样子，不动声色地摆弄着这把“掌心雷”，佯装不经意地询问卢文英这支手枪的来历。

卢文英毕竟是女人，不懂政治还喜欢炫耀，卢文英根本没想到，自己即将把自己心爱的人推向死亡，她还颇为得意地将詹森暗杀季云卿的经过绘声绘色地向张德钦大肆吹嘘了一番。

卢文英透露的这番内幕，对于张德钦来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为了不引起卢文英的怀疑，他若无其事、和颜悦色地和卢文英拉了几句家常，而卢文英一走，他就迫不及待地拨通了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的电话，把他得到的有关杀害季云卿的凶手詹森的消息告诉了丁默邨。

丁默邨得到这个宝贵的消息后，立刻将此消息告诉了李士群。为了证明自己的消息来源，张德钦还特意将卢文英送给自己的那把“掌心雷”交给了李士群。李士群拿到那把掌心雷后，将子弹取出，与刺杀季云卿的子弹弹头仔细进行了对比，经过多番检验后最终确定，这两枚子弹的型号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刺杀季云卿的子弹就是从这样的“掌心雷”里发射出去的。再加上张德钦转述的卢文英关于詹森刺杀季云卿的经过，李士群确定，就是詹森刺杀的季云卿。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李士群秘密地派出了一队全副武装的特务，悄悄潜伏在卢文英家附近，在确定卢文英的家里的确有一个魁梧的男人后，这队特务迅速出击，将毫无防范的詹森逮捕回了汪伪 76 号。

可以说，詹森被捕，完全是由他的女人卢文英一手造成的。如果詹森能够保持一个特工应有的警惕，不将暗杀季云卿的事情作为自己的资本，在女人面前吹嘘，也不将作案工具送给卢文英作为礼物，那么詹森十之八九可以逃过汪伪 76 号的抓捕，还可以在抗日战场上继续刺杀更多的汉奸、卖国贼，而不是早早地被关进汪伪 76 号特工组

织的监牢里，成为阶下囚。

笔者研究了许多史料，关于詹森被捕，还有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更合情合理。

这种说法，和女人无关。话说詹森成功暗杀季云卿后，本是有机会离开上海的，不过戴笠在他成功刺杀季云卿之后，又交给了他另一个更重要的任务，詹森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没能全身而退，落入了汪伪 76 号的虎口。

戴笠交给詹森的另一个任务十分危险，也十分困难，正因为难以完成，所以戴笠想来想去，决定派胆大心细、技术精湛的詹森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个十分危险的任务就是：在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安装炸弹，将它炸毁！

据有关资料记载，詹森在成功刺杀季云卿之后，就利用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的特工几乎全体出动，外出搜查刺杀季云卿的凶手之际，潜入了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然而，就在詹森安装炸弹时，被汪伪 76 号的特工发现，詹森功亏一篑，最终自身难保，被抓进汪伪 76 号的审讯室，饱受酷刑的折磨。

詹森在汪伪 76 号的审讯室里，遍尝辣椒水、老虎凳、皮鞭等酷刑的滋味，几番审讯下来，詹森已体无完肤，浑身上下都被鲜血染红，气息已十分微弱。尽管如此，面对特务们的逼问，詹森依然咬紧牙关，坚持声称自己刺杀季云卿是因为个人恩怨，不仅没有向汪伪 76 号投降，而且没有将军统驻上海特工总部派自己刺杀季云卿的实情招出来。

李士群对詹森用尽酷刑，詹森始终也没有泄露出任何对军统不利的消息。最后，无可奈何的李士群，眼看无法从詹森嘴里撬出一句实话，为了安抚季云卿的妻子金宝师娘和季云卿的门徒，为了安抚那些想要投靠或者已经投靠汪伪 76 号的汉奸，李士群决定将詹森公开枪决，也期望通过此举，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给派出詹森刺杀季云卿的军统局以威慑。

1939 年秋末，汪伪 76 号的几名特务将奄奄一息的詹森押到了麦根路中山北路的一个小树林里，在许多群众的围观下，大名鼎鼎的军统特工詹森被汪伪 76 号公开枪决了。

据史料记载，即使是面对死亡，詹森依然大义凛然，他坚持一个信念：铲除汉奸、走狗和卖国贼，是每一位炎黄子孙的责任！临刑前，詹森怒吼，说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痢，二十年后还是一条好汉，到时候，他一定会将所有的汉奸、走狗、卖国贼杀个精光！

军统局与汪伪 76 号正式开战

詹森的死，是军统局的一大损失，也是中国抗日战争的一大损失，抗日战场上因此而减少了一份中坚力量，爱国之士因此又少了一人。但是詹森的死，也并非全无意义，成功刺杀季云卿，让汪伪 76 号就此失去了一个强大的支持者，没有了季云卿的支持，汪伪 76 号就像是折了一条腿，失去了很多“眼线”和特权。

李士群失去季云卿这座靠山后，曾一度倍感焦虑，一直到抓到凶手詹森，李士群才松了一口气，然而处决詹森后，紧随而来的，却是无比的恼怒。李士群的手下通过多方情报，确认詹森是军统局的特工，这让李士群倍感恼怒，他觉得这是戴笠明目张胆地挑衅，军统局根本就没有把汪伪 76 号放在眼里，军统局要锄奸，那么，这次被杀的是季云卿，下次的目标，是不是就轮到自己了？如果是这样，那么他李士群是不是也该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了？

李士群就此决定，以公开枪决詹森，作为和军统局开战的第一枪，全面展开与军统局的对决。他李士群要让戴笠知道，汪伪 76 号再也不是以前那个小打小闹的小组织了，如今的汪伪 76 号，有日本军方做后台，有汪伪政府支持，完全具备了和军统局抗衡的实力。

那么，在李士群策划反击军统之时，戴笠在做什么呢？

在詹森成功刺杀季云卿后，戴笠又开始积极筹措针对汪伪 76 号的新行动，然而，詹森的被捕和被杀，却让他的行动计划受阻，也使军统特工们备受打击，戴笠因此极为恼怒。然而，戴笠知道，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戒备森严，想要悄无声息地潜入，炸毁汪伪 76 号，难度系数相当高，否则，詹森也不至于束手被擒。所以国宝级特工詹森的死，不仅让戴笠心疼不已，也让戴笠更加理智，他提高了对汪伪 76 号的重视程度，决定以地下斗争为主，正面冲突为辅，与汪伪 76 号打一

场持久战。

军统局和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之间的暗战，以军统特务詹森的死为导火索，全面展开了。在这场暗战中，双方各有侧重。汪伪 76 号依仗日本军方和汪伪政府的支持，大张旗鼓地开始搜捕军统局的特务，在武力上处于强势地位。而军统局则开始向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内部渗透，安排军统局的特务卧底汪伪 76 号，试图从汪伪 76 号的内部着手，抓住其命脉，破坏其根基。

军统局和汪伪 76 号这两大特务组织的明争暗斗，使得上海滩就此变成了“海上旋涡”。据不完全统计，仅 1939 年下半年，在上海租界发生的各类枪杀案件中，因军统局和汪伪 76 号的暗战造成的死伤人数，就多达 40 多人。

在李士群公开枪决詹森，并决意要与戴笠决一雌雄后，他命令汪伪 76 号的特务加强力度，四处搜捕军统局的特务。于是，汪伪 76 号的特务开始像疯狗一样四处咬人了。

第二节 军统上演现实版无间道

军统和汪伪 76 号之间的斗争越来越激烈，双方不止在正面战场上互相抓捕对方特工，还私下里向对方阵营中安插间谍，窃取对方机密。在这样混乱的暗战中，两大特务组织自然会因为“鼯鼠”的频频出现而损失连连。军统局曾经在汪伪 76 号内部安插过数名间谍，汪伪 76 号因为没能及时发现，损失重大。然而，那些当“鼯鼠”的谍中谍们，在敌方阵营里的日子也并不好过，他们必须小心谨慎，严密提防周围的人，不能信任任何人，因为他们一旦被发现，下场就只有死亡一途，而且敌人还会让他们饱受折磨，从他们口中挖掘有价值的信息，直到再也问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后，才会结束惨无人道的酷刑，结束他们的生命。当然，如果是具有重大价值的“鼯鼠”，两个特工组织都会非常重视，想方设法地将他策反到自己的阵营中来。

暗战谍中谍

1939年底，原军统特工吴道坤叛变，投靠了汪伪76号。叛变后，吴道坤向李士群提供了一个可靠的线索，那就是，现任上海宪兵队队长的李恃平，其真实身份是军统特工，他在法租界有一处房子，这处房子里有个电台，是专门用来向重庆方面发送情报的，在这栋房子里，还住着一名军统的情报员，名叫陈家栋。

李士群得到这个消息后，颇感兴奋，在间谍战中，电台是深受各方重视的焦点，能够破坏对方的电台，不亚于在正面战场上取得一场全面的胜利！

李士群决定迅速出击，将这个秘密电台全面摧毁，这样，不仅可以给军统局上海站以严重的打击，而且自己还可以凭此功绩，向自己的日本主子邀功请赏。由于此事事关重大，因此李士群并没有擅做决定，他首先联系了原中统特务，后叛变加入汪伪76号的马啸天，由马啸天负责联系电务处长晋辉，然后李士群、马啸天、晋辉三人，一同协商了摧毁军统局秘密电台的行动步骤。

经过一番探讨，三人最后决定，先由电务处长晋辉派人到上海宪兵队队长李恃平在法租界的住所附近租一间房子，暗中收集李恃平与重庆方面往来的电报，并将这些电报进行破译。

晋辉派人在李恃平的住所附近租房监听数日，经过对监听来的多封电报的破译，证实李恃平确实是重庆派来的特务。

证据确凿后，晋辉和马啸天立刻将这个信息报告给李士群，这一次，李士群毫不犹豫地下令，将李恃平逮捕，押送汪伪76号。

随后，马啸天带着吴世宝派给他的三个特工和一个日本宪兵队员，迅速包围了法租界内李恃平的家，将李恃平和陈家栋抓捕，押送到了汪伪76号特工总部，而在这所房子里查获的秘密电台，则由电务处长晋辉派其下属接管。

此后，电务处长晋辉的手下，很快就破译了电台的密码，通过这部电台，他们接收了重庆军统总局发来的所有指令，从而取得了对抗军统行动的先机。

由于掌握了秘密电台，汪伪 76 号顺利获取了重庆军统局下达的所有命令，因此，李士群根据来自秘密电台的情报做了积极的筹划，迅速制订出针对军统局的反击行动。

秘密电台的易手，使得汪伪 76 号拥有了战胜军统局的绝密武器。汪伪 76 号就此开始了针对军统局的血腥大屠杀。可以说，从詹森刺杀季云卿被公开枪决处死后，汪伪 76 号就以其强势的态度和准确有力的行动，表明它已经从软弱无力的婴幼儿成长为拥有强大的反击能力的成年人，完全具备了与国民党军统局对决的能力。

李士群破获了军统的秘密电台，取得了一场毋庸置疑的大胜利。然而戴笠也不是吃干饭的，眼见军统局上海站屡遭破坏，他迅速要求军统局上海站的特务们，从正面对抗转向地下斗争，保存主要力量，伺机东山再起。

再回头说被汪伪 76 号抓捕的李持平和陈家栋，他们在汪伪 76 号的严刑拷打下举手投降，主动投诚。于是，为了收买李持平和陈家栋，也为了让更多的军统局特务意识到投靠汪伪 76 号的“优厚待遇”，李士群任命李持平做了“特工总部专员”，任命陈家栋为汪伪 76 号电务处的电务员，并且，为了收买人心，表示自己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李士群还特意将此二人送回李持平在法租界的原住所工作，并让李持平二人，佯装并未被捕，也未叛变，继续和重庆军统总局保持电台联系。当然，狡猾的李士群并不全然信任此二人，在送李持平二人回原住所时，李士群还派了汪伪 76 号的一名特务和另外一名电务处专员，同他们一起回原住所工作，李士群声称，这样安排是为了保护李持平和陈家栋的生命安全，并协助他们开展工作。实际上，李士群派出汪伪 76 号的一名特务和另外一名电务处专员，就是为了能够监督和监视李持平和陈家栋的工作。

李士群万万没有想到，在李持平和陈家栋被捕之前，早已收到戴笠的密报，密报中，戴笠一再交代二人，一旦被捕，就在不引起汪伪 76 号人员怀疑的情况下假意叛投，成为潜伏在对方阵营的谍中谍，在汪伪 76 号扎根发芽，从内部瓦解汪伪 76 号，协助军统局铲除这个“大毒瘤”。

在李恃平和陈家栋二人成功地在汪伪 76 号潜伏下来后，他们一直在汪伪 76 号的监督下，秘密和重庆军统局总部保持联系，将各种珍贵的情报，通过电台发送到重庆军统局，使军统局了解了许多汪伪 76 号的内幕，也为军统局减少了许多损失。李恃平和陈家栋一直做得非常隐蔽，就连心细如发的李士群都被二人欺骗。李恃平和陈家栋曾一度以为，他们将会持续这样的工作状态，一直到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彻底瓦解，但是，他们的秘密行动，还是被敌人发现了。

1940 年 6 月底，胡均鹤接替晋辉，担任了汪伪 76 号第二处，也就是电务处处长，他发现李恃平和陈家栋的行为和其他的情报员不太一样，二人总是寻找各种机会，单独待在一起。刚刚上任的胡均鹤，对此二人特别关注，亲自监督他们的行动。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胡均鹤惊讶地发现，李恃平和陈家栋二人，表面上看起来兢兢业业，为汪伪 76 号的情报工作起早贪黑，实际上，他们收发的很多内容，都通过隐秘的手法发送给了重庆的军统局总部。也正是因为此二人的这些举动，导致军统局提前知晓了汪伪 76 号的行动计划，从而使得汪伪 76 号由主动变成了被动。也就是说，本来是汪伪 76 号利用此二人套取重庆方面的情报，结果，他们却反过来利用汪伪 76 号的信任，将汪伪 76 号的情报泄露给了重庆军统局总部。胡均鹤立刻将自己的侦察结果上报李士群，李士群得知此事恼羞成怒，当即命令行动处第四处队长万里浪，带人抓捕了李恃平和陈家栋，并将二人拉到中山北路的小树林里，秘密枪决了。

在这场暗战中，汪伪 76 号和军统局谁也没占到便宜，军统局虽然在汪伪 76 号内部安插了两名间谍，却不足让汪伪 76 号伤筋动骨；而且，虽然军统局在对汪伪 76 号的行动中获得了一定的成功，却损失了两名优秀的情报人员和一个秘密电台。可以说，这一次，在汪伪 76 号和军统局的交锋中，汪伪 76 号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军统看起来暂落下风。然而，这还只是两大间谍组织明争暗斗的头道“开胃菜”，以此事为开端，两大特工组织的暗战愈演愈烈。

军统上将戴星炳卧底汪伪政府

潜伏在汪伪 76 号和汪伪政府的军统特务中，职位最高的，当属军统上将戴星炳。然而，1939 年 9 月，汪伪 76 号逮捕了军统上将戴星炳。

戴星炳是军统上将，他潜入汪伪 76 号的重要任务，就是伺机暗杀汪精卫。

当时，为了早日成立伪国民政府，汪精卫重金收买各界人才。而军统局、中统局和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以及各界爱国人士意欲除杀的头号汉奸，就是汪精卫。但是，随着汪伪 76 号日渐壮大，汪伪 76 号对汪精卫的守卫也更加森严，刺杀汪精卫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基于这种情况，军统局局长戴笠决定派出汪精卫熟悉的人，佯装投靠汪伪政府，作为卧底潜伏在汪精卫身边，伺机刺杀汪精卫。

戴笠精心挑选了一些特工，假意投降汪伪 76 号，成功渗透到了汪伪政府和汪伪 76 号中去。在这些卧底中，职位最高的就是上将戴星炳。

戴星炳和汪精卫是老相识了，在汪精卫尚在国民党政府任职时，戴星炳就是汪精卫的手下，因此，戴星炳脱离国民政府，为了更好的前程，投靠老领导汪精卫，也是非常名正言顺的事情，相较于其他人投靠汪伪政府的军统局特务，戴星炳更容易取得汪精卫的信任。

不过事情并不像戴笠想象的那么顺利，戴星炳虽然顺利进入汪伪政府，不过汪精卫只给了他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职位，以至于戴星炳在汪伪政府中，只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像他这样的小人物，在汪伪政府中数不胜数，别说刺杀汪精卫，连见到汪精卫本人的机会都很少很少。而且，自从汪精卫在河内险被暗杀后，出入更加小心谨慎，几乎很少出现在公众面前，所以戴星炳找不到刺杀汪精卫的机会。

为了能早日刺杀汪精卫，戴星炳几经思考，想出了一个对策。

汪精卫叛国投敌后，举国上下一致反对汪精卫，就连曾经支持过他的人也不敢违逆群众的意愿，不再支持汪精卫。而汪精卫组建汪伪政府，急需用人，迫切需要一个人去劝说那些曾经支持过他的人，加

入汪伪政府，了解到汪精卫的这一需求，戴星炳毛遂自荐，找到汪精卫，主动请缨去做这些人的劝说工作。汪精卫见戴星炳毛遂自荐，自然高兴，觉得还是从前的老部下更贴心。于是，汪精卫亲手写了一封信，让戴星炳带着这封信前往第四战区司令部所在地广东韶关，把信交给张发奎，以劝说张发奎投靠汪伪政府。戴星炳到了广东韶关后，立刻将自己的行程和汪精卫的困境通过电报秘密报告给了戴笠，随后，他找到张发奎等曾经支持过汪精卫的国民党将领，将汪精卫的信给他们看过，随后，请他们给汪精卫回了信，当然，张发奎等人也心存犹疑，只是回了“会待机行动，投诚汪政府”之类的话语。

于是，戴星炳带着张发奎等人的回信，马不停蹄地回到了上海，把信交给了汪精卫。汪精卫看到张发奎等人的回信后，大为快慰，认为是戴星炳帮他解决了困扰他的难题，于是认定戴星炳是自己的福将，从而更加信任戴星炳。于是，汪精卫决定将戴星炳留在身边，委以重任。汪精卫的决定，让戴星炳心中大快，成功获取汪精卫的信任，让他对完成刺杀汪精卫的任务充满信心。

然而，就在戴星炳寻找机会刺杀汪精卫之时，他的身份竟然暴露了。

戴星炳身份暴露，刺汪行动失败

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的头目李士群，在汪精卫准备前往南京的前夕，告诉他一个令汪精卫大跌眼镜的消息，那就是，戴星炳的真实身份竟然是军统特工，他投靠汪伪政府，不过是假意投降，其真实目的，是刺杀汪精卫。

这一消息让汪精卫大为火光，他怎么也想不到，军统的杀手居然离自己这么近，而且这个杀手不是别人，正是他视为福星的老部下戴星炳。汪精卫将戴星炳视为亲信，许给他高官厚禄，留在身边委以重任，没想到戴星炳不仅背叛了自己，还想要杀死自己。汪精卫对戴星炳彻底失望了，替而代之的是恼怒和仇恨，汪精卫命令李士群迅速抓捕戴星炳，认真调查此事，将相关人员一网打尽。李士群奉命派出汪伪 76 号的特务，逮捕了戴星炳，并将其关进了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的大牢中。

戴星炳的身份和其所要执行的刺杀汪精卫的计划，就是在军统局内部，也是绝对保密的，除了少数军统特工略有知晓外，没有人知道。所以，按理说，汪伪 76 号不可能查出戴星炳的真实身份，也不可能察觉他的刺杀计划。那么，究竟是谁，透漏了戴星炳的身份和行动计划呢？是不是军统特工叛变，投身汪伪 76 号的阵营，才导致戴星炳的身份和行动计划被泄露出去了呢？

关于戴星炳被捕的原因，笔者查询了许多资料，其中有一种说法颇为流行，说戴星炳之所以被捕，和詹森被捕的第一种原因近似，是因为一个女人。

一位当年曾经参加了此次行动的军统特工，在他的一篇回忆录中这样叙述此事：1939 年，他奉戴笠之命到上海参加由戴星炳主持的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就在他奉命潜伏在汪精卫的住所附近，等待戴星炳的行动指令，准备刺杀汪精卫之时，却听到了戴星炳被捕的消息。戴星炳被汪伪 76 号特工逮捕的消息传来，这名军统特工和其他潜伏人员，唯恐刺杀汪精卫一事就此泄露，于是迅速撤离了潜伏地点。事后，军统局潜伏在汪伪 76 号的内线传出消息，说戴星炳卧底身份暴露，此次行动失败，军统局所有潜伏人员请迅速撤离。而据内线透露，出卖戴星炳的人，居然是戴星炳的姘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在戴星炳成功获取汪精卫的信任，成为军统派驻汪伪 76 号的卧底中，距离汪精卫最近的人后，军统局就下发了一大笔活动经费给戴星炳。由于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十分危险，作为距离汪精卫最近的卧底，戴星炳的危险性最大，所以戴笠派人告知戴星炳，不管此次刺杀汪精卫是否能够成功，如果戴星炳不幸遇难，军统局定会给戴星炳的亲属一笔非常丰厚，足够他们后半生衣食无忧的抚恤金。戴笠派去联络戴星炳的特工和戴星炳的谈话内容非常隐秘，然而，在二人秘密商谈的过程中，戴星炳的姘头正巧来找戴星炳。这个女人敲了半天门，也没见有人来开门，以为戴星炳不在，就掏出钥匙开门进屋。进屋后，这个女人透过门缝，看到戴星炳正在里屋和一个陌生人低声交谈。于是，这个女人偷偷地趴在门边，偷听了戴星炳和戴笠派来的特工的谈话。这个女人心机颇重，她一听，这么一件大事，就决定以此

为把柄，敲诈戴星炳。于是，她听完二人的谈话，就悄悄地走掉了。也就是说，戴星炳自己并不知道，他的姘头已经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并且知晓了他刺杀汪精卫的行动计划。

接下来的几天，戴星炳的姘头多次来找戴星炳，旁敲侧击地打听戴星炳的身份，并且提出只要戴星炳给自己一大笔钱，自己就能帮助戴星炳对其所谓的工作保密。然而戴星炳却一直装傻充愣，顾左右而言他，丝毫没有要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自己的行动计划告诉这个女人的意思，于是这个女人觉得戴星炳根本就不信任自己，也不会给自己多少银子，即便是将来戴星炳发财了，也只会把钱送给远在老家的老婆孩子。于是，戴星炳的姘头感到非常不满，她认定戴星炳根本没把自己当成心爱的人，戴星炳找自己，不过是找一个暖床的女人而已。最后，这个贪图钱财的女人决定，把戴星炳是军统特工，并且准备刺杀汪精卫的消息报告给汪伪 76 号，这样，自己能够领取一些赏钱，总不至于到最后，被戴星炳抛弃，落得两手空空。于是，这个女人跑到汪伪 76 号，用自己知道的秘密换了 500 块大洋的赏金，就这样，戴星炳被捕，军统刺杀汪精卫的计划失败。

不过这种说法的真实性却值得怀疑。

首先，戴星炳是国民党上将，也是一名训练有素的军统特工。作为一名接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戴星炳与任何人接触的时候，都会非常小心，他在与戴笠派来的特工交谈时，肯定会仔细探查四周的情况，锁好门窗。所以，戴星炳肯定会从屋内将门锁死，在这种情况下，戴星炳的姘头就是有钥匙，也进不去屋子，更不可能偷听到他们的谈话。

其次，身为一名优秀特工，戴星炳肯定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反侦察的能力，那么，在戴星炳的姘头一次又一次旁敲侧击试探他的身份，索要金钱以帮助他对其所谓的工作保密的情况下，戴星炳不可能没有丝毫的察觉。

再次，如果戴星炳的姘头对戴星炳不肯给自己银子而心怀不满，戴星炳不可能发现不了，也不可能不起疑心。

因此，戴星炳被自己的姘头出卖，从而被汪伪 76 号抓捕，这种情况虽然可能会发生，但是发生的几率却十分小，那么，如果戴星炳

不是被自己的姘头出卖，他的身份又怎么会暴露呢？

大汉奸傅筱庵与戴星炳被捕

根据笔者再三考证，发现戴星炳的被捕，和时任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的关系很大。

傅筱庵是清末及中华民国企业家、银行家，曾出任北洋军政府高级顾问，1927年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1938年10月16日做了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做了傀儡市长后，傅筱庵发现，现实与想象相差甚远，上海特别市市长这个名头听起来很响亮，然而这个特别市市长不过是表面风光而已。傅筱庵出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后，发现市政府在财政上入不敷出，很多事情都要他自掏腰包。市政府没钱也就算了，但是傅筱庵连一个市长应有的权力也没有，他不过日本人的傀儡而已，根本没有自己的决策权。难以接受现状的傅筱庵在私底下经常对亲朋好友们发牢骚，说自己当初真不应该一时冲动，接下上海特别市市长一职，这简直就是个骗人的苦差事！傅筱庵嘴里虽然这样说，但他在说这话的时候，却并没有辞去上海特别市市长的打算，毕竟挂着一个市长的名头，也能假公济私地办很多事情。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听傅筱庵发牢骚的人里，就有这样一个人，他叫许天民，是个商人，由于经常听傅筱庵发牢骚，所以他将傅筱庵的牢骚话听在耳中记在心中。

许天民不是一个普通商人，他的公开身份是开滦煤矿公司驻上海办事处总经理，私下里，他却是军统特工在上海活动的掩护者和协助者。可以说，许天民是军统局的地下人员，军统特工的地下保姆，不过，许天民隐藏得很深，除了与他单线联系的军统特工，就连军统局的官员都少有人知道他。

许天民听了傅筱庵的许多次牢骚后，认为傅筱庵既然对日本政府不满，那么就一定可以将他拉上军统局的大船。于是某次，许天民请傅筱庵吃饭，傅筱庵又在席间大发牢骚，许天民便趁机试探性地对傅筱庵提出：既然傅筱庵已经后悔投靠日军，出任傀儡市长，为什么不转而投身到国民党的旗下？

听到许天民提出这样的建议，傅筱庵敏锐地察觉，许天民的身份，绝对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许天民不仅仅是一名商人，他很可能和国民党关系密切。为了掩盖自己对许天民的怀疑，避免许天民对自己心生杀机，傅筱庵表示：此事关系重大，他需要时间考虑，而且从伪市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也尚需从长计议，不过他希望在他退下来后，能够获得国民党的保护。

许天民听了傅筱庵的表态后，以为傅筱庵心有所动，有希望将其拉入国民政府的阵营，于是，他将此事呈报戴笠，戴笠对此事也极为重视，命许天民好生安抚傅筱庵，如果有可能，先安排傅筱庵为军统局完成一两个任务，以明确傅筱庵的真实立场。于是，许天民迅速向傅筱庵传达了戴笠所交代的任务，这个任务很简单，就是希望傅筱庵在汪精卫来沪时，在家中设宴欢迎汪精卫，傅筱庵只需要大摆筵席就可以了，剩下的事情，就交由军统特工接手办理。

傅筱庵接到许天民传达的任务后，倒吸一口冷气，戴笠的这个计划可谓一箭双雕，不管能否成功，都必将给傅筱庵烙上协助军统局行动的烙印，这就意味着，自己只要参与了这个任务的执行，就加入了军统局，也就投入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怀抱。这个任务，其实和强迫自己加入军统局没有什么区别。

如果此事未能成功，自己恐也难免暴露，成为日本军方眼中的叛徒，军统局的特务，还会被汪伪 76 号抓去严刑拷打。此事如果成功，日后自己在国民党的阵营中，恐也不会多受待见，毕竟自己当下是心甘情愿地抱着日本人的大腿去做汉奸的，想要改变国民政府的要员们对自己的态度，估计很困难。

最后，傅筱庵心想，虽然这个伪市长不好当，但好歹也比被国民党当枪使要好，所以无论如何，自己也不能接受这个任务，投靠国民政府。傅筱庵转念一想，这件事，倒给了自己一个在日军面前邀功请赏的好机会，如果自己救了汪精卫，那么不仅会被日军奖赏，也会被汪伪政府器重，那么日后，自己的荣华富贵就会接踵而来。

于是，傅筱庵假意答应许天民，接受这个任务，并对许天民表示，宴会当天，自己一定会协助军统特工刺杀汪精卫。然而答应了许天民

的第二天，傅筱庵就跑到了汪伪 76 号，将军统局刺杀汪精卫的计划告诉了李士群。

傅筱庵的告密，令李士群大为兴奋，当天下午，他就驱车到傅筱庵的家中，和傅筱庵详谈了很长时间，李士群授意傅筱庵和许天民继续保持联系，以便套取军统局的全部作战计划和参加此次计划的人员名单，傅筱庵一一答应下来。

没过几天，许天民就将此次计划的全部安排都告知了傅筱庵，并将负责在宴会上刺杀汪精卫的军统特工人员的名字、代号都告诉了傅筱庵，戴星炳的特工身份也就此暴露出来。

李士群拿到傅筱庵送来的刺杀汪精卫的军统特工人员的名字、代号后，看到参加刺杀汪精卫的军统特工的名单中，居然还有戴星炳的名字，立刻感觉事情严重，他不敢有丝毫耽搁，立即将此事上报汪精卫，在得到汪精卫的同意后，李士群迅速出击，带人将戴星炳逮捕到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戴星炳就此被捕。

戴星炳因为傅筱庵出卖了军统局的情报而被捕，这种说法相对更加符合人物性格，也更接近历史事实。此次刺杀汪精卫的计划，由于傅筱庵的出卖，不但没有成功，反而使得参加此次行动的军统特工几乎全军覆没，都被汪伪 76 号抓捕。

戴星炳被抓进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后，并没有遭到严刑拷打，李士群没有对这位军统上将严刑逼供，而是把他关进 76 号三层的优待室，这也是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优待室第一次接纳来自军统的“贵宾”。

自从汪伪 76 号和军统开战以来，军统上将戴星炳是汪伪 76 号抓到的最大的军统军官，李士群自然如获至宝，如能将一名国民党上将拉到自己的这方阵营中，李士群必将得到汪伪政府的嘉奖，所以，这一次，他没有通过严刑拷打来获取情报，而是优待戴星炳，给予他与其他犯人不同的待遇，每天享受大鱼大肉、水果点心伺候着，以求这位军统上将能够改弦易张。

戴星炳自然明白，汪伪 76 号这样优待自己，必然另有所图，不出所料，没过几天，李士群就找到戴星炳，跟他聊了很久。李士群劝戴星炳做个聪明人，明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的道理，性命比

什么都重要，所谓的政治倾向，不过是过眼云烟。李士群还许诺，只要戴星炳投降汪伪 76 号，投靠汪伪政府，必定会拿到比在国民政府更好的薪水，必定会戴上比上将更高的乌纱帽。戴星炳也很痛快，说汪伪 76 号如此优待自己，而自己本来就是汪精卫的老部下，投靠军统刺杀汪精卫纯属无奈之举，只要汪伪政府肯重用自己，自己愿意就此真心投靠汪伪政府。

对于戴星炳的改弦易张，李士群也将信将疑，于是，他给戴星炳布置了一个任务，让他和军统局的高层领导取得联系，将汪伪 76 号的“和平协议”传达给军统局的高层领导。

李士群此举，其实也是为自己留条后路，李士群很清楚，一旦日本战败，身为汉奸头子的他，下场会非常悲惨，所以，他希望能够通过这样“和平”的方式，来取得军统局的认可，为自己的将来留下一条后路。

李士群处死“鼯鼠”戴星炳

李士群布置给戴星炳的任务，是替李士群联络重庆军统局的高层领导人。于是，戴星炳写了一封信给戴笠，信中表示：希望汪伪 76 号和重庆军统局能够化干戈为玉帛，以后两大特工组织不再对立，不再拼个你死我活，双方互留情面，和平共处。信中还特别表明，请军统局以后不要再派人刺杀汪精卫了，虽然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人，但他毕竟也是为了中国人民生活得更好，而且汪精卫也是重庆国民政府的旧员，看在旧日同僚的情面上，请戴笠不要再派人刺杀汪精卫。李士群还授意戴星炳在信的最后提到，如果戴笠同意和汪伪 76 号讲和，从此和平共处，他绝对不会亏待戴星炳，他可以做主给戴星炳一个不次于市长的官职，作为“砖”，来引出两大特工组织和平共处的“玉”。

戴星炳写给戴笠的信寄出一个星期后，戴笠的亲笔信就寄了回来。戴笠在信中表示，愿意与汪伪 76 号和平共处。

得到戴笠肯定的答复后，李士群非常高兴，他不用再担心军统局的人伺机暗杀汪精卫了，更重要的是，他不用担心军统局的人会伺机暗杀他李士群了。

然而，李士群并没有立即释放戴星炳，也没有立即上报汪精卫，给戴星炳在汪伪政府里安排一个较高的职位，他总觉得事情这么顺利，多少有些出乎意料。于是，警惕的李士群依然将戴星炳关在优待室里，自己拿着戴笠的回信，仔仔细细地研究了好几天。

几天后，李士群真的从戴笠的回信里研究出了一些问题。

在戴笠的这封回信里，字体的笔画粗细并不一样，细的字偏多，粗的字偏少，然而，笔画粗一点的字，却不止一两处，并不像是偶尔为之，似乎是故意将某些字的笔画写粗的。

于是，李士群拿了一张白纸，将所有笔画粗一些的字誊写到了白纸上，连成句子后，李士群居然得出了和戴笠的这封回信，意思完全相反的“另一封回信”！

原来，戴笠居然想瞒天过海，在李士群的眼皮底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在“另一封回信”中授意戴星炳假意与汪伪 76 号合作，在骗取李士群的信任后，伺机暗杀汪精卫。

李士群愤怒地冲进了 76 号三楼的优待室，这一次，李士群没有给戴星炳解释的机会，他二话没说，命令手下的特务将戴星炳拉走，直接拉到中山北路的小树林里枪决了。戴星炳直到被枪决的那一刻，都不知道为什么本来态度和悦的李士群，会突然下令枪决自己，他不知道戴笠回了一封秘藏着“回信”的回信，而且他永远都不能知道了。

笔者根据历史资料，将戴笠给李士群的回信内容大致还原如下，以便读者对当时的情况有更深入确切的了解。

电悉。我将李兄的信件交蒋委员长审阅后，蒋委员长同意了你的意见。他认为重庆和上海可以和平相处，两大特工组织之间所发生的冲突也可以避免。当前战场的时局比以前更加艰难，战斗也更加紧张，不管是日方还是我方，武器、人力、资源都消耗巨大。如果日本人灭国民党的心不死，后果将会十分严重，因此，蒋委员长希望李士群和丁默邨能以民族大义为重，重庆方面也将以民族大义为先，和汪精卫政

府和平共处，以前国民党所策划的刺杀汪精卫的全部计划，一概作废！以后重庆和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可经常保持电讯联系。

信上字迹比较粗的几个字是：加、紧、消、灭、汪，连在一起，就是命令戴星炳抓住机会，抓紧时间，不惜一切代价将汪精卫消灭掉。也就是说，重庆军统局根本就没有放弃刺杀汪精卫的计划，身为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的头目李士群，怎可容忍戴笠这样戏弄自己和汪伪 76 号，所以他没有再给戴星炳机会，直接枪决了军统上将戴星炳。

第三节 叛变投靠汪伪 76 号的军统特工

军统和汪伪 76 号之间的战争愈演愈烈，他们不间断地向对方的阵营里安插卧底，不断地将对方的特务拉进自己的阵营当中。在此期间，汪伪 76 号成功策反了一批军统高官，在这次策反中，有一个人，对于汪伪 76 号而言功不可没，而对于军统局而言，就是罪大恶极了。

叛变投敌的军统特工万里浪

万里浪，原名万家文，湖北省枝江县人。万里浪毕业于国民党军统金华训练班，毕业后被安排到军统局金华分站工作，后因表现较为出色，被提拔到军统局上海区从事特工活动。万里浪到军统上海区之后，成功地完成了军统上海区领导派给他的几个任务，这让上海区的军统大佬们非常满意，于是，提拔万里浪为军统驻上海区行动队队长。

然而好景不长，1939 年底，汪伪 76 号在上海大肆搜捕军统特工人员，在这场大搜捕中，万里浪和其他一些军统特工一起，被汪伪 76 号抓捕。

被汪伪 76 号关进监牢后，万里浪的几位军统同事，先后遭到汪伪 76 号特务的毒打，万里浪见状，非常害怕，他不愿意遭受这种非人的折磨，害怕因此丢掉性命，所以，当汪伪 76 号的特务举起皮鞭，

准备鞭打他时，他迅速低头求饶，主动将知道的一切都说了出来，并高声叫喊，发誓自己真心投靠汪伪 76 号。

就此，万里浪叛变，加入了汪伪 76 号。

万里浪叛变后，为了让自己能够尽快在汪伪 76 号站住脚，占据一席之地，频频表现。万里浪出卖了昔日的同事和好友，带领汪伪 76 号的特务们，在很短的时间里，抓捕和诱降了一批军统特工。

万里浪的“优良”表现，让李士群非常满意，于是，还不到半年时间，万里浪就成了李士群的心腹。

1940年3月，万里浪被李士群任命为汪伪 76 号第四行动队大队长，驻守愚园路 818 号。

在万里浪担任第四行动队大队长期间，用各种手段抓捕了许多军统人员，并且成功地策反了大部分被捕的军统成员，这些人在万里浪的劝说下，都转投汪伪 76 号门下。于是，万里浪加入汪伪 76 号还不到一年，就在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内部，组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由叛变投降的军统成员组成的小团体，因此，万里浪在汪伪 76 号的威信逐渐提升，他加入汪伪 76 号一年后，其在汪伪 76 号中的威信虽然比不上李士群，但却也和老牌特工汪曼云、马啸天相差无几。

万里浪策反军统特工的成功率和人员级别都是比较高的。万里浪先后策反了原军统少将、高级参谋萧家驹，原军统上海特派员、军统老牌特务罗梦芴，原军统南京区少将、南京区区长钱新民，原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等人，这些人和万里浪一起，成为汪伪 76 号的爪牙，沦为了可耻的汉奸。

一年后，万里浪凭借那些在他的积极拉拢和策反下，投靠了汪伪 76 号的原军统成员，在汪伪 76 号内部组建了一个以他为首的“小军统”，这些人都是有学识、有能力、有经验的特工，有的曾经是万里浪的上司，有的曾经是万里浪的属下或者同事。后来，随着万里浪策反的军统特工的增多，加入汪伪 76 号的军统特工越来越多，以至于以万里浪为首的“小军统”，逐渐成为汪伪 76 号中一个分量强大的小集团，以至于万里浪逐渐取代了丁默邨的位置，成了能与李士群相提并论的汪伪 76 号的重要领军人物之一。然而，虽然后期的万里浪，

在汪伪 76 号中的地位已与丁默邨相当，然而他的和李士群的关系，却不像丁默邨和李士群之间那样紧张。

万里浪很聪明，他算是较早投靠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的原军统特务，他对李士群和丁默邨恩怨情仇还是比较清楚的。在汪伪 76 号待的时间越长，万里浪看得越明白，只要李士群一天不离开汪伪 76 号，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就归李士群负责一天，任何人，包括丁默邨，都休想取代李士群掌管汪伪 76 号。万里浪心里非常清楚，虽然他笼络了一群原军统成员在身边，但这点小势力，和李士群在汪伪 76 号拥有的威信比起来，却算不了什么。他万里浪要想在汪伪 76 号站稳脚跟，要想保住自己在汪伪 76 号“一人之下千人之上”的位置，就得和李士群搞好关系，明里暗里都得让李士群知道，万里浪是绝对效忠他李士群的，而且无论何时何地，都不会和他李士群抢夺汪伪 76 号管理权。

万里浪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万里浪的表现始终让李士群感到十分满意，他愈发器重万里浪。后来，将万里浪的职务升到了调查部统计局第三厅厅长，也就是军统局第三厅厅长的位置，再后来，任命万里浪担任汪伪 76 号在杭州成立的特务训练机构——“中央政治保卫学校”的教育长兼杭州区区长。万里浪先后所负责的这几个职位，对汪伪 76 号的正常运作都十分重要，由此可见，李士群对万里浪的重视程度。

这里提一句，李士群在杭州创办的“中央政治保卫学校”，是一所系统培养特务的学校，学员从这所学校毕业后，都会成为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的一员。可以说，这所学校是汪伪 76 号拉拢人才、培育人才的基地。因此，如果不是李士群的绝对心腹，李士群也是绝不可能任命其为该校的教育长的。万里浪是少数被李士群信任，推荐给汪精卫，并得到了汪精卫认可和信任的人。汪精卫同意李士群的推荐，任命万里浪担任“中央政治保卫学校”教育长，主持学校的校务工作。万里浪担任“中央政治保卫学校”校长期间，不仅可以自主决定吸收社会青年和学生为该校学员，还可以自主决定哪些学员毕业后，可以送入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工作。可以这样说，万里浪担任“中央政治保卫学校”校长期间，掌握着为汪伪 76 号输送“新鲜血液”的一条命脉。

李士群对万里浪信任有加，后来，在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迁往杭州之前，李士群留在上海做善后工作，鉴于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需要在杭州筹建新址，需要一个人先去杭州主持大局，这时，李士群向汪精卫推荐了万里浪，李士群非常信任万里浪，甚至对汪精卫说，万里浪的工作能力是大家公认的。当然，万里浪也没有辜负李士群的信任，他到了杭州后，立刻着手主持杭州的特工工作，筹建杭州特工总部，并加强杭州特工总部的保卫力量，正是在他的努力工作下，才使得后来李士群等汉奸头子安然无恙地搬至杭州汪伪 76 号新特工总部。

万里浪的心机、手段皆非寻常，他坐在一个个重要的位置上，也从未混日子，他在积极安排特工工作的同时，还抓捕了一个又一个军统和中统的特工，策反了一个又一个的旧同事、老相识。

后来，汪伪 76 号总部从上海迁到杭州，李士群就将原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极司菲尔路 76 号，改为了汪伪 76 号“上海实验区”。虽然极司菲尔路 76 号不再是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而成了一个实验区，然而极司菲尔路 76 号对于汪伪 76 号的重要性非但没有降低反而增强了，其所拥有的人员和权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增加了。作为“上海实验区”的极司菲尔路 76 号，和汪伪 76 号的其他分区不一样，其在人员数量和机构组织方面，都比其他分区更为庞大。上海实验区，实际上还是汪伪 76 号的特供区，是李士群最大的一块“地盘”，是汪伪 76 号特务的老巢所在，改称“上海实验区”，不过是形势所趋而已。那么，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迁移到杭州，李士群肯定跟着特工总部一起去杭州，“上海实验区”这个老巢又交给谁来管理呢？关于“上海实验区”负责人的人选，李士群丝毫没有犹疑，直接指定万里浪为“上海实验区”负责人，把极司菲尔路 76 号这块风水宝地，这块人人垂涎的“肥肉”，直接送到了万里浪手中。由此，万里浪正式进入汪伪 76 号的高层领导圈，成为汪伪 76 号内部的一方“诸侯”。

在周佛海请辞汪伪政府警政部长一职后，李士群接任了警政部长的职务。当上警政部长后，李士群意识到，在汪伪政府中，没有属于自己的小集团是不行的，很多事情都会因此而被束缚手脚。为了改变

这种状况，李士群在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将汪曼云、杨杰、傅世文、余百鲁等汪伪政府的官员请到家中为自己庆祝生日，李士群十分信任万里浪，他将万里浪也一并请了去。

在宴会开始前，李士群慷慨激昂地对汪曼云、杨杰、傅世文、余百鲁、万里浪等九人表示，要和他们结拜为异姓兄弟，从此以后大家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其他九人自然明白李士群的心思，而且彼此都是汉奸，也都希望能够相互借力在汪伪政府站稳脚跟，于是，他们都没有违逆李士群的意思，纷纷表示赞同李士群的建议。

于是，这十个人就在李士群家的客厅里，摆上香案、烧香磕头，结拜为异姓兄弟，组成了一个十人的小集团，号称“十兄弟”。

从古至今，结拜为异姓兄弟都是一件大事，姑且不论李士群倡导的结拜掺杂了多少利益关系，他能主动邀请万里浪和他结拜，也显示出他和万里浪的关系绝不一般。

万里浪挤走黄自强，独掌汪伪 76 号

万里浪在汪伪 76 号的威信日渐增强，以至于在李士群死后，他的确通过各种手段，挤走了后来的顶头上司黄自强，达到了他独掌汪伪 76 号的目的。虽然这是李士群死之后的事情，但是作为万里浪来说，确是其“事业”的巅峰所在。所以笔者在这里，要对万里浪后来挤走顶头上司黄自强，独掌汪伪 76 号做一详细描述。

1943 年，李士群被他的日本主子毒死后，汪伪 76 号一度群龙无首。以前，汪伪 76 号的日常事务都是由李士群主持的，李士群一死，汪伪 76 号就没了主心骨。日本特务机关为了避免汪伪 76 号内乱，就任命曾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和汪伪 76 号调查局主任的黄自强接替李士群，主持汪伪 76 号的日常事务。在日本特务机关选出代理李士群的傀儡当家黄自强后没多久，就宣布撤销了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将其改组为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下属机构，委任黄自强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也就是说，汪伪 76 号换了门庭，特务们的顶头上司变成了黄自强。

汪伪 76 号改组了，然而换汤不换药，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大部

分人马，还是汪伪 76 号的原班人马，黄自强成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这对大多数特务来讲，也并没有给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什么太大的改变，然而，黄自强的上任，却触动了一个人敏感的神经，这个人，就是曾经和李士群关系非常铁的万里浪。原本，李士群死后，万里浪成为汪伪 76 号当家人的呼声非常高，但日本军方却认准了黄自强，万里浪无奈，认定是日本军方从中作梗，排斥李士群派系的特务，才使得他不得不屈居于黄自强手下，这口气，心高气傲的万里浪无论如何也咽不下去。

1943 年 10 月 29 日，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正式成立。

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设政治保卫局、情报局、秘书室、参事室、总务处和警卫大队六个部门。政治保卫局的工作性质和原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的工作性质一样，局长由万里浪担任，胡均鹤为副局长。政治保卫局下设第一局和第二局，第一局的办公地址为原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所在地，也就是极司菲尔路 76 号；第二局在南京颐和路 21 号，主要负责人是胡均鹤。政治保卫局所拥有的权力，是军事委员政治部的各个部门中最大的，其成员也是最多的。

虽然政治保卫局从属于军事委员会，看起来貌似地位比当年汪伪 76 号独掌大权时降低了许多，但实际上它的职权范围比改组前更宽。

也就是说，实际上，政治保卫局局长万里浪拥有非常多的权力，而且虽然黄自强是万里浪的顶头上司，可万里浪根本就不买黄自强这个政治部部长的账。也就是说，黄自强的政治部部长，对政治保卫局而言，不过是个挂名的职务而已，黄自强根本没办法掌控政治保卫局。因此，黄自强对万里浪非常不满，他想把持政治保卫局，也就是原来的汪伪 76 号，于是处处以政治部部长的名义，对政治保卫局的行动指手画脚。黄自强的举动，令本来就对黄自强的“上位”非常不满的万里浪更加恼怒，他可不愿坐以待毙，干等着黄自强将自己排挤出政治保卫局，于是，他开始公开和黄自强争夺汪伪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政治保卫局的领导权。

万里浪和黄自强的权力之争，从地下升级到地上，双方甚至不再掩饰对对方的不满甚至厌恶。万里浪和黄自强经常在公开场合对对方

冷嘲热讽，还悄悄地做了许多打击对方的事情。

黄自强有位姨太太，是南京一家酒家的女服务员，这位姨太太有个没什么正经本事，只会惹是生非的同胞兄弟，不夸张地说，这位姨太太的弟弟，是个除了他自己的狐朋狗友和家人，没人不厌恶的街头混混，然而黄自强却把这位啥本事都没有的小舅子安排进了政治部，说自己的这位小舅子是天才特工，并且不顾众人的反对，一意孤行地任命他的小舅子为政治部情报专员，还专门给他的小舅子取了个代号，叫“长风”。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来，“长风”这个代号出自“长风破浪会有时”，显然是针对万里浪而取的，大有“长风破万里浪”之意，可见，黄自强与万里浪的争斗，已经到了针锋相对的地步。

黄自强私底下针对万里浪做了许多手脚，而万里浪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自然也没闲着。

自从黄自强上任政治部部长后，许多原汪伪 76 号的特务见风使舵，拜倒在黄自强的门下，这些特务中有不少原本都是万里浪的“小军统”中的人，这一点让万里浪非常不满。后来，黄自强在工作中，多次越过万里浪，擅自安排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事，还下令“点编”政治保卫局管辖的警卫部队，这不仅让政治保卫局的特务们人心惶惶，更让万里浪坐立难安。黄自强的这些举动，就是一个信号，要将万里浪彻底边缘化，排挤出政治保卫局，于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万里浪决定铤而走险，恐吓黄自强，促使他放弃插手政治保卫局的工作。

这一天，黄自强从住处前往政治部，行至中山门时，忽然遭遇一名刺客的刺杀，幸亏那名刺客射击时准头较差，射偏了，以至于子弹连黄自强的身体都没有碰到，于是黄自强毫发无伤地躲过了这场暗杀。当然，究竟是刺客射击时准头太差，还是奉万里浪之命有意为之，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一次，黄自强和他的妻子从杭州去上海，到上海后，落脚在华懋饭店。然而他们在华懋饭店落脚的两天时间里，接二连三地收到恐吓信，除了恐吓信，还有一只只血淋淋的缺胳膊短腿的死猫，恐吓信中要求黄自强夫妻二人在三天内离开上海，否则他们夫妻二人就会像那一只只死猫一样，死无全尸！于是黄自强夫妇再也不敢在上海多

待，三天还不到，就收拾行李赶回了杭州。

上述事件之后，黄自强还遭遇过好几次暗杀，但都有惊无险。

黄自强虽然总是有惊无险，但经过这样三番五次的恐吓和暗杀，黄自强害怕了，在他看来，得到政治保卫局的特工领导权和保住性命相比，显然保住性命更加重要，所以，他不再和万里浪争夺政治保卫局的领导权，主动向万里浪求和。

万里浪取得了这场权力争斗的决定性胜利。

然而，万里浪却向黄自强提出了两个非常苛刻的条件：

政治保卫局的人事权、财政权和行动权完全独立，政治保卫局的所有事务全权由万里浪处理，政治部没有任何干涉的权利；

除了政治保卫局，但凡和政治保卫局相关的机构、人和事，不经万里浪同意，政治部不能擅自调动，政治保卫局下属机构的经费也由万里浪亲自从汪伪政府领取，然后由万里浪转发给政治保卫局所有下属机构。

这两个非常苛刻的条件，将政治保卫局完全从军事委员会政治局中脱离了出来，然而黄自强却没有犹豫，迅速答应了万里浪的条件，至此，万里浪彻底掌握了原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现政治保卫局的领导大权。

然而，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万里浪虽然能够独掌汪伪 76 号大权，作威作福一时，但与民族大义相悖，做了汉奸的他，终究逃脱不了悲惨的下场。

后来，万里浪在日本政府投降前，凭借其敏锐的政治嗅觉，抢先和戴笠取得了联系，为了保住性命，万里浪将屠刀转向了政治保卫局的下属，为戴笠肃清汉奸的行动立下了大功，然而此举，依然没能保住他的性命。

在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国民党政府只能顺应民意，于 1946 年 8 月 15 日，将大汉奸万里浪公开枪决。

如果万里浪没有叛变军统局，就不会成为民族的罪人，然而，他在汪伪 76 号的威逼利诱下，放弃了自己的国家和自己的信仰，残忍地镇压自己的同胞，成了民族的罪人，万里浪的最终结局，完全是他

咎由自取。

被万里浪策反的军统少将萧家驹

前面，笔者再三提到，万里浪投降汪伪 76 号后，策反了不少军统特工，他为了表现自己的真心诚意，作为“投名状”，第一个策反的军统特工，就是军统少将高级参谋萧家驹。

1939 年 10 月，万里浪凭借他在军统时的人脉关系，获得了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消息，那就是军统少将、军统的高级参谋萧家驹，即将来上海军统站布置军统局的游击工作。

萧家驹，河北人，河北被称为燕赵大地，是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和赵国所在的位置，从古至今，这片土地上涌现出许多文人志士、英雄豪杰，萧家驹出生在这片热土上，他和当时许多年轻的中国人一样，满腔热血，外出求学。然而，萧家驹和许多热忱单纯的年轻人又不太一样，他的爱国之心并不纯粹，其中掺杂了许多个人利益。可以说，萧家驹从年轻的时候，就擅于投机，不论政治倾向还是团队意识，哪方能给他带来的个人利益最大，他就投向哪方，因此，后来，萧家驹被万里浪策反，转投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也就不足为奇。

萧家驹毕业于河北保定军校，在校期间，萧家驹就加入了国民党，因其表现出色，尚未毕业时，萧家驹就被军统局选中，成为了军统局的一名特工人员。

萧家驹从保定军校毕业后，被提升为军统少将，任军统局高级参谋一职，专门负责部署军统特工的游击工作。

1939 年下半年，军统特工在上海的行动屡次失败，军统上海区萎靡不振，于是 1939 年 10 月，戴笠决定把擅于游击作战的萧家驹派往上海，以期改变上海区军统特工屡遭失败的现状。

这个消息被潜伏在军统局的汪伪 76 号的间谍得知，便将军统少将萧家驹即将前往上海的消息秘密告知了万里浪。万里浪接到这个消息后，没有耽搁，迅速将此事上报丁默邨。丁默邨听后，认为这是个策反萧家驹的好机会，而且他认为，万里浪是策反萧家驹的最佳人选，因为万里浪出身军统特工，原本和萧家驹的关系就比较好，如果万里

浪出面策反萧家驹，将萧家驹拉入汪伪 76 号阵营的成功率就会很高，于是丁默邨派万里浪负责策反萧家驹。

虽然万里浪得到了情报，说萧家驹即将到上海来，但是军统局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扎实，萧家驹究竟哪一天到上海，落脚在什么地方，却是潜伏在军统局的汪伪特工所无法得知的。因此，万里浪想找到萧家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为了早日完成这个任务，交出一张漂亮的“成绩单”，万里浪派出几个精于搜索线索的手下，秘密打探萧家驹的消息，他凭借手中有限的线索，几经周折，终于查获了萧家驹在上海的落脚之处。然而，老牌特务万里浪虽然查明了萧家驹的落脚之处，却没有直接到萧家驹的住处去与他见面。

首先，万里浪担心汪伪 76 号特工获得的这些线索，都是萧家驹发现有特工跟踪后，故意放出来的，为的就是“放长线钓大鱼”。

其次，万里浪担心，如果自己只身一人前往萧家驹家中，说不定会中了萧家驹的埋伏，被过去的军统同事抓捕。

所以，万里浪思索再三，决定先托人去找萧家驹，谎称他万里浪想重回军统，目前加入汪伪 76 号是情非得已，是权宜之计，他万里浪万分希望老朋友、老同事萧家驹能在戴笠面前替自己说说好话，请戴笠原谅他的叛变，能让他重新回归军统局。

萧家驹亲自接待了万里浪派来的说客，在得到万里浪决心重返军统局的消息后，萧家驹喜出望外。萧家驹以为，万里浪在他初到上海之际，就迫切地提出回归军统局，这对自己在上海打开局面，将有极大的帮助。如果他萧家驹真的能够将军统局的老牌特务万里浪拉回军统，那绝对是大功一件，戴笠肯定会更加重视他，以后，他的仕途之路也会更加顺利。

于是，萧家驹让万里浪派来的说客传话给万里浪，约万里浪在上海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皇后咖啡馆见面。

几日后，万里浪按照双方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了皇后咖啡馆。萧家驹见到万里浪后，显得特别激动，两位昔日的老友、同事，热情拥抱在一起，虽然二人心中各自盘算着自己的小算盘。二人在皇后咖

咖啡馆落座后，才发现这个见面的地点选得不是特别恰当，人多嘈杂，不适合商谈，而且，虽然皇后咖啡馆面积不小，却没有包间，皇后咖啡馆里喝咖啡的人又非常多，他二人虽然可以面对面交流，但他们的座椅背后、侧面，都坐着陌生人，因此，他们之间谈话，只能是浮于浅表的嘘寒问暖，根本无法深入展开话题。

为了便于交谈，万里浪提议，请萧家驹到他的家中去坐坐，以便他们深入交流。

万里浪的邀请正中萧家驹的下怀，他正想知道万里浪的住址，这样，他就可以经常联络万里浪，促使万里浪成为军统局潜伏在汪伪 76 号的双面间谍。

萧家驹自恃和万里浪旧交深厚，坚信万里浪不可能加害于他，于是，他毫不犹疑地坐上了万里浪的汽车。

一路上，萧家驹十分愉快地和万里浪攀谈，然而走着走着，萧家驹却觉得这条路很是奇怪，越走越戒备森严，根本就不像是通往家庭住宅的道路，萧家驹很是不安，紧张起来，再三询问万里浪究竟要去哪儿，然而万里浪并没有回答萧家驹的问题。直到汽车停了下来，万里浪才对萧家驹表示，自己并无半点恶意，他认为在这里谈话，和在他的家中谈话效果是一样的，而且这里更加安全。那么这里究竟是哪儿呢？这里就是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原来，万里浪直接将萧家驹，带进了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

萧家驹进了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才明白自己是上了万里浪的“贼船”了，这里还有什么商谈可言。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不得已，萧家驹只能表现出无所谓的态度，跟随万里浪来到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的会客室里。

在进入会客室之前，萧家驹沮丧而无奈，他已无路可逃，万里浪既然把自己带进了汪伪 76 号，肯定有所图谋，想从守备森严的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逃出去恐怕是天方夜谭了，想到自己还年轻，大好的前程还等着自己，倘若就这么死了，未免太可惜，只好先看看万里浪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再做决定了。

进入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的会客室后，万里浪一脸亲切，对自己

未经萧家驹同意，就将他带进了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诚恳地表达歉意，并且声称，自己绝没有恶意，在军统局共事时，他就一直与萧家驹交好，如今，他们二人一个在军统局一个在汪伪 76 号，这让他万里浪对昔日的友情甚为怀念。接下来，万里浪表示，他一个人在汪伪 76 号，实在有些寂寞，他希望二人的友情能够延续，哥俩能够互相帮助，在汪伪 76 号一起共谋大业。当然，对于此事，他万里浪并不强求，他只希望萧家驹来参观一下汪伪 76 号，给他们的特工工作提出些宝贵的意见。

萧家驹既然上了汪伪 76 号的“贼船”，想不“参观”也由不得他了，萧家驹知道已经身不由己，便见风使舵，顺水推舟地向万里浪表示，凭借他们两人的交情，只要万里浪说一声，他一定义不容辞过来帮忙。

萧家驹的答话，让万里浪心花怒放，他马上带萧家驹去见了李士群和丁默邨二人，就在当天，万里浪就为萧家驹办好了加入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的一切手续和进入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的最高级别的通行证。

当天晚上，李士群和丁默邨就让万里浪转交给萧家驹一笔可观的“安家费”，算是汪伪 76 号给萧家驹的压惊吧。也就是从那天开始，又一个军统高官叛变，走进了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的贼窝，从此，军统又少了一个高级战将，抗日战场上又少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热血男儿！

萧家驹叛投汪伪 76 号后，被李士群任命为成立不久的汪伪肃清委员会下属的“和平救国军”的参谋长。此外，李士群还将萧家驹安排到专门训练特务的“伪警察训练班”担任训练班教官，教学员各种特工技能。

萧家驹的叛变，令戴笠震怒，他没有想到，他派去上海负责游击作战的军统少将，竟然被万里浪策反，投靠了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在这一年里，在军统局和汪伪 76 号的明争暗斗中，虽有过一些胜利，但时至今日，他戴笠算了算，却是场亏本的生意。他戴笠精心培养的许多特工，都被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的特务给抓捕了，给杀害了。最可恨的，是许多被汪伪 76 号逮捕的军统特工，经不住汪伪 76 号的严

刑拷打和糖衣炮弹，掉转枪口，开始策反和杀害昔日的军统同僚，这些叛徒使得军统上海区损失惨重。

万里浪的叛投和军统少将萧家驹的叛投，使得李士群在与戴笠的争斗中，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在与军统局的争斗中，扳回了一局，于是，万里浪变本加厉，加紧策反军统特务加入汪伪 76 号。

被万里浪策反的又一军统少将王钟麒

万里浪在成功策反萧家驹之后，被李士群青睐有加，于是，为了获取李士群更多的信任，在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内站稳脚跟，树立自己的权威，万里浪又盯上了军统少将王钟麒。

王钟麒是江苏人，在 1939 年 10 月，万里浪叛变，主动向汪伪 76 号投诚之时，军统少将王钟麒正作为军统特派员，在上海法租界内开展情报搜集工作。万里浪叛变之事，王钟麒一无所知，他还住在上海法租界内的小旅馆里，按部就班地开展自己的情报搜集工作，丝毫没有想到，危险距离自己越来越近。

万里浪通过自己在军统局的旧同事，探知军统少将王钟麒在上海的住处后，就将这个消息上报了李士群。李士群得到军统少将王钟麒在上海的消息后，立刻派出汪伪 76 号的一支特工小队，秘密前往法租界王钟麒暂住的小旅馆去抓捕王钟麒。这支特工小队悄悄跟踪了王钟麒，在其回到住处，进入房间后不久，就闯入房间，将其绑架。王钟麒还没来得及弄清楚究竟是谁绑架的自己，就被两名特工一左一右地押着胳膊，后腰被枪顶着，像个布偶一样，被这支特工小队押进汽车。直到汽车开进汪伪 76 号的大门，王钟麒这才明白，这些绑架自己的人，一定都是汪伪 76 号的特务，对于汪伪 76 号绑架自己的目的，王钟麒也猜出了一二，无非是想要他叛变投敌，加入汪伪 76 号。

王钟麒被绑进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后，和王天木被汪伪 76 号抓捕时一样，并没有被关押到审讯普通犯人的审讯室中，而是关在优待室里，被好吃好喝地伺候着。

几天后，李士群走进了优待室，他再三劝说王钟麒加入汪伪 76 号，并希望他能说出军统另一名老牌特工李济时在上海的住处。

王钟麒的骨头比起万里浪和萧家驹来，还是硬多了，他不仅对李士群的劝降不予理睬，对李士群许诺的高官厚禄也嗤之以鼻。最后，看到王钟麒拒不合作，李士群大为恼火，当即下令手下特务将王钟麒关进审讯室，随后，李士群找来了吴世宝，要和吴世宝一起审讯军统少将王钟麒。

王钟麒被带进审讯室后，李士群命吴世宝脱掉了王钟麒的上衣，随后，命吴世宝和其他几个孔武有力的特工，用两寸多宽、一寸多厚的牛皮带子，轮流抽打王钟麒。军统少将王钟麒，从来没有受过这样的皮肉之苦，被打得惨叫连连。

最终，王钟麒不堪忍受酷刑，供出了军统特工李济时在上海的住所，然而，李士群并没有就此满意，王钟麒的痛苦也并没有就此结束。

王钟麒在供出李济时的住所后，遭到了更为残酷的毒打。

李士群接着逼问王钟麒：你每次去见李济时，你们都在什么地方见面？

王钟麒回答：在李济时家的亭子间里见面。

李士群继续问：你们每次见面，是在楼上还是楼下？

王钟麒不假思索地说：在楼上。

王钟麒刚回答完，李士群便挥手指令特务继续鞭打王钟麒。

随后，李士群又问了王钟麒四次，王钟麒每次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到了第五次的时候，王钟麒终于无法忍受，高声叫喊着，说自己已经将知道的全部交代出来了，没有一丝的隐瞒。

这里要交代一句，凡是上海的石库门房子，有厢房后间的，建在楼下的房子叫作灶披间，建在楼上的房子叫亭子间。

李士群见王钟麒遭受了三番五次的毒打，说的都是一样的，才确信王钟麒说了真话，于是不再毒打王钟麒，而是派汪伪 76 号的特务头子马啸天，带领一队特务到王钟麒所说的地点，抓捕了军统派驻上海的另一名特派员李济时。

随后，马啸天将李济时绑进了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的审讯室。

当李济时看到被毒打得伤痕累累的王钟麒，还没等汪伪 76 号的特务对他动刑，就主动投降了，还提出要加入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

只要李士群收留自己，他就将他知道的事情全部报告李士群。

看到李济时如此干脆的投诚，李士群却心生疑窦，他先答应了李济时的请求，同意李济时加入汪伪 76 号，随后将李济时带入另一间审讯室，详细询问了他有关军统上海区的有关情报。

李士群担心李济时所提供的情报有假，在获知这些情报后，又转而去盘问被打得半死不活的王钟麒，直到明确地认定此二人的口供一致，才心满意足。

李济时和王钟麒叛变军统，让李士群志得意满地认为，用不了多久，军统局在上海的大部分特工，就会被他李士群统统策反，军统局在上海，定会折个大跟头，丢了大面子。

王钟麒和李济时二人，在被汪伪 76 号抓捕后，先后叛变投敌，加入了汪伪 76 号，和其他叛变投敌的军统特务一样，此二人很快就在汪伪 76 号内取得了一定的职位。王钟麒被任命为汪伪 76 号的顾问，李济时则被任命为汪伪 76 号的专员，李士群命此二人专门负责破坏军统局在上海的行动。

李士群对此二人的任命可谓用心良苦，即使李济时或者王钟麒是军统安插进汪伪 76 号的双面间谍，因为此二人在汪伪 76 号的工作任务是破坏军统局在上海的行动，所以，他们要想获取李士群的信任，就必须拿军统局的旧同事开刀。

后来，李士群担任了汪伪政府警政部次长，而通过长时间的观察和考验，他认定李济时和王钟麒是真心投靠汪伪 76 号的，于是提升李济时为政治警察署署长，调任王钟麒为警政部专员。直到 1941 年，汪伪政府警政部撤销，王钟麒和李济时才离开了汪伪政府警政部，然而他们却一直在李士群手下工作，成为了汪伪 76 号的资深特工。

王钟麒和李济时在离开警政部后，因王钟麒懂得一些“相面”之术，二人就在李济时在苏州的家里支了个“算命”摊子，二人以帮人看命、改风水为生。此时的王钟麒和李济时，看似是得道高人，每日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实际上却是以算命为伪装，隐藏起来的汪伪特工。当然，除了李士群，鲜有人知这两个江湖术士，居然是恶名昭彰的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在苏州实验区外围的特务。

1942年，王钟麒被调往南京“中央大学”担任教员，他一直在这个职位上工作到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关于王钟麒和李济时这两个叛徒的最终下场，笔者查阅了大量资料，也没有查到确凿的历史明证，不过想必这二人应该和所有的汉奸一样，得到应有的报应。

第四节 汪伪 76 号摆下迷魂阵，军统要员连连中招

从1939年夏到1940年秋，在军统局和汪伪 76 号的争斗中，军统局损失惨重，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可谓收获颇丰。在这段时间里，汪伪 76 号不止策反了萧家驹、王钟麒和李济时等军统要员，还虏获了许多军统特派员和军统的金牌特工。

李士群离间计策反军统金牌杀手

在万里浪被汪伪 76 号成功策反之后，军统王牌杀手王天木也被李士群成功策反，王天木的叛变，让军统上海区、天津站、青岛站，都遭受了灭顶之灾。

汪伪 76 号凶名在外，当时，在上海滩，提及伪汪 76 号，大家都会胆战心惊，只要被汪伪 76 号的汉奸抓进汪伪 76 号的监牢，不被剥掉一层皮，是别想出来的，更多的人是竖着进去横着出来的。但也有例外，李士群并不是对每一个被抓进汪伪 76 号的“罪犯”都予以严刑拷打，有些人能够获得李士群的优待，比如军统杀手王天木、陈恭澍、刘戈青、沈醉等国民党军统局的重要干部，就都曾经被汪伪 76 号的汉奸抓进汪伪 76 号，但他们全都安然无恙地从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走了出来。李士群为啥会优待这些军统局的“超级”杀手呢？无非是想通过自己的优待，来收买这些杀手，离间他们和军统局乃至戴笠的关系。

军统金牌杀手王天木，就曾经被关押在汪伪 76 号的策反室中，李士群用离间计，成功策反了军统金牌杀手王天木。

笔者在第一章中叙述过 1939 年，军统杀手成功暗杀伪维新外交

部部长陈箴的前后经过，这次暗杀主要归功于军统特务王天木和刘戈青，因此，王天木应该因此得到戴笠的嘉奖，可是当时远在香港的戴笠不但没有嘉奖王天木，反而因他和上海区副区长赵理君的不合而严厉地批评了他。立了大功却被批评，这让王天木颇觉委屈，他觉得戴笠这样维护赵理君，就是因为赵理君曾经是戴笠的学生，因此，戴笠不辨是非、不分黑白，不表扬立功的自己，反而斥责自己。王天木因此对戴笠心存怨恨，他自恃自己是军统局的元老，开始顶撞戴笠，这让戴笠也颇为恼火，甚至说出要撤销王天木军统局上海区区长的职位，让他做个普通情报员的气话来。当然，戴笠还是认可王天木的能力的，毕竟王天木是军统局的金牌杀手，所以，有些话，戴笠不过说说而已。

然而，戴笠和王天木之间的关系就此疏离。

王天木因为得不到戴笠的嘉奖，心情郁闷，开始常常到一间茶室去喝茶散心。王天木的这一习惯，被一个人注意到，并报告给了汪伪76号，这个人，就是军统局上海区特工陈明楚。当时，汪伪76号的特工，正在为寻找杀害陈箴的真凶而忙得焦头烂额，李士群除了逮到了军统上海区特工陈明楚，谁也没有抓到。然而，就是这个陈明楚，为了保住性命，毫不犹豫地投向了汪伪76号的怀抱，并将王天木、刘戈青设计暗杀陈箴的经过告知了李士群，并且，将自己注意到的，王天木新近喜欢到一间茶室去喝茶散心的情报也都透漏给了李士群。

意外得到线索的李士群，立刻命令手下的特务监视王天木，经过多日的跟踪调查，确定王天木的确喜欢在固定的时间，去固定的那间茶室喝茶散心。于是，为了成功逮捕王天木，李士群制订了很多方案，最终选择在某日下午三点，王天木到那间茶室和部下接头的时候采取行动，抓捕王天木。

那天，李士群亲自出马，潜伏在王天木常去的那间茶室对面的楼房的屋子里，通过窗户观察进入对面茶室的人。当李士群看到王天木出现在茶室门前时，不禁低声叫出了王天木的名字。

那天，王天木头戴一顶灰呢帽，身穿轻便的春装，和往常一样，他晃悠悠走进茶室，没有丝毫的防范。在进入茶室之前，王天木环视四周，似乎在寻找什么人，又像在等待什么人，片刻后，王天木改

变了主意，他并没有走进茶室，而是大步向茶室西面的一个烟摊走去。然而，王天木还没有走到烟摊，汪伪 76 号的一名特工就将手枪抵在了王天木的背后，还用一只手揽住了王天木的肩膀，然后推着王天木，迅速向停靠在路边的汽车走去。王天木的身体在接触到枪口后，僵硬了起来，然后，他被身边的人推搡着，走近汽车。汽车的车门迅速打开，王天木被拽进了车里，车门迅速关上，汽车绝尘而去。随后，汽车一路疾驶，行至极司菲尔路 76 号，此时，王天木已经回天无力，眼前就是著名的汪伪 76 号，看来，他王天木要受一番皮肉之苦，甚至可能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

然而，被绑进极司菲尔路 76 号后，王天木不仅没有受到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反而被李士群当作上宾，好生招待。每天，汪伪 76 号都给王天木送来好烟好酒和好菜，如果不是王天木失去自由，王天木倒觉得，汪伪 76 号对自己的款待，就像在招待汪伪政府的大人物，而自己在汪伪 76 号里的生活，除了不能走出去，其他的，都像是在度假。

王天木怎么也想不到，就这样被优待了好几天之后，李士群就客客气气地释放了自己。李士群除了送王天木出门的时候，说了一句：跟着戴笠有什么好的，戴笠心狠手辣，黑白不分，你立了功，也是他戴笠的功劳，你出了事，全是你自己的责任。此外，李士群什么也没说，连审讯都没有审讯王天木。

然而，走出汪伪 76 号后，迎接王天木的，却是戴笠无尽的猜疑。

虽然王天木在汪伪 76 号的那段时间，并没有向汪伪 76 号投诚，也什么情报都没泄露，但是他安然无恙地走出了汪伪 76 号，还是让戴笠疑心重重，不敢确定王天木是否叛变。为了确保军统组织的安全，戴笠暗中派人监视王天木，并且下令监视王天木的军统特务，一旦发现王天木有可疑行径，不必上报，可迅速将其除掉。

就这样，戴笠派出监视王天木的军统特务，对王天木进行了两次暗杀，王天木在先后躲过了两次暗杀后，终于从这两次险境中发现了一些端倪，明白是戴笠派出特务对自己下的毒手。

王天木悲愤交加，从自己立功却不受嘉奖开始，到如今发现戴笠

决心要除掉自己，如今的王天木，无论如何也无法再原谅戴笠对自己的怀疑和心狠手辣，王天木心中又是难过又是气愤，他甚至觉得李士群说得真对，跟着戴笠有什么好，得了功劳是戴笠的，犯了错误就得他王天木自己扛着，有谁知道他王天木为抗日为锄奸做了多少事情，他对戴笠忠心耿耿，换来的却是戴笠的怀疑甚至暗杀，因此，对戴笠死了心的王天木，决定去找李士群谈谈，加入汪伪 76 号，和戴笠，乃至军统局彻底决裂。

王天木找到李士群后，提出要加入汪伪 76 号，这令李士群开心不已，因为王天木的手中，不仅掌握着军统局在上海的全部情报和资料，还掌握军统局在天津、北平的许多情报和资料。有了王天木这个“军统万事通”，李士群再也不愁汪伪 76 号扳不倒军统局。

事实证明，李士群的离间计非常成功，王天木在加入汪伪 76 号后，为汪伪 76 号提供了大量的有关军统局的情报，根据这些情报，汪伪 76 号彻底击垮了军统局上海区。王天木的叛变，给军统局带来的灾难是不可估量的，军统在上海的势力几乎被连根拔起，在天津、北平和青岛等地的势力均遭到了严重的损害，军统因此元气大伤。

汪伪 76 号诱降军统特派员罗梦芴

1939 年秋，为了改变军统上海区接二连三地被汪伪 76 号挫败的惨淡局面，戴笠派军统老牌特工罗梦芴前往上海主持军统上海区的特工工作。

然而，罗梦芴还没从南京出发，他的行踪就已经被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掌握，于是，汪伪 76 号开始筹划一场针对罗梦芴的诱降计划。

军统局的老牌特务，已经叛变投敌的万里浪，对军统的老同事罗梦芴相对比较了解，他告知李士群，罗梦芴是贵州人，国民党中央军校第六期毕业生，毕业后就加入了国民党军统局，是一名经验丰富、屡战屡胜的老牌军统特工，同时也是南京警察厅特务股的特务督察，手中掌握着大量的特工资料。因此，如果能诱降此人，将此人吸纳到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中，那么汪伪 76 号就能将军统在南京的势力连根拔起，将军统局南京站彻底击溃。

于是，李士群就决定诱降罗梦芴，并且他认为，此事由万里浪负责最为合适。因为万里浪和罗梦芴曾经是同事，他们素有旧交，所以罗梦芴对万里浪不会有太多的提防，而且万里浪对罗梦芴的弱点相对也比较了解，更容易针对罗梦芴的弱点将其劝降。于是，万里浪又一次被授予了诱降旧同僚登上汪伪 76 号贼船的“光荣使命”。

万里浪接受任务后，开始调查罗梦芴抵达上海的时间，然而，尽管罗梦芴作为特派员即将来上海工作的情报早已确凿，但罗梦芴何时抵达上海，抵达后会去哪儿落脚，却始终无从知晓。万里浪心急如焚，可又不得不耐心等待，直到汪伪 76 号的特务打听到了罗梦芴抵达上海的时间和在上海的落脚之处后，万里浪才开始行动。万里浪故技重施，还是先找人代自己去拜访了罗梦芴一次，不过这一次，他没有请人带话，说自己想回归军统局，而是直接请人带话，说希望罗梦芴能抽空和他见个面。

罗梦芴见到万里浪派来的传话人，听了来人转述的万里浪的见面的邀请后，犹豫了片刻。罗梦芴早已确知，万里浪已经叛变军统，成为汪伪 76 号的一名汉奸，然而，罗梦芴却相信，自己还是能够劝说万里浪弃恶从善、浪子回头的。罗梦芴坚信，即使自己不能劝说万里浪回归军统，凭借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也能从万里浪的口中撬出一些关于汪伪 76 号的情报。斟酌再三，罗梦芴决定和万里浪见面，并通过万里浪派来的传话人，转告了万里浪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话说这一天，罗梦芴和万里浪见了面，二人见面后，交谈甚欢，丝毫看不出两人之间的敌对关系。在交谈中，万里浪故意提到了马啸天，说他们二人现在在汪伪 76 号，备受煎熬，很想念当初在军统局里快意恩仇的日子。罗梦芴听了万里浪的感叹后，觉得有希望将万里浪拉回军统，而且据万里浪所言，马啸天似乎也有回归军统的念头。

当年，马啸天在军统局的时候，和罗梦芴相交甚厚，二人既是同事又是好友，所以，听万里浪说马啸天有意回归军统后，罗梦芴大喜过望，不仅想将万里浪拉回军统，而且想将昔日好友马啸天也拉回军统。即便他们二人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再回到军统，罗梦芴也自信能劝说此二人作为“鼯鼠”，成为军统局安插在汪伪 76 号内的双面间谍，

能重新为军统局服务，暗中传送汪伪 76 号的情报给军统。

基于这些考虑，罗梦芴向万里浪提出，希望能够和马啸天见一面。

万里浪听到罗梦芴的要求后，佯装沉思，罗梦芴见万里浪如此犹豫，心生疑虑，便问万里浪：难道，和马啸天见面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万里浪听后，微微一笑，说：想见马啸天并不难，只是究竟用什么方式约马啸天出来见面，才能够不引起李士群的怀疑，万一他们三人聚在一起，被汪伪 76 号的特务发觉，那么后果就严重了。

听了万里浪的解释，罗梦芴如释重负，他认定万里浪是真心为他所想，真心想回归军统，于是万里浪走后，罗梦芴就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万里浪的好消息。

没过几天，万里浪就派人传话给罗梦芴，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又过了几天，一个清晨，万里浪和马啸天一起来见罗梦芴了，他们和罗梦芴相约，在上海静安寺路的一个酒馆见面。

罗梦芴对于此行信心十足，他沉浸在成功劝说万里浪和马啸天回归军统局的美好幻想中，根本没有想到，这两个昔日的同事会暗中派人守候在约见地点，伺机抓捕自己。

话说万里浪和马啸天，身为汪伪 76 号的汉奸，他们深知自己恶贯满盈，所以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他们带了一支特务小队。这支特务小队担负着双重任务，首先，是保护万里浪和马啸天的人身安全，暗中守护在万里浪和马啸天与罗梦芴见面的酒馆里，一旦出现什么意外，第一时间将罗梦芴击毙；其次，是伺机抓捕罗梦芴，将其绑架回汪伪 76 号。

万里浪和马啸天在约定的酒馆门口见到了罗梦芴，他们担心罗梦芴提前在酒馆里安排了军统局的特工，便由万里浪劝说罗梦芴更换谈话地点。于是，一见到罗梦芴，万里浪就说这家酒馆的点心不好吃，他知道一家酒馆，不仅小菜好吃，而且点心的味道也是一绝，这家酒馆离这里也很近，就在斜对面，所以大家不妨到那家酒馆去落座。

罗梦芴急于劝说万里浪和马啸天回归军统局，所以也没多想，同意了万里浪的建议，于是三人步行到万里浪说的酒馆。落座后，三人

一边吃着点心，一边聊天，寒暄许久，都没有触及正题。

这家酒馆的饭菜味道虽然不错，但来吃饭的人也非常多，酒馆的布局又不是很好，隔音效果很差，店里人声鼎沸，所以想要说些私密的话，很是不便。

万里浪趁机又一次提议，不如到马啸天的家中深入交谈吧。

当时，罗梦芑已差不多酒足饭饱，对此二人的戒备之心也早就消除，于是他当即同意了万里浪的提议。

三人相携走出酒楼，上了万里浪的汽车。

在车上，罗梦芑侃侃而谈，待到汽车驶入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后，罗梦芑才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原来，万里浪和马啸天二人早就设置好陷阱，就等着自己往里跳呢。

罗梦芑虽然明白自己中了万里浪二人的阴谋，但已羊入虎口，想要从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逃出去，是万万不可能的事情了。

万里浪故技重施，下车后，将罗梦芑请进会客室，随后叫人泡了三杯咖啡，在秘书将咖啡送到屋子里后，万里浪和马啸天先是假惺惺地向罗梦芑道歉，紧接着，又开始劝说罗梦芑与汪伪 76 号合作。

罗梦芑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不如先答应此二人的合作要求，再图逃脱汪伪 76 号这一魔窟。于是，罗梦芑先是佯装愤怒，继而表现出无奈，最后同意与汪伪 76 号合作。

对于罗梦芑的转变，万里良和马啸天感到非常满意，于是，他们不再遮遮掩掩，将他们的目的全盘托出，希望罗梦芑加入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

罗梦芑心里暗叹，自己原本想将万里浪和马啸天二人拉回军统局，为己所用，现在倒好，偷鸡不成蚀把米，自己反倒成了被人拉拢的人。罗梦芑素知汪伪 76 号的做派，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要求，自己怕是别想活着走出汪伪 76 号的大门。

最后，罗梦芑权衡再三，决定投降，他干脆地表示，他愿意加入汪伪 76 号，再度与万里浪和马啸天一起工作。

万里浪劝降了罗梦芑后，非常高兴，立即带他去见丁默邨和李士群二人。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罗梦芑在见到李士群后，主动提供了

军统在上海的有关工作的情报，和可以策反的其他现任军统官员和特工的名单。

当天下午，李士群就任命罗梦芑为汪伪 76 号的顾问，让万里浪为罗梦芑办理了加入汪伪 76 号特务组织的手续及出入卡等。

1940 年 3 月，汪精卫组建伪政府后，罗梦芑不仅在汪伪 76 号担任职务，还担任了汪伪警政部保安司科长一职，由于其表现出色，很快升任为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第一处副处长和汪伪警政部长。

升职后的罗梦芑为虎作伥，变本加厉地加害曾经的军统同僚，协助汪伪 76 号逮捕了许多昔日的军统同事。

因为罗梦芑表现“出色”，汪伪政府先后升任他为调查统计部第三厅副厅长、闽浙皖赣四省边区行营参谋长和浙东行政督察专员等职务。

罗梦芑在汪伪政府金钱和权力的诱惑下，迷失了自我，他的心中只剩下权势和财富，再没有一点民族良知，昔日的同事之情，在他眼中也只是他升职的工具而已，出卖昔日同事，成了他后期最主要的工作。

这一时期，和罗梦芑一样被汪伪 76 号逮捕，叛投加入汪伪 76 号的军统特工人数量较多，比如军统华北区青岛站站长傅胜兰，他本该与汪伪汉奸血战到底，可事实上，他被汪伪 76 号抓捕后不久，就投入了汪伪 76 号的怀抱。以至于军统青岛站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戴笠辛苦多年培植起来的军统局华北区元气大伤。

第五节 高陶事件始末

1939 年底，汪精卫集团、北平的王克敏傀儡政府、南京的梁鸿志伪国民维新政府，三个日军的傀儡政府为组建全国性的国民政府一事，定于 1940 年 1 月，聚集到青岛进行会谈。军统间谍得知此事后，立刻发密报给重庆军统局，戴笠收到密报后，认定此事事关重大，不敢擅自处理，便迅速将密电呈交蒋介石。

蒋介石看过密电，皱起了眉头，他决不允许第二个国民政府出现，于是他命令戴笠，派出军统特工，利用汪精卫等人在青岛主持会议的机会，将汪精卫、王克敏和梁鸿志等巨奸击毙，以阻止伪国民政府的成立。

为了确保百分百地成功阻止伪国民政府的成立，蒋介石还命戴笠派人策动汪精卫集团重要人物高宗武和陶希圣出走，揭露汪精卫一行人卖国投日的真面目。戴笠派出军统特务策动高宗武和陶希圣出走，促成了著名的“高陶事件”。

谁是高宗武？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高宗武和陶希圣这两个人，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令蒋介石如此重视？

高宗武是浙江乐清人，早年留学日本，抗日战争前期在国民党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一职，是当时国民政府中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专门负责对日本的外交工作。

1932年，27岁的高宗武在国民政府创办的报纸《外交评论》上发表文章，并被该杂志聘为该报的特约撰稿人。在《外交评论》的创刊号上，高宗武以一篇名为《最近日本之总观察》的文章，将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的经济、外交、社会和政治四个方面全面地总结了一番，为国人打开了一扇了解日本的窗户。这篇文章一经发表，好评如潮，随后，高宗武一发不可收拾，在《外交评论》上连续发表了14篇文章，每一篇文章讲述的都是日本问题，因此，当时，高宗武被公认为“日本通”。

高宗武在《外交评论》上的出色表现，引起蒋介石的注意，1932年11月，蒋介石特聘高宗武为国防设计委员会专员，请他针对日本局势，提出当时我国国防需要注意的事项。从那天开始，高宗武就从一个众人眼里的“日本通”，一跃成为上流社会的名流之一，面对自身社会地位的巨大变化，高宗武的自信心急剧膨胀，甚至自诩“天老大，我老二”。

1934年5月，29岁的高宗武调任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一

年后，也就是1935年5月，高宗武升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此时的高宗武，刚满30岁，年轻气盛，也年轻有为，被蒋介石等国民党的重要领导人器重并着力培养。

年轻气盛的高宗武，面对接二连三的升迁，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起来，他在处理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时，曾口出狂言，对周围的人这样表示，虽然他是亚洲司司长，有义务处理日本政府提出的有关取缔排日政策的要求和降低对日关税等问题的相关事务，但他对这些事情其实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志不在此，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他高宗武根本就看不上，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将中日关系从针锋相对转变成友好相处。当然，高宗武的志愿显然只是他一厢情愿，在当时根本无法实现。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高宗武再次提出了自己的愿望，他认为，这是一个好机会，他终于可以趁此机会，实现自己的志愿。

1937年7月31日中午，当蒋介石将高宗武叫进办公室，询问他关于中日形势的看法时，高宗武侃侃而谈，主动向蒋介石请缨，要求蒋介石派自己去与日本军方交涉，他相信，凭自己对中日两国局势的深入理解和分析，可以说服当时的日本首相近卫文麿，让日本从中国战场上全面撤退。当天，蒋介石第一次发现，高宗武略微有些幼稚，然而，面对这个意气风发、满腔热忱的年轻人，蒋介石并没有打击他的信心。

当天晚上，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紧急召见了高宗武，并与高宗武秉烛长谈，对他的想法表示大力支持。

受到汪精卫的鼓舞后，高宗武便找到了国民政府南京事务所所长，请他帮忙联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然而，他的请求并没有得到南京事务所所长的重视，也可能是南京事务所所长联系了日本军方，但是没有得到日本军方的重视。总之，高宗武没有得到日本军方的回复。

战火很快就烧到了上海，南京国民党政府承受着史无前例的压力，日军嚣张至极，日军的飞机频繁空袭南京。

高宗武和国民党内部的部分悲观分子忧心忡忡地聚集在一处坚固的地下室里，商讨着投降的事宜，他们认为中日战争已经没必要继续

下去了，中国必败。

于是，这群懦弱的胆小鬼们，极力主张在中日战争未分胜负之时，用和平谈判的外交方式来结束这场可怕的战争。这些官员的想法与汪精卫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这些官员推举对日本的了解相对比较通透的高宗武为头目，为和平谈判之事，与汪精卫多次会面。高宗武认为，实现自己愿望的时候到了，于是他主动向汪精卫提出，自己要前往上海，与日本驻华大使商讨停战一事。

汪精卫大力支持高宗武前往上海，面见日本驻华大使，商讨中日停战一事，并且，汪精卫还将高宗武主张的对日外交的步骤和计划亲笔写了出来，亲自呈交蒋介石，希望蒋介石能支持他们的计划。

然而蒋介石却并不认为汪精卫和高宗武的计划可行，他不认为日本政府会轻易地放过中国这块到嘴的“肥肉”，与其停战不如抗战，于是，蒋介石回复汪精卫，此事时机未到。蒋介石的阻挠，让踌躇满志的高宗武十分沮丧，暂时打消了面见日本驻华大使的念头。

1937年11月，南京沦为危城，高宗武离开南京来到武汉。就在抵达武汉后，高宗武擅自做主，非常大胆地做了一次尝试。高宗武在没有告知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情况下，私自派遣外交部亚洲司第一科科长秘密前往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试图通过商谈，促使日本放弃对华的侵略战争，但这一次，高宗武并没有实现自己的“和平”愿望。

1938年1月，日本发表了一个声明，该声明彻底断绝了高宗武关于通过中日之间的和平谈判达到停战目的的念头。

该声明的内容为：

日本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日本和国民政府之间没有任何商议的余地，日本将要一直打下去，打到国民政府崩溃为止。

日军因为在中国战场上的节节胜利而变得狂妄自大，日本政府气焰嚣张地发表了这个声明。日本发表该声明的当天，国民政府就召回了中国驻日本大使，和日本彻底断绝了外交往来。

国民政府与日本断绝了外交关系，这意味着高宗武这位“日本通”就要赋闲在家了。习惯了在官场上呼风唤雨的高宗武，无法忍受如日中天的自己，一下子从权势的风口浪尖上，跌落到权力的谷底，高宗武家，也从门庭若市一下子变成了门可罗雀，这让高宗武大感英雄无用武之地。于是，高宗武找到周佛海，商议如何才能打开中国与日本的谈判之门。

周佛海也是胆小鬼，他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景也不抱胜利的希望，高宗武的想法，正好符合他的心意，因此，周佛海借机向蒋介石进言，说如果将高宗武留在武汉，等于浪费人才，不如把他派到香港，让他收集有关日本的情报，这样才能发挥他的价值。蒋介石没有想到，周佛海之所以向他提出调任高宗武到香港任职，是为了便于高宗武与日本军方展开联络，他还以为，周佛海是真心为国民政府考虑，所以蒋介石认为周佛海的建议可行，便立刻认可了周佛海的意见，还特意从国民政府的军费中拨出每月 6000 元港币的保密费，划给高宗武，作为其在香港的活动经费。

于是，高宗武得到了一张军用出差证明书，于 1938 年 2 月 22 日，离开武汉前往香港。

高宗武违背蒋介石命令私会日本人

高宗武抵达香港后，为了掩饰自己的身份和行动的目的，在香港开了一家洋行作为掩护。稍作布置后，高宗武就秘密前往上海。到达上海后，高宗武和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取得了联系。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在日本军界和政治界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被看作是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智囊之一，所以，中国情报界也没有将此人看作一名商人，而是把他当作了近卫文麿的私人驻华代表，因此，高宗武意欲与日本军方和谈，首先就找到了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松本重治。

高宗武见到松本重治后，就急切地向松本重治询问，日本内阁发表的声明，会坚持执行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更改的可能，怎样才能让日本政府将这份声明撤销或更改。松本重治明确地告诉高宗武，日本

内阁发表的这份声明是不可能更改的！当时，日本已经占领了南京，日本政府狂妄地认为，占领中国指日可待，所以根本不愿意与中国政府和谈，于是，松本重治劝高宗武断了和谈的念头。

高宗武和松本重治见面后，颇感失落，就在他几近万念俱灰之际，他的下属董道宁从日本回来了，董道宁给高宗武带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高宗武的手下董道宁，也是中国人，但在日本长大，因此，他经常以“日华人”的身份自居，是彻彻底底的“亲日派”。在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对峙之际，高宗武授意“日华人”董道宁联络日本特务机关，寻找中日和谈的机会，于是，董道宁找到了日本驻华特务机关日本特高课，并且在日本特高课的帮助下，去了趟日本。董道宁的日本之行，收获颇丰。董道宁到日本后，通过日本特高课的关系，很快与时任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长的影佐祯昭取得了联系。影佐祯昭得知董道宁的来意后，表示日本军方愿意尝试和谈，并立刻写了两封语焉不详却又措辞暧昧的信，托董道宁带回中国，带给自己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时，认识的老同学，国民党上将何应钦和国民党元老张群，请他们一起努力，积极筹措改善日本政府和国民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

董道宁从日本回国后，将影佐祯昭的态度转告给高宗武，并将影佐祯昭的两封信也一并交给了高宗武，高宗武听了董道宁的转述并拿到两封信后，大喜过望。

1938年3月28日，高宗武迫不及待地从小香港飞回武汉，将影佐祯昭的信交给了蒋介石，请求蒋介石派自己前往日本，与日本军方和谈。

没过几天，蒋介石就吩咐高宗武回香港与日军代表商谈。

高宗武回到香港，约见了日本特高课驻香港的代表，转述了蒋介石的意见。

高宗武是这样转述的：

看到影佐祯昭中将的信件后，蒋委员长颇为感慨，作为日本军人，影佐祯昭中将此番来信，无异于将日军将领的性命交付到了他蒋某人的手中，蒋委员长感受到了影佐祯昭中

蒋的诚意，并对他的举动感到钦佩。

日本占领的中国的东北和内蒙古地区，可以日后再商议如何处理，但是河北、察哈尔等地，必须要归还中国。

日本必须尊重长城以南中国领土的完整的原则。

希望双方能互相谅解，先行停战，以上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谈判。

日军代表在和高宗武的和谈中，对高宗武转述蒋介石的上述话语表示了怀疑，但是，日军代表未敢耽搁，迅速将高宗武的话转告给了日本东京参谋本部，但日本东京参谋本部却认为，日军无往而不利，没必要和国民政府和谈。因此，还是没有给高宗武任何答复。

迟迟得不到日本政府的答复，一直以来顺风顺水、高高在上的高宗武陷入了困境。高宗武不相信自己就此赋闲，再无用武之地，于是，桀骜不驯的高宗武决定联合汪精卫，一起努力，共同促成与日本政府的和谈。

1938年6月，高宗武私自与日本特高课达成了一项危险的合作：共同推举汪精卫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与日本政府沟通的代言人。

随后，汪精卫在报纸上发表了意欲与日本“和平”相处的通电。

1938年7月，日本政府告知高宗武，日军不想和蒋介石和谈，他们决心打下去，直到蒋介石下野，汪精卫当政。高宗武于是迅速转投汪精卫阵营，告知汪精卫日本军方的打算，并希望汪精卫出马，依靠日本人的支持，从国民政府中走出来，成立一个独立的政党。

也可以说，汪精卫走上叛国投敌的道路，有高宗武的一部分“功劳”。

当然，高宗武的所作所为，并没有逃过蒋介石的眼线，在得知高宗武如此行事后，蒋介石盛怒不已，当时，蒋介石在日记上这样写道：“倭国对我变更态度，强硬威吓，其果误认为吾内部已动摇乎？其实，与高宗武之荒谬赴倭有关。今观其报告，其误事果不浅也。”（摘自华文出版社2009年出版《档案春秋》之《当年那些人》第一版）

然而，就是这个将汪精卫领上汉奸不归路的高宗武，却在汪伪政权开场前夕，毅然决然不顾个人安危，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真面目暴露在了全国民众的面前。

高宗武的行为貌似前后不一，但是大体来讲，他还是一个爱国的国民党军官，以至于后来，在他公开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的真面目之后，国民政府取消了对他的汉奸通缉令。

高宗武在经过此番大起大落后，桀骜不羁的个性已经消磨殆尽，对政治也失去了兴趣，他最终离开了政坛，远赴美国，从此从公众的视线里消失。

陶希圣其人其事

高陶事件，揭露了汪伪政府的汉奸本质，正因为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的揭露，使得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时，未能获得预计的支持，以至于汪精卫的南京伪国民政府的成立，就像是几个跳梁小丑在戏台子上表演一样，让人心生厌恶。

陶希圣和高宗武一起，揭露了汪精卫叛国投敌真面目，那么，陶希圣又是谁呢？

陶希圣出生于1899年，名汇曾，字希圣，笔名方俊峰。陶希圣是当时的社会经济史大师，还曾担任过蒋介石的秘书和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那么，这样一个有学识有见地的国民党官员，怎么会和汪伪政府纠缠在一起呢？后来，陶希圣又为什么下定决心，揭露汪精卫叛国的真相呢？且听笔者慢慢道来。

1922年，陶希圣从北大法学专业毕业，当时，在中国文化界，社会辩证唯物论盛行，一部分学者开始试图从经济角度探讨中国未来的发展，因此，一场文人、学者之间的论战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而这场论战的发起者，就是陶希圣。

1922年，陶希圣在上海《新生命月刊》上发表了文章《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这篇文章引发了许多学者和学生的热烈响应，也引起了大众的争论。

这篇文章引起的争论，聚焦为以下三个论点：

第一个论点，认为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

第二个论点，认为中国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

而陶希圣则坚持第三个论点，他认为中国的封建制度虽然已经衰竭，但是封建势力依然存在，目前中国最大的两个阶层是士大夫和农民。

当时，许多人都肯定陶希圣的观点。

正是因为这场争论，陶希圣走进了蒋介石的视野之中。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许多人的命运由此改变，陶希圣也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这场战争，陶希圣也许会一直在名校里当教授，但这场战争，却让身为学者的陶希圣变成了一名政客。

1937年夏，蒋介石和汪精卫在芦山召开“牯岭茶话会”，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探讨如何阻止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这次大会邀请了许多全国各界的名人，陶希圣也被邀请而来。正是这次大会，让陶希圣脱颖而出，从学界踏入了政界。

陶希圣在此次大会上的突出表现，让蒋介石对陶希圣青睐有加，于是，大会结束后，陶希圣被国民政府留用，安排在委员长侍从第五组，随后，又被提升为国民政府参议员。

抗日战争初期，陶希圣的确是怀着一颗热血之心，为了国家的主权独立而四处奔走，虽然陶希圣优柔寡断，但从事国际宣传工作却好不惜力。

然而，1938年，在上海、南京、武汉相继失守后，陶希圣陷入了悲观的情绪当中，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前景忧心忡忡，也正是在这种悲观的影响下，陶希圣加入了由一群对抗战不抱任何希望的国民党官员组成的“低调俱乐部”，就是在这一时期，他和蒋介石的关系慢慢疏远，和汪精卫越走越近。

1937年，陶希圣追随汪精卫，积极策划所谓的“和平运动”。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从昆明逃至越南河内之时，陶希圣还坚定不移地支持汪精卫。

在汪精卫逃亡河内期间，蒋介石命令戴笠派军统成员远赴河内暗杀汪精卫，但并没有成功。此事被陶希圣拿来大做文章，撰写了一篇

名为《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执政者》的文章，在香港的《南华日报》上发表。在《为河内暴乱事件质问重庆执政者》一文中，陶希圣竭力将汪精卫描写成一位忧国忧民，为了国家、为了人民鞠躬尽瘁的爱国将领，并声称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完全是为了保住国家的命脉，让民族可以延续，汪精卫先生主张和平的做法没有任何过错。

1939年5月，汪精卫回到上海后，在上海大力推行“和平运动”，然而，许多跟随汪精卫的原国民党军官却发现，汪精卫所谓的“和平运动”，根本不像他说的那样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而发起的，而是以出卖国家主权苟延残喘罢了，于是，很多追随者不再支持汪精卫的做法，纷纷离开。此时，陶希圣虽然也察觉到汪精卫的做法十分不妥，但他和汪精卫交情甚厚，加之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一再劝说，陶希圣才按捺下自己的疑虑，继续为汪精卫所谓的“和平运动”工作。

高陶事件

1939年11月1日，汪精卫和周佛海与陶希圣、高宗武等人，与日本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影佐祯昭等人商谈，通过此次商谈，双方订立了《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正是这份《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让高宗武和陶希圣看清了日本政府的野心，也让此二人对汪精卫等人在此次商谈中毫无底线的退让感到了无比的失望和不满。当时，在发觉了日本政府想要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后，陶希圣和高宗武劝说汪精卫不要签字，也不能再与日本人继续谈判，然而此时的汪精卫，已经完全被日本政府控制，他就像木偶一样，任由日本人摆布。而且，当时的汪精卫，对高宗武和陶希圣的劝诫颇感不满。

眼看原本的“救国”梦想，变成了当下的“卖国”之举，陶希圣和高宗武死的心都有了，他们已经对汪精卫彻底失望了，也不愿再与汪精卫同流合污。

1939年12月30日，汪精卫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陶希圣和高宗武无奈，他们无法阻止汪精卫签订此条约，于是二人谎称生病，拒绝参加这场卖国条约的签订仪式。高宗武和陶希圣的反常举动，引起了汪精卫的怀疑，心狠手辣的汪精卫派出自己的犬

牙——汪伪 76 号的特务将高宗武和陶希圣监视了起来，并且叮嘱李士群，一旦发现此二人有叛逃的迹象，便当即除杀。

当高宗武和陶希圣二人发现，自己已经被汪伪 76 号的特务跟踪，便知道汪精卫已经对自己起了疑心，于是，1940 年 1 月 2 日，高宗武去看望了陶希圣，二人一起商议，决定不再含泪饮毒酒，一起秘密逃离上海，脱离汪精卫集团，坚决不再做卖国投敌的国家罪人。

于是，高宗武和陶希圣与蒋介石取得了联系，获得了军统局的协助。

当时，戴笠在接到蒋介石关于协助高宗武和陶希圣逃离上海的命令后，迅速联络了杜月笙，请杜月笙派出门徒，协同军统局的特务，一起完成这项任务。

在军统特务和杜月笙的门徒的帮助下，1940 年 1 月 4 日，陶希圣和高宗武悄悄离开上海，抵达香港，顺利脱离汪伪集团，回到了抗日救国的阵营中来。

1940 年 1 月 22 日，陶希圣和高宗武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揭露了汪精卫卖国投敌的丑恶面目，并将汪精卫等人秘密签署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全文刊登在《大公报》上。

陶希圣和高宗武的这篇文章一经刊出，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全国各界人士，痛斥汪伪集团的汉奸作为。而许多对日本政府抱有幻想的国民党官员，也就此看清了日本政府的狼子野心，丢掉了不切实际的和谈的想法，决心坚定地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

高宗武和陶希圣的这篇文章，虽然没能阻止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成立，但却让全国人民看清了汪伪政府的真面目。汪伪政府这个披着“国民政府”外衣的日本傀儡组织，从此成为所有爱国志士和爱国党派的公敌。

下面，笔者将《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罗列如下，以便读者对高陶事件，以及当时的历史，有更为深入的了解。

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

日、满、华三国应在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之下，作为友好邻邦互相结合，并以形成东洋和平的轴心为共同目标。

为此，决定基本事项如下：

制定以互惠为基础的日、满、华一般提携的原则，特别要制定善邻友好、防共、共同防卫和经济提携的原则。

在华北和蒙疆划定国防上、经济上（特别是有关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的日华紧密结合地区。在蒙疆地方，除上述外，特别为了防共，应取得军事上、政治上的特殊地位。

在长江下游地带，划定日华在经济上的紧密结合地区。

在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上取得特殊地位。

有关具体事项以附件规定的重要项目为根据。

附件：

调整日华新关系重要项目：

第一，关于善邻友好原则的事项。

为了日、满、华三国相互尊重原有的特性，融合一致、相互提携，以确保东洋和平，实现善邻友好起见，应在各方面采取连环互助，促进友好的措施。

中国承认满洲帝国，日本和满洲尊重中国的领土和主权，恢复日、满、华三国的新的外交关系。

日、满、华三国在政治、外交、教育、宣传、贸易等各方面，应废除那些破坏相互之间友谊的措施，消除其原因，并在将来禁绝这种情况。

日、满、华三国的外交，以相互提携为基本原则，在同第三国的关系上，不采取违反这个原则的一切措施。

日、满、华三国应在文化的融合、创造和发展上互相合作。

新中国的政权形式应根据分治合作的原则加以策划。蒙疆规定为紧密防共自治区域。上海、青岛、厦门根据既定方

针，规定为特别行政区域。

日本对新中央政府派遣少数顾问，协助新建设，特别在紧密结合地区或其他特定地区，应在必要的机关内配备顾问。

随着日、满、华友好关系的实现，日本考虑逐步归还租界和撤销治外法权等。

第二，关于共同防卫原则的事项。

日、满、华三国一面共同实行防共，一面在维持共同治安和安宁方面互相合作。

日、满、华三国在各自领域内铲除共产主义分子组织，并在有关防共的情报宣传等方面进行交流合作。

日华共同实行防共。为此，日本在华北和蒙疆的主要地区驻扎必要的军队。

另外，缔结日华防共军事同盟。

第二项规定以外的日本军队，应适应全面的和局部的形势，尽快撤回。但为了保障治安，在华北和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带的日本军队在治安确立以前，应继续驻扎。为了维持共同治安和安宁，在长江沿岸的特定地点、华南沿海的特定岛屿，以及与此有关的地点，驻扎若干舰艇部队；在长江和中国沿海拥有舰艇航行停泊的自由。

中国对于上述日本为协助治安而驻扎的军队，负有在财政上进行协助的义务。

日本对于驻兵地区内的铁路、航空、通讯以及主要港口、水路，一概保留军事上的要求权和监督权。

中国改革、整编警察和军队；在日本军驻扎地区部署军警和建立军事设施，目前限于治安上及国防上所必要的最低限度。日本对中国的军队和警察的建设，以派遣顾问、供给武器等办法予以协助。

第三，关于经济提携原则的事项。

日、满、华三国为了实现连环互助和共同防卫，在产业

经济等方面，根据取长补短、互通有无的原则，以共同互惠为宗旨。

一、日、满、华三国就资源的开发、关税、贸易、航空、交通、通讯、气象、测量等方面，签订必要的协定，以实现上述要旨和以下各项要点。

二、关于资源的开发利用，在华北、蒙疆地区，以寻求日满所缺乏的资源（特别是地下资源）为政策的重点。中国从共同防卫和经济合作的观点出发，提供特殊便利。其他地区，关于特定资源的开发，也从经济合作的观点出发，提供必要的便利。

三、在一般的产业方面，尽量尊重中国方面的事业，日本对此给予必要的援助。帮助改良农业，以有利于中国民生的安定，并设法栽培日本所需要的原料资源。

四、对于中国财政经济政策的确定，日本予以必要的援助。

五、在贸易方面，采用妥当的关税制度和海关制度，一方面发展日、满、华之间的一般通商关系，一方面使日、满、华（特别是华北）之间的物资供应趋于便利、合理。

六、对于中国的交通、通讯、气象和测量的发展，日本提供必要的援助和合作。日华交通方面合作的重点在于：整个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华北的铁路（包括陇海线在内），日华之间和中国沿海的主要海运，长江的水运和华北、长江下游的通讯事业。

七、通过日华合作，建设新上海。

附列项目：

中国应赔偿事变爆发以来日本国民在中国所受的权利和利益上的损失。

第三国在中国的经济活动和权益，由于日、满、华经济合作的加强，当然要受到限制。但是，这种加强的主要范围

是根据国防和国家存在的需要而规定的，并不想不适当地排斥和限制第三国的活动，甚至侵犯它的权益。

（《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摘自吉林文史出版社《汪精卫与陈璧君》1988年第一版）

第六节 那些背叛中统加入汪伪 76 号的特工们

“高陶事件”后，汪伪集团与国民政府彻底决裂，汪精卫授意李士群、丁默邨等人，严厉打击国民政府。于是，国民党军统局、中统局均受到汪伪 76 号特务组织的疯狂打击，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关于军统局与汪伪 76 号的暗战，前面笔者已经介绍了很多，下面，就谈一说中统局与汪伪 76 号的暗战。中统局的一些特工，被汪伪 76 号特务组织抓捕后，不堪严刑拷打，主动投敌，还有一些中统特务，则孤身犯险，冒死与汪伪 76 号的特务周旋。

善变的中统特务胡均鹤

在被汪伪 76 号策反的中统特工中，胡均鹤是最著名的。胡均鹤之所以著名，是因为他游走在中共特科、中统局和汪伪 76 号之间，身份非常特殊，而且极为善变。那么，胡均鹤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胡均鹤 1907 年生人，出生于江苏省吴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在胡均鹤很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就去世了，一家人的生活全靠他的母亲来维持。胡均鹤的母亲一直给人做佣人，辛苦劳作维持一家人的生活，胡均鹤依靠叔叔的资助读完了小学。胡均鹤小学毕业时，刚刚 14 岁，就离开了家乡，孤身一人来到上海打工赚钱，为了养活自己，胡均鹤做过学徒、帮工、纱厂工人，还曾做过小买卖。

1925 年，胡均鹤参加了五卅运动，年轻的胡均鹤在这场运动中，深刻感受到了革命的必要性，于是，他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各项运动，在这些运动中表现出色。1925 年年底，在瞿秋白的弟弟瞿景白和另一位共产党员李强共同推荐下，胡均鹤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中国的第一大党是国民党，中国知识分子和资本家进入政坛的首选就是国民党，而中国共产党势单力薄，只能从基层大众中吸收党员，因此，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党员都是没有太多文化的农民、学徒工和工人，这些人怀着对新生活的梦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因此，完整地读完了小学的胡均鹤，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中也不算鹤立鸡群，是党员中的文化人，因此，他对许多事情的看法相对还比较客观，这就使得胡均鹤在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迅速崭露头角。

1927年，胡均鹤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在莫斯科举行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同时，胡均鹤还以少先队国际中国支部代表的身份参加共产国际六大和少先队国际五大，在这两大会议上，他被选为少先队国际委员。回国后，胡均鹤被派往浙江担任中共特派员。

自1927年以后，胡均鹤的职务就像是乘上了火箭，飞速提升。

1932年，胡均鹤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组织部部长，接着，又担任了共青团中央书记。

可以说，胡均鹤的仕途是非常光明的，但胡均鹤过于“聪明”了，以至于聪明反被聪明误。

1932年秋，胡均鹤在上海被国民党抓捕。

入狱初期，胡均鹤面对国民党的严刑拷打宁折不弯，坚强不屈，坚守机密，并试图自杀殉党，最终未能成功。面对这样一块硬骨头，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徐恩曾感到十分棘手。

当时，堪称中国共产党最危险的叛徒的顾顺章建议，对付这种不怕严刑拷打的中国共产党员，对他们使用酷刑并没有太大作用，要想撬开他们的嘴巴，最好的办法就是攻心。

徐恩曾听取了顾顺章的建议，先伪造了几份共产党的刊物，在这些刊物中，伪造了中国共产党公开声明胡均鹤已叛变，开除胡均鹤中国共产党党籍的文章。

胡均鹤看了这些刊物后，将信将疑，徐恩曾火上浇油，说：“你看看，这就是你誓死也要保护的党，你为它不惜自杀，可它却在你被捕后，就把你当作叛徒开除党籍了。”

接着，徐恩曾又了解到，胡均鹤的妻子已经怀孕，快要生孩子了，于是就以此要挟胡均鹤，对他说：“你就算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你的家人着想吧。据我所知，你的妻子很快就要生孩子了，你忍心让你的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吗？忍心让你的妻子一人含辛茹苦地将你的孩子养大吗？”

最后，胡均鹤相信了徐恩曾伪造的刊物，误以为中国共产党真的开除了他，心理备受打击，加上思念妻子，担心未出生的孩子，最终背叛了中国共产党，投靠国民党中统局。

第一次背叛时，胡均鹤还对中国特科心怀愧疚，然而有了第一次，第二次就简单多了，胡均鹤的第二次背叛，过程非常简单。

1938年，胡均鹤被中统局派往中统局苏沪区任副区长和情报处处长。1938年9月，胡均鹤的同事苏成德主动投向汪伪76号的怀抱，将自己所知道的苏沪区所有人的家庭住址全部供了出来，于是，除了苏沪区区长和会计因外出办公逃过劫难，胡均鹤等中统苏沪区特工均被汪伪76号逮捕。

这一次，胡均鹤没等汪伪76号的特务举起皮鞭，便主动投降，把他所知道的有关中统局的所有情报全盘托出。

因为胡均鹤提供的情报准确无误，而且极具价值，所以胡均鹤很快就受到了汪伪76号特工组织的重用，被李士群任命为汪伪76号南京区副区长兼任情报科科长。

胡均鹤任汪伪76号南京区副区长兼任情报科科长期间，出色地打击了国民党中统局和军统局在南京的行动。

随后，胡均鹤被李士群调回上海汪伪76号特工总部，任特工二处处长，专门负责协助李士群、丁默邨等人对付国民党中统局和军统局的行动。

后来，李士群还特意交给胡均鹤一个重要的工作，让他负责破坏学生运动。因为胡均鹤当年就是靠领导学生运动起家的，所以，他对学生运动的行动特点和缺陷把握得非常清楚，也知道怎样做能让满腔热情的学生们备受打击，放弃学生运动。因此，胡均鹤非常出色地完成了李士群交给自己的破坏学生运动的工作。

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胡均鹤以他出色的工作，赢得了李士群的信赖，李士群越来越重视他，将他视为心腹。

然而，胡均鹤却又一次决心“改变”。

三重间谍胡均鹤

胡均鹤十分清楚，自己成为了汉奸，虽然深受李士群器重，表面上看来风光无限，但终究还是人民的敌人，做汉奸，也不是长久之计。于是，胡均鹤开始一边残害爱国人士，一边为自己寻找后路。

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胡均鹤想到了原中统苏沪区长徐兆麒。

其实，最初投靠汪伪 76 号之时，李士群询问胡均鹤徐兆麒的所在之地，并试图以胡均鹤为“诱饵”，抓捕徐兆麒。虽然，胡均鹤是苏沪区唯一可以和徐兆麒直接联系的中统官员，而且当时他也能够联系上徐兆麒，但是当时，胡均鹤就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他没有按照李士群的意图去诱捕徐兆麒，而是以种种借口，敷衍了李士群。因此，胡均鹤早就给自己留了后路，所以，胡均鹤要想“改变”，徐兆麒正是自己改弦易张可以凭借的一颗绝好棋子。

于是，胡均鹤秘密联系了徐兆麒，他对徐兆麒表示，虽然他已加入汪伪 76 号很久，但自己并未真正叛变，投靠汪伪 76 号，不过是自己迫于无奈的权宜之计，胡均鹤希望徐兆麒能够上报徐恩曾，代自己请求徐恩曾谅解自己，然后将自己作为中统局安插在汪伪 76 号内部的双面间谍，一名中统局的地下工作者，而不是一名汉奸对待。

徐兆麒有感于胡均鹤的救命之恩，自然知恩图报，于是他在中统局局长徐恩曾面前为胡均鹤说了许多好话，终于，徐恩曾认可胡均鹤作为中统局“地下抗战工作者”，继续潜伏在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内部。

但是仅仅取得了国民党中统局的认可，胡均鹤还是觉得不保险，他又想到了他的“老东家”——中国共产党，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不断地发展壮大。中国共产党在加大敌后游击战的力度的同时，还加强了地下工作的力量，培养出许多优秀的特工，并专门成立了一个红色锄奸打狗队，以适应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的需要。胡均鹤很担心，自己会不会成为中国共产党红色锄奸打狗队的锄

奸目标。

虽然胡均鹤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员，但是他没能坚守到底，从中国共产党叛变到国民党，而后来，他胡均鹤又叛变了国民党，成为了汪伪 76 号的汉奸。

对胡均鹤而言，叛变投身国民党，或许还有一线生机，毕竟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同属中国的政党，一直在为抗日而尝试联合。然而，叛变投身汪伪 76 号，却等于自断归路，没有一个党派，会容忍一个卖国投敌的汉奸。

最后，胡均鹤决定，为了将来能够免遭一死，不被共产党的红色锄奸打狗队除掉，再次“投诚”中国共产党。

于是，胡均鹤主动向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者传递信息，希望和中国共产党合作，由他向中国共产党提供汪伪政府和汪伪 76 号的情报，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胡均鹤还特意向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提供了一系列汪伪 76 号的情报，鉴于胡均鹤表现良好，中国共产党决定暂且相信胡均鹤的“投诚”，派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有关负责人与他单线联系。

这一时期，负责和胡均鹤联系的是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潘汉年。潘汉年是老地下党了，常年潜伏在上海领导中共特科上海区的特工工作。

话说胡均鹤后来，的确为中共特科提供了不少真实的情报。后来，潘汉年私下会见李士群，试图策反李士群，当时，胡均鹤负责暗中保护潘汉年的安全。再后来，潘汉年会见汪精卫，也是胡均鹤从中周旋，为之牵线搭桥。

胡均鹤为潘汉年和汪精卫牵线搭桥

在胡均鹤与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负责人之一潘汉年取得联系后，为潘汉年与李士群以及潘汉年与汪精卫的会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当时，潘汉年先后两次被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委派，以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代表的身份，与汪伪 76 号的负责人李士群，以及汪

伪政府的负责人汪精卫进行谈判。

话说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沦陷的前期，潘汉年曾经成功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和上海的大部分爱国人士，从上海向内地或香港转移。在转移过程中，潘汉年亲自负责挑选转移对象、交通工具、转移路线、陪护人员，并负责安排好转移对象到达目的地后的接应人员。在上海大转移过程中，潘汉年对每一件事都要再三确认，事无巨细。正是在潘汉年周密的安排下，中国共产党上海地下党的许多重要人物，全都安然无恙地撤离了上海。正是因为潘汉年在上海大转移中表现出了出色的组织能力，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决定，由他和周恩来、廖承志、刘少文等人，与英美等国建立起真诚的反法西斯战线。

后来，汪伪 76 号为非作歹，卖国求荣，中共中央就决定，委派潘汉年和李士群联系，试图说服李士群带领汪伪 76 号脱离汪伪政府的管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联合抗日。

当时，潘汉年联络李士群时，还颇为担心，一则担心李士群和自己针锋相对，以至于自己的工作无法开展；二则担心李士群加害于自己，派出特务将自己抓进汪伪 76 号。

所以，潘汉年通过胡均鹤联络李士群时，颇为忐忑，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潘汉年担心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潘汉年与李士群取得联系后，李士群居然将潘汉年奉为上宾，而且，李士群对待潘汉年，并不像对待其他军统、中统的高级特务一样，“优待”后予以劝诱，而是悄然优待，秘密联络。而且，为了确保潘汉年的安全，李士群还特意授意胡均鹤，保护潘汉年的安全。这令胡均鹤与潘汉年都颇为诧异。

而且，为了便于潘汉年开展行动，李士群十分周详、十分大方地将苏州的家安排给潘汉年，作为潘汉年在苏州的落脚点居住。

在李士群的保护下，潘汉年居然真的就在李士群在苏州的家里落了脚，于是，李士群在苏州的家，就成了潘汉年和许多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上海和苏州往来时，最安全的落脚之地。

那么，李士群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李士群怀念昔日的同事之情，感恩于当年自己在中共特科时，潘汉年对自己的关心？非也！李士群这么做，并非念及昔日同事之情，他不过是担心自己作恶太多，日后

不得善终而已。当时，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不断壮大，李士群和胡均鹤一样，不过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给自己多留条后路而已。

潘汉年在胡均鹤的联络下，和李士群交流融洽、沟通顺畅，当然，这都是私下里的。随后，在胡均鹤的陪同和保护下，潘汉年又开始联络汪精卫。

潘汉年单纯地认为，汪伪政府和其旗下的特工组织——汪伪 76 号的领头人都是汪精卫，如果能说服汪精卫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抗日，那么这场战争要想取得胜利，就会相对容易一些，而他潘汉年自然也就立了大功一件。潘汉年想得过于简单，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想法不但没有得到实施，相反，他本人却被汪精卫所利用，后来，汪精卫借助潘汉年的力量，不断壮大越来越被全国人民孤立的汪伪政府。

潘汉年或许是太想立功了，关于联络汪精卫的具体步骤，他居然没有事先和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商讨，也没有和中共特科的有关领导人商议，他私自决定，在胡均鹤的引荐下，与汪精卫单独见面。

然而，潘汉年与汪精卫的见面，却并不像潘汉年想象的那样愉快。

首先，潘汉年没有太多劝说汪精卫的机会，因为汪精卫油盐不进，一口认定只有“和平”运动才能救中国，说白了，就是坚持要与日军合作，卖国求荣。

其次，潘汉年在与汪精卫见面的过程中，忐忑不安，一方面，他担心被汪伪政府抓捕；另一方面，他担心汪精卫把自己抓了交给日军。

所以，潘汉年和汪精卫的会面并不成功，然而，此事却并未就此画上句号。

潘汉年会见汪精卫后不久，国民党政府就捕风捉影，在报纸上大肆报道潘汉年在南京秘密会见汪精卫一事，报道写得有声有色，就像报社记者当时在现场一样。

这条新闻让广大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产生了些许的怀疑，也让汪精卫找到了借口，他借助此事大肆宣传汪伪政府得民心顺民意，连中国共产党都有意投入其麾下，借助舆论的力量，不断壮大越来越被全国人民孤立的汪伪政府。

然而此后，潘汉年并没有就此心灰意冷，他还继续努力，试图找

到新的突破口。

这后续的事情，却是在十年后，也就是 1955 年，才被公之于天下。

1955 年，胡均鹤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审讯时，说出了当年的后续事件。

在潘汉年和汪精卫见面后，胡均鹤陪同潘汉年到了上海，随后，潘汉年应李士群的邀请，会见了日本华中派遣军谋略课长都甲大佐。

潘汉年并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他佯装成一位江南的生意人，谎称是日本参谋本部谋略课长影佐祯昭将军的好友，会见了都甲大佐。在这次会见中，潘汉年佯装从一个生意人的视角看新四军，和都甲大佐探讨了中国共产党在苏北根据地的情况。在胡均鹤的协助下，潘汉年从都甲大佐口中套取到不少有用的军事情报。

后来，在潘汉年上海之行结束，准备回淮南根据地的前夕，他又和李士群见了一面，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见面。再后来，为了获取日军情报，为了给新四军筹措急需的药品，潘汉年曾经联系过胡均鹤与李士群，胡均鹤每次都积极帮助潘汉年。

最后，说一说胡均鹤的下场。

虽说胡均鹤叛变，成为了汉奸，但是因为他积极给自己寻找后路，遇到了潘汉年这位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具有一定分量的中共老牌地下工作者，所以，他也算是多多少少为中国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出了一些力，因此，在解放后，审讯胡均鹤时，中国共产党还是对其采取了宽大处理的政策，然而，他曾经背叛国家、背叛党的事实却是改变不了的。

因此，1954 年 9 月，胡均鹤被关押入狱。1983 年，胡均鹤刑满出狱。1993 年，胡均鹤因病去世。

可以说，胡均鹤是一名有觉悟的“汉奸”，在背叛国家之际，总算有所醒悟，有所畏惧，自寻后路，为国家抗战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因此，胡均鹤在受到应有的惩罚的同时，也得到了应有的宽容。

主动背叛中统加入汪伪 76 号的汉奸苏成德

在向汪伪 76 号投诚的中统特工中，有被汪伪 76 号逮捕后，不堪忍受汪伪 76 号的酷刑而投降的；也有禁不住汪伪 76 号的糖衣炮弹的

诱惑而投降的；还有一类人，是主动投靠汪伪 76 号，心甘情愿成为汉奸走狗的。原中国共产党党员，后叛变加入中国国民党中央局的特务苏成德，就是主动投靠汪伪 76 号的叛徒之一。

苏成德，1921 年毕业于济宁中西中学，随后，只身到济南打工。苏成德在济南结识了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地下党负责人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这些人的影响下，苏成德成为一名先进的积极的进步青年，并于 1922 年 9 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共青团。

1925 年初，由于苏成德表现出色，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

苏成德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于 1925 年 4 月底，成功组织了青岛工人罢工游行运动，并通过该运动，迫使日方工厂的厂主，答应了工人们提出的 16 个复工条件。然而，在工人复工后，日本工厂厂主出尔反尔，不但没有履行诺言，还秘密将苏成德逮捕，并在 1925 年 5 月 29 日，对纱厂工人进行了血腥的镇压，制造了震惊全国的“青岛惨案”。“青岛惨案”是近代中国革命史和工人运动史上一起重大的历史事件。

所幸，苏成德并没有在狱中待多久，1925 年秋，苏成德被中国共产党营救出狱。出狱后，苏成德接到中华铁路总工会的派遣，到安徽去主持中国共产党安徽地下党的工作。

1926 年，苏成德被中共特科派往苏联学习。

1929 年，苏成德从苏联学成归来，被安排到中国共产党铁路工作委员会工作。

1931 年，苏成德被派往上海，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调查科工作。然而没多久，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就遭到了国民党情报机关的大肆搜捕和破坏，苏成德懦弱的性格于此时暴露无遗，他没有坚持抵抗，而是主动叛变，只身前往南京，加入了国民党。

随后，苏成德被安排进入国民党中央局。

加入中统局后，苏成德迅速“变脸”，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地下党组织的情报全盘托出。正因为苏成德表现“出色”，中统局一把手徐恩曾不仅给予苏成德非常优厚的待遇，还任命其为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设计委员，专门负责对共产党的活动进行破坏。

苏成德的背叛，致使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南京等地的地下工作遭到严重破坏，仅仅一年时间，苏成德逮捕、杀害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就达数百人之多。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苏成德既然能够为了保命叛变共产党投靠国民党，将屠刀举向他昔日的同事，自然也会为了保命，出卖国民党，投靠汪伪 76 号。

1939 年 7 月，苏成德见国民党在与对日作战中节节败退，就见风使舵，主动脱离中统局，投靠臭名昭著的汉奸组织汪伪 76 号，并被汪伪 76 号任命为 76 号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

狡猾的投机分子苏成德在汪伪 76 号可是个尽职尽责的“好同志”。苏成德毫无遗漏地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国民党中统局的军事机密，以及有关国民党军统局的相关情报，甚至有关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有关情报，统统告知了汪伪 76 号的领导，利用各种手段，将他所知道的国民党中统、军统人员一网打尽。

可以说，汪伪 76 号对国民党军统、中统的暗战最成功的时期，非苏成德担任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时期莫属。苏成德担任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南京区区长时，所抓捕、诱降的国民党军统、中统人员的数目和级别，绝非万里浪、马啸天等人所抓捕、诱降的国民党军统、中统人员可以相比。

后来，在苏成德的抓捕、策反和诱降下，汪伪 76 号南京区的特务队伍不断壮大，其中八九成，都是曾经的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国民党中统南京区和国民党军统南京区的特务，几乎全被苏成德拉拢进汪伪 76 号，其中不乏和万里浪、苏成德一样重要的角色。那么，苏成德究竟是如何掌握国民党中统局和军统局这行踪隐秘的特工的活动情况，从而将他们悉数抓捕的呢？

苏成德能够捕获这些特工，主要依靠两大法宝：

第一，苏成德掌握中统局苏沪区的几乎全部情报。

苏成德本人在国民党中统局任职期间，担任过中统局苏沪区副区长，因此，他对上海、苏州的中统特工的人员构架、联络地点、居住地点都比较熟悉；而且，由于苏成德是中统局苏沪区各项行动的负责

人，所以他手中有国民党苏沪区中统特务的花名册，所以，能把几乎中统局苏沪区的全部特务悉数抓捕，送进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

在抓捕了中统局苏沪区的大部分昔日同事后，苏成德依靠这些人的人脉关系，很快就把京沪线一带的国民党中统成员一网打尽。苏成德几乎不用做任何的调查，仅仅依靠已经抓捕的中统局苏沪区特务们提供的情报，就与李士群、马啸天等人，将京沪线一带的国民党中统成员抓捕殆尽，其中有很多中统的重要干部也被抓进了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如庄鹤、童国忠等人。而这些人，为了保住性命，享受荣华富贵，又将中统局上海区的特务的有关情报告知了汪伪 76 号，使得军统局上海区的特工，除了区长徐兆麒一人逃脱以外，其他人全部落网，被捕特工超过 40 人。就这样，苏成德抓捕的国民党中统特工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被捕的中统特工相互揭发，最后，中统成员几乎被苏成德等人一锅端，全都抓进了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最后，国民党中统局面对其在苏沪地区全军覆灭的态势，只得彻底放弃了苏沪地区。

第二，军统特务、“忠义救国军”成员何柏椿。

苏成德依靠“忠义救国军”的成员何柏椿，抓捕了许多军统局特务。原国民党军统局下属的“忠义救国军”成员何柏椿，原是军统局南京行动队的负责人。何柏椿是青帮头目之一，他的影响力虽然不如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但也是青帮里不容小窥的人物，徒子徒孙遍布南京地区。何柏椿是军统元老，因此军统局下属的“忠义救国军”在南京活动时，由何柏椿负责联络。

当时，“忠义救国军”的有关人员非常信任何柏椿，他们从未想到，何柏椿会陷害他们，然而他们不知道，此时的何柏椿，已经带着自己的青帮弟子，投靠了汪伪 76 号，成为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的特工新贵。

于是，军统局“忠义救国军”的全部人员构成、所有行动情报，都被何柏椿悉数告知他在汪伪 76 号的顶头上司苏成德，苏成德对此非常满意。获悉了“忠义救国军”这批训练有素的情报人员的有关情报，苏成德乐不可支，他向李士群申请了几位汪伪 76 号的老牌特工协助自己，将“忠义救国军”的许多成员抓进了汪伪 76 号，进而把这些

人又变成了自己的手下。

苏成德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他手上的特务越来越多，后来，汪伪 76 号都容不下他了，他上蹿下跳，担任了伪警察总监署总监，还组建了另一个特务组织——“东方国际通讯社”，并组建了一个代号为“成和通运公司”的特务分支，专门进行反共宣传和反共活动。

1944 年，苏成德见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已呈败局，才想到赶紧给自己找条退路，于是，他打算重回中统局。

为了能够让国民党中统局重新接受自己，苏成德迅速在上海成立了一个高举“反共建国”旗号的“建国社”，苏成德如此这般高调地支持国民党，反对中国共产党，令国民党中统局颇为满意，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苏成德自主行动，负责掩护国民党中统特工的一些行动。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 9 月，汪伪政府土崩瓦解，此时的苏成德，没了当年的嚣张，也没了当年的靠山，只能牢牢抱住中统局的大腿。

然而，尽管苏成德高调支持国民党，打击中国共产党，但他作为汉奸，却给国民党中统局、军统局，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国民党哪肯轻易放过苏成德。

1946 年 4 月 9 日，苏成德在上海海格路的家中，被国民党中统局抓捕。

1947 年 8 月 9 日，苏成德被上海高等法院判决汉奸罪，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自此，两面三刀、心狠手辣的汉奸苏成德，走完了他罪恶的一生。

第三章 小叛徒制造大灾难

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后，许多爱国将士在抗日战场上抛头颅洒热血，拼死卫国，然而，却有一些人，经不起敌人的威逼利诱，成为了民族的叛徒。抗日战争期间，不止有正面战场的战斗，还有许多地下战场的暗战。在地下战场的暗战中，不止有之前笔者讲述过的军统局、中统局的老牌特务叛变投敌，还有一些在军统局、中统局不起眼的小人物。并非只有军统局、中统局的老牌特务，才会给军统局和中统局带来巨大的灾难，很多小人物的叛变，同样也给军统局和中统局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第一节 军统特工张北生投敌

张北生在没有投靠汪伪76号特工组织之前，只是军统局众多的小特工之一，既不起眼，又不受重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特工，却在叛投汪伪76号特工组织后，给军统局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让军统局遭受重大的打击。

不甘心只做县长的张北生

张北生出生于江苏南通，他曾经是国民党中央党部干事、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抗日战争期间，张北生被安排到南通县任县长，张北生对这个职位非常不满，他认为这是国民党军统局内部的有关人员

在故意打压他，让他无从表现，更不可能有机会在戴笠面前邀功请赏，以取得更好的职位。

当然，虽然张北生不甘心只做一个小小的县长，但他还是在县长的职位上努力经营了一年的时间，然而却没有任何进展，似乎国民党军统局和他在军统局的旧日同僚，都已经将他忘记了。

张北生在南通县任县长的一年时间里，没有一位军统局的旧日同僚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旧日同僚来看望他，也没有任何消息可以表明他张北生有被提升的希望。显然，努力一年，这样的结果令张北生万分沮丧。

1939年底，张北生终于按捺不住了，他怀揣着对权势的渴望，秘密地从南通来到上海。

张北生来到上海，几乎找不到一个熟识的人，虽说他也曾经在军统局上海区待过几天，但是军统局上海区的新地址、联络暗号，他都不知道，他像没头的苍蝇一样，找不到升迁的方向。

万般无奈之下，张北生想到了自己的一位老乡，他的这位老乡在上海也算小有名气，而且他知道怎么找到这位老乡，可是想要投靠这位老乡，他必须找个理由才行，还得让这位老乡了解到自己的“才华”。那么，张北生的这位老乡究竟是谁呢？为什么张北生要大费周章，去寻找理由，展示“才华”，才能得到这位老乡的提拔？

张北生的这位老乡，就是汪伪76号特工组织的第一杀手吴世宝。

吴世宝当时在上海，是极其有名的穷凶极恶的大汉奸。当时，人们对他的恐惧程度非常严重，甚至到了只要听到他的名字，就默不作声的地步，甚至很多百姓这样吓唬家里淘气的小孩：你要是再不乖乖的，我就把你交给大魔头吴世宝，让他把你吃了。听到这句话，再淘气的孩子也会老老实实地待在家里，不会再乱跑，不会再淘气。在孩子们心中，吴世宝就像个恶魔，长着一双铜铃般大的血红的大眼，一张血盆大口，只要一口，就能将他们吃掉，这样一个恶魔，怎能不让他们害怕呢。

张北生当然是不害怕吴世宝的，他既然有意投靠吴世宝，也就做好了心理准备，既然在军统局得不到重视，那么他就打算走走吴世宝

的门路，二人再怎么说是同乡，吴世宝再怎么坏，也得对家乡人照顾一番吧，毕竟“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张北生可不管什么汉奸不汉奸，只要能得到荣华富贵，他什么都不在乎。

可总不能两手空空地去投靠吴世宝吧，这样即便是吴世宝收留了自己，恐怕也不会重用自己，自己飞黄腾达的愿望依然会落空。这一次，张北生可不想只谋得一点蝇头小利了，他在南通县当县长当够了，这次来上海，他打定主意要干一票大的，让吴世宝和汪伪 76 号对自己刮目相看，青睐有加。

张北生的“投名状”

张北生的运气很不错，虽然他没有找到军统局的大本营，但是他还是联系到了军统局的旧日同僚，虽然依旧不受待见，依旧升迁无望，然而他却在无意间得到了一个消息，那就是军统局的一些重要特工，近几日在法租界某地开会。得到这一消息，张北生如同捡到了宝，他一刻也没耽搁，立刻带着这个消息去找吴世宝。

张北生见到吴世宝后，迅速递交了自己的“投名状”，那就是：军统局上海区的重要领导吴绍澍、马元放、张渊杨等人，近几日在法租界的白菜尼蒙马浪路新民屯 9 号秘密开会，现在去抓人，肯定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吴世宝虽然和这位老乡并不是特别熟稔，但是这个消息却极其重要，得到这个消息后，吴世宝也丝毫不敢耽搁，立刻带着张北生面见李士群和丁默邨二人。见到李士群和丁默邨后，张北生不仅将此消息又一次浓墨重彩地叙述了一番，而且说自己 and 马啸天是故交，以此来提升自己在汪伪 76 号这两位主要领导人心中的地位。

李士群在意的不是张北生这个人，而是张北生提供的消息。于是，李士群当即叫来了马啸天，李士群、马啸天、吴世宝和张北生一起，针对张北生提供的消息，做出了周密的抓捕计划。因为在法租界内开会的军统特工小队的人数比较多，因此，李士群决定，让林之江带着汪伪 76 号的特工和日寇便衣宪兵队，一同前往法租界马浪路新民屯 9

号，前去抓捕这支军统小队。

然而，当林之江带人闯入屋子，准备抓人时，却发现屋内空无一人。

尽管如此，汪伪 76 号却不认为张北生提供的是假消息，因为屋内的地上，满是果皮，房屋中间的桌子上，放着纸笔，还摆着一桌冒着热气尚未动筷的酒席，而门口的衣帽架上，还挂着几顶呢帽和围巾，这一切迹象都表示，这间屋子里原本有很多人，而且正准备开会、吃饭，这些人肯定是仓皇逃走的。

事后，林之江等人反思了很久，认定是门外有放风的人，看到他们这一队人马朝这里奔来，通知屋内的人慌忙逃走的，这才导致林之江等人的抓捕行动失败。

虽然林之江等人的行动失败，没有抓到军统特务小队，但是李士群等人还是因此信任了张北生，还发给了张北生 1000 元的好处费。张北生因此搭上了汪伪 76 号的“贼船”，获得了自由进出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的出入证。

张北生获得了自由出入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的权利后并不满足，他想要成为汪伪 76 号里，像马啸天、汪曼云和吴世宝那样呼风唤雨的人物，而不仅仅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编外人员。所以，张北生极力寻找机会表现自己。

小叛徒叛变，大官员落马

说不清楚张北生是被幸运之神眷顾，还是被正义之神抛弃，总之，他很快又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情报。这次的这个情报，让张北生兴奋极了，他认定只要他将这个情报汇报给李士群，自己就算不能因此获得和马啸天等人平起平坐的职位，也能在汪伪 76 号内锋芒初露了。

得到这个情报后，张北生迅速赶到汪伪 76 号，面见了李士群，将自己得到的情报全盘托出，原来，他的旧日同事，现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主任的马元放、江苏省委委员崔步武和江苏省教育部专员周孝伯等人得知张北生来到上海后，和张北生取得了联系，他们当然并不知道张北生已经心属汪伪，他们以为张北生还在军统局公干，就喊他一起到上海大中华饭店打麻将，并且还让他叫上几个“向导”，准备

在上海玩个痛快，然后再回江苏。

李士群听了张北生带来的情报后，两眼放光，这可是笔大买卖，江苏省党部主任、省委委员以及教育部专员，如果真的能够将这几人抓捕，他李士群也算是大功一件，无论是在日本主子那里，还是在汪精卫那里，都可以邀功请赏了。

于是，李士群立即叫来马啸天，经过商议后，他们决定让张北生先到大中华饭店，和马元放等人一起打麻将，然后由马啸天和汪伪 76 号特工行动大队第三处处长女特务张劲庐，带领汪伪 76 号的一队特工，潜伏在中华饭店伺机行动。

张北生来到大中华饭店后，按照李士群的指示，撺掇马元放等人赶紧开局打麻将，然后趁着大家玩得兴起，张北生借口要找几个“向导”，走出房间，找到了马啸天等人。

然后，张北生带着女特务张劲庐和另外两名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特务回到房间，张北生声称这三人，就是他找来的漂亮、懂事、服务好的“向导”，她们来自福州路妓院。

张劲庐和其他两名女特务进入房间后，莺声燕语、搔首弄姿，让马元放等人心花怒放。在张劲庐等人的怂恿下，马元放等人打完牌后，觉得意犹未尽，就带着三名貌美如花的“向导”到她们推荐的馆子里去大吃大喝了。

这几个醉生梦死的国民党军官怎么也想不到，他们已经落入了汪伪 76 号的陷阱，汪伪 76 号的特工，就在他们吃饭的包厢隔壁的屋子里，秘密地监视着他们。

马元放一行人酒足饭饱，一个个喝得醉醺醺的，回到了大中华饭店的房间里。他们刚进房间，就被守候多时的马啸天和汪伪 76 号第二处行动大队的特务们逮捕了，并且，马啸天将他们连同张北生和三个“向导”，一起抓了起来，带到了位于福州路的公共租界巡捕房中。

为了让这场戏看起来更真实，张北生和马元放一起，坚决否认自己的真实姓名和工作职务。因此，巡捕房以姓名、职务不明，收容了这几个“醉鬼”。

最后，汪伪 76 号的特工请来日本宪兵大队，将马元放等人从公

共租界巡捕房引渡出来，关押到了日本宪兵队驻上海总部。

这时候，马元放还单纯地认为，张北生和他们一样，是国民党的军官，此次被捕，不过是因为他们嫖妓喝酒，引起了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的注意而已。马元放等人根本没有想到，张北生已经投靠了汪伪 76 号，此次抓捕，就是他张北生告密导致的。

后来，汪伪 76 号将马元放等人从日本宪兵队驻上海总部带进了汪伪 76 号，进入汪伪 76 号的时候，马元放还很天真地认为，自己和其他几个人的身份不会泄露。

然而，马元放被李士群带到早已叛变加入汪伪政府的国民党元老周佛海面前，才明白自己要的小伎俩早已被汪伪 76 号看穿。

随后，周佛海和李士群一起劝马元放叛投汪伪 76 号，然而马元放坚决不肯叛投，表示自己宁愿坐牢，也不愿意做汉奸。

李士群不想放弃拉拢这样一位国民党高官的机会，便将马元放暂时关押在汪伪 76 号位于南京区的看守所里。李士群虽然没有放弃将马元放拉到自己阵营的打算，可奈何马元放一直不肯投降，不肯加入汪伪 76 号，如果是其他在国民政府内职位较低的国民党官员，李士群早已经命令汪伪 76 号的特工将他枪决了，然而马元放身份地位较高，而李士群又有自己的私心，他想要给自己留条后路，万一以后日本战败，国民党当政，他至少还有条后路可走，于是，李士群一直将马元放关押在汪伪 76 号的监狱里。

直到 1942 年，与马元放私交深厚的周佛海，在汪精卫面前为马元放求情，才将马元放从汪伪 76 号的监狱里保释了出来，马元放这才离开了关押他三年的汪伪 76 号的监狱。即使这样，马元放依然在汪伪 76 号的监视下，汪伪特工日夜驻守在他的住所门前，不允许他离开南京。直到 1943 年，李士群才放过马元放，允许他离开上海，返回重庆。

而江苏省委委员崔步武、江苏省教育部专员周孝伯、江苏省委委员石顺渊和江苏省省政府参议掌牧民四人，则在被汪伪 76 号从日本宪兵队带进汪伪 76 号不久，就变节投降，加入了汪伪 76 号。并且此四人还在上海接见了新闻记者，在新闻媒体上发表了脱离中国国民党

的声明。

由于掌牧民在国民党任职期间，曾经做过南通专员，对江苏地区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因此李士群将掌牧民派往了江苏，任命他为苏北行营秘书长，协助汪伪 76 号在苏北的特务工作。

石顺渊因为和周佛海是故人，所以主动投降后，在汪伪 76 号没有受到严刑拷打，而是被李士群安排到了四川，担任中央储备银行总务处长。而且，李士群为了表示自己对石顺渊的信任，还很大方地任命石顺渊担任该行电台的总台长，因而石顺渊掌握了一个电台，非常自由。有意思的是，得到电台后，石顺渊的心思开始活络起来，虽然他做了汉奸，但他打心眼里不愿意卖国求荣，他开始琢磨，如何能够麻痹汪伪 76 号的特工，私下里悄悄利用手上的电台，和军统局取得联系。

石顺渊的确按照李士群等人的指示为汪伪 76 号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来，在取得李士群等人的信任后，掌握了电台密码的石顺渊，在每次独自值班时，都利用这个电台和军统局联系。再后来，石顺渊通过这台电台，将汪伪 76 号的行动情报源源不断地报告给军统局。

后来，石顺渊再次取得戴笠的信任，成为了潜伏在汪伪 76 号内部的高级“鼯鼠”，专门负责秘密地向军统局输送汪伪 76 号的重要情报。

军统局凭借石顺渊输送的那些情报，在针对汪伪 76 号的战斗中，还取得了不少的成绩。

第二节 军统试图劝说叛徒回头未果

军统局虽然利用石顺渊输送的情报，在与汪伪 76 号的暗战中取得了不少成绩，但由于一些叛徒的叛变，使得军统和中统损失重大。虽然军统局也多次试图劝说王天木、陈明楚等叛徒回归军统局，但是却屡遭失败。

刘戈青力劝王天木回归军统

笔者在前文叙述过，军统金牌杀手王天木被李士群策反。在王天木投敌后，还曾经给他的好兄弟，同是军统王牌杀手的刘戈青写过一封信，信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

兄于八月十五日被赵理君暗中刺杀，其并未成功。然而经过调查，发现赵理君此举是戴笠下令所为，这让兄感到十分寒心，决定从即日起，脱离军统，成为自由人，希望戈青见此信后，能够尽快来上海和兄见面。

刘戈青接到这封信后，深感此事严重，唯恐王天木叛变，投靠汪伪 76 号，于是刘戈青片刻都不敢耽搁，火速将这封信交给了香港站负责人王新衡，请他将这封信转交给当时还在香港的戴笠。

戴笠拿到这封信后，又气又怒又悔，他认定自己和王天木虽有过节，但是旧情尚在，虽然王天木对自己彻底失望，以至于要脱离军统，甚至可能要去投靠汪伪 76 号，但王天木还是应该心向军统的。

因此，戴笠迅速派出刘戈青和军统老特务吴安，前往上海劝说王天木重新回到军统，并亲笔写下一封书信，要求刘戈青亲自将此信交到王天木的手中。

刘戈青和吴安抵达上海后，很快就和王天木取得了联系。王天木将戴笠的亲笔信亲自交给了王天木，并向王天木转达了戴笠对王天木的关心，劝说王天木回归军统局。即便是王天木不正式回归军统局，也希望他加入汪伪 76 号后，能够凭借他在汪伪 76 号的地位，帮助军统局获得汪伪 76 号的有关情报，成为军统局潜伏在汪伪 76 号内部的双面间谍，以便制裁汪精卫的工作能够成功完成。

然而，王天木看完戴笠的亲笔信，听完刘戈青的话，笑着对刘戈青说，看来自己误解戴老板了，自己之所以投向汪伪 76 号，全都因为赵理君，现在刘老弟亲自来劝说自己，自己一定会认真考虑的。

王天木这样模棱两可的回答，令刘戈青一头雾水，可他又无计可

施，只能等着王天木的准确回复。

很快，王天木便联系刘戈青，将自己给戴笠的回信交给了刘戈青，请他转交给戴笠。

刘戈青没敢私自拆开王天木的回信，他以为，王天木会在回信里，向戴笠保证，他王天木会潜伏在汪伪 76 号内，做好“卧底”的工作。然而，谁也没想到，王天木在回信中写了这样几个字：“违仁背义，男盗女娼。”

那么，戴笠在信中究竟写了什么，而王天木又为什么如此愤慨，这样回复戴笠呢？

戴笠在给王天木的信中这样写道：

余遇君素厚，弟念数年来患难相从，凡事曲予优容，人或为之不平，余则未尝改易颜色，似此无负于汝，而汝何竟至背余事逆耶……

唯念汝现居逆方高位，有机与汪逆接近，正可乘间为我而图之。故特准戈青重履险地，即为我达此意与汝也。若果能出此，则不唯往者不咎，且必能以汝之此项功绩，而邀逾格之重奖也。戴罪图功，此其时矣。望毋负余意！余由戈青代达。……

其实，王天木在看到戴笠的信时，心情还是十分激动的，他觉得戴笠果然还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还是重视自己的。然而，当刘戈青离开后，王天木平静下来，又开始怀疑戴笠的可信度。最终，王天木还是认为，戴笠是说变就变的人，他王天木是根本不可能猜透戴笠的心思的。既然此前戴笠能派人暗杀自己，难保自己回去之后，不会再次遭到戴笠的暗杀。反正自己已经叛变，背上烙上了背叛者的烙印，不如干脆就做个叛徒，何苦像条狗一样，回去向旧主摇尾乞怜。再说了，就算自己有心帮军统，李士群又是好骗的吗？李士群能让自己的如意算盘得逞吗？

因此，王天木打定主意，不再回归军统。

当然，刘戈青是在将王天木的回信交给戴笠后，才知道王天木决意不再回归军统局的。而在王天木将回信交给刘戈青的时候，刘戈青还以为，王天木有心回归军统局，刘戈青断然没有想到，王天木不仅根本不打算回归军统局，还有心策反刘戈青叛变军统，不过王天木在私下里试探了几句之后，知晓刘戈青对军统局忠心不二，也就没有再多言。

后来，刘戈青在上海又待了几天，并且一直催促王天木有所行动，王天木已经下定决心，要坚定地站在汪伪 76 号的队伍里，自然不会听从刘戈青的意见，有所行动，有所表现了。可王天木不愿明言，他将无法立即开展有利于军统的动的责任推到了与他一起叛投汪伪 76 号，时任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第一行动处处长陈明楚的身上，说陈明楚身为处长，一直在监督自己，以至于自己不便行动。

刘戈青是实心眼，听王天木这样说，急忙请王天木将陈明楚邀来。刘戈青要见一见陈明楚，他打算尽己所能，劝说陈明楚也回归军统局。王天木百般推脱，他担心刘戈青和陈明楚见面后，会争执起来，但始终敌不过刘戈青的坚持，不得已，他只能安排陈明楚与刘戈青相见。

陈明楚和刘戈青见面后，并没有出现王天木想象中的刀枪相见的火爆场面，两个人反而非常热络，像是二人依旧在同一单位共事，甚至比刘戈青和王天木见面还要显得更为亲切和熟络。

或许是因为杀手和杀手之间惺惺相惜，陈明楚、王天木和刘戈青之间，并没有因为所服务的对象不同，而相互敌对。三人其实都知道，今日三人在不同的敌对阵营，若日后果真杀场相逢，彼此都希望对方能够念在昔日的情分，对对方手下留情，这，也许就是杀手们独有的生存之道吧。

后来，三人坐到酒桌上开始吃饭喝酒，陈明楚越喝越多，他醉醺醺地对刘戈青表示，自己也是戴笠的学生，怎么可能会背叛戴笠呢。今天他之所以和王大哥走到叛国投敌这一步，完全是被赵理君逼的，其实他们都是人在曹营心在汉。但让他感到心寒的是，重庆方面居然连调查都不调查，就认定他们是汉奸，还把他陈明楚的亲人全部关押

了起来，而且就算是他陈明楚有什么过错，也罪不及家人，他的父母妻子都没有任何罪过，为什么要关押他们呢。

刘戈青听了陈明楚的话，当即表示，这些都是误会，重庆方面并没有关押他的家人，倘若陈明楚不信，他可以将陈明楚的家人全部接到上海，让他们一家团聚，以证明他所说的一切，并不是假话。

刘戈青拉拢陈明楚惨遭失败

刘戈青回到住处，和吴安商量后，决定将他们在上海的工作进展禀报戴笠，并申请将陈明楚的家人带到上海，请他的家人说服陈明楚，让陈明楚在汪伪 76 号做卧底，继续为军统效力。于是，刘戈青就此事发了一封电报给戴笠，戴笠收到刘戈青的电报后，认可了刘戈青的意见，派军统特务朱山猿去了长沙，并吩咐朱山猿一定要将陈明楚的家属接上，送至上海，让他们一家人团聚，以便陈明楚明白事情的真相后，安心在汪伪 76 号内做军统的卧底。

朱山猿奉命来到陈明楚在长沙的家，见到了陈明楚的父母妻子。

朱山猿见到陈明楚的父母妻子后，将陈明楚的状况和对家人的思念讲述一番，并请陈明楚的父亲书信一封，规劝自己的儿子陈明楚回归军统，不再跟着汪伪 76 号做卖国求荣的汉奸。陈明楚的父亲立刻给陈明楚书信一封，并请朱山猿带陈明楚的妹妹陈弟燕去上海见陈明楚。随后，朱山猿带着陈弟燕到了上海，将陈弟燕带到了刘戈青的面前。

刘戈青见到陈弟燕后，大喜过望，立刻通知陈明楚，让他到上海沧州饭店和他的妹妹陈弟燕相见。

陈明楚接到电话后，不相信刘戈青能将他的妹妹接到上海，他认为这是军统想要逮捕自己的一个圈套，于是他非常谨慎地带着一队汪伪 76 号特工来到了沧州饭店，当然，这一队汪伪 76 号特工乔装打扮成饭店食客、街头行人等，埋伏在饭店内部和饭店四周。

踏进沧州饭店，陈明楚一眼就看到了正和刘戈青一起在饭店大厅里等候自己的妹妹陈弟燕。兄妹二人见面，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陈明楚和妹妹陈弟燕，以及刘戈青在包间落座后，陈弟燕便将父亲的亲笔书信拿了出来，交给了哥哥陈明楚。

陈明楚展信阅读，在信中，陈明楚的老父亲怒斥自己的儿子做了汉奸，背信忘义，背弃国家，规劝儿子及时回头，不要成为民族的罪人。陈明楚读完父亲的亲笔信，再也忍不住对亲人的思念，朝向长沙所在的西南方向，泪流满面地跪在地上。陈弟燕看哥哥如此难过，忍不住心头也难过起来，便也跪在地上，抱着哥哥痛哭流涕，一边哭，一边劝，劝哥哥回头是岸，不要再做民族的罪人，国家的罪人了。

陈明楚很想答应妹妹，回归军统，不再做汉奸，但是如今的陈明楚，已经上了汪伪 76 号的贼船，身不由己了，他害怕一旦自己回归军统，就会被汪伪 76 号的特务秘密抓捕，被李士群下令枪决，他更害怕李士群在对自己痛下毒手后，还会伤害自己的家人。然而眼下，面对涕泪横流的妹妹，他只能先口是心非地答应妹妹，自己一定不再做汉奸。

那天，陈明楚非常高兴，他得到家人平安的消息，又看到了妹妹，情绪十分激动，他对刘戈青再三表示了感谢，并表示，一定会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帮助刘戈青，并尽快逃离汪伪 76 号，回归军统。随后，陈明楚就带着妹妹陈弟燕走了。

然而，陈明楚就此一去不回，后来，不管刘戈青怎么试图和陈明楚取得联系，陈明楚都没有再露面，他就像是在人间蒸发了一样，从此再也不见刘戈青。

王天木引荐旧相识，刘戈青暂留上海

刘戈青费尽了心机，却不见王天木和陈明楚有回归军统局的行动，他眼睁睁地看着军统这两大王牌特工走向不归路，内心无比焦虑。不过刘戈青并没有放弃，他决心再努力一段时间，竭尽全力将王天木和陈明楚拉回军统，因此，他决定在上海暂留一段时间。

刘戈青暂留上海，并且开始经常打电话给王天木。

时间一长，王天木开始替自己和刘戈青担心了。他担心的是，经常是同一个男人给自己打电话，一旦汪伪 76 号的其他特务有所察觉，起了疑心，将此事报告给李士群，而李士群万一悄然派人跟踪自己，查出自己一直和刘戈青联系，而刘戈青又是军统局的特务，当年刺杀陈策的凶手，这不止会给刘戈青带来性命之忧，就连他王天木恐怕也

会小命不保。

为此，王天木三番五次劝说刘戈青离开上海，可刘戈青执意暂留上海，无奈之下，王天木决定给刘戈青找个可以掩护他的人。这个人不见得要会打枪会隐蔽，只要有正常的身份，能够经常和刘戈青在一起，能够代替刘戈青给自己打电话，就可以避免单身的刘戈青，引起汪伪 76 号的特务的注意，也可以避免自己被汪伪 76 号的其他特务盯上。这不仅仅是为了刘戈青的生命安全，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安全。

最后，王天木找到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可不是王天木随便从街上拉来的，这个女人名叫陆谛，是一名百货公司的售货员，她和刘戈青曾经有过一段渊源。

按说，一个普通的售货员，和一个杀手应该没有任何交集，但刘戈青和陆谛，偏偏就曾经在上海的一家小舞厅里相遇相识。

陆谛和刘戈青相遇相识的时候，刘戈青和王天木还同在军统局做特工，刘戈青还没有因为刺杀陈箴而被汪伪 76 号通缉。

这一天，二人为了侦察之需，来到一家小舞厅，为了不引人注目，他二人和其他舞客一样，来到舞池中跳舞。就在挑选舞伴的时候，刘戈青注意到，舞厅中有一名衣着朴素面露羞怯的女孩，一点都不像舞女，却站在待选的舞女之列。出于好奇，刘戈青邀请这个女孩一起跳舞。

刘戈青拉着这个女孩的手，来到了舞池中央，可刘戈青刚刚揽住她的腰，这个女孩就微微哆嗦起来。刘戈青更加好奇了，这肯定不是一个专业的舞女，甚至这个女孩可能从未和男人跳过这样的交际舞，这样一个单纯的女孩，怎么会来舞厅当舞女呢？

于是，刘戈青没有为难这个女孩，拉着她走到舞厅的吧台前，和女孩聊了起来。

原来，女孩是一家百货公司的毛衣售货员，今年年初，母亲生了一场大病，不仅花去了家里所有的钱，还欠下了一大笔债。现在快要过年了，家里没钱还债，为了多挣些钱，她才出来做舞女。女孩还说，自己已经通过米高梅大舞厅的面试了，自己的外形、学历都通过了，因为自己还会说英文，所以米高梅大舞厅已经同意她下个星期去伴舞。

因为她从来没做过舞女，因此特别紧张，就找到了这家小舞厅，想学习学习，适应几天。

刘戈青听完女孩的叙述，想也没想，就将身上所有的钱都塞给了她，让她不要做舞女，安心做售货员，否则，日后很难回头。女孩收了刘戈青的钱，万分感激地离开了舞厅。

第二天，刘戈青和王天木外出办事，正好路过前晚女生所说的百货商场，于是刘戈青请王天木稍等自己一会儿，然后，他走进商场，径直去了毛衣部。果然，前一晚在舞厅里遇到的那个女孩，正在毛衣部里招待顾客。

刘戈青很开心，觉得自己帮对了人，女孩果然是个单纯的女孩，一点也没撒谎。于是，刘戈青在女孩工休的时候，来到女孩面前，问了女孩的名字。

女孩回答她叫陆谛，并且询问了恩人的名字，说日后一定回报。为了保密起见，刘戈青胡乱编造了一个假名字，说自己叫李萍，是一名建筑工程师。陆谛因此记住了这个叫李萍的工程师。

后来，刘戈青成功暗杀了大汉奸陈篆，随后，刘戈青火速离开了上海，陆谛再也没有见到帮助过她的建筑师李萍先生。

再后来，一次偶然的的机会，王天木去百货公司购物，陆谛认出了当年在小舞厅里，和帮助自己的恩人建筑师李萍先生在一起的这位先生，于是就向这位先生打听李萍先生的下落。后来，王天木每次见到陆谛，都会被陆谛追问李先生的下落，王天木对这个知恩图报的女孩颇有好感。这一次，为了掩护刘戈青，也为了保护自己，王天木想到了陆谛，于是，王天木找到了陆谛，带她去见刘戈青。

当时，为了隐蔽，刘戈青装扮成建筑工人，暂居在建筑工地的工人房里。

陆谛见到刘戈青后，感到十分诧异，她没想到以前的翩翩贵公子李先生，如今居然混迹在工人房中。

刘戈青看出了陆谛的疑惑，便对她谎称，自己在南阳工作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为了看病花掉了全部的积蓄，现在工作也没了，别人欠自己的债又不还，只能暂居工人房，干点零活，养养身体，能省一

点就省一点。

陆谛听后，当即表示要照顾李先生，以报答昔日李先生的恩情。陆谛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从再次见到刘戈青的第二天开始，陆谛每天下班都会买些好吃的去看望刘戈青。久而久之，刘戈青对陆谛心生信任，再约王天木出来，也会拜托陆谛去帮他打电话。

王天木终于稍微松了一口气，不用再担心刘戈青频繁联系自己，会被汪伪 76 号的特务怀疑了。

然而，王天木心底的大石头刚落地，刘戈青就出事了，事情虽然不大，却让王天木对刘戈青这个昔日的兄弟动了杀机。

刘戈青险暴露，王天木动杀机

刘戈青究竟出了什么事呢？

原来，朱山猿带着陈明楚的妹妹来上海的时候，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军统特务尤品三，他们三人到上海后，曾在沪西大旅社 10 号房间住过一晚。后来，他们转移了住处。可没多久，尤品三被巡捕房逮捕，在严刑拷打下，尤品三将沪西大旅社 10 号房间供了出来，并且将他们当时登记房间用的唐姓名字也供了出来。

于是，刘戈青和朱山猿都认为，在尤品三被捕后，朱山猿当时住的房间就不能住了，得立刻转移，于是，刘戈青和朱山猿想到了朱山猿带着陈明楚的妹妹刚到上海时，只住了一晚的沪西大旅社，他们没想到，朱山猿会将他们只住过一晚的沪西大旅社也供出来。

然而，当时，沪西大旅社已经不安全了。

刘戈青陪同朱山猿来到沪西大旅社，依然用唐姓名字登记，依然住 10 号房间。就在刘戈青和朱山猿自认为安全的时候，巡捕房就到沪西大旅社进行大搜查了。恰好当时二人走出了房间，正要走出沪西大旅社的大门，看到巡捕房在此搜查，刘戈青警觉起来，认定这个地方不安全。于是，当巡捕房的人追问二人住在哪个房间时，刘戈青谎称他们二人是来找人的，没找到要找的人，巡捕房的巡捕见刘戈青和朱山猿双手空空，什么东西也没带，也没再追问，就放二人离开了沪

西大旅社。刘戈青和朱山猿离开沪西大旅社后，自然没有再回到那里，而是立刻寻了个比较安全的地方躲了起来。然而，当刘戈青把这件事情告诉王天木之后，王天木却吓得胆战心惊。

王天木害怕极了，他开始担心刘戈青被捕。他害怕刘戈青万一被汪伪 76 号抓捕，然后禁受不住汪伪 76 号的酷刑，告发自己当年在军统局和刘戈青一起密谋刺杀汪精卫的事情。王天木开始忧心忡忡，万一这样的事情出现，那么依照李士群锱铢必较、心狠手辣的个性，自己肯定是没有好果子吃的。刘戈青又是倔脾气，拧得很，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死活也不肯听从自己的劝说离开上海，因此，刘戈青留在上海一天，他王天木就一天不能安心。最后，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命安全，王天木决定不顾旧日情分，痛下狠手，刺杀刘戈青。

王天木找到陈明楚，请他约刘戈青见面，王天木事先会安排汪伪 76 号的杀手潜伏在他们的见面地点，等他们见面后，请陈明楚伺机摔杯，下令潜伏的汪伪 76 号的杀手们刺杀刘戈青。陈明楚起初并不同意王天木刺杀刘戈青的计划，但在王天木的劝说下，他最终决定听从王天木的安排，刺杀刘戈青。

于是，王天木打电话给刘戈青，说陈明楚打算和他在舞厅见面。

刘戈青接到王天木的电话后，以为陈明楚回心转意，打算回归军统局，便立刻表示自己一定会准时到达。

朱山猿觉得此事有些不妥，陈明楚当初百般推脱，人间蒸发般不再见刘戈青，现在又怎么会主动约见刘戈青呢，这其中恐怕有诈。

当然，刘戈青也知道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但他有股子拧劲，死活都要去看看，都要去努力，他觉得，如果自己不去，陈明楚和王天木二人就再也没有回归军统的可能了，所以，他明知前途凶险，也坚持要去见陈明楚。

那天，刘戈青准备出发去舞厅时，陆谛恰好来找刘戈青，于是，陆谛理所当然地作为女伴，陪着刘戈青一起去了舞厅。

刘戈青提前十几分钟到达的舞厅，没多久，陈明楚带着妹妹陈弟燕就来了。陈明楚走进舞厅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这让刘戈青不禁疑惑起来。而陈弟燕则说，她也不知道哥哥这是怎么了，哥哥好像很

痛苦，在家里喝了很多酒，然后就带自己来了这里。

听完陈弟燕的话，刘戈青心中一沉，他环视四周，看到一名青年男子一边向他们走来一边掏东西，刘戈青一句话没说，迅速走上前，挡在了醉醺醺的陈明楚面前，陈明楚被刘戈青的举动吓了一跳，酒意也下去了三分。等到那名男子走到他们面前，刘戈青才明白，那名男子只是从怀中掏出了一盒烟，然后拿出一根，向他们借个火而已。

而陈明楚看到刘戈青挺身保护自己，内心感到更加痛苦，他对刘戈青怎么也下不了狠心。最后，陈明楚抱着刘戈青痛哭了好一阵子，才拉着刘戈青，上了他的车。

此时的陈明楚，心里乱糟糟的，刘戈青也没有多问，安安静静地坐在陈明楚的车上，任凭陈明楚开车在上海的马路上乱转。最终，陈明楚还是将刘戈青带到了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

进了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陈明楚就将刘戈青和陆谛二人往会客室一扔，自己就走掉了。陈明楚跑到王天木的屋里，将他把刘戈青和陆谛带进汪伪 76 号的前后经过完完整整地说了一遍。

王天木听后十分气愤，却拿刘戈青没有办法。

王天木的心中恼火极了，他本想让陈明楚带人将刘戈青除掉，死人是决不会说出自己刺杀汪精卫的陈年老账的，结果现在倒好，陈明楚妄做好人，将刘戈青送到了汪伪 76 号总部，这不是“寿星老上吊，嫌命长”吗？

当夜，又急又怕的王天木连夜赶回家中，将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转移，随后自己也藏了起来，不敢再回汪伪 76 号。

晚上六七点钟的时候，在汪伪的会客室里待了很久的刘戈青准备离开，但汪伪 76 号的警卫却说什么也不放刘戈青和陆谛走。陆谛第一次觉得，自己身边的这位李先生，身份可能没他说的那么简单。

二人惶惶不安地在汪伪 76 号的会客室里度过了一晚，第二天早上 10 点左右，李士群通过手下人的谈话，才知道会客厅里坐着他梦寐以求的人才刘戈青，这位军统的金牌杀手，居然被“请”到汪伪 76 号的大本营来了，然而他李士群却不知道，究竟是谁下的命令，将刘戈青带到了这里。

李士群虽然知道刘戈青是刺杀陈箴的凶手之一，但他却不知道刘戈青和王天木、陈明楚二人之间的关系。

不管怎样，李士群见到刘戈青来到汪伪 76 号，还是非常开心的，他一直想将刘戈青收为己用。对于刘戈青这样的军统金牌特务，李士群当然是舍不得让他遭受严刑拷打的。于是，李士群将刘戈青安排到汪精卫曾住过的房子，还派人亲自将陆谛送回了家，并允诺只要陆谛想来，随时都可以来汪伪 76 号看望刘戈青。

刘戈青在汪伪 76 号期间，李士群天天好酒好菜地招待他，每天都和刘戈青谈谈话、聊聊天，甚至常常和刘戈青一起共进午餐或者晚餐。

当然，李士群来看刘戈青，不是聊些家长里短，而是对刘戈青宣传他的汉奸理论，李士群试图在刘戈青面前，将自己塑造成一名爱国爱民，为了国家不惜赔上自己的名声的爱国人士，虽然他的爱国方式和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方式不同，但大体方向却是一致的，他希望刘戈青能和自己一起干。

刘戈青没有上李士群的当，他对李士群的这番表演并不感冒。

最后，刘戈青对李士群说：“我刘戈青只谈家恨，不谈国仇。”

原来，刘戈青的父亲曾经挨过日本兵六刀，幸好老人家练过武，身体素质好，才侥幸活了下来，也正因为这样，父亲一直教导刘戈青，要杀鬼子为他报仇。刘戈青向李士群表态，如果李士群是另立山头当土匪强盗，他刘戈青一定跟着李士群一起干，但是为日本人干事，哪怕是假的，他刘戈青也是万万不能的。

李士群看到刘戈青态度如此坚决，心里也就明白，拉拢刘戈青加入汪伪 76 号是没戏了，于是他转而打听刘戈青此行前来上海的目的。

刘戈青当然不会把真话全盘托出，而是半真半假地对李士群说，王天木想从戴笠那里骗一笔钱，于是将他从重庆招来，现在王天木的钱骗到手了，却联合陈明楚，将自己弄到了汪伪 76 号，不肯放自己出去，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人到底想干什么。

李士群又打听刘戈青此行前来上海，是独自前往还是携伴而来。

刘戈青有些莫名其妙，回答就自己一个人，不过他在上海倒是有

不少认识的人，如果李士群对这些人有兴趣，他随时可以将这群人聚集起来，介绍给李士群认识。

李士群一听，顿时来了兴趣，刘戈青一叫就到的人，究竟是什么人呢？

刘戈青见李士群好奇，就笑着问李士群：“你想看看？只要我一个电话，就能将这些人叫来。”

后来，刘戈青当着李士群的面，开始打电话。

李士群深知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的凶名在外，没有什么人平白无故愿意到汪伪 76 号魔窟“体验”一番，所以他也没有在意刘戈青打什么电话，而且，刘戈青联系到的人，十之八九是军统局的人，倘若真的来了，倒正中李士群的下怀，他可以趁机策反或者抓捕。

刘戈青不疾不徐地拿起电话，拨打了几个电话号码。

不一会工夫，李士群就接到警卫的报告，说外面有人自称是应刘戈青之邀前来的，还希望能有人接他们进来。

李士群派人将门外的人接了进来，却发现，进来的居然是上海滩几个著名的记者和国民党军统局的朱山猿。

看到这几名记者，李士群知道自己被刘戈青耍了，虽然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但是他依然表现得很大度，让刘戈青和进来的几个人先聊，李士群则快步离开了会客室。

刘戈青见李士群走了，就叮嘱朱山猿，要他一定迅速离开上海。朱山猿听后，表示自己一定会听从他的安排，尽快坐船到香港，从香港转道回重庆。

第二天，朱山猿果真没有来，只有刘戈青的记者好友一人前来，他给刘戈青带来了朱山猿的口信，朱山猿请刘戈青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要以保住生命为前提，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刘戈青向记者好友表示自己一定会保住生命，在记者朋友即将离开之前，刘戈青还写了一张小纸条，让他带给朱山猿，纸条上写着：他刘戈青绝对不会以任何人、任何消息，来换取个人的安全。

后来，这张纸条被交到了朱山猿的手上，朱山猿回到重庆后，将刘戈青的纸条交给了戴笠。戴笠看后，大为感叹，后来还将此纸条作

为训练特工的训练材料之一。

而王天木，在躲藏了一夜后，得知刘戈青并没有说出任何对自己不利的口供，才拉着陈明楚一起到优待室看望刘戈青。

此时的刘戈青，见到王天木和陈明楚二人，已经没了当初的热络之心，只是冷淡地回应着他们的问话，二人待了一会儿，自觉无趣，便相携离开了。

刘戈青算是幸运，由于李士群十分欣赏刘戈青，所以并没有为难刘戈青，并且，李士群有意为自己多留条后路，所以李士群非但没有对刘戈青用刑反而关照有加。

当李士群确定，不可能将刘戈青拉入自己这方阵营后，就将刘戈青秘密放回了重庆。

当然，放了刘戈青，并不能说明李士群有意讨好军统，他依然是那个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也依然是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大魔头。军统和中统的其他人，一旦落在他的手上，都没有好果子吃。

第三节 小叛徒引发的“蝴蝶效应”

俗话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小叛徒也能引起大灾难，在中统、军统和汪伪 76 号的暗战中，很多小叛徒，引起了一连串的叛变，小叛徒引发的“蝴蝶效应”，给中统局和军统局，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马啸天“暗算”中统苏沪区总务科科长陈鋈

马啸天是李士群投靠日本政府后，第一批投靠汪伪 76 号的汉奸之一，他投靠李士群后，很长一段时间，他都没有暴露自己的汉奸身份，以至于他的许多中统同事，都认为他马啸天依然是国民党中统局的人，没人想到他早已投靠了汪伪 76 号，因此，马啸天在早期，为汪伪 76 号拉拢了不少军统和中统特务。中统苏沪区总务科科长陈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到马啸天的“暗算”，被拉进汪伪 76 号的。

马啸天在得知陈鋈来到上海后，立刻打听到他的住处，随后，他

告知了李士群中统苏沪区总务科科长陈鋆即将抵沪。于是，李士群指示马啸天，带着汪伪 76 号的三名特务去抓捕陈鋆。

马啸天很机警，他来到陈鋆的住处后，让汪伪 76 号的三名特务在屋外暗中戒备，自己孤身一人敲门去拜访陈鋆。

马啸天并不想动武抓捕陈鋆，一则，他怕陈鋆家附近有潜伏的中统特务，引发火并；二则，他怕大张旗鼓地抓捕陈鋆后，他马啸天投靠汪伪 76 号的消息就会在中统局内部迅速传开，他就很难再“暗算”或者诱捕旧日同事了。

于是，马啸天独自走进了陈鋆的住处。

然而，让马啸天大喜过望的是，陈鋆以及当时同在屋内的陈鋆的妻子，都没有对马啸天产生怀疑。在他们夫妇看来，马啸天仍然是中统的一分子，既然是同僚，又有什么可戒备的呢？

陈鋆夫妇很热情，他们邀请马啸天一起吃些便饭再走，但马啸天却表示，自己此次前来，就是为陈鋆夫妇接风洗尘，所以想请二人出去吃饭。

最后，陈鋆夫妇敌不过马啸天的热情，出门上了他的汽车，而汪伪 76 号的三名特务，则开着另一辆汽车，紧随其后。

上车后，马啸天当然没有将汽车开往饭店，他直直地就把汽车开进了汪伪 76 号。

陈鋆夫妇从马啸天的汽车上下来后，发现这里并不是吃饭的场所，才觉出异常。于是陈鋆询问马啸天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马啸天则表示，就是想找陈鋆谈谈话，没什么大事，马啸天还请陈鋆不用担心，自己不会伤害他们夫妇二人的。

陈鋆听后，不再作声，闷声不响地跟着马啸天进了汪伪 76 号的会客室，想要看看，马啸天的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

进了会客室，马啸天端来一杯茶，开始劝说陈鋆投靠汪伪 76 号。

马啸天说：“我们是兄弟，有福就要同享，我已经投靠了汪伪 76 号，也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到汪伪 76 号来享福。”

陈鋆听了马啸天的一番话，颇觉气愤，但考虑到自己深陷魔窟汪伪 76 号，于是决定先稳住马啸天。于是陈鋆佯装投降，同意和马啸

天去见李士群。

然而，假戏最后却变成了真唱，在马啸天兴高采烈地把陈鋆带到了李士群面前后，陈鋆就不再对逃离汪伪 76 号心存幻想了。

李士群是何等人物，他怎能看不穿陈鋆的真心？

最后，陈鋆无奈，不得不低下了头，毕竟夫人和自己在一起，如果自己真的死扛硬抗，那么最后倒霉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自己的夫人。

后来，李士群请来丁默邨，李士群、丁默邨、马啸天陪同陈鋆夫妇一起，在汪伪 76 号的会客室里吃了午饭。

吃完饭后，李士群送给陈鋆 500 元做安家费。并且表示，这区区 500 元，不过是这几日的安家费，等陈鋆安顿下来，到汪伪 76 号正式上班后，必然安排正式的职务，并支付不菲的薪水。

随后，李士群吩咐马啸天，为了陈鋆夫妇的安全，先给他们选择一个较为安全的饭店住几天，然后，待汪伪 76 号帮他们寻找到合适的住所后，再让他们一家正式安顿下来。

很快，李士群就将汪伪 76 号对面的钱家巷 38 号买了下来，作为汪伪 76 号特务的宿舍，打扫完毕后，李士群就派人将陈鋆一家接到了钱家巷 38 号。

也就是说，从进入汪伪 76 号的那一刻起，陈鋆夫妇就由汪伪 76 号的特工全程“陪护”，直到住进钱家巷 38 号，所以，不管陈鋆是否投降，他都逃不掉了，于是陈鋆只好硬着头皮到汪伪 76 号去上班了。

特工邓达谥被捕投敌

陈鋆到了汪伪 76 号后，叛变了中统，很快，他不仅出卖了自己的老部下庄鹤，还出卖了中统局苏沪组训股股长邓达谥，于是，邓达谥被汪伪 76 号抓捕。

邓达谥是中统局苏沪区组训股股长，股长是最基层的管理干部。在军队中，股长是团参谋长、副参谋长的后备人选，不过即使是后备人选，股长也是一个不入流的级别，按照现在公务员的级别分类，股长相当于科员的级别。也就是说，邓达谥只是中统局的一个小虾米。

汪伪 76 号根据陈璠提供的线索，派出四名特务，闯进了邓达谥的家中，将他绑架，架上了汽车。邓达谥被汪伪 76 号的特务架上车后，立刻大喊大叫，希望能引来租界的巡捕，将自己解救。四名特务见邓达谥如此不老实，就用破布塞住了邓达谥的嘴巴，随后，将其打晕，带进了汪伪 76 号。

到了汪伪 76 号，邓达谥就成了一块硬石头，无论汪伪 76 号的特工怎样审讯，邓达谥都不开口。

“硬骨头”邓达谥惹恼了汪伪 76 号的特务们，以汪伪 76 号第一杀手吴世宝为首的特务们，对邓达谥施以极刑，老虎凳、辣椒水，轮番使用，邓达谥昏过去好几次。

最后，在汪伪 76 号特务们的严刑拷打下，邓达谥叛变求饶，向汪伪 76 号投降，并将自己所知道的有关中统局的情报全部交代了出来。

邓达谥投降汪伪 76 号后，李士群任命他为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南京区组训科长，1941 年下半年，又改任邓达谥为南京市第一区区长。

邓达谥在成为南京市第一区区长后，做了一系列堪称非常奇葩的事情。

首先，邓达谥利用手中的权势，将所管辖的中山路、汉中路一带的棚户区的居民和摊贩全部赶走，然后用木篱笆将这片区域圈了起来，并在栅栏外竖起广告牌，公告大家，说政府要将这片区域改造成商场，以方便附近居民的生活，并公告大家，如果谁需要商场的摊位，就要先交纳一定数目的建筑费。许多商贩为了生存，不得不交给邓达谥一部分建筑费。

邓达谥算得上是汪伪 76 号里极富商业头脑的汉奸，他把收上来的钱分成三份，其中一份，用来建造了一批偷工减料、质量不佳的铺面，剩下的 2/3，他投资建了一家小银行，而这家银行就建在商场里，并且和商场一样命名为“兴中”。

别看邓达谥投资的银行很小，但业务却很繁忙，因为邓达谥规定，商场里的银钱出入，都要和兴中银行合作。

后来，邓达谥利用商场和银行，为汪伪 76 号筹到了不少的活动

经费，也填饱了自己的肚子。

邓达谥之妻暗助中统锄奸

邓达谥加入汪伪 76 号后，他的妻子刘慧也随他一起加入了汪伪 76 号。

邓达谥的妻子刘慧，原来是中统的出纳，在随丈夫加入汪伪 76 号后，为了自己和丈夫的未来，暗中和中统局继续保持联系。

1939 年底，马啸天的汉奸身份暴露，鉴于他给中统、军统带来的巨大危害，中统局决定除掉马啸天。

中统局通过邓达谥的妻子刘慧，获知了马啸天的住所和惯常的行踪，根据刘慧提供的消息，中统局布置了行动计划，配备了行动人员，准备刺杀马啸天。如果中统局的计划成功实施，那么汪伪 76 号必将损失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而中统局和军统局也会因此减少许多损失，避免许多优秀人员被汪伪 76 号抓捕。

然而行动当天，马啸天偏偏没有按照日常的习惯准时回家。

那天，吴世宝约马啸天外出吃饭，于是，马啸天他提前离开汪伪 76 号，回家换衣服。当马啸天的车行至家门口后，马啸天下车回家，却让司机先回汪伪 76 号，等到下班时再来家中接他。而正巧当时，马啸天的贴身保镖将一件重要的东西忘在了汪伪 76 号，便和马啸天打了个招呼，然后坐着马啸天的车，返回汪伪 76 号。

而当时埋伏在马啸天的住所所在的巷子里的中统特工，误以为车里坐的就是马啸天本人，于是对着车子开枪射击。

马啸天的司机经验丰富，在多年的司机生涯中，他曾多次遇到这样的暗杀。于是，司机一听到枪声，就立刻将油门踩到底，飞速向前驶去。在开离小巷驶上大路后，司机专门往人多的地方开，利用拥挤的人群，将中统的特工甩掉。汽车开进汪伪 76 号后，司机迅速下车，将此事告诉了吴世宝，于是吴世宝马上派出汪伪 76 号的特务，赶到马啸天的住所梅邨附近。

到了梅邨附近，中统的特务还没有撤退，他们还在寻找马啸天乘坐的汽车的踪迹，于是汪伪 76 号的特务和中统的特务展开了巷战。

这时，被之前的枪声吸引过来的日本宪兵大队的宪兵和租界巡捕房的巡捕也赶到了，他们协助汪伪 76 号的特务对抗中统局的特务，最终，中统局的一名特工被枪杀，剩下的中统特工见形势不利，便仓皇逃走了。

而此事的主角马啸天，则一直躲在家里不敢露面，直到丁默邨派日本宪兵队的保险汽车接他回汪伪 76 号，他才颤颤巍巍地从房子里走出来，坐上汽车，惊魂未定地返回汪伪 76 号。

马啸天没有想到，中统局这么快就对他下手了，回到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后，马啸天开始仔细琢磨此次刺杀事件的种种细节。

首先，如果没有人泄露他马啸天的行踪，中统局的人是不会知道他马啸天的住处的。

其次，泄露他马啸天的行踪的，必然是汪伪 76 号的特务。也就是说，汪伪 76 号中有内鬼，否则，谁会知道他马啸天是不是每天都回家，而每天又是什么时候提前回家呢？

那么这个内鬼，必然是他马啸天的同事。

于是，马啸天暗中派人严查潜伏在汪伪 76 号的中统间谍。

马啸天虽然叛变了中统，投靠了汪伪 76 号，但他在中统局，却依然有一定的人脉，甚至在中统局内部，还有他马啸天的内线。

很快，中统局的内线就送出情报，原来，马啸天的日常行踪，都是邓达谥的妻子刘慧悄悄告知中统局的特务的。于是，马啸天迅速将邓达谥、刘慧夫妇二人抓捕。在对邓达谥夫妇严刑拷打、几经审讯之后，汪伪 76 号的特务们确认，此事系刘慧一人所为，与邓达谥无关，于是，马啸天释放了邓达谥，随后，李士群将邓达谥派到了南京，做了组训科科长。后来，在邓达谥的周旋下，汪伪 76 号没有处决刘慧，而是将她关押在了南京宁海路 25 号的监狱里。此事也就就此了结。

小叛徒频现，汪伪 76 号暗战告捷

陈赓、邓达谥等人投敌后，将中统局的很多人都拉下了水，中统局的叛徒像滚雪球一样，一个接一个地滚进了汪伪 76 号。

邓达谥投敌后，紧随其后被抓进汪伪 76 号的是中统苏沪区组训

股干事宋建中。

宋建中是邓达谥的同事，邓达谥投靠汪伪 76 号后，和比他更早进入汪伪 76 号的原中统苏沪区总务科科长陈鋈商量，策反过去在中统局的全部班底，将过去在中统局的老同事都拉进汪伪 76 号，这样，他们这些从中统叛变的新加入汪伪 76 号的特务们，就能组成自己的小圈子，在汪伪 76 号中迅速立足。

宋建中被抓进汪伪 76 号后，没有像邓达谥那边拼死守节。宋建中一看，自己的老同事邓达谥和苏成德都在汪伪 76 号，当即明白自己一定是被这两位老同事出卖了。宋建中早就听说过汪伪 76 号的凶名，知道自己不可能全身逃脱，于是决定举手投降。于是，邓达谥没费什么力气，就让宋建中同意叛变加入汪伪 76 号。

进入汪伪 76 号后，宋建中继续跟着老上司邓达谥工作，邓达谥去哪儿，他就去哪儿。

1941 年，邓达谥担任南京第一区区长时，在建设兴中商场和兴中银行的过程中，遭到了当地居民和商贩的强烈反对，宋建中为了他和邓达谥等人的利益，“大公无私”地与当地居民和商贩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沟通和谈判，最终促成了兴中商场和兴中银行的建成。后来，为了奖赏宋建中，邓达谥任命他为兴中银行董事兼经理。

1939 年到 1940 年底，以邓达谥、张北生等小人物为首，中统的很多小官员，相继投靠汪伪 76 号。

除了邓达谥、张北生等人投靠汪伪 76 号，原国民党中统局调查科行动总队队长苏成德的一些属下，也相继在苏成德的策反下，投靠了汪伪 76 号。其代表人物分别是苏成德在中统局的得力助手童国忠、潘元恺和刘炳元。

这三入加入汪伪 76 号后，也分别在汪伪 76 号捞到了一官半职。

1940 年，苏成德任职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南京区长时，提拔童国忠为南京区宁海路看守所主任，潘元恺任职南京区侦察科科长，刘炳元则成为南京区行政科科长。后来，苏成德升任首都警察厅厅长后，这三人也随着苏成德一起到首都警察厅任职，潘元恺任特高课课长，童国忠则任侦察队长，刘炳元则被安排为下关分局局长。

1942年，苏成德因表现突出，被汪伪76号特工总部调到上海警察局任副局长，这一次，他依旧带着自己的三个得力手下童国忠、潘元恺和刘炳元。然而上海毕竟是汪伪76号的大本营，有太多的“人才”在这里工作，一时间，苏成德居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安排自己的这三个心腹，只得暂时委屈他们三人担当督察，而几个月后，这三人中，也只有刘炳元被提为督察长。

从1939年到1942年，汪伪76号从国民党中统局和军统局中策反的小人物非常多，以至于一些基层职位，出现了人多官少的局面。可以说，1939年底到1942年，是汪伪76号猖狂发展的几年，那几年，汪伪76号在与中统局和军统局暗战中屡屡告捷。

第四节 投靠汪伪76号的女特务

1939年到1942年期间，叛变中统局和军统局，投靠汪伪76号的不止有马啸天、张北生、苏成德、邓达谥这些男特务，还有一些女特务，也是在虚荣心的驱使下加入了汪伪76号，心甘情愿成为卖国贼。

中统女叛徒唐逸君

唐逸君是原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别动总队淞沪特遣支队的司令熊剑东的妻子，原中统局的女特务。

1939年3月，熊剑东在上海执行任务时被日军俘获，在监狱中待了两年半。1941年7月，熊剑东的脾气在监牢中消磨殆尽，于是周佛海就说服熊剑东加入汪伪76号，并亲自出面向日本人求情，将熊剑东保释了出来。熊剑东出狱后，立即被汪伪政府任命为汪伪黄卫军总司令，1941年11月，升任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

1943年3月，熊剑东被汪精卫视为心腹，提升为汪伪中央税警总团副总团长，兼任上海市保安处处长。

自从熊剑东加入汪伪76号，便死心塌地为汪伪76号卖命，他不仅自己做了人人唾弃的汉奸，还将自己的妻子唐逸君拉进了汪伪76号。

说到唐逸君这个女人，她的身上有许多爱慕虚荣的女人的通病，她将钱财看得比任何东西都重要，而丈夫拥有的权势，就是她炫耀的资本。为了帮助熊剑东在汪伪 76 号获得更高的职位，唐逸君将“算盘”打到了汪精卫、李士群和周佛海等人的妻子身上，她千方百计拉拢这些“贤内助”，在她看来，只要自己能和这些“贵”太太成为好朋友，她的丈夫熊剑东的仕途之路就有可能一路坦途。

唐逸君还利用这些太太们，帮助丈夫获取汪伪 76 号的内部信息，她从这些太太们嘴里打听到汪伪 76 号的人员信息和发展动向，随时告诉丈夫熊剑东，以便丈夫见风使舵，更好地在汪伪 76 号发展。

同时，唐逸君自己也加入了汪伪 76 号，为了“展示”自己，唐逸君想到了她在中统局的顶头上司张瑞京，她决定将自己的老上司张瑞京拉进汪伪 76 号。

1939 年秋，唐逸君向李士群和丁默邨立下军令状，向此二人保证，自己将把中统局老牌特务张瑞京抓进汪伪 76 号。

为了配合唐逸君行动，李士群还命汪伪 76 号的化验室主任配了一剂哥罗芳交给唐逸君，还派了两名身手不错的特工随时听候唐逸君的命令，以协助她将张瑞京抓捕到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哥罗芳是一种麻醉剂，可以将人迅速麻醉，使人神志不清甚至昏迷。

唐逸君私下约张瑞京见面。

见面后，唐逸君趁张瑞京没有丝毫防备之际，用哥罗芳将张瑞京迷倒，随后，在汪伪 76 号两名特务的协助下，将昏迷的张瑞京塞进了汽车，然后唐逸君和另外两名特务一起，开车狂奔，带着昏迷的张瑞京驶向汪伪 76 号。

到了汪伪 76 号，那两名身强力壮的汪伪特务将张瑞京抬进会客室，此时的张瑞京依然处于昏迷状态。

李士群在得知张瑞京被唐逸君顺利抓进汪伪 76 号后，也赶到了会客室，当发现张瑞京尚在昏迷状态，清醒过来还要一段时间后，就将张瑞京安置在吴世宝办公室隔壁的房间里，并叫来马啸天，让他负责照看张瑞京，直到张瑞京清醒过来。李士群如此安排另有深意，因为马啸天和张瑞京曾经是军校同学，军校毕业后，二人一同加入了国

民党中统局，张瑞京在马啸天手下做行动专员，所以张瑞京和马啸天比较熟络，相对更好沟通。很多被汪伪 76 号拉下水的中统特工和军统特工，就是这样被熟人诱降的，这一次，李士群一样想让张瑞京的老上司马啸天来劝降张瑞京。

马啸天焦急地等了很久，张瑞京才终于苏醒，但是，由于麻醉药的作用，张瑞京虽然清醒了，却依然疲惫不堪，精神不济。

马啸天看张瑞京疲惫不堪，便没有打搅他，让他继续休息，并派人留在房间里照顾他。

第二天，张瑞京完全清醒过来，弄清了自己所在之处后，开始思考自己究竟该何去何从。

马啸天再次去看张瑞京的时候，张瑞京已经非常清醒，他客气地请马啸天坐下，并主动向马啸天表示，他愿意加入汪伪 76 号。

马啸天听张瑞京说要加入汪伪 76 号，感到非常满意，迅速将这个信息禀报了李士群。李士群得到这个消息后，马上吩咐马啸天带张瑞京来见自己。张瑞京见到李士群后，非常恳切地表示自己心甘情愿加入汪伪 76 号。随后，李士群任命张瑞京为汪伪 76 号的高级顾问，并发给张瑞京 500 元的安家费。

那么，张瑞京为什么没有受到任何的审讯和拷打，就主动要求加入汪伪 76 号呢？

张瑞京叛变投敌，也是经过一番思量的。

首先，张瑞京思度，既然自己已经被带进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如果不投降，想要安然无恙地走出去恐怕是不可能了，因此，要想保命，只有投降。

其次，张瑞京考虑，即使自己侥幸活着走出汪伪 76 号，中统局能否像从前一样信任自己还是个问题。既然军统局局长戴笠曾经怀疑过安然无恙地走出汪伪 76 号的王天木，那么自己的最高领导——中统局局长徐恩曾，会不会也像戴笠一样，对自己活着走出汪伪 76 号表示怀疑呢？

最后，张瑞京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心思，那就是汪伪 76 号的直属领导——汪伪政府的当家人大汉奸汪精卫，是张瑞京的老乡，二人

都是广东人。作为广东人，张瑞京清楚地知道广东人有多么排外，想来汪精卫也不会例外。汪精卫从国民党政府出走后，和他一起投靠日本政府的广东人并不多，所以张瑞京思量，如果自己能加入汪伪 76 号，以后多一些接触汪精卫的机会，必然可以凭借老乡的身份，获得汪精卫的信任，在汪伪政府里占据一席之地。

正因为上述三个原因，张瑞京才主动表示要加入汪伪 76 号。

张瑞京的如意算盘，正中汪伪 76 号的下怀。

再说将张瑞京绑架到汪伪 76 号的女特务唐逸君，因为绑架有功，被李士群奖励了 1000 元的奖金。在当时，奖励多达 1000 元的奖金，这在汪伪 76 号内还是不多见的，正是李士群的这一“大手笔”，让越来越多的中统和军统叛徒，走上出卖旧日同僚的道路。

中统叛徒张瑞京

1940 年，张瑞京加入汪伪 76 号半年后，果真如愿以偿，被汪伪政府提升为南京区治安科科长。张瑞京对治安管理十分内行，他是军校出身，对如何对付散兵游勇颇有经验。张瑞京在担任南京区治安科科长期间，他对南京地区的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许以重金和官位，将这些原本抗日的国民党士兵拉拢到自己麾下，组成了一支以打击残害抗日民主人士为主要工作的特务行动大队。后来，张瑞京的这支特务行动大队在南京地区臭名昭著，这支队伍打着清理国民党、中国共产党的残余力量的旗号在南京地区为非作歹、欺男霸女。

张瑞京任汪伪政府南京区治安科科长期间，就像是南京的土皇帝，逍遥自在，为所欲为，但是他还不满足，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权势，他不择手段，甚至和日本宪兵队某分队队长的姘头勾搭上了，通过日本宪兵队某分队队长的姘头，张瑞京和日本宪兵队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日本宪兵队的支持。

张瑞京虽然取得了些许“成绩”，但他依然不满足，因为他还没有和汪精卫本人取得联系，他寻思着，倘若自己和汪精卫熟络起来，那么他的仕途之路就会顺风顺水。

富于心计的张瑞京，不甘心仅仅当一个南京区政治科科长，更不

甘心一直按照目前的升职速度慢慢向上爬，于是，他刻意结交了汪精卫的长子汪孟晋。在与汪精卫的长子汪孟晋的交往中，张瑞京投其所好、百般献媚，很快就被汪孟晋视为情投意合的好友，二人遂结拜为兄弟。从此，张瑞京获得了不需要通报，就可以自由进出汪精卫的府邸的权利。

汪精卫和陈璧君自然因此和张瑞京熟络起来，二人对儿子能有这样一个知心知意的把兄弟感到高兴，于是，他们开始考虑给张瑞京一个像样的职位，否则，儿子天天和一个挂着特务大队长名头的把兄弟混在一起，未免也太不像样。于是，汪精卫大笔一挥，将张瑞京的特务行动大队改为汪伪政府陆军独立第七旅，任命张瑞京担任第七旅旅长，并将张瑞京提升为少将。就这样，张瑞京改头换面，脱下了特务的帽子，摇身一变，成了汪伪政府的正牌少将。

后来，张瑞京汲汲经营，步步高升。上文，笔者提到，广东人很排外，张瑞京和汪精卫都是广东人，而张瑞京又是汪精卫的长子汪孟晋的结拜兄弟，所以，汪精卫在组织伪南京国民政府的过程中，对张瑞京信赖有加。

当时，汪精卫急需人才，而他的麾下，只有一个军校毕业的广东同乡李逵，并且已经被汪精卫委派为卫戍司令。汪精卫的确排外，他对身边的其他人，比如湖南籍的参军长，都难以信任，于是，汪精卫不断提升张瑞京，没多久，就将张瑞京提拔为中将参军，让他随时陪伴在自己左右。

第五节 “小鬼”吴道坤叛变，带给军统大灾难

俗话说，“阎王好见，小鬼难缠”，这句话道出了小人物的力量。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小人物，也许你本来顺风顺水，结果因为种种原因，被一些从未被你重视过的小人暗算，导致你多年的积累功亏一篑，甚至命悬一线。在军统局、中统局和汪伪 76 号的暗战中，让军统局和中统局屡次陷入危机的，大多数是那些不被大家重视的小人物，正

是这些小人物，给军统局和中统局制造了巨大的灾难。

小人物吴道坤出卖军统情报员陈三才

吴道坤在军统的历史上，似乎是个可有可无的小人物，之所以说他是可有可无的，是因为在汪伪 76 号王牌特务汪曼云和马啸天等人的回忆录中，几乎找不到有关吴道坤的信息，而且，笔者翻遍当时的历史资料，也找不到太多关于吴道坤的背景介绍。由此可见，吴道坤在当时的军统局中，始终寂寂无闻。那么，这样一个不被大家重视的小人物，究竟做了什么事情，使得军统局损失严重呢？

小人物吴道坤的确做了两件大事，而且这两件大事导致了十分严重的后果。

第一件事，是出卖军统驻上海法租界台司德郎路的秘密电台情报员李恃平和陈家栋，这件事情上文已有交代，而出卖他们的人，就是小人物吴道坤。如果没有吴道坤的出卖，这部秘密电台还是很安全的。因为这部电台除了军统局上海区的最高领导，几乎没人知道它的存在。因此，1938 年，军统在上海法租界的总部被破，军统局上海区区长和金牌骨干刘方熊等人全部落入汪伪 76 号魔掌时，这部秘密电台还能够安然无恙。即使是在 1939 年 7 月，军统在上海的 14 个据点全部暴露的紧张局势下，这部电台依然十分安全，由此可知这部电台的保密程度有多高。所以，如果不是小人物吴道坤出卖了李恃平，军统局还是能够长时间地通过这部电台，与上海的情报人员秘密通讯，获取上海地区的情报的。这件事在上文已有详细叙述。

第二件事，就是吴道坤出卖军统局秘密情报员陈三才，给军统局带来重大灾难。

陈三才的社会身份是：上海市北极冰箱公司的老板兼经理，清华堂派遣至美国留学归来的“海归”人士。

这里先介绍一下陈三才其人。

陈三才在 15 岁时，被保送清华留美预备学校，从清华毕业后，他便远赴美国研读电机工程专业。陈三才在美国留学七年，刻苦钻研电器冷藏技术。七年后，陈三才学成归国，利用手中的技术，在上海

静安寺路 989 号创办了北极冰箱公司，专门代理经营销售美国“弗里吉代尔”系列冰箱。在公司的下属，在陈三才的朋友、邻居和同学眼中，陈三才是一个热心公益的商人。在上海，只要学校、医院、孤儿院等社会机构遇到困难，只要找到陈三才，他一定会鼎力相助，慷慨解囊。陈三才的乐善好施在商界和政界有口皆碑。在大多数商人追逐名利的乱世，陈三才却怀抱满腔的爱国热忱，一心为国分忧。

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陈三才看到日军践踏中国的土地，中国百姓在战乱中惶恐不安、艰难度日，民族良知让他无法选择沉默。陈三才决定加入革命组织，与日寇做斗争，铲除汉奸，为民除害。

于是，陈三才毅然决定前往香港，寻找军统相关人员。当时，戴笠人在香港，陈三才抵达香港后，辗转与在香港的军统人员取得了联系，将自己投身军统的想法转达给了戴笠。

当戴笠得知陈三才有意投身军统，为国锄奸时，十分兴奋，立即批准陈三才加入军统局，专门负责协助军统局上海区的锄奸工作。

陈三才痛恨汪伪集团的卖国行为，于是，他积极配合军统局铲除汪精卫，陈三才的真实身份是军统局上海区秘密情报员，所谓北极冰箱公司的老板兼经理，不过是他用以遮掩真实身份的挡箭牌罢了。

炸毁汪伪 76 号计划泄露，诸亚鹏叛变投敌

陈三才的第一个锄奸目标，就是位于上海极司菲尔路 76 号的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总部。

陈三才和军统局潜伏在汪伪 76 号的双面特工诸亚鹏商量，利用大量炸药，将汪伪 76 号炸毁，随后，将逃出的特务抓捕。诸亚鹏在汪伪 76 号潜伏的时间较长，对汪伪 76 号周围的环境比较熟悉，所以，他建议将炸药放置在极司菲尔路 76 号和 74 号之间的一条小泥沟里。当然，炸药和雷管由陈三才负责购买。

陈三才和诸亚鹏的计划非常严密，但一件意外的事情，不仅让他们的计划泡汤，也让二人身陷囹圄。

当时，汪伪 76 号的王牌特务马啸天，带着自己的下属，汪伪 76 号的副处长魏曙东，偕同姚筠伯、陈中芳一起巡查公共租界。小人物

吴道坤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他向马啸天一行人提供了一个情报，说公共租界里的北极冰箱公司的老板兼经理陈三才是军统的秘密情报员，这个陈三才，正打算炸掉汪伪 76 号。

吴道坤人微言轻，因此马啸天等人并没有太在意吴道坤提供的这个听起来骇人听闻的情报，只是因为姚筠伯曾经做过翻译，在公共租界有一定的名气，所以马啸天便派他去调查一下陈三才，看看陈三才是否购买过制造炸药的原料或者咨询过从哪里能买到炸药。

这一查不要紧，姚筠伯还真的和公共租界的巡捕一起，查获了陈三才和军统局之间往来的文件，甚至还查到了陈三才与汪伪特工诸亚鹏之间联系的证据。

马啸天这下惊呆了，看来，小人物吴道坤提供的情报是真的，而且，汪伪 76 号的特务诸亚鹏，竟然是军统局潜伏在汪伪 76 号的“鼯鼠”！

马啸天与诸亚鹏素有旧交，他虽然将此事迅速禀报了李士群，但是同时也在李士群面前为诸亚鹏求了情。马啸天向李士群提议，由自己亲自去抓捕诸亚鹏，并劝说诸亚鹏加入汪伪 76 号，如果诸亚鹏能够迷途知返，希望李士群能够既往不咎，重用诸亚鹏；如果诸亚鹏死不醒悟，那么李士群再处理诸亚鹏也不迟。李士群见马啸天主动请缨，便顺水推舟地同意了他的意见，派他去抓捕诸亚鹏。

第二天，马啸天就找到了诸亚鹏。

马啸天面色凝重，直指诸亚鹏竟然瞒着自己和军统局联络，马啸天连声哀叹，说自己多年来一直十分信任诸亚鹏，把他当作最贴心的朋友，没想到……

在马啸天强大的心理攻势下，诸亚鹏终于低下了头，他不仅交代自己和陈三才之间的关系，还将他们的计划全盘托出；不仅供出已将陈三才给自己的炸药按照原计划，埋放在极司菲尔路 76 号和 74 号之间的小沟里，还说他们到现在还没有动手实施爆炸，就是因为炸药不够，他们原本打算，等炸药全部埋放完毕，就装上雷管引信，将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的主体部分全部炸毁。

马啸天听完诸亚鹏的交代后，出了一身冷汗，来不及向李士群汇报，他就慌忙带上诸亚鹏，赶到了埋放炸药的地点。

将炸药取出，带回汪伪 76 号后，马啸天派两名特务看管诸亚鹏，自己则急急忙忙抱着炸药，跑去见李士群了。

李士群听马啸天讲完劝降诸亚鹏和取出陈三才和诸亚鹏放置的炸药的经过后，也倒吸了一口冷气，暗自庆幸提前发现了这件事情，否则，他苦心经营的汪伪 76 号就真的要完了。

李士群就此大力嘉奖了小人物吴道坤，然后，听从马啸天的建议，在亲自提审了诸亚鹏后，继续留用诸亚鹏，官任原职。

陈三才被捕，炸汪计划彻底泡汤

汪伪 76 号里发生的事情，并没有传到陈三才的耳朵里，就在诸亚鹏叛变的同时，陈三才还在购买炸药，为炸毁汪伪 76 号的计划忙碌着。

直到见到汪伪 76 号的特务万里浪，带着日本宪兵来到他的面前，陈三才才察觉到危险将至。万里浪将陈三才绑到汪伪 76 号后，陈三才才明白事情已经暴露，然而他并不知道诸亚鹏已经叛变，他甚至还为诸亚鹏的生命安危忧心忡忡，决定严守机密，以便诸亚鹏能够继续完成自己没能完成的炸汪计划。

陈三才为了保守秘密，保护诸亚鹏，面对汪伪 76 号特务们的严刑拷打，宁死不屈。然而，让陈三才难过的是，在经受了一番酷刑后，汪伪 76 号的特务们竟然恶狠狠地告诉他，诸亚鹏早已叛变，炸药早就被挖了出来。陈三才顿感大势已去，自己所有的努力，都成了泡影。

随后，汪伪 76 号的特务们在陈三才的北极冰箱公司搜查到一个装有一支穿甲机枪的大冰箱。事后，李士群了解到，这支穿甲机枪是为刺杀汪精卫而准备的，由于汪精卫出入十分谨慎，每次出门都坐保险汽车，所以，军统局购买了威力强大的穿甲机枪，吩咐陈三才伺机行动，射杀汪精卫。

除此之外，汪伪 76 号的特务们还从陈三才的家中搜到了一根暗藏手枪的拐杖。

后来，李士群将藏有穿甲机枪的大冰箱和暗藏手枪的拐杖都搬到了汪伪 76 号，并将那支穿甲机枪，献给了驻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的日

本宪兵小队长准尉涩谷。

如果陈三才和诸亚鹏炸掉汪伪 76 号的计划没有泄露，汪伪 76 号的历史必将改写，可是他们的计划，偏偏被不起眼的小人物吴道坤知道了，这个小人物，为了个人前途和一己私利，将这个计划密报了汪伪 76 号，导致了这场计划的失败，也导致了军统局潜伏在汪伪 76 号的特务诸亚鹏和军统局秘密情报员陈三才的被捕，给军统局带来了极大的损失。

关于陈三才被捕一事，还有另一个版本，不过在这个版本中，陈三才之所以被捕，还是因为吴道坤告密所致。

不过在这个版本中，陈三才不是打算在计划炸毁汪伪 76 号的过程中被捕的，而是因为刺杀汪精卫的计划泄露而被捕的。

陈三才为了刺杀汪精卫，想了许多办法，他打听到汪精卫因为饱受肝病折磨，打算到位于北四川路的一家日本医院接受手术。陈三才觉得这是一个刺杀汪精卫的好机会，于是，陈三才花费重金，买通了在这家日本医院工作的一名白俄女护士，让这名女护士利用汪精卫手术后在该医院休养的时机，伺机下毒毒死汪精卫。

为了确保白俄女护士能够按照陈三才的计划毒死汪精卫，陈三才预先支付了一部分酬金给白俄女护士。

如果当年，陈三才的刺汪计划顺利实施，汪精卫这个头号卖国贼，就已经在 1940 年 6 月到 7 月之间死掉了。

然而汪精卫这个老狐狸太谨慎太多疑，他在就诊当天，竟然突然改变了就诊医院，致使陈三才的周密计划流产了。

最可恨的是，后来，那名白俄女护士以此事为由，不断要挟陈三才，漫天要价。在从陈三才处骗得巨款后，贪得无厌的白俄女护士为了获得更多的钱财，竟然将这件事告诉了小特务吴道坤。吴道坤在支付了白俄女护士一笔不菲的“信息费”后，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了汪伪 76 号，讨了一大笔赏钱。

1940 年 7 月 9 日，由于吴道坤的出卖，陈三才不幸被捕。

陈三才被关押在汪伪 76 号一年多，他的家人始终没有停止过对他的营救工作，后来，陈三才的家人辗转找到和汪精卫关系匪浅的褚

民谊，请他在汪精卫面前为陈三才说好话，请汪精卫网开一面放过陈三才，使他和家人团聚，并保证日后陈三才不会再和国民党有任何联系。

褚民谊收下了陈三才的家人送来的价值不菲的礼物，答应在汪精卫面前替陈三才求情。

褚民谊以为，陈三才已经被关押一年多了，凭借他和汪精卫的交情，汪精卫一定会给自己这点面子的。

然而，当褚民谊跑到汪精卫面前为陈三才求情时，汪精卫听完了褚民谊的一番陈述，却立刻站起身，指着褚民谊的鼻子怒骂：“你是不是也想杀我！”汪精卫的这种说法让褚民谊哑口无言，一时间接不下话来。

汪精卫见褚民谊如此，继续说：“你若不是想杀我，为何替打算行刺我的陈三才求情？”

后来，汪精卫一气之下，竟然将陈三才的卷宗重新翻出，在首页上批示了“立即枪决”四个大字！

陈三才的家人万万没有想到，褚民谊的求情，不仅没有能够救出陈三才，反而导致陈三才被枪决。

最后，陈三才被汪伪 76 号的特务枪决。

第四章 军统伏魔，血洒十里洋场

在汪伪 76 号利用军统、中统变节分子破坏军统局和中统局的行动时，军统局和中统局也针对汪伪 76 号的破坏进行了全面的反击。戴笠在军统局的一些特务叛变后，痛定思痛，下决心大肆休整手下的特工人员。于是，军统局开始了新一轮的伏魔行动，在戴笠的大力监管下，很多军统特工坚定了信心，后来，一些军统特工即使被汪伪 76 号逮捕，也能坚定不移地在汪伪 76 号内部做军统的卧底，继续为军统局工作。

第一节 游走于汪伪 76 号魔窟的军统卧底

戴笠领导的军统局，在与汪伪 76 号的暗战中，屡次失败，这让戴笠十分失望。戴笠仔细研究了对汪伪 76 号作战失利的原因，发现军统局在与汪伪 76 号的暗战中，几次比较严重的失败，主要原因都是因军统特务叛变，而且很多时候，一个军统特务落水，就会带下一串人马，而这一串人马的落水，又会带动一片人马纷纷落水，就像“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样，局面就越来越严重。为了避免这种状况再度发生，戴笠决定严加监管手下特务，然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利用汪伪 76 号对付军统的办法去对付汪伪 76 号。

王天木副官马河图平安夜锄奸

陈恭澍成功收买马河图

1939年年底，戴笠电联军统局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命其不计任何代价，不管使用何种手段，都要对原先落水的那些军统特工进行反收买，然后利用这些人继续开展锄奸活动。

陈恭澍接到戴笠的电话后，思量再三，决定先找一个从军统叛变到汪伪76号的原军统特务下手，所谓下手，并不是劝说其回归军统，而是刺杀。陈恭澍之所以决定，是打算杀一儆百，这样，才能将原先落水的那些军统特工集体反收买。

陈恭澍的第一个目标，是王天木的随身近卫马河图。陈恭澍要马河图去刺杀王天木、何天风、陈明楚等汉奸中的任何一个。

陈恭澍对马河图允诺，不管他能否成功刺杀王天木、何天风、陈明楚等汉奸，只要他针对这些汉奸采取了刺杀行动，军统都会奖励给他一笔巨款，而且还会对他以前做过汉奸的事情既往不咎。

马河图接到陈恭澍指派的任務后非常激动，马河图原来也是军统特工，在他追随王天木加入汪伪76号，成为汉奸后，经常昼夜不安。现在，军统局给自己这样一个机会，不仅让他戴罪立功，还会给他一大笔钱，这让他不禁对军统局感激涕零，暗下决心，一定要杀死几个汉奸回报军统局的信任。当然，陈恭澍拉拢的人不止马河图一人，他还拉拢了许多跟随王天木一起叛变加入汪伪76号的副官，这些副官和马河图都一样的想法，他们其实并不是真心投靠汪伪76号，而是为了保住性命，不得不跟随王天木投敌。

为了不让自己辛苦拉拢的人被曝光，陈恭澍特意将联系马河图一事交给深藏多年、鲜为人知的军统特工吴安之。

马河图没让陈恭澍失望，对于吴安之，他可以算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把自己了解的，所有关于汪伪76号的内部的事情全盘托出，其中包括刘戈青被汪伪76号逮捕一事。在讲述刘戈青被捕事件时，马河图还特意讲明了当时刘戈青的处境，让吴安之了解刘戈青之所以被捕，完全是王天木和陈明楚二人导致的。正因为这样，吴安之才放

弃了拉拢王天木和陈明楚二人的计划，将二人正式定为叛徒，并准备刺杀这二人。

王天木等人平安夜张狂玩乐

1939年12月24日，这个平安夜，上海一扫之前的萎靡，变得热闹非凡。极司菲尔路的汪伪76号特工总部也是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汪伪政府的大汉奸汪曼云、蔡洪田、顾继武、凌宪文和黄香谷，以迎接自广东而来的陈公博为名，在汪伪76号的高洋房里举办平安夜大餐。王天木、陈明楚、何天风等叛变者都作为作陪者出席。此时的王天木，已升任汪伪政府的“和平救国军”总指挥，并兼任汪伪政府特务委员会委员。

王天木等人在高洋房里大吃大喝、高谈阔论一番后，觉得只是几个人在汪伪76号总部吃喝，未免还是单调，听着外面的烟花爆竹声和街头艺人打把式卖艺的吆喝声，王天木等人心里痒痒的。于是，王天木向何天风、蔡洪田和陈公博等人商议，去外面逛逛，玩乐一番，王天木还提起了几个相对著名的夜总会的名字，提议去夜总会喝酒、跳舞、取乐。王天木还悄悄凑到汪曼云身边，对他耳语：咱们去外面乐呵乐呵！

汪曼云听着外面的声音，也想去玩乐一番，但他是今天宴会的发起人，怎么可以丢下这些客人，和王天木他们出去玩乐，于是只能无奈地对王天木悄声说：“我去不了。”

王天木以为汪曼云在推脱，又极力怂恿了汪曼云一番。汪曼云于是解释，自己是这次宴会的主人，必须要尽到主人的责任。

王天木、何天风等人看到汪曼云怎样都不肯去，于是便向汪曼云告辞，说他们几个先去百乐门戏耍一番，等汪曼云送走了客人，再到百乐门去找他们，然后几人再换个地方好好玩一玩。

汪曼云点头答应了王天木等人的邀请，然后，王天木等人便出了汪伪76号，前往百乐门。

汪曼云侥幸逃劫难

席散后，汪曼云想起王天木等人的邀请，就打算去百乐门找王天

木等人，可闻见自己身上有浓郁的酒肉味，自觉如此前往舞厅着实有些不雅，于是回了家，打算换身衣服再去赴约。

可汪曼云回家后，换好衣服，却被妻子拦住了。汪曼云的妻子见他如此晚归，回来后却没有洗漱睡觉，反而换了衣服准备出去，颇感好奇，便问他想到哪儿去？汪曼云就将王天木的邀约如实地告诉了他的妻子。汪曼云的妻子听后，觉得十分不妥，就劝他说：“别去了，这几天外面不太平，打来打去的，枪弹不长眼，万一伤到你怎么办？再说都这么晚了，你就在家休息吧，别去凑这热闹了。”

汪曼云想了想，觉得妻子说得有理，再加上他在席间喝了不少的酒，当下也着实有些困意，便差人去百乐门，告知王天木、何天风等人，自己今晚不能赴约，并向他们道歉。

第二天天还没亮，汪曼云尚在睡梦中，就听到大门外有人在急促地敲门，他睡眼朦胧地问前来禀报的家人是谁，家人禀报，来人自报姓名冯一先。汪曼云颇感诧异，这么早，自己在汪伪 76 号的同事冯一先来干什么？汪曼云忙起床，请家人引冯一先进门。冯一先一见到汪曼云，还没有等汪曼云开口，就兴奋地冲汪曼云大声说：“恭喜汪先生，恭喜啊恭喜！”

冯一先这番话让汪曼云颇有些迷糊，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他问冯一先：“冯先生，我有何喜？”

冯一先咧嘴一笑，说道：“昨日夜晚，你没和王天木、何天风等人一起去玩乐，就是件值得祝贺的大喜事啊！”

汪曼云于是意识到，一定是王天木等人出了岔子，但事情到底有多严重，他猜不到。

还未等他开口询问，冯一先就滔滔不绝地把事情的原委讲了出来。

原来，昨天晚上，王天木、何天风等人到了百乐门后，一边喝酒跳舞，一边等待汪曼云的到来。等来等去，等到的却是汪曼云派来的家人，在听家人说，汪曼云今晚不来百乐门之后，他们便转战兆丰夜总会。

王天木、何天风在兆丰夜总会疯狂歌舞到凌晨 3 点钟，仍觉意犹未尽，几个人便一起到兆丰夜总会的优待室里抽起了大烟。天色微亮时，这几人终于尽了兴，恋恋不舍地从兆丰夜总会走了出来，准备回家。

当时，何天风的下属，原军统特务冯国桢走在最前面，何天风和陈明楚跟随其后，王天木走在最后。

这一行人刚刚走出兆丰夜总会，异变陡生，紧随他们身后的王天木的副官马河图，突然掏出手枪，射向何天风和陈明楚。何天风、陈明楚二人中枪倒地，冯国桢听到枪声后，立刻倒地装死。而何天风的保镖，在短暂的错愕后，马上掏枪回击。马河图也不恋战，迅速混入人群中，跳上汽车逃之夭夭。

汪曼云夫妇听了冯一先的这番叙述，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汪曼云心中暗自庆幸昨晚没去百乐门找王天木等人，不然，他恐怕就见不到今天的太阳了。

汪曼云又想起，今天一早，他还没有睡醒，丁默邨就给汪曼云来电话，让他带汪伪特务顾继武、蔡洪田、凌宪文、黄香谷四人，赶到汪伪 76 号，说有重要的事情商议。

汪曼云于是猜测，丁默邨一早给自己打电话，很可能与昨晚何天风、陈明楚被刺一事有关，于是，汪曼云片刻不敢耽搁，先谢过冯一先，收拾妥当后，迅速赶到了汪伪 76 号。

刚到会议室门口，汪曼云就感受到了会议室里的紧张气氛，大家的目光都指向这次事件的关键人物王天木。

汪曼云迅速意识到，大家都在怀疑王天木。因为马河图是王天木的副官，他跟随王天木多年，二人感情如同兄弟，并且马河图与何天风、陈明楚二人素来也没有任何过节，因此，众人对这起枪击案的解释就是：马河图是奉王天木之命，刺杀何天风和陈明楚的。那么，王天木为什么要刺杀何天风和陈明楚呢？有可能是因为王天木与此二人有过节，也有可能是因为王天木是军统安排到汪伪 76 号的内线。总之，王天木是这起枪击案最大的嫌疑人。

王天木遭嫌疑被搁置

众人这样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如果王天木的副官马河图是擅自与军统局勾结，而王天木本人并不知情的话，那么马河图第一个刺杀的人应该是王天木，而不是何天风和陈明楚。那么，为什么马河图饶过

王天木，只刺杀何天风与陈明楚呢？很显然内藏蹊跷。

当然，也有人猜测，王天木并没有和军统局和戴笠勾结，然而他却知道马河图与军统局私下勾结，却没有告发马河图，所以马河图才会对他手下留情。当然，这只是一小一部分人的猜测，大部分人都认为，王天木是假投降真卧底，这起刺杀案件就是王天木指使他的副官马河图，对何天风、陈明楚等人下手的！

面对众人的质疑，王天木坚决否认自己知道马河图与军统局联系一事，也不承认自己是这起刺杀案件的主谋。

王天木的拒不承认，并没有打消众人对他的怀疑，还让李士群更加坚信，王天木与这件事有关联。因为这次玩乐，本就是王天木鼓动发起的，地点也是王天木挑选的，出了这样的事情，王天木自然罪不可逃。如果当天王天木没有鼓动众人出去玩乐，就不会发生这起刺杀案件，如果不是王天木选择转战兆丰夜总会，也许也不会发生这起刺杀案件。

放下汪曼云，再说汪伪 76 号。

在汪伪 76 号将王天木作为嫌疑人扣押和审问的过程中，还出了两个小插曲。

在审讯王天木期间，同为军统叛徒的林之江表现得特别激动。作为审讯人之一的林之江，曾经几度欲拔枪射杀王天木，都被丁默邨劝阻了。对于林之江为什么这样激动，没有人能解释清楚。笔者翻阅了很多资料，只有关于这一情节的叙述，却没有关于林之江为什么如此激动的官方解释。如果说林之江是军统局安插在汪伪 76 号内的卧底，那么林之江在“愤怒”之下，一时失去理智，将王天木杀掉，也倒是他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做法，符合戴笠和陈恭澍的意愿。但如果林之江不是军统局的卧底，那么他如此愤怒，几度欲拔枪射杀王天木，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林之江和王天木的私人过节太多，林之江想趁此机会公报私仇！

这个小插曲之外，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不管林之江为什么几度欲拔枪射杀王天木，林之江的举动都惹恼了一个人，那就是丁默邨。

王天木被汪伪 76 号扣押后，丁默邨一直力保王天木，因为王天

木是他的亲信，在汪伪 76 号丁默邨派系和李士群派系针锋相对的态势下，丁默邨自然不肯让李士群斩杀自己的重要亲信王天木。

因此，丁默邨对一直认为是自己人的林之江，恼怒不已，他没想到，林之江居然会在这件事情上拆自己的台。对此，丁默邨猜想，自己派系中的不少人，可能都已经被李士群拉拢过去了。

再后来，由于在对王天木的处理方式上，李士群和丁默邨各执一词，所以案件一直没有进展，无奈之下，他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那就是将王天木搁置不用，软禁起来了事。

直到 1941 年，王天木才被汪伪 76 号释放，王天木在出狱之后就不见了踪影，直到 1949 年，国民党逃往台湾时，才有人在一艘开往台湾的船上见到了王天木。

那么，话说回来，刺杀案件发生的当时，为什么马河图没有射杀王天木呢？难道是因为马河图跟随王天木时间久了，感情深厚，于是马河图不忍心结束这个大汉奸的生命吗？

事实上，马河图并非有意放过王天木，按照计划，王天木本也逃不掉被射杀的命运，然而幸运的是，在马河图开枪前，王天木忽然觉得肚子痛，就转身回夜总会上厕所去了。正是因为这样，王天木躲过了一劫。

当时，刚刚转身进入夜总会的王天木听到了枪声，出于本能，躲到了沙发背后，待到日本宪兵队赶到时，他才颤颤巍巍地从夜总会里走了出来。而此时，汪伪 76 号的特务们也赶到了夜总会，于是他们将王天木、冯国楨和王天木的保镖们都带回了汪伪 76 号，就夜总会枪击案一事进行审问。

再说那个刺杀何天风、陈明楚的马河图，他从沪西的兆丰夜总会逃走，躲进了法租界。随后，陈恭澍派人将他秘密送到了重庆。到了重庆后，戴笠没有丝毫吝啬，大方地奖励了马河图 10 万元。

三个军统叛徒，两死一被送监狱，这样的结果，极大地纾解了戴笠心中积压的恶气，并且还让鼓舞了军统局的士气，让军统局众特务打击汪伪 76 号的兴致高涨。

打入汪伪 76 号的天才间谍侯建

加入中共特科的侯建

有的人天生就是当间谍的料，不用人指导就能自主学会各种间谍本领，如情报高手戴笠、奇女子郑如萍、海上谍才侯建、五重间谍袁殊。这些人都是天生的间谍高手，其中除了奇女子郑如萍服务于中统局外，戴笠、侯建与袁殊都服务于军统局。

侯建和袁殊，都是曾经受命于戴笠，潜伏在汪伪 76 号中的军统局的双料特工。

说起侯建，那就话长了，因为侯建是四重间谍，可谓当时最有“料”的特工之一。

侯建，其父是老同盟会会员侯晓岚。侯晓岚是孙中山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并且还曾经出资支持过孙中山革命。侯建的母亲袁殊兰是苏州的一位富家小姐，和国民党诸位高官来往密切。可以说，侯建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官二代、富二代。按照常理来说，他学成后加入国民党，成为国民党党内一名年轻有为、潜力非凡的军官是理所当然的，然而事实总和人们想象的有些偏差。侯建早年在日本留学，学习新闻学，当时，年轻的侯建梦想做一名报道时政新闻，一切从事实出发的新闻工作者。因此，侯建学成归国后，进入了自己喜欢的媒体行业，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工作后不久，侯建又觉得给别人打工，发表文章受到很多限制，便下定决心创建属于自己的《文学新闻》报。

侯建文如其人，文章犀利、有个性，评价时事往往一针见血。侯建的文章总是非常出彩，很快，侯建就被左翼文人团体所关注。后来，左翼文人潘梓年，将侯建的文章送到了中共特科的领导人潘汉年的面前。潘汉年看完侯建的文章，觉得侯建是可造之才，因此请潘梓年为他引见侯建。

1931 年 10 月，通过潘梓年的牵桥搭线，侯建在上海静安寺一家咖啡馆与中国共产党成员潘汉年和王子春见面。谈话中，潘汉年表示：中国共产党看了侯建主办的《文学新闻》报，赞叹他是个人才，想邀请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打算安排他进入中共特科工作，如果侯建愿

意加入中共特科,那么自己就是他的直属领导人。侯建听后,欣然同意。自此,侯建从一名纯粹的新闻工作者,变成了一名游走在危险边缘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

1931年底,潘汉年交给侯建一个任务,让他想尽办法加入中统局,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局中,为中国共产党提供有用的情报。这个任务对侯建来讲并不困难,很快,侯建在表兄的介绍下,结识了当时任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局长的吴醒亚。在吴醒亚的推荐下,侯建正式加入了中统局上海反共特工小组。侯建就此成为潜伏在国民党中央局的中国共产党中共特科的地下特工。那么,此时已经是双料间谍的侯建,后来又是怎么和军统局搭上关系的呢?

1935年,侯建被国民党逮捕,他的父母百般疏通,终于将他救了出来。出狱后,侯建觉得,以自己现在的状态,即使留在国内,想要开展中国共产党地下事业也是很困难的,因此他向中国共产党党组织提出,出国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经过商议后,批准了他的请求。就这样,侯建远赴英国留学,直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谈判,侯建才学成归国。回国后,侯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联系潘汉年,向他汇报自己这些年在英国的学习情况和收集到的情报。

这时候,侯建经过杜月笙推荐,认识了戴笠,当戴笠获知了侯建留学日本、英国的经历,并了解到侯建所学为无线电通讯技术后,认识到侯建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而且杜月笙对戴笠说,如果戴笠能将侯建招揽进来,那么手下就多了一员足智多谋的大将。

戴笠听了杜月笙的意见,对侯建起了招揽之心。侯建得知戴笠要拉拢自己,立刻将此事告知潘汉年。潘汉年思量后,认为这是侯建打入军统局内部的好时机,建议侯建接受戴笠的招揽。

1937年9月,侯建成为军统局的一名骨干分子。

此时,除了潘汉年和侯建自己,谁也不知道他已经是身具三重间谍身份的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加入军统局后不久,侯建跟随戴笠去往香港,参加军统局的情报工作会议。到了香港后,侯建得知潘汉年也来到了香港,便想方设法

与潘汉年取得了联系，向他报告了国民党中统局、军统局对日伪的暗战情况。

在侯建陪同戴笠在香港参加军统局情报工作会议期间，戴笠曾多次对侯建进行考核，不仅对他所拥有的各种层面的知识进行了严格的考查，也对他的行动能力进行了严格的考核，最后，戴笠得出一个结论：正如杜月笙所说，侯建的才华和能力都十分出众。得此干将，戴笠大喜，对付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的决心也大涨，不久，戴笠便在心中定下一计，决定让侯建担负起对付汪伪 76 号的重任。

军统情报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戴笠秘密召见侯建，交给他一项绝密任务：想尽办法摧毁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

侯建被抓入汪伪 76 号，成为多重特工

接到戴笠的任务时，侯建的想法很简单，他认为摧毁汪伪 76 号，符合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一切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原则的思想，是一种抗日行为，他便接受了戴笠指派的这个任务。

侯建毕竟还是年轻，经验不足，他根本没有充分意识到这项任务的难度系数。当时，能够指导侯建行动的中共特科的有关领导人潘汉年已经离港，侯建也无法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得到指导和支持。同时，侯建单纯地认为，戴笠手下的特工都与他一样，是坚定的革命者，却没想到这些人的意志、信仰、秉性都与他截然不同。

侯建接到戴笠的任务后，迅速回到了上海，专心研究摧毁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的办法，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后，他把自己的最终计划交到了上海区区长王天木的手上。但是，让他想不到的是，自己的上司王天木竟然投靠了汪伪 76 号，而且很快就出卖了自己，把自己的计划书交给了汪伪 76 号特务组织，于是，侯建很快就被带入了汪伪 76 号的审讯室。

侯建被捕后，虽然受到了汪伪 76 号的审讯，却一直没有遭受酷刑，这是因为对如何处理侯建，李士群和丁默邨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

李士群看到侯建策划的摧毁汪伪 76 号的计划后，深感震撼。如果此计划成功实施，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一定会被炸毁。从这个计划

书中，李士群看到了侯建的才华，心里生出“此人若能为我所用，何愁不能夺天下”的壮志雄心。因此，李士群主张利诱侯建，促使其加入汪伪 76 号。

而丁默邨看过侯建的计划书后则认为，侯建此人着实可恨，居然想出这样恶毒的办法摧毁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这简直是要让他们死无丧身之地啊，因此他坚持要将侯建用最残忍的方法杀死。

李士群和丁默邨就对侯建的处理上产生了分歧。

李士群劝丁默邨说：“侯建留学英国，精通无线电技术，还会多个国家的语言，日语和英语说得尤其好，如果把他拉到汪伪 76 号，会成为情报科的优秀人才。这样，我们在日本人面前，腰杆子能挺得更直！”

丁默邨对李士群的话充耳不闻，坚持要将侯建碎尸万段。

李士群和丁默邨谁也无法说服谁，无可奈何之下，他们只得找到周佛海，让他决定侯建究竟是死是留。周佛海给二人写了一张字条：“凡是可杀可不杀之人，都可不杀。”而侯建也正是因为周佛海的一句话，才得以保住性命。

随后，李士群为了拉拢侯建，特意把他带到家里。李士群把侯建带到家中后，遣退佣人，将妻子叶吉卿叫了过来。

原来，李士群夫妻二人，在服务于中国共产党期间就与侯建相识了，他早已知道，侯建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因此，李士群在汪伪 76 号见到侯建时，便以为侯建和他一样，是被国民党逮捕后，经受不住酷刑才叛变加入国民党的。基于此，李士群才认定侯建是个贪生怕死之徒。于是，为了让侯建为己所用，李士群主张诱降侯建，并对侯建许诺，只要他加入汪伪 76 号，就能既往不咎，不仅免其一死还将对他委以重任。

李士群把侯建领进家门后，以为侯建会感念自己的不杀之恩，接受他的诱降，然而没想到，侯建并不买账，侯建竟然这样对李士群说：“你之所以敢这么说，就是因为背后有日本人撑腰，我的后台比你李士群的后台还要硬！”

李士群见侯建很干脆地拒绝了自己的诱降，颇为恼火，他不明白

侯建所说的“我的后台要比你李士群的后台还要硬”是什么意思。

为了证明所言非虚，侯建向李士群要求，允许自己打个电话。李士群听后犹豫不决，不知道侯建究竟想做什么。

此时，一直在一旁的叶吉卿走上前来，和李士群耳语了几句，李士群就上楼去了，上楼之前，对侯建说：“你只管打电话。”

侯建在叶吉卿面前拨通了电话，然后叶吉卿就在旁边听着，虽然侯建说的是日语，但叶吉卿多少也听懂了一些。

渐渐的，叶吉卿听出了电话里的玄机，借着侯建打电话的工夫，她上楼告诉李士群，侯建的电话是打给一个分量十足的日本官员的，他们得罪不起。

李士群之所以上楼，也是为了找来汪伪 76 的翻译，请翻译通过电话分机监听侯建的电话。

于是，李士群决定，先不为难侯建，将他先送到一个秘密的地方住下，然后从侯建的妻子入手，劝降侯建。

李士群在安顿好侯建后，让妻子叶吉卿与侯建的妻子取得了联系，告诉侯建的妻子侯建的下落已经明了，李士群正在想尽办法营救侯建。

侯建的电话究竟是打给谁呢，这个人竟然能让李士群如此投鼠忌器？

侯建的电话，打给了一个日本军官，这个分量十足的日本军官就是日本驻沪总领事馆副总领事岩井英一。岩井英一是活动在日本的老特工，虽然表面上他只是日本驻沪总领事馆的副总领事，然而实际上，连总领事馆的总领事都要卖他三分面子。

早在 1933 年，侯建便与岩井英一结识。当时，岩井英一在与侯建交谈过程中，一直对侯建的日语水平赞叹不已，还说侯建的日语水平已经可以到东京电台当播音员了，很多日本人没有侯建说的这般字正腔圆。那时候，侯建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明白结识一个在日本政府具有相当地位的人，对抗日战争的帮助有多大，因此他有意识讨好岩井英一，经常投其所好，邀请岩井英一去舞厅、酒店、夜总会等地休闲娱乐。

在侯建的刻意结交下，岩井英一很快将侯建当作自己的知交好友，

并一直保持联系。

当岩井英一接到侯建的电话，得知自己的好友侯建有难，被日本政府的“傀儡”——汪伪政府的特务机关扣押，决定帮侯建一把。

没过两天，岩井英一亲自带着两名日本卫兵，来到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找到李士群，要求李士群马上释放侯建。

李士群哪敢不从，马上派人将侯建带到了岩井英一面前，岩井英一见到侯建，先请侯建上车，亲自帮侯建关好车门后，才从车身的另一侧上车。

侯建享受日本人的如此礼遇，让看到此景的汪伪 76 号的特务们目瞪口呆，羡慕不已；也让李士群暗自庆幸自己没对侯建动刑，而是好吃好喝地伺候着他，否则要是岩井英一看到伤痕累累的侯建，自己就算不死，恐怕也会被扒层皮。

岩井英一将侯建从汪伪 76 号中救出来了，自然也了解了侯建因何被汪伪 76 号拘禁。岩井英一也是个聪明人，赔本的买卖他不会做，因此在车上，他迫不及待地向侯建提出，让侯建在报纸上发表他和日本政府合作的声明。

侯建并不愿意这样做，因此侯建对岩井英一表示，这件事事关重大，他要考虑几天。岩井英一也算当侯建是朋友，没有强迫他马上答应，而是给他时间考虑。

侯建吸取这次任务失败的教训，在岩井英一离开后，想尽办法与潘汉年取得了联系，寻求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的帮助和支持。

不得不说侯建运气很好，恰巧此时，潘汉年正在上海，没几天，侯建就找到了潘汉年，把自己被抓进汪伪 76 号，到被岩井英一相救，再到岩井英一要求自己为日本政府服务的经过，详细汇报了一番。

潘汉年听了侯建的汇报后，感受到侯建坚定的革命意志。他告诉侯建，可以答应岩井英一的要求，并给戴笠写一封信，阐明自己加入汪伪 76 号的缘由以及请教进入敌人内部后自己该怎么做。潘汉年认为，戴笠此时一定也希望在汪伪 76 号以及日本政府里有一位有分量的自己人，因此，戴笠也必定会支持侯建答应岩井英一的要求。

侯建当着潘汉年的面，写了一封信给戴笠，信上详细叙述了自己

的遭遇。不久，侯建收到了戴笠的回信，果不出潘汉年所料，戴笠同意侯建加入日本政府，成为一名“日本特工”。

因为岩井英一要求侯建公开加入日本政府，所以侯建就成了被摆在明面上的汉奸，也正是因为这样，侯建承受了许多不明真相的爱国人士和中国共产党员的唾骂。这些压力他都默默承受下来了，从来没有站出来为自己辩解过一次。侯建就这样，在中共特科的领导人潘汉年的指导下，把日本政府的情报悄悄地透露给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和国民党军统，在四大特工组织里小心谨慎地游走战斗了多年。

袁殊——中国共产党唯一的五重间谍

袁殊在中国共产党党员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唯一一个拥有五重身份的间谍。他也是第一个提出“报告文学”这种概念的作家。许多人曾经说过袁殊如果不搞情报工作，而是专注于文学，一定能成为当时著名的作家。

话说回来，虽然袁殊与侯建同是多重间谍的身份，但二人成为多重间谍的原因却是不尽相同的。袁殊的间谍身份包括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军统、中统、青帮、日伪这五个方面，其中青帮的间谍身份是侯建所不具备的。袁殊加入中统、军统、青帮和日伪的过程其实与侯建有些相似，都是经由潘汉年同意的。

潘汉年这个人是个大人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受中国共产党党中央委派，出任“中共特科”的领导人，专门负责情报工作和广大中国共产党员的保卫工作。由于他身具领导地下党员，与负责上层领导保卫工作的双重任务，因此要求他具有广泛的人脉和强大的社会背景。

听起来这个职位很难做，但潘汉年却能在隐秘和公开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活动中游刃有余，完成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工作。正是因为袁殊与侯建都从属于潘汉年，因此他们的背景如此相似也就不足为奇了。

言归正传，袁殊加入军统特工后，戴笠交给他两个重要任务，一个是寻找机会刺杀李士群；另一个是加强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套取中日和平的要求。

袁殊本来想先完成刺杀李士群的任务，但计划还没有完善，就与侯建一起被王天木出卖，因此刺杀李士群一事只能搁浅。袁殊为了继续革命工作，就对自己也非常熟识的岩井英一提出了“兴亚建国运动”的计划，并化名为严军光，发表了《兴亚建国论》。

在袁殊的《兴亚建国论》中，有这样一段：

日本与外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之日，也就是我们亚洲民族复兴之日。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后，亚洲始见最初的独立国家。其他如中国、印度、波斯、阿富汗、阿拉伯、土耳其等国，都不能算是独立的国家。只不过是欧洲各国支配分裂下的殖民地。在三十年前，日本也是欧洲一个殖民地，只是日本人民具有先见之明，知道民族国家兴隆衰歇的理由，立刻分歧和欧洲人斗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使日本成一个独立国家。自日本在东亚独立以来，全亚洲的各国家与各民族，便生出了一种新的希望。他们生出了一种信念：日本既能废除不平等条约而独立，他们当然也可以追从模仿，因此便产生了种种的独立运动，来解脱亚洲人的束缚，不做欧洲人的殖民地，要做亚洲的主人翁。像这种思想，就是三十年以来的思想，这种乐观的思想，与三十年我们全亚洲的民族思想非常不同。欧洲的文化、科学和工业都在进步，所以兵器精、兵力强。我们亚洲却别无所长，因此亚洲到底不能抵抗欧洲，到底不能从欧洲的压迫下解脱，大有永远做欧洲的奴隶的景况。这就是三十年前的悲观思想，然而日本废除不平等条约之后，日本就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和日本接近的民族与国家，当然大受影响。

（摘自严军光《兴亚建国论》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一月初版）

表面上看，袁殊发表的《兴亚建国论》是为日本说好话，为日本

工作，而实际上袁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掩护他所拥有的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电台，让他能在日伪的监控下，用更灵活、更隐秘的方式将窃取到的机密情报发出去，以便中国共产党能够针对日伪的情报及时调整作战方针。

袁殊假意投日的举动不仅潘汉年知道，戴笠也是知道的。

袁殊成为日伪间谍后，奉戴笠的命令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目的是暗杀臭名昭著的汉奸以及惩办日本军人。而袁殊的情报首先报告给潘汉年，其次才选择性地报告给戴笠，毕竟在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和中国共产党都为抗日而战斗，两大组织之间还是有共同利益的。

正是因为袁殊的情报，中国共产党和军统躲过了很多灾难，避免了巨大损失。

当年，潘汉年曾经伤感地说过一句话：大凡搞情报工作的人很少有下场的。而袁殊的下场正好验证了潘汉年的这句话。

1945年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后，袁殊辞去伪教育厅的职位，被军统任命为忠义救国军新制别动队第五纵队指挥以及担任军统直属第三站站站长，并被授予中将军衔，从这些来看，戴笠对袁殊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然而，戴笠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袁殊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特工。

1946年初，袁殊不告而别去了解放区，这个结果让戴笠感觉像是被人扇了一大巴掌，恼羞成怒的他不仅抄了袁殊的家，还对袁殊下了通缉令。1958年，袁殊的妻子因为经受不住军统的恐吓与折磨，企图服药自杀，幸好被人及时救下，才保住了性命。后来，袁殊的妻子为了躲避军统的恐吓，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讯。当时，袁殊并不知道自己的出走，给家人带来巨大的灾难。

1987年，年迈的袁殊精神紊乱，身患重病，经常毫无所觉地号啕大哭，1987年11月26日，袁殊在北京病逝，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

袁殊的一生，虽然历经磨难，但他是一名被人民永远铭记的抗日烈士，没有人能抹杀他在抗日战场上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更没有人能抹杀他为民族独立、中国解放立下的汗马功劳。

第二节 被汪伪 76 号摧毁的军统青岛站

戴笠在汪伪 76 号特工组织内部，成功安插间谍后，却因为军统局老牌特务王天木的叛变投敌，被汪伪 76 号狠狠地“黑”了一把。王天木的投敌，导致军统上海站被汪伪 76 号破坏殆尽，以至于直至抗日战争结束，军统局都没能将上海的情报站再次发展起来。而在摧毁了军统上海站后，李士群为给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等卖国巨奸保驾护航，先行一步前往青岛，在王天木的指领下，准备破坏军统青岛站。前文中，笔者曾经提过军统青岛站被汪伪 76 号破坏，这一节将全面展开叙述。

群奸聚集青岛

先简单介绍一下军统局青岛站的发展历史。

军统局青岛站，在没有遭到汪伪 76 号破坏前，可以说是固若金汤。

1938 年，军统局成立，同年，戴笠在山东设立了军统青岛站和军统济南站。

军统局在青岛设立特工站，并不是戴笠的首创，军统青岛特工站的历史，其实应该从 1932 年 4 月，军统局的前身“力行社”建立那年算起，当时，“力行社”特工李兰亭、郑兴周，就被委派到济南、青岛去组建特务组织。1935 年，“力行社”青岛站被改为“国际情报组”，到 1938 年，戴笠在山东发展情报组织，才将“国际情报组”改为军统局“青岛站”。

1939 年 11 月，军统局青岛站被汪伪 76 号破坏，虽然戴笠一直在试图恢复军统局青岛站的实力，但因日伪政府多加阻挠，戴笠一直未能如愿。

1946 年，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后一年，军统局才得以重建青岛站。

1949 年，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后，在解放后的华北地区秘密筹建特务组织，在青岛设立华北办事处，专门负责特务的潜伏工作。

1949 年 6 月 2 日，青岛解放，保密局青岛站彻底覆灭。

据统计，国民党军统局自1932年4月开始到1949年6月，在17年的时间里，在青岛共建立了22个特务小组，包括特务151名，其中长驻青岛的特工共有38人。

军统青岛站的实力不可谓不强大，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军统青岛站却在最鼎盛的时期，因为内部叛徒的腐蚀，从牢不可破变成千疮百孔。而导致军统青岛站破败的导火索，就是为了确立伪中央政府成立，三大汉奸巨头齐聚青岛。

就让我们从1939年5月说起。

1939年5月，汪精卫前往日本拜见日本新首相平沼骐一郎，希望从日本新首相平沼骐一郎那里获得援助，帮助他建立伪中央政府。当时，日本新首相平沼骐一郎和汪精卫交谈甚欢，在谈话中，平沼骐一郎爽快地答应了汪精卫的求助。得到日本首相的承诺后，汪精卫信心满满地离开日本返回国内。

为了确保伪中央政府的建立万无一失，汪精卫决定先举行伪中央政治会议，通过伪中央政治会议上的成员“民主”选举，生成伪中央政府各个部门的人员名单。

为了能够顺利当上伪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从其他汉奸手中夺取更多的权力，汪精卫于1940年1月19日，致电王克敏、梁鸿志等卖国巨奸，邀请他们到青岛参加伪中央政治会议。

汪精卫在前往青岛前，找到了汪伪76号的当家李士群。

自从汪精卫公开发表“艳电”起，国民党就把汪精卫列为了必杀目标之最，汪精卫走到哪里，国民党的杀手就跟到哪里，有几次，汪精卫甚至与死神擦身而过。因此，汪精卫对国民党军统杀手恐惧至极，即使是身处防备森严、几乎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的汪伪76号，他都不能酣然入睡。虽然汪精卫恐惧军统局的杀手，但为了建立伪国民政府，他不得不按照日本人的意思去青岛主持会议。所以此次前往青岛，汪精卫要住在一个他并不太了解，且军统特工力量十分强大的地方，他不得不认真防范。为了保住性命，汪精卫去往青岛前，将李士群找来，让他先行前往青岛，把青岛的反对势力清除干净，以确保他们一行人的人身安全。

李士群接到汪精卫下达的命令后，不敢怠慢，马上着手行动。说来也巧，汪精卫给李士群下达任务时，汪伪 76 号恰好将王天木迎进门。王天木在军统算是老资历了，他对军统北平战、天津站、青岛站虽不如对上海站那么了如指掌，却也有七八分熟悉。有了王天木的帮助，李士群打击军统青岛站就胸有成竹了。

在汪伪 76 号带着王天木前往青岛的同时，戴笠也给军统局青岛站站长傅胜兰下达了指令：不计一切代价，务必制裁汪精卫。

军统局青岛站站长傅胜兰接到戴笠的命令后，先是安排人手探查汪精卫的下榻地址。

汪精卫即将在青岛下榻的地点，非常容易查出，因为当时青岛被日军占领，汪精卫、王克敏等汉奸巨头前来此处会谈是一件大事，不管是伪青岛警察署还是日本军警特宪科都非常重视，所以大张旗鼓地严密部署。虽然条条街道都岗哨密布，但明眼人都能看出，位于青岛龙山路的迎宾馆的警戒与其他地方迥然不同，这里重兵把守。所以不难猜出，这里就是汪精卫下榻的具体地点。

在获悉汪精卫下榻的确切地点后，傅胜兰立刻派出特务前往迎宾馆观察周围地形。勘察过后，傅胜兰大致了解了伪警察和日本警察的兵力部署。随后，傅胜兰利用迎宾馆周围的地形，让手下的人装扮成不同的社会人士，来往于宾馆周围，秘密地将军火运送到制定的狙击点上，准备在汪精卫等人到来的当天，一举将这些汉奸击毙。

傅胜兰的计划十分周详，若照计划行事，汪精卫必定难逃一死，但是谁也没有想到，王天木居然叛变了。王天木不仅从熟识的青岛站特工口中，将傅胜兰的计划和盘套出，还亲自带着李士群等汪伪 76 号的特务，将傅胜兰和军统青岛站的数十名重要人员逮捕殆尽，最终导致傅胜兰的部署功亏一篑，而汪精卫，则又一次躲过了死神的镰刀。

躲不过美人心计，傅胜兰竟成汉奸

在摧毁军统青岛站时，汪伪 76 号逮捕了军统局青岛站的大部分特工，其中不仅有军统上海站站长傅胜兰，还包括军统出纳，也是傅胜兰的情人丁美珍。而丁美珍的被捕，则最终为傅胜兰铺就了一条不

归的汉奸之路。

汪伪 76 号的特务，将傅胜兰带到青岛伪警察局后，进行严刑拷打，逼迫他交出青岛军统站的漏网特工的名单。傅胜兰还算是块硬骨头，在酷刑下，他咬紧牙关，一言不发。正当李士群无计可施之时，王天木给李士群出了个主意，他对李士群说：傅胜兰的弱点，在于情感，他惦记着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与傅胜兰一同被抓的丁美珍。

李士群听后，立刻命人将丁美珍带到傅胜兰面前，并命人当着傅胜兰的面毒打丁美珍。傅胜兰倒挺住了，看着丁美珍遭受酷刑，也没有叛变，然而丁美珍无法承受酷刑，挨打后，主动对李士群表示，只要汪伪 76 号能放了她和傅胜兰，并且让傅胜兰马上和她结婚，她就能策反傅胜兰，并策反傅胜兰的部下，全都追随傅胜兰，一同加入汪伪 76 号。这正是李士群想要的结果，因此，丁美珍的这个提议马上就被李士群批准，丁美珍就此叛变。

丁美珍和李士群达成协议后，马上被送到了傅胜兰身边。

丁美珍极力劝说傅胜兰投降，泪眼婆娑地对傅胜兰说：“不要再坚持了，再坚持下去连性命都保不住了。”傅胜兰也算条汉子，不怕疼，不怕打，什么都不怕，可就怕美人泪。看见丁美珍的眼泪，傅胜兰的态度有些松动，丁美珍随即明白，自己离成功只差一步了，只要再加把劲就能劝说成功。

随后，丁美珍软声软语地对傅胜兰描述他们以后的美好生活。这些话语让傅胜兰重新燃起对权力、财富和美色的渴望，也让他最终决定放弃自己的坚持，成为日本政府在汪伪 76 号内的又一鹰犬。多么可悲，真可谓英雄难过美人关，美人泪断人肠，傅胜兰抵得住敌人的严刑拷打，却抵不住情人耳鬓厮磨的劝说和梨花带雨的眼泪。

投靠汪伪 76 号后，傅胜兰将手下的特工几乎全部拉到了汪伪 76 号，使得军统青岛站名存实亡，元气大伤，甚至在此后的几年内，戴笠都无法组建出另一个像样的青岛特工站。

青岛站特工在傅胜兰的带领下集体叛变，这件事让戴笠愤怒不已，戴笠发誓，一定要让傅胜兰死无全尸。但傅胜兰毕竟出身军统局，他了解戴笠的脾气，也了解军统局暗杀的力量。因此，傅胜兰在背叛时，

就已经清楚地知道，戴笠不会轻易饶恕他，所以他每次出门，保卫工作都做得非常严密。虽然戴笠很想让这位叛徒死无葬身之地，但军统在青岛的势力几乎不复存在，戴笠不得不另寻他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寻觅，戴笠找到了原军统局青岛站特工丁文惠。

丁文惠原是军统局青岛站的内勤，直属领导就是傅胜兰。傅胜兰被汪伪76号拉拢过去后，丁文惠也被傅胜兰出卖，被迫加入汪伪76号。

戴笠之所以找到丁文惠，是因为在工作过程中，丁文惠和傅胜兰之间曾经有过一段感情。戴笠认为，傅胜兰与丁文惠毕竟曾经是情人，傅胜兰对她的提防之心较小，由她去暗杀傅胜兰，得手的几率更大。

但是戴笠忽略了一点，丁文惠不是一个受过专业特工训练的人，她犯了一个所有特工的禁忌——被感情控制，失去了理智。

丁文惠和傅胜兰之间的感情是真实存在的，让她亲手结束傅胜兰的性命，对她来说太难了，她实在是下不了手，但戴笠的命令她又不能不从。

权衡之下，丁文惠决定用一种无色无味的毒药，来结束傅胜兰的性命。她准备把这种毒药放到傅胜兰家中的热水瓶里，这样，自己就能完成任务了，也不用亲眼看着心爱的人死去。

由于丁文惠对傅胜兰有情，所以她迟迟没有下手。这时候的丁文惠，一边寻找机会下手，一边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继续与傅胜兰交往。丁文惠本来以为，自己的表现天衣无缝，却不知她的异常，早就落入傅胜兰的眼中。这个老奸巨猾的特务开始对她提高警惕，处处监视她，但表面上却装作毫不知情。

终于有一天，丁文惠觉得戴笠交代的任务，不能再拖了，她鼓起勇气，准备将毒药放置在热水瓶中，却不想在放置毒药时，被傅胜兰亲手抓住。落在傅胜兰这样的人手中，丁文惠的结果可想而知，她当场就被傅胜兰带到卧室，勒死了。

一名年轻貌美的女子，就这样香消玉殒了，虽然傅胜兰是直接凶手，但戴笠才是这件事的始作俑者。戴笠找丁文惠暗杀傅胜兰，就注定了任务的失败，也注定了丁文惠的悲惨结局。丁文惠虽然隶属军统，但她不是专业的特工，没有接受过特工训练，再加上她对傅胜兰的难

舍真情，所以任务会失败，也就并不令人意外。

经过丁文惠一事，傅胜兰更加小心警惕，就连身边人都很难找到机会接近他。

时间很快到了 1940 年 1 月。

1 月 21 日，王克敏带着朱深、齐燮元等人首先到达青岛；次日上午，伪“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德王代表李守信紧随王克敏的脚步到达青岛；当天下午，汪精卫随同周佛海、林柏生一行人到达青岛。与王克敏、李守信来青岛的方式不同，汪精卫一行人不是乘飞机而来，而是坐轮船从上海而来。接到汪精卫等人即将到达的消息后，青岛的日伪军政要员为了巴结汪精卫，为自己挣一个好前途，纷纷前往码头迎接。伪警察局也不甘落后，派出了大批优秀的特工前往码头警戒，其中就有叛变不久的傅胜兰和他的部下。

汉奸在青岛上演的分赃丑剧

1940 年 1 月 22 日下午 3 时许，王克敏、李守信、汪精卫三大汉奸巨头为成立伪中央政府一事齐聚青岛。到了青岛，他们自然首先要拜见自己的日本主子。深受日本人重视的汪精卫，带着王克敏、李守信二人前去拜见驻青岛的日本将领，对日本主子大肆赞美一番。为了掩盖自己叛国投敌的罪行，汪精卫还特意在青岛迎宾馆招待中外记者，美化自己的所作所为，把自己卖国投敌行为美化为爱国行为。

三大汉奸将伪中央政府成立第一次会谈时间定在 1 月 24 日。

会谈时间商定之后，三个汉奸巨头得意扬扬，他们似乎看到伪国民政府成立后，举国上下对自己无比尊崇的场景。带着这样的憧憬，1 月 24 日，三大巨头走出迎宾馆的客房，从戒备森严的迎宾馆走廊一直走到小接待室，尽管当时天色突变，大雪突降，气温直降到 -10°C ，天色灰沉沉的，到处飘着鹅毛般的雪花，然而恶劣的天气没有破坏三大汉奸巨头高昂的情绪，他们在小接待室里描绘着伪中央政府的前景，讨论伪中央政府成立后，他们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让举国上下都知道他们成立了这样一个政府，日后伪国民政府的纲领是什么。三个汉奸经过一个下午的讨论，得出了彼此都十分满意的答案。

第一天的会议，气氛十分融洽，当然，这是因为这场会议主要针对伪中央政府成立的事情，没有涉及个人所拥有的权力。

第二天，也就是1940年1月25日，在伪中央政府各项事宜的具体会谈会议上，三大汉奸巨头的气氛就没有那么融洽了。因为三个汉奸巨头各代表一个日方集团，三人间权力的分配其实也是日本各方势力的较量。而在这场伪中央政府会议上，日本各派的实力人物不约而同地都到达了现场。

1月25日，会议刚开始，现场就变得剑拔弩张起来，三方各执一词，都认为自己一方应该享有最高利益。平时看上去斯文有礼的领导人，这时候都变成了市井泼妇，有的撸起袖子大声嚷嚷，有的站在桌子上振臂高喊，还有的不停地拍桌子。这些汉奸最丑陋的一面，在利益面前显露无遗。这不是一场会议，而是一场分赃丑剧，而这场“分赃”丑剧的导演，就是汪精卫。

汪精卫在会上高调地表示，既然是要建立伪国民政府，那么这个政府的权和必须聚集所有伪政府的权力，并凌驾于所有伪政府之上。也就是说，将所有的政权合并。而以他现在的资历、现在的职位，这个伪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人选非他莫属，并且，伪国民政府官员的任命，也应该由他来负责。这番话一出，在场的汉奸都坐不住了。

王克敏首先就表示不同意。王克敏的野心很大，日本人虽然没有重视他，但他一直认为自己是第一批投靠日方的政客，他的资历在这些汉奸中是最老的。因此，他认为这个伪国民政府的“一国之主”非自己莫属。在王克敏看来，汪精卫这个提议分明就是针对自己的，汪精卫这是在挑战他王克敏的权威。为了显示自己老奸巨滑的“资历”，王克敏发话了，他拍着桌子叫嚣：“汪精卫你算什么，我帮日本人做事的时候，你还跟着国民党政府打日本呢，凭什么你一来就要做伪国民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你哪有那资格！”

梁鸿志也高声反对。他高喊：“这绝对不行！伪国民政府可不是你一个人的政府，没有我们这些人，你以为你能站在这里！”话音一落，参加会议的众人立刻跟着起哄，全部都在讽刺、嘲笑汪精卫的不自量力。

会场即将暴乱，汪精卫无法控制，他不得不向日方求助。

支持汪精卫的日本军方代表终于出面，日本军方代表发言后，会场奸奸安静了下来。汪精卫借着日本军方代表的声势，又开始讲话，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刚才的混乱情形，汪精卫做出了一些让步，他声称自己不会独揽大权。

就这样，政权问题在汪精卫的让步下逐步商榷。

就在汪精卫觉得终于可以舒一口气时，一个棘手的新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伪国民政府各个部门的官员任命应该由谁来负责？

这又是个让这些汉奸们争论不休的难题。他们谁也不想落人一步，都想在伪国民政府里多安排几个自己的人。因此，汉奸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再次展开争论。

这场关于权力分配的会议，从早上一直持续到晚上，期间，争吵几度白热化，各方人马间火药味浓重。不过，虽然过程艰辛，但结果总算让每个汉奸都比较满意。

经过商讨，众人决定由王克敏担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自此，王克敏成为华北地区的“土皇帝”；梁鸿志担任监察院长；而汪精卫，则如愿以偿地成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其他汉奸，则按“劳”安插在各个部门中。

汉奸们借势分权，权力归属问题最终尘埃落定。而权力归属问题的尘埃落定，也预示着到了他们要去向日本主子致谢的时间了。

1月26日上午，汪精卫、王克敏和梁鸿志带着满脸的得意，在迎宾馆门口，当着众多的中外记者宣布此次会谈圆满成功，还大言不惭地说，这次会谈促进了和平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至此，三大汉奸巨头策划成立伪国民政府的丑剧终于落幕。日本人对这次会议结果非常满意，他们对记者表示，这次会议极大地缓和了中日关系。

在中外记者尚未散去时，主导这场丑剧的日本军方代表走到台前，拍着汪精卫的肩膀称赞他。而汪精卫则收起平日的趾高气扬，换上卑躬屈膝的嘴脸，连连表示，自己成功是因为日方的栽培得力。

这场会议虽然结束了，但它带来的影响却令人震撼。国民党阵营中的悲观分子、信仰不坚定的官员内心更为动摇，国民党营垒分裂加速。

而汉奸们如此赤裸裸的卖国行为，让所有爱国者愤怒不已。

1940年1月28日，在伪国民政府会议结束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就在报纸上发出号召：凡是爱国者、凡是有中国共产党党组织的地方，一定要坚决阻止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宣传，对于汪精卫之流的卖国分子，所有的中国人都可除之后快！国民党也紧随其后，表示对于汪精卫等汉奸成立的伪国民政府，国民党不予承认，中国只有一个政府，那就是国民党政府。对于这些卖国汉奸之流，他们将派出特别行动队，将他们铲除殆尽！

第三节 军统再次派人屡屡暗杀汪精卫

三大汉奸巨头齐聚青岛宣布成立伪国民政府一事，触动了国民党政府敏感的神经。蒋介石怒不可遏，急召戴笠前来，对他下达了无论如何都要将汪精卫、王克敏等卖国汉奸击毙的命令。戴笠对蒋介石向来都是唯命是从，他虽然感觉刺杀汪精卫等人困难重重，但还是将这个艰巨的任务承揽了下来。

刺杀汪精卫，军统越挫越勇

吴贻恕密谋刺杀汪精卫

其实，军统刺杀汪精卫的行动，自汪精卫发表“艳电”以来，一直都没有停止过。从军统远赴河内暗杀汪精卫，戴星炳潜伏汪精卫身边伺机暗杀，到陈三才的刺汪行动，军统一直把刺杀汪精卫作为头等大事。而汪精卫也因为这几次暗杀，加强了自己身边的警卫。这就意味着，暗杀汪精卫的成功几率越来越小，因此，每次暗杀汪精卫，戴笠都要部署好久，这次同样也不例外。

前文，笔者讲过戴星炳被军统小人物吴道坤和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出卖，被汪伪76号逮捕杀害的事情，但刺杀汪精卫的行动并没有就此夭折。

当初，戴笠为了确保此次暗杀能够成功，特意从军统总部调遣军统书记长吴赓恕，以及军统“江山帮”的十名特务前往上海，协助戴星炳的工作。所以说，虽然戴星炳被杀，但刺杀汪精卫的行动依旧在进行。

吴赓恕和“江山帮”的人都是戴笠的亲信，吴赓恕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忠心被戴笠一点点提拔上来的，“江山帮”的特务则都是戴笠的老乡。戴笠对这些老乡的信任，可以说是由心而发，而“江山帮”的特务们回报给戴笠的，也是一片片赤胆忠心。从戴笠组建军统直至戴笠死亡，“江山帮”的人没有一个背叛军统，也没有一个人在军统内部搞分裂。他们自始至终都是以戴笠为中心，以“江山”的老乡为队友，团结战斗。

话说回来，戴星炳被捕后，吴赓恕和“江山帮”的十名特务立刻启动了第二套刺杀汪精卫的方案。

吴赓恕在前往上海前夕，就打探到在维新政府里有两名他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班的老同学，只是这两名老同学现在都不在上海。吴赓恕于是电话邀请这两名老同学来上海。吴赓恕从前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班时，就以凶残蛮横出名，虽然这两个人和吴赓恕分别很久，但他的淫威一直存在于这两人心中。当他们接到吴赓恕邀请他们来上海的电话时，尽管不知道所谓何事，但也不敢不从。

吴赓恕与他们见面后，立刻公开了自己军统书记长的身份，并表示自己此次来上海是为了刺杀汪精卫，打电话叫他们来，不过是看在曾经是同学的情分上，给他们一个赎罪的机会。吴赓恕还说，他们二人身为汉奸，本是军统必杀之人，如果按照他说的做，就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这二人本是胆小之人，听吴赓恕说到这里，两人颤抖的双腿有些支撑不住，扶住身旁桌椅才勉强站住了。他们不知道吴赓恕到底要他们做什么，只知道如果不听他的话，他们二人的小命也就玩完了。

吴赓恕对两人的恐惧视而不见，继续对他们说：“汪精卫曾经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发表演说，你们可以算是汪精卫的学生，再加上你们现在在维新政府工作，所以你们完全有机会接近汪精卫。我要你

们做的，是利用师生关系接近汪精卫，获得汪精卫的信任，取得自由出入汪精卫卧室的权利，然后再在汪精卫的床下安放炸药，或在汪精卫的食物里下毒。”

听完吴赓恕的计划，这二人胆战心惊，这完全是在老虎嘴里拔牙啊。汪精卫是何许人也，恐怕到最后牙没拔成，自己的小命就丢了。二人刚要开口推辞，吴赓恕又开口了，他带着轻蔑和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他们不按照他说的做，那么他绝对会让他们生不如死！两个人吓得连说不敢，并保证按照他的计划执行。吴赓恕这才满意地放这二人离开。

这两人从吴赓恕那里离开后，来到一个小酒馆里商议对策。这两人现在进退两难，如果去执行吴赓恕的计划，刺杀汪精卫，无异于“太岁头上动土”，他们没有这个胆量。可如果不按照吴赓恕的话去做，不用想都知道吴赓恕肯定不会放过他们。此二人愤愤不平，抱怨吴赓恕那么大本事，怎么自己不去暗杀汪精卫，非要把他们二人拉下水。可埋怨归埋怨，他们对吴赓恕十分恐惧，他们了解吴赓恕这个人，能够为自己所用的人，他定会厚待，可如果不按照他的指示去做，只有被暗杀这一个下场。

二人经过反复商议，权衡之后，把心一横，决定把此事报告给汪精卫，让汪精卫这个正主自己去对付吴赓恕。汪精卫与吴赓恕针锋相对之后，说不定吴赓恕无暇顾及他们，他们二人还能得以保命。

丁默邨设计反刺杀

就这样，此二人面见了汪精卫，把吴赓恕和他们见面，要求他们刺杀汪精卫一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汪精卫。汪精卫听完，立刻将他二人交给伪国民政府的陈春圃，让陈春圃带着他们去见汪伪 76 号的丁默邨。

丁默邨见到这二人后，先是请此二人将吴赓恕指示他们刺杀汪精卫的事情仔细讲述了一遍，然后又问他们和吴赓恕怎样联络。二人中的陈承纶，马上将吴赓恕留下的电话号码交给了丁默邨。

丁默邨为了抓捕吴赓恕，可谓是费尽心机。

为什么丁默邨要费尽心机呢？

首先，吴赓恕在军统身居高位，抓住他对汪伪 76 号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所以丁默邨非常重视此事。

其次，吴赓恕要刺杀汪精卫一事，汪精卫也是知道的，如果自己不能成功抓捕吴赓恕，不仅为汪伪 76 号留下一个强敌，还无法向汪精卫交差。同时，丁默邨自己在汪精卫心中还会留下能力不足的印象。说不定，丁默邨就此失去汪精卫对他的信任，这也就意味着他将失去手中的权力。这对于习惯了权力的丁默邨来说，是无法忍受的。

所以，丁默邨对抓捕吴赓恕一事全力以赴。

抓捕吴赓恕一事中，最让丁默邨头疼的就是公共租界的巡捕房。当时，受环境所迫，汪伪 76 号抓人时，如果是在非公共租界，他们便可以无所顾忌地直接前往目标所在处抓捕。但如果目标在公共租界内，他们就必须请日本宪兵队出面联络公共租界巡捕房。也就是说，汪伪 76 号要想在公共租界抓人，必须先和租界的巡捕房联系，再由巡捕房的人员和他们一起去抓捕犯人。

要是平时，在公共租界抓人，也就是比在非公共租界抓人麻烦一点，但在抓捕吴赓恕这件事上，丁默邨就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如果租界巡捕房的巡捕被军统局、中统局收买了，当自己把抓捕吴赓恕的要求上报巡捕房后，他们派人暗中通知了吴赓恕，让即将被抓捕的吴赓恕因为提前得到消息从而逃脱汪伪 76 号的抓捕，那么，他所做的一切就付之东流了。即便最后汪伪 76 号的特务查明了抓捕目标是在巡捕房的通风报信下才逃脱的，他丁默邨也无可奈何，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所以，为了避免在抓捕吴赓恕时出现这样的情景，丁默邨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声东击西的好办法！

丁默邨先是请汪精卫亲手写了一封信给陈承纶，内容大致为：汪精卫聘请陈承纶为自己的秘书。然后，两天后，丁默邨示意陈承纶约吴赓恕见面，并将这封信亲自交给吴赓恕，以此消除吴赓恕对陈承纶的戒备之心，使吴赓恕充分信任陈承纶。

不出丁默邨所料，吴赓恕看到这封信后，大喜过望。他当场夸赞陈承纶的卧底工作做得好。而陈承纶为了让吴赓恕更加信任他，也为

了把戏演得更真实，他向吴赓恕汇报了自己的行程，说他打算马上回南京交接自己过去的工作，随后赶回上海接任汪精卫的秘书一职。

此时的吴赓恕，完全沉浸在陈承纶成功打入敌人内部的喜悦中，根本就没想到这是汪伪 76 号给他上演的一场好戏。

吴赓恕被捕，刺汪行动又一次失败

陈承纶到南京没两天，吴赓恕就催促他赶快回上海，声称有重要的任务要交给他。陈承纶闻讯立刻从南京赶往上海。回到上海后，陈承纶先是到汪伪 76 号见丁默邨，将自己即将与吴赓恕见面的情况告知丁默邨。随后回到住处，与吴赓恕联系。

吴赓恕接到陈承纶的电话，立刻要求陈承纶和自己见面，并定好了见面地点和时间。

陈承纶挂断电话后，立刻拨通丁默邨办公室的电话，将他们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全部告诉了丁默邨。丁默邨叮嘱陈承纶按照约定的时间和吴赓恕见面，并再三叮嘱陈承纶，见面后想办法拖延时间，以便给他们充足的时间部署抓捕工作。

如丁默邨所料，吴赓恕果然将与陈承纶见面的地点约在了法租界内的拉斐德路与迈尔西爱路交界处，丁默邨声东击西的好戏，终于要正式上演。

为了防止巡捕房泄露抓捕行动，丁默邨故意让原市政府法文秘书与法租界巡捕房私下联系，以便取得法租界巡捕房的信任。随后，丁默邨给日本宪兵队一个错误的门牌号，让日本宪兵队与巡捕房正面交涉到这一错误的地址抓捕嫌犯的事宜。这样一来，即便巡捕房内有军统局的内线，透漏给吴赓恕的，也是错误的情报。后来，汪伪 76 号、日本宪兵队和巡捕房的人聚齐，到丁默邨所提供的错误地址去抓人，他们肯定是抓不到吴赓恕的。而当巡捕房的巡捕无果而归后，汪伪 76 号的特务和日本宪兵队，立刻在丁默邨的指挥下，直扑吴赓恕和陈承纶见面的真正地点，将二人抓回汪伪 76 号。

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巡捕房的巡捕，对日本宪兵队和汪伪 76 号，在巡捕房的巡捕不在场的情况下抓捕嫌犯非常不满，然而面对丁默邨

的应对，他们却无计可施。

丁默邨面对巡捕房的询问，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手续是齐全的，抓人完全是符合规定的。我们不过是把嫌犯所在的门牌号弄错了，等我们知道门牌号弄错的时候，已经来不及再向巡捕房报备了，只能先斩后奏了。”而吴赓恕已经被带入了汪伪 76 号，巡捕房即使有心包庇也无力回天了。

吴赓恕和陈承纶二人被带到汪伪 76 号后，被分别关押在不同的审讯室里。陈承纶自然是进了审讯室没一会儿，就被放出来了。但是在被放出来之后，陈承纶却万分恐惧地对丁默邨说：“吴赓恕这个人很凶恶，万一他知道是我出卖的他，一定会想方设法报复我的，如果吴赓恕不死，我怎么也不能安心。”

对于陈承纶的担心，丁默邨承诺，吴赓恕必定难逃一死。丁默邨还请陈承纶安心回南京，等着汪精卫的提拔。

吴赓恕在审讯室里，遭到了汪伪 76 号的特务的毒打，起初，他并不承认自己是军统局的特工，但在汪伪 76 号的特务对他用了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多种酷刑后，他终于迷迷糊糊地承认了自己刺杀汪精卫的计划。

丁默邨将吴赓恕的口供交到了汪精卫的面前，汪精卫看也不看，就在上面批上四个大字：“立刻枪决。”

吴赓恕死后，汪精卫念及陈承纶的救命之恩，将陈承纶提升为伪国民政府文官处秘书，比陈承纶之前的官职高出了三级。过了两年，陈承纶又在汪精卫的提拔下，升任伪湖北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厅长。

“打虎英雄” 刺杀汪精卫

“武林高手” 黄逸光

吴赓恕刺杀汪精卫的计划虽然失败了，但戴笠并没有因此灰心。他分析以往屡次刺杀汪精卫失败的原因，决定改变策略，不再安排军统特务去刺杀汪精卫，而是改用民间的武林高手，让真正有功夫的民间高人，近身刺杀汪精卫。

戴笠的思路成熟后，便下令手下的特工，四处寻找符合条件的“武林高手”。戴笠手下的特工，不少都觉得戴笠的这个计划不可靠，他们认为，身为专业特工的他们都屡屡不能得手，民间的所谓“高手”如何能刺杀得了汪精卫，他们甚至认为，戴笠被汪精卫屡次逃脱军统的暗杀气得失去了理智，但他们还是认真地执行了戴笠的这个命令。

军统局的特工在全国各地搜罗了许多有名的“武林高手”，但这些“武林高手”在戴笠的考察下都被否决了。这件事就这样一直拖着，直到一位名叫黄逸光的大力士出现。这个黄逸光究竟有什么样的本事，能让要求甚高的戴笠都信任有加呢？

其实，黄逸光身上的光环，从某种角度讲，甚至不逊色于戴笠。

黄逸光是广东赤溪人，也是墨西哥华侨。黄逸光是一个天生的冒险者，安逸的生活对于他来说无异于牢笼，所以他在1935年，因受不了生活的平淡，便偕同好友徒步环游世界去了。

在环游世界的过程中，黄逸光结识了不少人，其中就包括当时在巴黎“避难”的汪精卫。二人同样受过高等教育，同样是不甘寂寞的人，如此志同道合的两人，自然有说不完的共同话题。在交往的过程中，他们时常感觉对方就像是另一个自己，于是二人很快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然而黄逸光还要继续他的环球旅游，所以汪精卫只能满怀遗憾地送黄逸光离开巴黎。分别时，汪精卫看着黄逸光的背影，不禁感叹：此行一别，不知何时才能再次相会。但命运往往喜欢与人开玩笑，汪精卫怎么也想不到，他与黄逸光重逢的日子，很快就到来了。

三年后，黄逸光和友人旅行到非洲，惊闻祖国京、津、沪、冀、鲁、豫、晋、苏、皖、浙等地的主要城市和交通沿线，以及南京地区都被日本人攻陷。强烈的民族责任感让黄逸光无法再继续环游世界，他立刻中止了这次环游世界的计划，毅然回到了祖国。

回国后，黄逸光决定报效祖国，但要加入哪一个与日本侵略者做斗争的党派呢，这可让黄逸光犯了愁。黄逸光想加入的首选党派就是国民党，但是国民党这么大的党派，不是他想加入就能加入的。就在黄逸光无计可施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三年前结交的朋友汪精卫。汪精卫是国民党政府的元老，手中有极大的权势，通过汪精卫的关系，

他一定能顺利进入国民党，从而成为抵抗外族侵略的一分子。

黄逸光是个行动派，想到了就马上去做，他很快就赶到了汉口，并找到了汪精卫。再见故人，汪精卫十分高兴，拍着胸脯保证帮黄逸光办好这件事，还留黄逸光在自己的宅邸住了一晚，并与之合影。

第二天，汪精卫就将写好的介绍信交给黄逸光，让他前往昆明航校接受训练。当黄逸光拿着汪精卫写的介绍信欣然前往昆明时，怎么也想不到，这次一别，竟是二人的决裂，此后，他和汪精卫已经不是好友而是敌人了。

1938年12月，汪精卫叛出国民党公开投降日本。而后，汪精卫做起了挖墙脚的生意，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拉拢人才，黄逸光就在他的拉拢范围内。

在成立伪国民政府后，汪精卫十分诚恳地给黄逸光写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的“远大”志向以及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当然还有对黄逸光的欣赏，最后提到了这次写信的目的：请黄逸光来响应自己主张的“和平运动”。

满怀期待的汪精卫哪里知道，黄逸光早已不再把他当作好友，在得知汪精卫叛出国民党公开投降日本后，黄逸光甚至觉得，曾经和汪精卫相谈甚欢都是件恶心的事。现在又见汪精卫来信，如此厚颜无耻地拉拢他，黄逸光心中对汪精卫厌恶至极。收到汪精卫的来信后，黄逸光马上将汪精卫拉拢自己这件事向国民党有关当局作了汇报。而与此同时，军统的特工也找到了黄逸光。

戴笠选中黄逸光，打虎英雄担重任

戴笠见到黄逸光时，已经知晓黄逸光上报了汪精卫拉拢他的事，因此，戴笠确定，黄逸光是一个坚定抗日的革命者，所以戴笠对黄逸光也没有丝毫的隐瞒，直接将自己找他的目的说了出来。黄逸光一听，戴笠让他去刺杀汪精卫，立刻拍着大腿说，“这事我干。”就这样，黄逸光秘密地成为了军统的一分子。

不过，黄逸光很很好奇，戴笠是怎么找到自己的？为什么戴笠会选自己去刺杀汪精卫？

戴笠为黄逸光痛快地接受任务颇感高兴，因此，他很爽快地回答了黄逸光的问题。

原来，军统特工虽然找了许多所谓的“武林高手”，但经过检验后，却发现很多“武林高手”不过是江湖骗子；有些人即使有真功夫，也没有刺杀汪精卫的胆识；而即便有身手，有胆识，可与汪精卫之间没有什么关系的“武林高手”，想要打入汪伪政权的核心，获取汪精卫的信任，也是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些人都被戴笠淘汰了。

军统特工在得到黄逸光的资料后，了解到他与汪精卫交好，而且黄逸光曾经徒步环游世界。军统特工从黄逸光徒步环游世界的经历中，抽丝剥茧，得出了自己想要的情报。搜集情报，一向是军统特工的强项。军统特工在分析黄逸光环游世界这件事后，分析出，一个人能够胆大到徒步到世界各地去旅游，必然要有所恃，并且他“所恃”的，必定是非常过人的本事。

最后，军统特工按照这个思路，果然发现了黄逸光的过人之处。资料显示，黄逸光在旅游到马来西亚的一片森林时，曾经遇到过一只老虎。当时，他和同伴手中没有枪，如果转身逃跑，显然是没有活路的。黄逸光思量片刻后，让同伴爬到树上，自己留下来对付老虎。就在同伴向树上爬去时，老虎突然向黄逸光扑过来，黄逸光一把抓住老虎的脖子将它翻转在地。老虎腹部朝天，黄逸光就坐在老虎的肚子上，不停地用双拳捶打老虎的脖子。就这样，黄逸光毫发无损，却将一只老虎活活打死了。

于是，戴笠根据军统特工搜集的这些情报，确定黄逸光，就是他要找的人。

黄逸光听完戴笠的叙述后，不禁感叹军统特工的分析能力之强，从而也对戴笠更加另眼相看，能够培养出这样一批特工，他们的头领必然也不是个一般的人。

随即，黄逸光向戴笠询问刺杀汪精卫的详细计划。

戴笠带黄逸光走入自己的私人会客室，二人密谈了很久，黄逸光才从戴笠的私人会客室离开。

第二天一早，黄逸光前往南京，来到汪精卫宅邸门前，将 1938

年他和汪精卫的合影拿了出来，要求面见汪精卫。门口的侍卫见到这张合影后，明白面前这个人，和汪精卫关系匪浅，因此收起了平日的趾高气昂，礼貌地请黄逸光稍等。侍卫手拿合影，向汪精卫通报了黄逸光求见的要求后，汪精卫拿着那张合影，激动地来到门前，迎接黄逸光。

见到自己曾经的好友，汪精卫走上前，紧紧地拉住了黄逸光的手，不停地对他说：“你能来实在是太好了。”汪精卫以为，黄逸光是接到自己的信件后，来投奔自己的，而黄逸光也表示自己刚到南京，尚未安排住处。

黄逸光和汪精卫交谈甚欢，黄逸光甚至希望，汪精卫能让他住进他的宅邸，这样，他便有机会刺杀汪精卫。但汪精卫经过多次暗杀，对身边最亲近的人都十分提防，更何况是许久未见的朋友。所以，汪精卫根本不可能像黄逸光期望的那样，把他安排到自己家中。听黄逸光说自己还没有住处，汪精卫便命令手下在中央饭店给黄逸光开个房间，并让黄逸光先去饭店休息几日，等休息好了，二人再好好叙旧。

黄逸光与汪精卫的初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虽然黄逸光没有如所愿住进汪精卫的府邸，但黄逸光却认为自己还有机会，可以在日后慢慢取得汪精卫的信任，再伺机暗杀他。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却让他的所有的想法都化为乌有。

汪伪 76 号抓捕黄逸光，刺汪再次失败

黄逸光离开不久，李士群就收到情报：军统派了两名特工，伪装成平民来南京拜见汪精卫，这两名特工都是汪精卫熟识之人，其中一人还曾经徒步环游世界。

李士群收到这一情报后，惊出一身冷汗，连忙将这一情报告知汪精卫。

汪精卫听到这个情报后，不禁一愣，刚刚见过的黄逸光，就曾经环游世界，如果没有他的环游世界，自己还不会认识他呢。这么看来，黄逸光此次前来，是要来刺杀自己的。

尽管汪精卫并不十分确定，黄逸光就是军统局派来刺杀自己的特

工，但为了保险起见，他立刻命令李士群对黄逸光展开调查，如果发现黄逸光确实是军统特工，立刻将他击毙。当然，如果黄逸光不是军统局，就将黄逸光带到汪伪 76 号，好好调教一番，最好让他成为汪伪 76 号的特工。

李士群立刻安排汪伪 76 号的特工进入黄逸光所住的中央饭店秘密搜查，很快，他们就在黄逸光居住的 304 房间的床下找到一把枪。同时，他们在检查房间登记簿的时候，还发现一件诡异的事情，原本，汪精卫只为黄逸光一个人安排了房间，但 304 房间的房客，除了登记有黄逸光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点和李士群收到的情报不谋而合。

汪伪 76 号的特工，趁黄逸光不在房间的时候，搜查了他的房间，并将查到的有关情况，迅速上报李士群，请李士群定夺如何捉拿黄逸光。

对于捉拿黄逸光这件事，李士群不得不谨慎对待。汪伪 76 号的特工也不是吃素的，他们当然也调查出，黄逸光是个武林高手，在徒步旅行时，曾经徒手打死过一只老虎，这样的人，不是汪伪 76 号那些只会些“三脚猫”功夫的特工能对付得了的。为了顺利捉拿黄逸光，李士群特意派人请来了曾在上海大世界武术擂台连续打败九名武术高手的王霖。

请到武术高手王霖后，李士群立刻用重金和高职将他收在汪伪 76 号门下。为了避免夜长梦多，王霖到达汪伪 76 号的当天夜晚，马啸天就带着王霖和 6 名特务前往中央饭店，直奔黄逸光所在的 304 号房。

到达中央饭店后，马啸天等人破门而入。

两名汪伪特务进屋后，齐齐压床上，想要把黄逸光按在床上。黄逸光凭借自己过人的力气，将这两名特工推开，王霖却在此时，上前和黄逸光打斗起来。

黄逸光虽然力大如牛，却不是专业学武出身的王霖的对手。

在与王霖交手过程中，黄逸光总是处于下风。

在四周观战的特工，看到黄逸光即将落败，四名特工便一拥而上，用铁链将黄逸光锁住，其余两名特工，便牢牢控制住了与黄逸光同

住之人。

黄逸光被马啸天带到汪伪 76 号后，明白自己的身份暴露了。面对特务们的严刑拷打，黄逸光什么也没说，只是痛骂以汪精卫为首的一群汉奸。

1940 年 12 月 17 日，黄逸光被汪伪 76 号押赴雨花台，执行枪决。

在行刑前，黄逸光没有后悔自己的选择，面对汉奸的枪口，黄逸光大声朗诵自己为祖国所写的诗，“可爱的中华，我愿为你歌唱，我愿为你而死”，最终慷慨就义！

一个英雄豪杰，就这样惨死在汪伪 76 号特务的手中，黄逸光虽然没有完成刺杀汪精卫的任务，但他是中华的好儿女，他的精神激励众多爱国人士奋勇抗战，让中国人民更坚定了将外敌赶出中国的决心。

成功一击——汪精卫命丧军统之手

黄逸光的死，代表军统刺杀汪精卫的再一次失败。这次刺杀失败，给戴笠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他再也没有主动提起继续暗杀汪精卫一事。而汪精卫就在戴笠的消极怠工下，风平浪静地度过了一段日子。军统特工、汪伪政府，包括军统的老对手汪伪 76 号都以为，戴笠就此放弃了刺杀汪精卫的想法，虽然在最初，汪精卫和李士群等人依旧不敢放松警惕，但一直等到过了一年，他们见戴笠再没有任何刺杀汪精卫的举动，便彻底相信戴笠已经对刺杀汪精卫失去了信心，便不再理会这件事。也正是因此，汪精卫周边的戒备才有了些许松动。

戴笠真的放弃对汪精卫的刺杀了吗？

按照戴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个性，他当然不会如此轻易放弃。他不再派军统特工暗杀汪精卫，是因为戴笠清楚，在当下的军统局里，已经有了不少汪伪 76 号安插的间谍，他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这些间谍的眼中，即便自己派出再优秀的特工去刺杀汪精卫，都会因为这些汪伪 76 号的内线走漏消息而无法成功，所以，与其做无用功，还不如将优秀的特工投入到与汪伪 76 号作战的战场上。有了如此想法，戴笠自然不会急于策划刺杀汪精卫一事，不过，虽然戴笠不再动用军统特工去刺杀汪精卫，但他心中已经酝酿了一盘非常周密的棋局，这

盘棋直到 1943 年，才显示出它的威力。

1943 年 5 月 1 日是一个普通的日子，但这个夜晚，却发生了一件让戴笠和大汉奸周佛海都万分紧张的大事件。这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戴笠签署的刺杀汪精卫的“密杀令”，居然丢失了。

“密杀令”丢失之事非同小可，要知道，此次“密杀令”中针对的人物，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汪精卫。

“密杀令”丢失，戴笠紧张情有可原，身为汪伪政府元老的汉奸周佛海，又为什么紧张至极呢？

周佛海之所以如此紧张，这，还要从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袭击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国说起。

太平洋战争打响后，掌握着汪伪政府的财政、特工、外交和军事大权的周佛海，开始如坐针毡。针对这场战争，周佛海做了认真的分析，他并不看好日本，甚至隐约看到了日本此战的凄惨下场。而一旦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对日本恼怒至极的美国，必定会加大对中国的帮助，到那时，日本想要在中国战场上取得胜利，肯定也万分艰难。而日本一旦战败，他们这些投靠日本人的汉奸，下场可想而知。

于是周佛海决定，趁日本在中国尚未显露败迹之际，给自己寻一条出路。周佛海不假思索地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了国民党身上。于是，周佛海偷偷找到军统局上海站的负责人，通过他联系到了远在重庆的戴笠，并向戴笠发了一封为自己请求自赎，希望重庆方面能接受他为国民政府服务的电报。

戴笠接到周佛海的电报后开心不已，他正愁军统局在汪伪政府中没有一位分量十足的间谍呢，现在周佛海自己送上门来，他岂有放过的道理。戴笠迅速向蒋介石报告了大汉奸周佛海请求国民政府庇护一事，蒋介石听后也非常开心，周佛海向国民党示弱，证明汪伪政府人心涣散。蒋介石立刻指示戴笠与周佛海联系，要求周佛海为重庆提供关于日本以及汪伪政权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情况的情报。戴笠除了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之外，还要求周佛海利用他在汪伪政府中的权势，将戴笠派出的特工，安插到汪伪政府的重要部门中。

周佛海收到戴笠的回电后，暗自庆幸，蒋介石和戴笠提出的条件，

对于他来讲并不困难。也就是说，自己的退路已经就此铺就，而退一步讲，即使蒋介石和戴笠派给自己的任务很难完成，他也必须漂亮地完成才可以，这是他取信于国民政府的关键。后来，周佛海将蒋介石和戴笠要求的事情都处理得非常妥当。周佛海想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将自己对国民党的诚恳传达给戴笠和蒋介石，戴笠当然也从周佛海的具体行动，看出周佛海诚心投诚，并非是在戏耍国民党。

有了周佛海这个汪伪政府的元老做间谍，戴笠重新拾起了搁置已久的刺汪计划。戴笠周密策划了很久，本来，他对这次计划颇具信心，但没想到，戴笠在下发“密杀令”时，居然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将“密杀令”丢失了，这让戴笠大为光火。

“密杀令”丢失后不久，汪精卫就获悉军统局又将对他采取刺杀行动。面对纠缠不休，一直想要取他性命的军统局，汪精卫再也不能保持镇定，他马上命令李士群，加大对军统特工的抓捕和策反工作。李士群接到汪精卫命令后，很快将全国各地的汪伪 76 号特务调动起来，让他们在所在地区大肆破坏军统的势力。这样的局面，让戴笠有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感觉，为了避免周佛海暴露，他不得不迅速终止暗杀汪精卫的计划。

戴笠虽然又一次暂时放弃了刺杀汪精卫的计划，但是对于汪精卫来说，戴笠却变得更加危险了。这时的戴笠，就像是一条潜伏在草丛里，等待猎物出现的毒蛇一样。戴笠从此由明转暗，只等汪精卫露出破绽，便给予其致命的一击。

让戴笠庆幸的是，汪精卫的破绽，并没有让他等待太久。

1944 年，汪精卫旧伤发作，不得不飞往日本治疗。经过日本名医的治疗后，困扰汪精卫长达十之久的深藏体内的子弹被取出。手术成功后，汪精卫身体虚弱，不能受风，需要长期调养，而陪同汪精卫前往日本治疗的妻子陈璧君，又因为太过肥胖，十分怕热，经常开窗通风。因此，在汪精卫休养期间，陈璧君经常不顾汪精卫的身体，大开门窗，这就导致汪精卫的痊愈时间愈加漫长。

汪精卫在休养期间，听闻国内汪伪政府内各势力内乱，各个部门明争暗斗，谁都妄想取代自己的位置，急火攻心，不顾医生的劝阻，

拖着尚未痊愈的身体，一意孤行回到了上海。

自然，汪精卫没有将自己返回上海的消息泄露出去，他将子女都留在了日本，制造了自己还在日本养病的假象，试图骗过自己的敌人。但是他千算万算，也没有算到，曾经是他最亲密的战友的周佛海，已经投靠国民政府。于是，在汪精卫回到上海后不久，周佛海就将他在上海虹桥医院养病的消息透露给了戴笠。

戴笠收到周佛海的情报后，仔细斟酌了很久，终于决定再次策划刺杀汪精卫的计划。戴笠认为，当下汪精卫身体虚弱，行动不便，又因为要整肃汪伪政府，焦头烂额。而且，既然汪精卫没有将自己已回上海的消息公开，那么当下，汪精卫身边的守卫力量肯定非常薄弱，因此，戴笠决定“趁他病要他命”。戴笠清楚地知道，如果此次错过时机，以后再想暗杀汪精卫，机会就更难找了。于是，戴笠在认真筹划后，派人偷偷潜入了虹桥医院，买通了给汪精卫换药的医生和护士，要求他们每次给汪精卫换药的时候，在药里掺入一些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医生和护士依计而行，时日不多，汪精卫便毒发身亡。就这样，卖国巨奸汪精卫在戴笠的精心算计下，于1944年11月10日，一命呜呼。

汪精卫死亡的其他原因

关于汪精卫的死亡原因，并不只有笔者上文所说的那一种说法。还有另外两种说法，一说汪精卫是死在一个爱国中医的手中，一说汪精卫死在日本人手里。这里，笔者不惜笔墨为读者讲述汪精卫的死因，谨希望能够还原最真实的历史，虽然，历史有的时候很难考证。

汪精卫早年，腰部中弹，后来，没有将弹壳取出，因此，汪精卫落下了腰疾。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见西医怎么也医不好丈夫的腰疾，便为丈夫四处寻找能医治腰疾的中医和药方。不知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还是有人故意透露，陈璧君终于找到了一个口碑很好的中医名医。此人是江苏吴县人，人送外号“刘一帖”，意为他只用一帖膏药，就能将非常严重的刀伤、枪伤，以及各种无名肿痛治好。听闻“刘一帖”治病救人手段神奇，陈璧君立刻请“刘一帖”来为汪精卫治病。

据说，那日，“刘一帖”在仔细查看了汪精卫的病情后，拿出一贴膏药，贴在了汪精卫的后背正中，便起身告辞了。

汪精卫当时也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贴上膏药的，谁知第二天，汪精卫竟觉得自己腰痛减轻了许多。这下，汪精卫可不敢再小觑“刘一帖”，他立刻派手下人驾车，再次接“神医”到他的宅邸为他复诊。

这一日，“刘一帖”来到后，仔细询问了汪精卫的病情，又为汪精卫留下两贴膏药，并告知了膏药的用法，并向汪精卫保证，贴完这两贴膏药，汪精卫的病就能痊愈。

说完这些话，“刘一帖”提起药箱就离开了。出门前，因推脱不掉，“刘一帖”收下了陈璧君早已备好的厚礼。

当天夜里，陈璧君帮汪精卫贴上膏药。二人满怀欣喜地等着药效发挥。但是，三个时辰后，汪精卫从睡梦中惊醒，后背灼痛，如同被很多人拿着鞭子抽打后背一样，手心脚心都冒出冷汗来。陈璧君见状，一面叫来家庭医生为汪精卫检查，一面叫人去旅店接神医“刘一帖”前来。

然而，谁也没想到，派去接“刘一帖”的家人再也找不到“刘一帖”。没一会儿，家人就气急败坏地回来，说“刘一帖”当晚根本就没有回客栈。汪精卫和陈璧君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已经明白了几分。

陈璧君心里明白，自己一定是上了“刘一帖”的当了，他留下的膏药，哪里是用来救命的，明明就是用来催命的。

无奈之下，陈璧君慌忙将汪精卫送入医院。医生检查后纷纷摇头，表示他们也无能为力。

“刘一帖”的膏药，加速了汪精卫体内的子弹铅毒的扩散，使得汪精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汪精卫也一天比一天痛苦，最终，汪精卫痛苦地死去了。

据说，汪精卫死后，陈璧君还收到了一封信，信上写着短短的四句话：厚礼不该收，收了也不愁。本人刘一帖，医人不医狗。

此外，关于汪精卫之死，还有一种流传甚广的说法，汪精卫最终命丧日本人之手。

1944年3月，汪精卫因病飞往日本。经过日本医院骨科医生的会诊，确诊为子弹铅毒深入骨髓，导致骨骼病变，于是日本医生建议汪精卫做削骨手术。

对此，日本医生一共制订了两套方案。

一套方案是去掉汪精卫的一节胸椎骨，从他的其他骨骼上取下一块对身体作用不大的骨头，仿成胸椎骨的样子移植到胸椎上，以消除病骨对病人的危害。

另一套方案是削去病骨后，不再移植新骨，等待病人的骨头自然愈合，然而后一种方案因为风险较大，被众多骨科专家否定了。

确定了治疗方案后，日本医院准备为汪精卫实施手术，然而，就在手术实施前，院方突然通知汪精卫的主治医生，汪精卫的手术要按照第二方案实施，于是，主治医师就采取了第二种方案对汪精卫进行了手术。

手术完成的当天夜里，医生们发现，汪精卫被铅毒感染的三节胸椎骨已经严重变形，并且压迫到了神经。换句话说，就是汪精卫真的成了一名“断了脊梁骨”的残疾人。

对于这个糟糕的手术结果，日本医院并没有告知陈璧君，为了避免麻烦，他们想出了一个瞒天过海的计划：将汪精卫搬进一间隔音的病房，在陈璧君来之前，给他打足麻药，待汪精卫因药效发作昏迷后，再将汪精卫的身体放置成侧卧，面孔朝内的姿势，并在汪精卫的手上放上一本书，让陈璧君以为，汪精卫手术成功，已经能够侧卧看书了。当然，日本院方没敢让陈璧君进入汪精卫的病房，他们以汪精卫的身体虚弱，外人进入会带入病菌为由，只让陈璧君隔着玻璃，在汪精卫的病外看了汪精卫一会儿。也就是说，在汪精卫手术后，陈璧君连话都没跟汪精卫说上一句，而且只看到了汪精卫的后背，没看到汪精卫的面孔。接下来，日本院方就以各种理由阻挠陈璧君进入医院，陈璧君无奈之下，只得飞回南京，在南京等待汪精卫的归来。

汪精卫在手术后，病情越来越严重，他的胸椎骨变得越来越脆弱，甚至随时都可能折断，颈椎骨也慢慢弯曲，最后，胸椎和颈椎竟然连支撑头部的力量都没有了。为了改善汪精卫的身体状况，日本医院又

想出了一个精妙的主意：他们按照汪精卫头颅的大小，特制了一个钢圈，将汪精卫的头颅凌空吊起来，虽然这样看起来像是上吊自尽一般，但是头颅和颈椎骨却拉直了，不会压迫汪精卫的内脏。此时的汪精卫，已经没有任何自保的力量，只能任由日本人摆布。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终于死在日本医院里。

日本医院为什么不采用第一种手术方案，而使用风险较大的第二种方案呢？这里还涉及一个人，那就是日本陆军117部队的渡边大佐。

当时，日本陆军117部队的渡边大佐也因旧日枪伤铅毒发作。在汪精卫在日本医院医治自己的旧患时，日本军部给这家医院下达了一个命令，那就是让他们在一两天的时间里，找一个病人做病理实验，通过实验来证明削骨手术的可行性，以便确保渡边大佐的削骨去毒手术成功。当时，日军在中国战场上已经显露败迹，汪精卫主持的汪伪政府对于日本政府来说已经没有太多价值，汪精卫因此成了日本政府的累赘，所以，汪精卫很不幸，成了这家医院的试验品，于是，日本院方在手术前，临时改变了手术方案。

汪精卫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他恐怕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为日本政府拼死卖命，最后竟死在了日本医院里。汪精卫罪有应得，这是他应得的下场！

第四节 军统上海特工与汪伪 76 号的又一次鏖战

汪精卫的死，完全是他咎由自取，而与他为虎作伥的汉奸组织汪伪 76 号的特务们，是否能够依旧逍遥法外，高枕无忧地过着他们纸醉金迷的日子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军统的锄奸行动一直在继续。

军统上海特工成功暗杀赵刚义

军统局与汪伪 76 号的暗战，大部分是在上海展开的。戴笠将锄奸力量主要放在上海，也是有原因的。上海沦陷时间比较早，日本政府在上海市区的势力较强，所以，许多亲日分子纷纷前往上海，在日

本政府的庇护下，有恃无恐地进行破坏抗日战争、损害祖国利益的活动。面对这些作恶多端的汉奸，戴笠就将军统局的锄奸力量主要放在了上海，命令上海区特工组着力锄奸。军统局上海区在王天木叛变后，按照戴笠的要求，又一次展开了一系列的锄奸行动，击杀了许多大汉奸，其中就有曾任军统青岛站站长的军统叛徒赵刚义。

赵刚义能够成为军统青岛站站长，离不开王天木的推荐，所以他们二人的感情颇深。王天木被汪伪 76 号逮捕后，赵刚义曾十分焦急地寻求营救王天木的方法，当王天木安然无恙地走出汪伪 76 号后，赵刚义非常替王天木高兴。后来，戴笠不再信任王天木，王天木叛出军统，赵刚义不仅不为王天木惋惜，反而为王天木感到欣慰，赵刚义觉得，以当时戴笠对王天木的态度来看，王天木就算继续留在军统，也只能在戴笠的不断探试和暗杀中惶惶度日，王天木投靠汪伪 76 号并没什么不好，至少不用再胆战心惊地过日子了。

王天木投靠汪伪 76 号后，赵刚义并没有和王天木断绝联系。后来，王天木之所以能带着汪伪 76 号的特务轻而易举地摧毁军统青岛站，赵刚义功不可没。

王天木摧毁军统青岛站后，第一时间就将赵刚义从审讯室里放了出来，带着赵刚义来到了汪伪 76 号高洋房的会客室里。进入会客室后，赵刚义惊讶地发现，李士群、丁默邨、万里浪、马啸天等汪伪 76 号的领导居然都在会客室等待自己。原来，在王天木的游说下，众人一起在会客室等待赵刚义，为他压惊，并一起为他举办了一个欢迎晚会，欢迎他加入汪伪 76 号。

赵刚义没有想到，汪伪 76 号居然会给自己举行这么一个欢迎会，一时间有些受宠若惊，赵刚义于是感激不已，表示自己以后一定尽心尽力为汪伪 76 号工作，不会辜负大家对他的期望。

赵刚义在军统局以能力出众、心狠手辣著称，不管是他在军统时的同事，还是后来在汪伪 76 号的同事，只要见识了他的手段，无一不对他心生恐惧，因此赵刚义的朋友并不多，大家都恐惧他、疏远他，而赵刚义对别人的疏远和恐惧毫不介意，反而扬扬得意，他认为这正是自己能力强大的表现。在汪伪 76 号里，除了几个头目级别的人物，

其他汉奸，他都不放在眼里。

赵刚义对已经变成敌人的军统同事，更是冷漠无情。在赵刚义看来，这些军统特务如今都是他成功的踏脚石，他们对没有丝毫的同情和顾忌。在加入汪伪 76 号的当天，赵刚义就带着一队汪伪特工，把他能够找到的军统特工，统统抓进了汪伪 76 号。此后，赵刚义变本加厉，迫害了许多军统特工。

戴笠自然不能容忍赵刚义之流一再迫害军统特工，这些特工，无一不是他费尽心思培养出来的，损失任何一个，都像是从他身上放血一样让他难受。面对嚣张的叛徒赵刚义，戴笠密令军统上海区第三行动队队长林焕芝，尽快组织暗杀行动，除掉赵刚义。

林焕芝收到戴笠的命令后，没有鲁莽行动，因为他和赵刚义从前是同事，对赵刚义的行事作风多少有些了解，虽然赵刚义狂妄自大，但他却是一名优秀的特工，要想除掉他，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再说赵刚义，加入汪伪 76 号之后，几次成功抓捕军统特工，让赵刚义颇为得意，他认为，由于自己行动迅速，打击有力，给军统局的特工以沉重的打击，军统局的其他特工一定都意志消沉，忐忑不安。因此，赵刚义骄傲不已，疏忽了对自身安全的防卫。

林焕芝在认真研究了形势，并通过内线，了解了赵刚义的状态后，认为当下正是刺杀赵刚义的最好时机，一旦赵刚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军统局列入刺杀名单，开始重视自身的防卫，那么暗杀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变得非常小了。而且，林焕芝也意识到，这次暗杀必须一击而中，如果没能杀死赵刚义，那么他肯定会加强自身的守备力量，再想杀他，就会难如登天。

林焕芝经过反复思量后，从第三行动队挑出四名枪法、身手皆是一流的特工，安排他们每天晚上 7 点，都埋伏在南京路大新公司演义部附近，伺机而动。这个地点，是林焕芝从军统局在汪伪 76 号内部的“鼯鼠”口中得知的。“鼯鼠”告诉林焕芝，赵刚义每个星期都会选择一天去南京路大新公司演义部休息放松，那个时候，他身边的守卫力量是最薄弱的。唯一一个问题就是，赵刚义虽然每周都去一趟，但星期几去，并不固定，因此，林焕芝并不知道赵刚义会在星期几去

大新公司演艺部，因此，他采取了最笨的方法——守株待兔。

1939年12月18日晚9点半左右，赵刚义的身影终于出现在大新公司演艺部入口附近，埋伏多时的林焕芝和四名军统特工一齐开枪，赵刚义头部、颈部、胸部等多处中枪，他来不及求救，就倒在了血泊中，气绝身亡。

军统局成功刺杀赵刚义后，弥漫在军统特务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他们鼓足干劲，再接再厉。

军统上海区连连得手，成功刺杀多名汉奸

1940年1月，家家户户都在准备年货、走亲访友，军统特工却依然在为锄奸紧张忙碌。军统特务并不是不想过年，而是戴笠有令，要求军统特工趁着年前、年中和年后的这两三个月时间，大力锄奸。过年前后，是汪伪76号以及其他汉奸最放松的时候，如果能够利用好这一时机，必然能制裁不少汉奸，同时也能杀鸡儆猴，让那些继续作恶的汉奸投鼠忌器。因此，春节前后，军统特工格外紧张。

1940年1月14日晚，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队队员开枪射杀了张啸林的亲家——大汉奸俞叶封。当时，俞叶封正往自己的汽车走去，刚走到车前，还没拉开车门，就被击倒在地。俞叶封的手下看他尚存气息，马上将他送往医院，这个大汉奸还没被送到医院，就气绝身亡。

俞叶封的死，让上海伪政府的官员们和上海的其他汉奸都震惊不已，俞叶封是张啸林的亲家啊，谁那么大胆，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不过这个谜团一直无解，直到很久以后，大家才终于知道，射杀俞叶封的，居然是军统特别行动队的特工。这个答案难免让汉奸们觉得有些意外，军统局虽然一直在锄奸，但谁也没想到，军统锄奸的决心居然如此坚定，在临近新年之际，居然会向张啸林的亲家下手。

俞叶封被军统刺杀的“余震”还没过去，一个星期后，也就是1940年1月21日晚，汪伪76号特务谭文质和他的妻子谭淑仪以及汪伪76号特工杨国栋，在谭文质家中，被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队的特工们用斧头劈死。

这两起锄奸案件，让投靠日本人的汉奸们人人自危，纷纷加强了

自身的警卫力量，然而他们再警戒，也逃不过军统局的锄奸巨手，军统刺杀汉奸的行动，一刻也没停歇过。

1940年2月19日晚，军统局上海区第一行动队的两名特工身着西装，来到中央饭店，痛殴一伙正在围坐着打麻将的男子。期间，一名军统特工偷偷掏出了消音手枪，在另一名特工的掩护下，射中了其中一名汉奸的头部。事后，二人骂骂咧咧地离开了中央饭店，被殴打的几个人，都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周围许多不明原因的看客，被军统局那两位凶神恶煞的特工吓坏了，谁也不敢上前，待二人离开后，才来到被殴打的几名男子身边，结果发现，其中一人已经中弹，头部被血染红。最终，这名汉奸在被送往仁济医院的途中死亡。这名被军统特工在大庭广众之下暗杀的汉奸，就是残害了许多军统同僚的军统叛徒，时任伪上海市政府警察局要员的陆雨亭。

1940年2月25日晚24点左右，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队的特工埋伏在静安寺路仙乐舞厅门口，将汪伪76号特工总部机要处处长钱人龙和汪伪76号特工总部交际科科长丁时俊击毙。

两天后，也就是1940年2月27日早10点左右，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队特工将伪政府国防救济会难民教育股主任兼大亚广播局经理刘仲英击毙。而刘仲英的好友，亲日分子、大陆新报社记者徐申，也在一个月后，被军统上海区特别行动队特工暗杀，不过徐申命大，正好福民医院的医生途经暗杀现场，及时对其实施了抢救，徐申才保住了小命。

军统局连连得手，然而军统特工却丝毫没有放松锄奸的步伐，为了给军统局争一口气，他们将恶行累累的汪伪76号第二大队大队长胡常英也列入了暗杀名单。

胡常英集老奸巨猾、心狠手辣、谄上媚下，深得李士群的喜爱。在抓捕军统特工的行动中，胡常英凶残至极，经过他审讯的军统成员、抗日志士，没有一个能活着离开汪伪76号的。面对这样一个罪大恶极的汉奸，军统特工自然恨得咬牙切齿。

1940年6月24日，胡常英独自一人步行回家，走到新民路大安里时，被军统特工前后夹击。当时，胡常英胸部、腹部、腿部中枪，

由于围观者越聚越多，军统特工在击中胡常英后，没有恋战，立刻撤退。后来，胡常英被路人送往了同仁医院，保住了一条小命。

军统局的疯狂刺杀，让汪伪政府和亲日分子们如惊弓之鸟，甚至开始怀疑周围的亲近之人，是不是在伺机暗杀自己的军统特工。面对军统局的疯狂锄奸，汪伪政府命令汪伪 76 号，迅速消灭军统在上海的力量。之后，王天木、陈明楚等军统叛徒加大了对军统局特工的抓捕和策反。

1941 年 10 月下旬，军统上海区再次遭遇灭顶之灾，军统上海区区长和军统上海区近百名成员均被汪伪 76 号抓捕。然而，即使军统上海区遭受如此惨重的打击，他们锄奸的脚步依然没有停止！

军统暗杀上海大亨张啸林

张啸林其人

前文中，笔者屡次提及张啸林，这一节，细述张啸林其人。

张啸林是浙江慈溪人，原名张小林，后来他觉得小林这个名字不够威风，便请教自己写字的先生为他批命改字。由于张啸林属虎，先生就将他的名字取为啸林，取虎啸山林之意。张啸林对这个名字非常满意。

张啸林的父亲是一个做木桶的木匠，收入不高，整个家庭又都靠父亲微薄的收入维持，所以张啸林的家境自然不算好，甚至可以用家徒四壁来形容。然而即便家庭环境如此，张啸林的父母对张啸林还是抱了很大的期望。为了让张啸林出人头地，张啸林的父母一直省吃俭用，供张啸林读书。

无奈张啸林天生不喜欢读书，只喜欢打架闹事。长大后，张啸林到杭州工作，依旧没改掉打架闹事的习惯。由于张啸林经常与流氓为伍，而在寻衅斗殴中，又无所不为，所以最终还是闯了娄子。张啸林在斗殴中，不慎将人打死，所以不得不逃离杭州，前往了上海。

张啸林逃往上海，只为避难，从来没有想过能在上海出人头地，然而世事难料，谁也没想到，上海对张啸林而言，居然是一块风水宝地。

20世纪20年代初，张啸林结交了黄金荣、杜月笙等人，还组建了一个“共进会”，这为张啸林成为上海滩的龙头老大打下了基础。后来，张啸林又与黄金荣、杜月笙、王柏龄、孙祥夫、陈希、杨虎、陈群等人，组成了上海黑道人尽皆知的“老八股党”。虽然这八个人中，张啸林年龄排第二，但人人都称张啸林为“张大帅”，这并不是为了彰显张啸林的地位，而是暗讽他性格急躁，只有匹夫之勇。

有一件小事，足见张啸林的“勇武”。

话说杜月笙在上海闯出名堂后，就为自己的祖先立了个祠堂。祠堂落成之日，杜月笙邀请了许多上海名角来排演堂会，由于祠堂地方不大，他们就把舞台和宴席都设在了祠堂外的空地上。

这天，宴会结束后，杜月笙的门徒要撤去舞台的座席，但有一个戏迷，唯恐自己第二天占不到好位置，一直坐在前排不肯走。杜月笙的门徒劝说了这位戏迷半天，他依旧固执地不肯离去。这名无计可施的门徒，就找到总招待张啸林，请他来解决此事。

张啸林先是和颜悦色地劝说这位戏迷，但这位客人依旧坚持不离开。看到这位客人如此固执，张啸林大怒，忘记了自己是总招待的身份，也忘记今天是杜月笙家祠落成的大好日子，更没考虑对方的身份，直接给了这位客人一记耳光。张啸林就此捅了一个大娄子。张啸林打的这个人，不是商人，也不是黑道的混混，而是警备司令部的一位高级参谋。这位参谋的几名随从，看到自己的长官被打，立刻将张啸林围了起来，并举起了手枪，扬言要将祠堂拆掉。

这场闹剧，惊动了杜月笙以及尚未离开其他宾客。杜月笙了解情况后，马上向这位高级参谋赔礼道歉，但是这位参谋的几名随从，还是把枪抵在了张啸林的脑门上。

最后，经杜月笙和众多客人的劝解，这位高级参谋才摆摆手，叫他的手下收了枪支，然而，这并不表示这位客人原谅了张啸林。

这位客人提出了几个条件：

第一，在这几天里，只要杜月笙的祠堂前有戏，就一定要在首排的正中，给他留出个座位；

第二，张啸林要亲自到司令部，给他赔礼道歉。

杜月笙满足了这位客人的要求，张啸林到司令部给这位客人赔礼道歉之后，这件事才算完结。

杜月笙以为，这件事之后，张啸林的嚣张气焰会有所收敛，但没想到，事实正好相反，这件事非但没让张啸林有所收敛，反而让他更加嚣张。而张啸林的门徒也常常把这件事当作吹嘘的资本，说张啸林是一个不畏权贵、仗义执言的人。

张啸林卖国投日

话说张啸林在上海滩呼风唤雨了几年后，终于迎来了人生又一次重大选择。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逃到香港避难，黄金荣闭门谢客，不与任何人来往，张啸林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学习老大黄金荣远离这场纷争；一是投靠汪伪政权，为日本人做事。

张啸林思前想后，认定这是个机会，能够让他一举成为上海滩第一大亨。于是张啸林频繁地与汪伪政府接触，积极与汪伪 76 号的李士群、丁默邨等人合作，通过为他们提供军统、中统特工的线索，获得了李士群的信任，与日本军方取得了联系。

张啸林帮助日本军方做事，甘做汉奸，自然上了军统的汉奸名单。

面对上海滩的大亨张啸林，戴笠还是有些顾忌的，他与杜月笙是好友，杜月笙和张啸林又是异姓兄弟，戴笠怕派人暗杀张啸林，会影响他和杜月笙之间的交情，为了一个汉奸，失去一个强大的助力，这种事，戴笠当然不肯做。

戴笠在和杜月笙聊天时，还曾经假装不经意地问杜月笙：“如果你的兄弟中，有人死心塌地为日本人卖命，你会如何处置他？”杜月笙听后一愣，随机坚定地告诉戴笠：“不管怎么样，只要是我的兄弟，我都不会下狠手。”

戴笠听到这个答案后，心中当即明了，杜月笙不会大义灭亲，想要制裁张啸林，恐怕只能曲线救国了。

其实，杜月笙与戴笠相交多年，怎么可能不知道戴笠的心思，虽然戴笠没有说出张啸林的名字，但杜月笙却心知肚明，清楚戴笠所说

的自己的兄弟，正是自己的把兄弟张啸林。

杜月笙不忍看到风头正劲的张啸林死在戴笠手中，后来，在与戴笠聊天时，还委婉地告诉戴笠，自己会劝说张啸林效仿黄金荣，不再为日本人做事，请戴笠放他一马。戴笠也答应杜月笙，只要张啸林不再为虎作伥，他就既往不咎。

然而，杜月笙说服得了戴笠，却说服不了张啸林。

后来，杜月笙前往张啸林家中，劝张啸林悬崖勒马，不要继续为日本军方做事，走上卖国投敌这条万劫不复的道路。然而张啸林却迷了心窍，认定日本军方能给自己很多很多，比如官职、比如权力、比如金钱。所以，张啸林在听了杜月笙要自己闭门不出，放弃即将到手的所谓的荣华富贵后，竟然对杜月笙破口大骂。杜月笙这才明白，自己说什么都无用了，张啸林已经不可能回头了。

杜月笙走后，张啸林继续做着自己升官发财的美梦，明目张胆地为日本军方服务。张啸林帮日本军方筹集棉花和医疗用品，为汪伪 76 号提供枪支弹药和特工，不过，官运却一直没有降临，霉运倒来了。

死在“自己人”手中的张啸林

张啸林做了汉奸后，他的名字就出现在了军统的锄奸名单上。在确定张啸林毫无悔改之心后，戴笠命军统特工对张啸林进行暗杀，但屡次都没有成功。而遭遇几次暗杀后，张啸林也加强了对自身安全的防卫。

张啸林和汪伪 76 号联络频繁，不仅经常让手下门徒帮助汪伪 76 号抓捕爱国志士，还经常协助汪伪 76 号绑架商人，敲诈勒索。而汪伪 76 号也常常求助于张啸林。因此，在需要加强自身安全的防卫时，张啸林首先想到的，就是向汪伪 76 号求助。

张啸林找到汪伪 76 号，希望李士群能给他派几个射击高手或者擒拿高手，再派几个情报高手，来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对李士群来说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因此，李士群没有拒绝。李士群从汪伪 76 号抽调了 20 多人，专门负责保护张啸林的人身安全。有了这 20 多名保镖，张啸林安心极了，他坚信，即使军统派出神枪手，也无法伤害他。

张啸林在汪伪 76 号的特工的严密保护下，活到了 1941 年的夏天。

在 1941 年之前，每年夏天，张啸林都和黄金荣、杜月笙等人，一起到莫干山避暑，但是这个夏天，时局太乱，黄金荣称病闭门不出，杜月笙又远走香港，只剩下他张啸林一个人了。可尽管军统一直对张啸林虎视眈眈，张啸林还是在不该去莫干山避暑的乱世，仗着有众多保镖，独自去了莫干山。然而，那段时间，恰好军统局下属的忠义救国军也在莫干山一带。当时，忠义救国军以莫干山为根据地，频频骚扰日军。日军被忠义救国军逼得恼怒万分，一把火将莫干山附近的山林、草木和竹林烧了个精光。张啸林到了莫干山，见满山烟火，听闻了此前的乱局，担心自己被忠义救国军发现，或者被日本军方误认为是忠义救国军的一员，就连夜带着保镖逃离了莫干山，返回了上海。

话说这位“张大帅”，在乱局中，终于耐得住寂寞，深居简出起来，自然，他的脾气秉性没变，只是时局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张啸林还是因为自己难改的本性，被“自己人”枪杀，最终一命呜呼了。

这一天，张啸林正和他的好友——汉奸吴静观在自己的府邸的三楼议事，突然听到院内有争吵声。争吵声打扰了张啸林和吴静观的谈话，张啸林向外一看，原来是他的保镖们在相互打骂。这可惹恼了好面子的张啸林，他立刻冲着外面的保镖大声叫骂：“你们这帮兔崽子是不是吃饱了撑得没事干，老子在楼上谈事，你们这帮东西居然敢在这里吵闹，不想干，就通通滚蛋，老子叫些东洋兵来保护老子，比你们不知道强多少倍！”

往常，张啸林就算开口大骂，府上被骂的人也不会反驳，只是乖乖地听他骂，等张啸林骂完了，他们就会自行走开。等些时候，张啸林气消了，就会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那天，张啸林照常张口就骂，却不想这一次，自己会因此丧命。

当时，张啸林的话音刚落，保镖队长林怀部竟然拔出了手枪，对准张啸林，叫道：“老子受够了，谁稀罕给你这个汉奸当保镖，我今天就送你上西天！”话音未落，林怀部就扣动了扳机，一枪射中张啸林的咽喉，张啸林当即从三楼的窗口栽了下来。

射杀张啸林后，林怀部没有停留，他立刻蹿上楼，来到张啸林和吴静观议事的房间，一枪击中正要打电话通知日本宪兵队的吴静观的后脑，吴静观当即倒地身亡。

林怀部杀死这两名汉奸后，丝毫没有慌张，他反而兴高采烈地从三楼跑下来，神情激动地喊：“我杀死了大汉奸，我杀死了大汉奸！”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快跑”，林怀部这才从亢奋中回过神来，转身跑出了张啸林的家，而其他的保镖，也没人上前阻拦，就这样，大家眼睁睁地看着林怀部从他们面前逃跑了。但是，已经逃走的林怀部，到了张啸林的府邸外，却站住了。为了不连累其他保镖，林怀部竟然决定不逃离现场，谁也想不到，林怀部就静静地站在那里，等待安南巡捕的到来。

张啸林和吴静观的死，着实是民族的幸事，如果他们不死，还不知道要帮日军残害多少爱国志士。只是让人遗憾的是，这件事几乎断送了英雄林怀部的一生。

当然，林怀部到底是怎样被军统局选中，又是怎样下定决心去刺杀张啸林的，已经无可考证，但是林怀部的确是接受了军统局的命令，才刺杀张啸林的。

林怀部被捕后，被判有期徒刑 15 年，因为军统局的多方打点，林怀部在巡捕房的监狱中并没有吃太多苦头，然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巡捕房监狱被日本军方接管，此后，林怀部饱受折磨。日本士兵折断了林怀部的每一根手骨，残忍地毁掉了他那双出枪极快极准的手。林怀部在监狱中饱受折磨，而他的老母和妻儿也由于没人照顾，生活极度贫困，只能靠乞讨为生。

新中国成立后，林怀部由于刺杀汉奸张啸林有功，被救出了监狱，并安排到上海市房管局工作，直至退休。对于这样的民族英雄林怀部，笔者相信他一定会有一个安静祥和的晚年，这也算是笔者对爱国志士的一种祝愿吧。

死在菜刀之下的汉奸傅筱庵

军统锄奸不仅依靠军统自己的力量，还十分注重拉拢爱国志士来

锄奸，这些军统的“编外人员”，虽然没有受过专业的特工训练，但也都大都没有让戴笠失望，除杀了许多汉奸。这些人包括刺杀张啸林的林怀部，还包括刺杀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的厨师朱升源，他们并不是受过专业训练的军人，但他们都有一颗爱国的心。其中，朱升源刺杀的傅筱庵，是军统除掉的汉奸中，在伪政府中职位最高的汉奸。

傅筱庵其人

前面的章节中，曾经提到大汉奸傅筱庵。这一节，就傅筱庵其人，笔者向读者详细展开叙述。

傅筱庵此人善于交际，在生意场上有自己独到的手段。

21岁时，傅筱庵凭借自己能说会道，从船厂的一名小工，摇身一变，成为写字间的领班，专门负责发放工人工资。那个时候，傅筱庵在商业上的“才华”就已经显露无遗，他经常克扣、冒领工人工资，并利用这些龌龊的手段，获得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购买了他在上海的第一处房产。此后，傅筱庵财运亨通，不仅结交了上海商界名人严子均、鲁麟和洋行买办虞洽卿、朱葆三等人，还通过他们的关系拜清朝廷官员盛宣怀为干爹，获得了政府和商道两界的扶持。然而，就在傅筱庵认定自己的前途一片光明时，辛亥革命爆发了。

辛亥革命爆发后，傅筱庵的干爹盛宣怀为了避难逃往青岛，临走前，让傅筱庵帮忙保管上海的家产。当时的盛宣怀怎么也想不到，他这番举动就是引狼入室。起初，傅筱庵还不敢对盛宣怀的家产有什么不轨的心思，但当他看到辛亥革命愈演愈烈，清政府即将灭亡，而自己的干爹又许久没有音讯时，傅筱庵的心思开始活络起来，他不露痕迹地将盛宣怀的财产转移到了自己的名下。

傅筱庵深知，不能将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因此他在上海商界的各大银行、商会、企业一共担任了数十个职务，即便这样，傅筱庵依然觉得底气不足，他认为商人如果没有军人、政府做靠山，很容易成为他人的俎上肉，任人宰割。所以，他寻找机会，欲与军队或政府搭上关系。

就在傅筱庵苦于找不到军队和政府做靠山的时候，一个天大的“机

遇”掉在了他的面前。

在蒋介石的军队尚未打到上海时，北洋军阀孙传芳控制着上海以及上海周边的许多地区，但孙传芳虽然掌握着一支军队，日子却并不好过。当时，北洋军阀政府的财政已经枯竭，一直靠银行贷款勉强维持，正因为这样，许多银行对北洋军阀政府失去了信心，都不再放贷给他们。而傅筱庵却认为，北洋军阀政府一定会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如果自己此时能与其搭上关系，对自己的前程必然大有好处。因此，傅筱庵在许多银行都拒绝北洋军阀贷款的时候，却频频与孙传芳接触，对孙传芳的要求有求必应。

难道傅筱庵真的不怕北洋军阀失败吗？当然不是，傅筱庵有自己的小算盘，他认为自己从自己所就职的银行贷款给北洋军阀不会有什么损失，即使北洋军阀失败了，损失的也是银行、商会和企业，与自己的财产无关。也就是说，现在傅筱庵是拿着别人的钱财在为自己做人情。

傅筱庵的算盘打得不可谓不响，但却因此惹怒了蒋介石。他在蒋介石率领的北伐军打到上海后，依然和北洋军阀孙传芳交往频繁，并继续为孙传芳提供资金支持。

更让蒋介石生气的是，蒋介石也曾为资金问题找过傅筱庵，但得到的支持，却与孙传芳有天壤之别。傅筱庵表面上不得罪手握重兵的蒋介石，好言好语地答应蒋介石大力支持国民政府，想办法为国民政府提供资金，但是事后，傅筱庵找了种种借口拖延，不支付款项。后来，蒋介石了解到，傅筱庵没有资助自己，然而却在同时，给了孙传芳不菲的资金资助，于是恼羞成怒的蒋介石，就在赶走北洋军阀孙传芳后，下令通缉傅筱庵。

傅筱庵听说蒋介石下达了抓捕自己的通缉令，惶惶如丧家之犬，连夜前往被日本占领的大连。虽然，大连属于敌占区，对傅筱庵来说相对比较安全，但傅筱庵却不愿一直留在大连，他想念上海呼风唤雨、纸醉金迷的生活，于是他拿出一部分家产，托杜月笙交给蒋介石，让杜月笙向蒋介石求情，撤销通缉令。

钱财加人情双管齐下，到底是起了作用。蒋介石考虑到傅筱庵在

上海工商界的影响力，再加上自己初入上海，需要有人帮助自己稳定上海的局面，于是在1931年，下令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通缉令被撤销的第二天，傅筱庵就从大连返回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傅筱庵凭借自己以往的关系，继续出任中国通商银行总经理的职务。傅筱庵本以为自己这次回来能继续过呼风唤雨的日子，但他没想到，在商界，他拼不过那些后起之秀；在政坛，他也被人排挤。

正所谓祸不单行，傅筱庵在商界和政界相继失意后，蒋介石看到上海一天比一天稳定，又对傅筱庵动起了心思。

时间很快就到了1935年，这一年，全球金融界爆发了一件大事——白银风潮。

1933年，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使美国早日走出经济衰退的泥潭，开始推行新政，在国内外市场高价收购白银，极力抬高白银价格，刺激类似中国这种银本位国家民众的购买力，实际上就是变相推动银本位国家的货币升值，以便美国对这些国家倾销过剩产品。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伦敦和纽约市场上大肆收购白银，导致国际银价疯狂上涨。

随着白银风潮的到来，众多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经济大萧条时期，为了缓解危机，这些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放弃金本位制度，利用货币贬值打开与受通货膨胀影响较小的国家的经济往来，以此来刺激国内的经济增长。这时，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将目光瞄准了中国，其中尤以美国为甚。

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大多数银行都属于资本主义银行，在银价涨到之前的两倍时，中国银行家从中看到了发大财的机会，他们开始在上海大量收购白银。

1933年到1934年，是上海的银行家们最疯狂的一年，当时，上海的各大银行每天晚上都要从库存中拿出一部分储备金，运给外国银行和中央银行国库，每天晚上，都有数百万两白银，从外国银行的邮轮转运到纽约和伦敦，在这些外国银行的推动下，整个上海滩陷入疯狂倒卖白银的浪潮中。

上海储存的白银从最高时期的 2.75 亿转瞬间下降到 0.42 亿，蒋介石看到国内物价飞涨、外贸逆差日益加剧，国内产品出口步履维艰，意识到中国货币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升值”。为了防止影响继续扩大，蒋介石立刻下令禁止国内银行向国外银行出售银元，也禁止国内银行对外国出售银元。这项命令阻止了正规渠道的白银交易，却阻止不了非正规渠道的白银出售和走私。不久，中国国内银元大量流失的后果显现了出来，因此通货紧缩，物价大跌，许多工商产业纷纷破产，上海租界的房价甚至下降了 90%。由于银元价格上涨，许多百姓和商人纷纷又到银行、钱庄兑换银元，导致大量银行和钱庄倒闭。

国民政府再也无法坐视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蒋介石频繁与美国交涉，希望美国能降低白银的收购价格，不想遭到了美国的拒绝。不得已，国民政府只能退而求其次，将中国现存的银元，全部按照商议的价格出售给美国，以求从这场经济危机中脱身。

虽然蒋介石在这场与美国的经济战争中一败涂地，但他却并非全然没有收获。在白银风潮中，蒋介石借机提拔了一批能帮助自己的商人，打压了一些与自己有旧恨的商人，而傅筱庵，不幸就是被蒋介石打压的那类人中的一个。

傅筱庵虽然从大连回到了上海，但他所在的通商银行经营情况却每况愈下。这其中不仅有国民政府不着痕迹的打压，还与傅筱庵不当的经营方法有关。通商银行在傅筱庵的经营下，一直坏账较多。所谓坏账，就是指企业无法收回或者收回可能性非常小的贷款。这些坏账在白银风潮中，给了通商银行致命的一击。一大批通商银行放款的大户因为破产，无法偿还通商银行放贷给他们的资金，再加上挤兑银元的风潮，通商银行的经营立刻出现了问题。为了维持通商银行的经营，傅筱庵不得不处处退让，而他的退让正好给了蒋介石一个打压他的机会。蒋介石趁傅筱庵内忧外患之时，指使国民政府接下了这家从前实力雄厚、信誉良好的商业银行，并把傅筱庵从董事长的位置上赶了下去，将通商银行更名为“官商合办银行”。

傅筱庵就因为是在蒋介石讨伐北洋军阀时期得罪了蒋介石，最终不仅失去了政治地位，还失去了银行董事长这个金饭碗。

从通商银行退出后，傅筱庵感到上海不会再有自己的立足之地，便心灰意冷地退避到了大连。

傅筱庵成汉奸，亲友伤心愤怒

退避到大连后，傅筱庵很少再出现在公众的视野里，就在人们即将淡忘他时，他又回到了上海，开始上蹿下跳。此次傅筱庵回来底气很足，为什么呢？因为他找到了新靠山，他的靠山身份很是显赫，是日本政府。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后，日本占领上海，经人引荐，请傅筱庵“出山”，出任伪上海市市长。1938年，傅筱庵大摇大摆地从大连回到上海主持“大局”。

傅筱庵成为了“伪上海市市长”，除了他自己、日本人、亲日分子和汉奸满意外，其他人都十分不满，包括他的家人。

傅筱庵的儿子因为无法承受自己的父亲变成了汉奸这一事实，变得有些精神失常，经常站在阳台上向下撒钞票，或许他潜意识里认为，是钱让他的父亲变成了汉奸，如果他将这些钞票全都撒光，父亲就会变回他心中那个为国奉献的好父亲。儿子的举动并没能让傅筱庵醒悟，他反而认为自己的儿子不争气，之后便对这个精神出现问题的儿子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地在卖国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傅筱庵的家中，除了他的儿子之外，还有一人对傅筱庵出卖国家的行为极为不满，这个人就是傅筱庵家中的厨师朱升源，也是经常被傅筱庵称为“老朱”的同乡。

关于朱升源的来历，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

朱升源是傅家两代厨师，在傅筱庵尚未出生时，朱升源就一直跟随傅筱庵的父亲。由于朱升源做事勤快，厨艺好，性格温顺，被傅筱庵的父亲视为亲信，委以重任。正是因为傅筱庵的父亲把很多事情都交给朱升源去做，让朱升源处事能力得到了飞速的提升，变得越来越圆滑，为人处世的能力丝毫不逊于游走在商界的许多商人。

朱升源的出色引来不少人的注意，许多人曾在私下里与朱升源联系，邀请他离开傅家到自己的企业做事，待遇任由他提。对此，朱升

源虽然心动，但也明白自己能有今日，全靠傅筱庵的父亲栽培，如果没有傅筱庵的父亲指点，自己一辈子都可能只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仆人。为了报答傅筱庵的父亲的知遇之恩，朱升源坚定地拒绝了这些人的邀请，一直留在傅家，尽心为傅家做事。

朱升源的忠诚，傅筱庵的父亲看在眼里，喜在心里，这更让傅筱庵的父亲确信自己没有看错人，也更加信任朱升源了。

转眼间，傅筱庵的父亲已经是风烛残年，在他弥留之际，将傅筱庵和朱升源叫到自己的床榻前，拉着二人的手，要朱升源多多照顾傅筱庵，也让傅筱庵一定要听朱伯伯的话，傅筱庵和朱升源二人泪眼婆娑地答应了下来。

傅筱庵的父亲去世后，朱升源不负傅父所托，无论傅筱庵身何处境，他都一直追随傅筱庵。然而，在傅筱庵答应日本政府，出任伪上海市长后，朱升源实在看不过去了，他找到傅筱庵，耐心劝他不要做汉奸，不要帮助日本政府，然而，傅筱庵已经被权力和财富蒙住了眼睛，他根本听不进朱升源的话，还与朱升源大吵一通。

朱升源虽然与傅筱庵吵了架，但他对傅筱庵没有丝毫芥蒂，依然将傅筱庵的生活照顾得无微不至，而傅筱庵也一如既往地信任朱升源。

傅筱庵对朱升源信任到何种地步呢？傅筱庵出任伪上海市长期间，因为遭遇了军统的几次暗杀，犹如惊弓之鸟，连自己的妻子都不信任，但唯独信任朱升源。傅筱庵每日的菜肴，都要朱升源给他做，不管朱升源把饭菜做成什么样子，傅筱庵都吃得很放心。对于这个从小看着自己长大的朱伯伯，傅筱庵从来没有生出过一丝戒心。

还有一种说法，说朱升源是傅筱庵在大连时收留的厨子。

在傅筱庵被蒋介石通缉避居大连时期，在一个大风呼啸的冬日，傅筱庵准备出门会见友人。刚一出门，就见到自己的府门前躺着一个穷困潦倒的男子。这个男子蜷缩在自家门前，似乎是想依靠大门为自己遮挡些许寒风。傅筱庵看着这名落魄的男子，心中忽然生出一种同病相怜的感觉，他觉得自己也像这个男子一样，在风波四起的政坛上瑟瑟发抖，无处躲避。因为这种感觉，傅筱庵破天荒地停住脚步，蹲下来询问这名男子姓什么，来自哪里。

男子刚一开口，傅筱庵就听出是宁波地区的口音，男子说自己是名厨师，烧得一手地道的宁波菜，由于战乱，被迫逃到大连，希望能在大连找份厨师的工作谋生。傅筱庵听后，立刻动起将此人收为自家厨师的心思。傅筱庵也是宁波人，能在北方听到乡音，吃到家乡菜，对于他来讲，也可以算是低迷时期唯一的一点慰藉了。于是傅筱庵收留了蜷缩在自家门前的朱升源，让他在自己家里做厨子。

朱升源进入傅筱庵的家里以后，也没有让傅筱庵失望。当天晚上，朱升源就给傅筱庵做了一桌色、香、味俱全的宁波菜，让傅筱庵吃得心满意足。傅筱庵甚至觉得朱升源做的饭菜比在宁波老家吃的还要地道，从此，傅筱庵每顿饭都指定要朱升源掌勺，几乎到了餐餐都离不开朱升源的地步。

由于朱升源做饭手艺好，人又忠实可靠，傅筱庵很快就将朱升源视为自己的亲信，甚至在家中议事时，也不避讳朱升源，即使是在与日本官员商讨出任伪上海市长一职一事时，他都没有避讳，而是让朱升源在一旁伺候着。

然而那一次，在日本官员走后，朱升源却破天荒地第一次指出傅筱庵做得不对，劝傅筱庵不要答应日本人的条件。朱升源对傅筱庵说，为日本人做事得不到好处，还会惹得一身腥，从民族道义上讲，日后，傅筱庵也必然会成为民族的罪人，这样的罪名，会让傅筱庵的祖先和后入蒙羞。奈何当时的傅筱庵，早已被日本官员许下的种种好处蒙蔽了心灵，他不耐烦地打断了朱升源的话，让朱升源回屋收拾行李，几日后随自己一起回上海。

笔者翻阅了大量的资料，找到了朱升源痛恨日本人的原因所在，这不仅是因为朱升源有自发的民族自尊心，还与他的经历有关。

朱升源曾经在日本商人的工厂里做过童工，在那里工作时，他经常被工厂里的日本人欺压、打骂、无故克扣工资，因此，朱升源对日本人是深恶痛绝的，并发誓一辈子不再为日本人服务。

朱升源对于傅筱庵是个“软骨头”，日本官员许给他一点好处，他就愿意为日本政府卖命非常不满。而且，自从傅筱庵勾结日本官员之后，朱升源不仅要负责为傅筱庵一家做饭，还要为常常登门的、他

最厌恶的日本官员做饭，这让朱升源的心中十分压抑。最让朱升源无法忍受的是，每次日本人来到傅筱庵的家中，都肆无忌惮地在傅家寻欢作乐，如果不是为了报恩，朱升源恐怕早就一走了之了。

朱升源心中烦闷又无人可以倾诉，他只能靠喝酒麻痹自己的神经，他真想有朝一日，在傅筱庵招待日本官员的宴席里下毒，将日本人毒死。

朱升源很小心地掩饰自己对傅筱庵卖国投日的不满，但他在外出喝酒时，还是不经意地泄露了自己对傅筱庵的不满，这便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

当时，军统正为刺杀傅筱庵的人选问题头疼，恰巧有个军统特工在一家小酒馆遇到了朱升源，从朱升源的只言片语里，分析出朱升源必然与傅筱庵有联系，并且十分密切，而且此人对傅筱庵还心存不满。为了查明朱升源的身份，这名特工在朱升源离开后，找到酒馆老板打听，这才了解到，他注意到的人居然是傅筱庵家中的厨师。他赶忙将朱升源的情况上报给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陈恭澍和戴笠商量后，都觉得可以利用此人除掉傅筱庵。

军统买通厨师，傅筱庵命归黄泉

陈恭澍打算用朱升源除掉傅筱庵，但是陈恭澍并没有立刻和朱升源联络，他开始收集朱升源的资料，决定了解透彻后，再根据朱升源的性格、喜好和弱点，制订刺杀傅筱庵的计划。

陈恭澍命上海区的一个特务，在傅筱庵的住宅附近开了一家小酒馆，并让这名特务在朱升源到酒馆喝酒时，与他拉近关系，然后从朱升源口中套取他对日本人、对傅筱庵的看法，以及有关傅筱庵的一些私密情报。

小酒馆建成后，朱升源果然常来这里喝闷酒。

朱升源第一次、第二次来小酒馆喝酒时，军统特工只是小心谨慎地观察朱升源，没有贸然上前和他搭话，当朱升源第三次来小酒馆喝酒时，军统特工走到他的面前，以店家的身份与朱升源搭讪。军统特工对朱升源说：“看您一个人来这里喝闷酒，是不是有什么不开心的

事情？”军统特工还装作很关心的样子，劝朱升源少喝些酒。

自从傅筱庵当了汉奸后，朱升源也一并遭人唾骂，他每次出门，都被人指指点点，说他在汉奸家里做事。朱升源遭受了不少冷言冷语的嘲讽，现在突然有个人关心自己，朱升源心中瞬间涌起一股暖流。从此，朱升源将小酒馆的老板视为知己，经常到小酒馆里喝酒，他喜欢这种不被人歧视的感觉，感觉小酒馆的老板特别随和，特别仗义。于是，随着二人关系的逐渐加深，军统特工从朱升源口中了解到越来越多的情报，包括朱升源对傅筱庵和对日本人的不满。

为了拉拢朱升源，军统特工也经常到朱升源面前表露对汉奸和日本人的仇恨，后来，朱升源大为感慨，说如果中国人都能不做汉奸，日本人也不会这么猖狂，于是军统特工就不露痕迹地向朱升源灌输爱国主义思想，后来，朱升源认同了军统特工的想法，认为汉奸和侵略者一样，都该杀。

这一天，傅筱庵又一次来到酒馆喝酒，军统特工见时机已经成熟，就将他安排到一个隐秘的小包间，说出了策划已久的刺杀傅筱庵的行动计划。

直到此时，朱升源才明白，这个与自己相交多日的酒馆老板，不是个一般人。

不过朱升源并没有深究酒馆老板的身份，他早已认同了酒馆老板汉奸该杀的想法，所以当他听到酒馆老板提出，要他去刺杀傅筱庵的行动计划后，没有太多犹豫，就点头答应了。朱升源早就对傅筱庵投靠日本人感到不满了，这些日子他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让他心中燃起的那团火焰愈烧愈旺，他恨不得马上杀死卖国投日的傅筱庵，替傅家清理门户。

看到朱升源爽快地答应刺杀傅筱庵，军统特工才告诉朱升源，在他行刺傅筱庵后，不管成功与否，军统局都会奖励他一笔奖金，并送他和他的家人到安全的地方生活，如果朱升源需要军统局为他提供工作，军统也一定会帮助他。朱升源听完后，才知道酒馆老板原来是军统局的特务，不过他也就此安心了，原本还顾忌自己的刺杀行动会连累到家人，有了军统局的担保，即使他失手被捕，他的家人也能得到

很好的照顾，他也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1940年10月11日凌晨，傅筱庵参加完日本某官员举行的宴会，带着满身的酒气回到家中。由于家人早已熟睡，傅筱庵准备去书房睡。因为在宴会上喝了不少酒，席间又花费大量精神周旋在日本官员与伪政府的官员之间，傅筱庵的精神和体力都已不支，因此，他躺在书房的床上，没几分钟就沉沉睡去。睡着的傅筱庵根本不知道，此时，在书房的暗处，正有一双眼睛在窥视自己。

这天晚上，朱升源听说傅筱庵要去参加日本官员举办的宴会，立刻意识到这是个刺杀傅筱庵的好机会，因此他一直没睡，而是在厨房磨刀。朱升源用傅筱庵参加宴会的时间，把一把大砍刀磨得锋利无比。见时间渐晚，傅家的人都睡觉去了，朱升源便静悄悄地躲到书房里，等待傅筱庵的归来，他了解傅筱庵的习惯，晚归的时候，傅筱庵总喜欢睡在书房里。

时间慢慢过去了，凌晨4点左右，朱升源听到了开门声，他偷偷地从门缝向外看，只见傅筱庵醉醺醺地走进屋。朱升源的目光一直紧盯着傅筱庵，在看到傅筱庵进入书房，倒在床上呼呼大睡后，朱升源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傅筱庵果真没有回卧室与妻子同睡，这样，自己杀死傅筱庵的时候，就可以不惊动任何人了。

朱升源悄悄地等待着，过了10分钟左右，他听到了傅筱庵轻微的呼噜声，朱升源知道傅筱庵已经睡着了，便轻轻起身。为了保证自己在不惊动任何人的情况下将傅筱庵杀死，他轻轻地走向床边，他每一步都走得很小心，没有发出一点声响，此时的朱升源既紧张又兴奋，一步、两步、三步……朱升源终于走到了傅筱庵的床前，他从怀中掏出早已磨得雪亮锋利的砍刀，对着傅筱庵的脖子狠狠地砍了下去。

只一刀，傅筱庵就一命呜呼了。朱升源一见得手，将砍刀一扔，便悄悄从书房退出，回到自己的卧室，取出早已整理好的包裹，在夜色的掩护下离开了傅筱庵的宅邸。

随后，朱升源来到与军统特工约定好的地点，与军统特工接头，然后在陈恭澍等人的安排下，前往法租界避难。

翌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条爆炸性消息，标题是这样的：虹

口昨晨血案，傅筱庵被刺身亡；祸生肘腋，老仆持刀暗杀，日方大肆搜查，并无所获。

陈恭澍看到这条消息后，担心傅筱庵的死会连累朱升源和他的家人，于是他特别叮嘱几名特工散播消息，就说傅筱庵已经死于军统之手，并到处传播消息，说军统刺杀傅筱庵完全是报复，当初就是因为傅筱庵反水，军统才损失了戴星炳、许天民这些优秀的特工，如果没有傅筱庵的反水，恐怕汪精卫早已变成了军统特工的刀下鬼。

军统局通过四处传播消息，让傅家人相信傅筱庵死于军统之手，也让怀疑是朱升源杀死了傅筱庵的人不再怀疑。因为厨师朱升源，在傅筱庵被刺杀的那天失踪了，大家都知道傅家对朱升源有恩，朱升源又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所以不再怀疑朱升源会做出恩将仇报的事情来。于是，大家都只当《申报》在编造故事，意在抹黑傅筱庵，暗指他做了汉奸，连家中的仆人都看不下去，恰巧朱升源失踪，就将傅筱庵的死栽赃在了朱升源的身上。

1940年12月，汪伪76号得知军统上海区的接头地点，在陈恭澍和军统成员接头时，派出汪伪76号的特务将陈恭澍逮捕，带到了极司菲尔路76号特工总部。很快，陈恭澍在李士群、王天木等汉奸的劝说下反水做了汉奸。

军统得知这一消息后，担心朱升源刺杀傅筱庵一事已泄露，连夜派人将朱升源从上海转移到金华，再由金华转移到了重庆。到了重庆后，戴笠亲自接见了这个忠义爱国的厨师，并奖励给他3000元法币。此后，这个颇具民族大义的厨师便慢慢淡出了军统局，与家人一起安度余生。

第五章 军统和日伪的货币战争

军统、中统与汪伪 76 号之间，不仅在情报战场上各不相让，经济战场上也是针锋相对、你争我夺。而这场经济战争的导火索，就是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当时，日本军队企图用废纸一样的中储券套走中国的物资和钱财，为了避免中国钱财流出，军统、中统围绕中储券的发行，与汪伪 76 号展开了一场斗智斗勇的暗战。

第一节 汪伪 76 号发行汪伪中储券

1940 年，日本政府对华实行“以战养战”的侵略性经济战略，企图采用“空手套白狼”的方式，用没有价值的“钞票”掠夺中国大量物资和财富，用这些物资和财富支持日本本土经济的发展，以及日本在华侵略军的给养。换句话说，日本就是想利用中国的物资和财富来消灭中国。

发行中储券，汪伪 76 号无所不用其极

在日本政府大量发行没有价值的“钞票”的同时，汪伪政府和汪伪 76 号，为了发行所谓的中储券，无所不用其极。值得庆幸的是，日本政府阴险、狠毒的想法很快就被国民政府发现了。为了不让群众上当，不让群众使用日本发行的“钞票”，国民政府特别向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广大报社发出通知：禁止使用“中

储券”，拒收“中储券”，让它留在汪伪政府，成为一堆只能用来生火的废纸。

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负责人在“中储券”尚未发行前，就收到了通知，而后又收到国民政府一封禁“中储券”的电文，为了响应蒋介石的号召，也为了避免给各个商界人士带来损失，上海公共租界工商局负责人迅速召集上海金融界和商业人士，讨论如何抵制“中储券”。经过一番激烈讨论，这些商业精英们拟定了三点原则，以保公司、个人和周围生意伙伴的利益。

这三点原则分别是：

- ①上海公共租界的各个商店均不得接受、使用“中储行”钞票；
- ②各个银行不准为“中储行”钞票兑换外汇；
- ③各大银行、钱庄必须拒绝收下“中储券”。

国民政府为了彻底抵制中储券，还命令市商会、邮电局一律拒绝接收、使用中储券。

看到中储券如此没有行情，百姓自然也不愿意使用和购买中储券。这样一来，日本政府以“废纸”换中国物资和财富的计划即将破产。但是日本政府怎么甘心如此一个对日本好处众多的计划就这么胎死腹中呢？为了能继续实行“以战养战”的经济战略，日本政府开始给汪精卫施压，命令汪精卫无论如何都要发行中储券。

汪精卫在收到日本政府的命令前，就明白中储券带来的效益，远没有达到日本政府的预期，日本政府必定会给自己施压。因此，他早早就开始寻找打开中储券的使用市场的方法。在收到“主子”的命令后，汪精卫决定动用他的爪牙——汪伪 76 号，以武力胁迫商行、银行接收中储券。

李士群收到汪精卫的命令后，也认为，只能靠武力和威胁，才能打破中储券发行困难的局面，改变中储券不被民众接受的事实。李士群虽然清楚，中储券的发行会给中国社会带来极大的灾难，但这些却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认为日本政府是自己的靠山，无论中储券发行的结果如何，只要自己尽力去发行，日本政府就不会亏待自己。而他李士群要是能做好发行中储券一事，一定能使得日本政府越来越

重视他，他也能获得更多的好处。这对他李士群来讲是一本万利的事，他为什么要为了顾及民众，放弃这么好的表现机会。

李士群召来自己的得力助手马啸天、万里浪、吴世宝等人，说清中储券发行遇到的困难后，征询他们的建议，让他们想想办法，如何以最快的速度打破中储券发行的僵局，使中储券得以大量发行。

马啸天提议，不妨从民众每天都要接触和使用的东西上着手，这样可以让民众很快接受中储券的存在，随后使用它。李士群觉得这个办法可行，便命令马啸天带着汪伪 76 号第一大队的特工，前往上海公共租界电车公司总部，威胁他们使用中储券。

马啸天领命后，立刻带着全副武装的特务，开着装满中储券的汽车，一路疾行，赶往电车公司总部。这些特务人手一把枪，在电车公司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就闯进了总经理室。

面对手枪和手榴弹的威胁，电车公司总经理只能服从他们的命令，用法币购买特务带来的这一车“废纸”。而电车公司收了“废纸”后，自然也不想让这些没用的钞票烂在他们的手中，他们将“废纸”化整为零，散发在各辆电车当中，让售票员用这种钞票当零钱找给市民。

市民们本不接收中储券，但是电车公司的售票员们恶声恶气地坚持，说目前电车上只有这一种钞票可以找零，市民们在没有选择的情况下，接受了中储券，但是市民很快就发现他们上当了，根本没有一家商店、银行愿意接收这种钞票，就连电车公司自己都很少接收这种钞票。

然而就是这样，李士群用武力发行出去的这些中储券，与日本政府期望的发行量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远不能满足日本政府的要求。

为了能发行更多的中储券，李士群接受了“中央储备银行”推销主任的建议，派汪伪 76 号特工用“中储券”到上海各大商场、市场购物，如果哪个商户不开眼，不肯接受中储券，特务们便掏出手枪，威胁他们收下中储券。

为了保命，各大商户唯有收下“中储券”，然后眼睁睁地看着特务们搬走自己的货物。汪伪 76 号特工用毫无用处的“废纸”换走商

户的货物，这种行为与抢劫无异。商户们非常气愤，有些商户坚决不收特务的中储券，认为即使特务再大胆，也不敢在公共租界内肆意妄为，然而汪伪 76 号的特务就是强盗、土匪，他们在公共租界内也肆无忌惮地开枪杀人。公共租界巡捕房的警察为了汪伪 76 号的特务在公共租界内开枪杀人疲于奔命，却没能抓住汪伪 76 号的一个特务，虽然矛头都指向了汪伪 76 号，但是谁也没有胆量直接到汪伪 76 号总部追查凶手，这些枪杀案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汪伪 76 号以中储券换货的行动，不单单只针对上海市各大商场和大市场，那些小店铺、生活用品商店也同样没能逃脱货物变“废纸”的命运。

汪伪 76 号为了提高中储券发行量，强迫街头店铺的老板使用中储券，并派出特务在各个商铺外监视，一旦发现哪个店主不使用中储券，就立即出面，用各种方法强迫店主使用中储券。受到汪伪 76 号监视的店铺十分多，就连那些售卖柴米油盐、布匹、卫生纸、火柴等基本生活用品的小店铺都没有逃过。

发行中储券引发的银行血案

汪伪 76 号的这些手段，让商户们吃尽了苦头，但是李士群还是觉得力度不够，他认为这样虽然能发行出一些中储券，但是见效颇慢，耗费的时间长，日本政府根本不会有耐心等他这样慢慢发行中储券，他必须要寻找更有效的方法来发行中储券。

李士群灵机一动，将主意打到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等几个国有银行头上。李士群当然不敢碰公共租界内的外国银行，毕竟那些外国银行身后的势力，不是他一个小小的“狗腿子”能得罪得起的，他还没傻到胆大妄为地在外国银行里胡作非为。但对国有银行，李士群就不怕了，在李士群看来，这几家国有银行纯粹就是国民政府的“走狗”，国民政府是汪伪政府的敌人，那么这几家国有银行就是他李士群的敌人。对待自己的敌人，李士群一向是不留情面的，因此他决定将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这四家国有银行作为突破口，利用四大国有银行大量发行“中储券”，同时，

在打击这些银行的同时，也给军统一点颜色看看。

首先，李士群决定杀鸡儆猴，先拿一家银行开刀，从而引起其他银行对中储券的重视。李士群选定的第一个目标是中央银行。

李士群选定中央银行后，却犯了难，他不确定自己该用多大力度去打击中央银行，轻了，他怕起不到杀鸡儆猴的作用；重了，怕激怒中央银行，要是中央银行直接关门了事，他的所有努力也就白做了，到那时，自己不但立不了功，还会受到日本政府、汪精卫和周佛海等人的责骂。

盘算了许久，李士群才命令汪伪 76 号化验室的主任，做了两颗定时炸弹，由汪伪 76 号的特务沈信负责执行对中央银行的恐怖威胁一事。

在沈信出门前，李士群又找到他，特意交代他这两颗炸弹的放置位置，一颗放在位于逸园跑狗场的中央银行办事处，另一颗放在公共租界爱义路（现北京西路）中央银行分行。

1941 年 3 月 21 日 16 时许，汪伪 76 号的特务沈信，派手下的一名特务，冒充邮递员，将装有炸弹的包裹送到了位于逸园跑狗场中央银行办事处。银行职员将这个包裹送到总经理的办公室，并按照总经理要求打开包裹后，发现包裹里是一个一闪一闪、嘀嗒作响的造型奇怪的仪器。虽然职员和总经理都不认识这个仪器，但是单凭直觉，他们也明白，这个仪器会威胁到他们的生命，但是，当那名拆开包裹的银行职员想将包裹扔出窗外时，已经来不及了，爆炸声成了这名职员和办事处总经理的人生的最后记忆。在这场汪伪 76 号制造的银行爆炸案中，有 50 余人遇难。

在位于逸园跑狗场的中央银行办事处被炸弹袭击的同时，位于公共租界爱文义路的中央银行分行内，也响起了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这枚炸弹先被送到了中央银行分行的传达室里，然后由传达室送到了银行大楼里，由于传达室和银行大楼距离较远，所以当炸弹爆炸时，包裹才到中央银行大楼的大门口，也正因为这样，这里的死亡人数，远低于跑狗场处的死亡人数，但也造成了 7 人死亡，银行大楼的大门也在这场爆炸中毁于一旦。这两起爆炸事件，让当时银行界的领导和职员们都惶恐不安，吸取这两次的教训，所有银行的传达室都不敢再

随意接收包裹，唯恐出现类似中央银行的爆炸事件。

再说汪伪 76 号的特务沈信，他似乎炸银行炸上瘾了，在炸毁中央银行的当天，他又指示一名特工，将装有定时炸弹的包裹送到了位于霞飞路的中国农民银行。然而同一天同一刻的两起爆炸事件，已经让银行对包裹有了戒备之心，因此，中国农民银行的职员在收到包裹时，没有将包裹送入银行内部，而是在银行外的空地上拆开了包裹。当看到闪烁信号灯的仪器时，银行职员立刻报警，称有人投放定时炸弹，请求警察的帮助。警察迅速带拆弹专家赶到中国农民银行。经过拆弹专家的努力，这枚定时炸弹被安全拆除。

而汪伪 76 号的特务沈信，在过了爆炸时间很久，还没有听到爆炸声后，立刻推断出，送到中国农民银行的炸弹没有爆炸，他也明白了，此时的各大银行，已经有所戒备，再想炸毁其他银行，已经没有开始那么容易了，因此，他带着特务们驱车返回汪伪 76 号特工总部，向李士群复命。

李士群在汪伪 76 号总部内也听到了两声巨大的爆炸声，他猜到沈信的任务已经圆满完成了，于是，在沈信回来后，他拍着沈信的肩膀，夸他做得不错。然而沈信却觉得不过瘾，说自己本想把中国农民银行也顺手炸了，但是却没能如愿。李士群随即召来吴世宝等人，将自己的下一步计划对沈信和吴世宝全盘托出。李士群计划让沈信、吴世宝带几名特务前往霞飞路，到中国农民银行职员的集体宿舍所在地——霞飞路 1412 弄进行恐怖袭击，枪杀农业银行的职员。

沈信和吴世宝听了李士群的话后，迫不及待地带着一群特务来到霞飞路，冲进霞飞路 1411 弄，他们看到霞飞路 1411 弄 10 号的大门上，写着“农行宿舍”四个大字，便撞开大门，冲进屋子，疯狂地开枪扫射，致使宿舍里的 6 名农行职员死亡，10 余人重伤。

吴世宝和沈信在疯狂残杀农行职员，返回汪伪 76 号，向李士群邀功时，才意识到，他们杀害的，是霞飞路 1411 弄 10 号江苏农业银行的职员，而不是霞飞路 1412 弄里中国农民银行的职员。李士群在得知吴世宝等人杀错了人之后，也没有怪罪吴世宝，干脆一错再错，让大开杀戒的吴世宝过过瘾，到汪伪 76 号附近极司菲尔路 96 号的中

国银行的员工宿舍去展开另一场屠杀。

于是杀红了眼睛的吴世宝，亢奋地带着一队特务，杀气腾腾地冲到了极司菲尔路96号，此时正是1941年3月22日凌晨3点左右。强行进入中国银行员工宿舍大楼后，吴世宝没有像在霞飞路一样，让手下特务们直接朝宿舍内扫射，而是命令特务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挨个搜查，把大楼里的中国银行的员工通通抓了起来，随后，全部押送到汪伪76号做了人质。一夜之间，中国银行一共有129名职员，被汪伪76号抓捕关押。

中国银行的营业范围最广，社会影响力最大，被抓捕了129名职员后，中国银行内部人心惶惶，然而，在会计、出纳和金融主管都被抓捕关押进入汪伪76号之后，中国银行依然尽最大的努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人员，在缺少大量人手的情况下坚持营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汪伪76号、汪伪政府证明，中国银行绝对不会因为汪伪76号的恐怖行动而屈服。

中储券给中国带来的恶劣影响

汪伪政府和汪伪76号为了发行中储券，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而国民政府为了阻止中储券的流通可以说是竭尽全力，那么，中储券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让中日双方，甚至国外银行都这么紧张呢，这还要从中储券的性质说起。

中储券全称中央储备券，它并不是一种国家认可发行的货币，而是日本政府在侵华时期，指使汪伪政府在沦陷区强制发行的一种货币。

根据日本政府的指令，汪精卫在1941年1月，在南京设立了中央储备银行。后来，汪伪政府为了扩大中储券的影响力，又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设立了中央储备银行分部。

最初，汪伪政府在发行中储券时，制定的兑换比率是50比100。也就是说，100元法币只能兑换50元中储券，这对于汪伪政府和日本政府来讲，绝对是稳赚不赔的买卖。

1941年，中储券发行初期，国民政府敏锐地察觉到，这种没有硬通货支撑的货币一定会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下令禁止使

用中储券。但尽管国民政府竭力阻止中储券在市面上流通，却还是无法阻止汪伪 76 号利用各种卑劣的手段逼迫商人使用中储券。

1942 年 5 月 31 日，无法阻止汪伪 76 号发行中储券的国民政府，为了不让中储券继续无所顾忌地发行，下令禁止法币在市场流通。

截至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投降前夕，中储券在中国一共发行了 46 亿，如此庞大的数字震惊了世界，日本人在这一时期制造的这一假钞的数量，在当时，乃至现在，都堪称世界之最。

期间，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减少百姓的损失，国民政府只得下令兑换中储券，然而面对数量庞大的中储券，国民政府显得有心无力，他们只能用 1 法币兑换 100 中储券的可怜比率来实行兑换政策。

1 : 100 的比率是什么概念？就是说，当初，民众是按 100 法币换 50 中储券的比率兑换的中储券，到了 1945 年，他们只能兑换回 0.25 元法币。也就是说，不到 5 年的时间，中储券整整贬值了 200 倍，日本人不仅创下伪造假钞数量之最，还创下了钱币贬值速度最快的纪录。

在中储券发行的这几年，日本政府、汪伪政府和汪伪 76 号利用这种“废纸”，从中国百姓手中搜刮走了大量的物资和金钱。

1943 年 2 月，汪伪政府为了更加快捷便利地和日本取得联系，决定扩建广州白云机场，扩建新航线。扩建机场，意味着需要征用新的土地，汪伪政府于是将目光瞄准了广州三元里一带，从这一带农民手里征收了 200 多亩土地。

众所周知，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汪伪政府若想征收这片土地，就必须给这些失去土地的农民一些补偿。事实上，汪伪政府确实给了农民补偿，一亩地赔偿 778 元，如果是大洋，那么这个补偿是非常合理的，足够一户人家做些小生意或者再到别处买些土地维持生计，而且即便什么都不做，这些钱也能保证一户人家衣食无忧地生活十年到二十年。即使这 778 元，换成当时价值略低于大洋的毫洋，农民们也是不吃亏的。然而做了汉奸的汪精卫，心肝是黑的，他将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土地征走以后，付给农民的钱币，居然是汪伪政府发行的中储券。1943 年，是中储券发行的第二年，中储券已经贬值许多，汪伪政府给农民补偿的 778 元中储券，当时仅能买到 80 公斤的

中级面粉。按照这样的比例，汪伪政府付给农民的 778 元。早在 1933 年，广州一亩土地就能卖到几千毫洋了，几千豪洋，足够一家人过上好多年的日子，然而价值几千豪洋的土地，却被汪伪政府用几百块钱的废纸就换到手了，可想当时那些被征收了土地的农民，下场有多悲惨。

日本政府利用汪伪政府和汪伪 76 号，发行中储券，强行征夺中国财富。

中储券在汪伪 76 号这些走狗的帮助下，疯狂地在中国发行，市面上中储券的数量越来越多，百姓手中的中储券越来越不值钱。

1944 年，14200 元中储券仅能买到 80 公斤大米，街头，经常能看到百姓拿着一大袋子中储券购物。

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笑话，有人拿着两斤猪肉和一麻袋中储券在挑大豆，在挑选大豆时，这个人将猪肉和一麻袋钱都放在了地上，等他买好豆子时，却发现钱还在，猪肉却没了。这虽然是个笑话，但也能由此看出，那个时期中储券贬值如何严重。

抗日战争结束后，日本退出中国，但是中储券给中国带来的影响并没有消失。日本人宣布无条件投降，汪伪政府和汪伪 76 号被迫解散后，中储券成了没有“家”的“黑户”，国民政府再也不允许使用这种象征着屈辱的钱券。

抗日战争结束后，为了减少停用中储券对百姓造成的损失，国民政府下令用法币兑换中储券，但是因为能力有限，国民政府将中储券和法币的兑换率制定得非常不合理，导致沦陷区的许多居民破产，百姓对国民政府的怨恨与日俱增。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中储券给中国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在抵制中储券对中国的影响，破坏中储券发行的过程中，军统局、中统局和汪伪政府、汪伪 76 号斗智斗勇，也取得了不小的胜利。

军统局大力除杀推行中储券的 76 号汉奸

在汪伪政府丧心病狂地推行中储券时，军统特工也积极行动了起来，他们遵照戴笠的指示，“以牙还牙”，用汪伪 76 号对付银行、商户的办法，对付汪伪政府设立的“中央储备银行”。

1941年1月30日清晨6点左右，两名军统局特工，埋伏在法租界恺自迳路（今金陵中路）芝兰坊7号对面，准备刺杀住在芝兰坊7号的汉奸季翔卿。季翔卿是“中央储备银行”驻沪推销主任，正是他，建议李士群用子弹打开中储券发行的大门。除掉季翔卿，中储券的发行速度就会放缓，军统的两名特工，奉戴笠之命，耐心地埋伏在季翔卿家对面，等待季翔卿的出现。

大约8点左右，季翔卿出现在家门口，军统特工们精神为之一振，他们的目标季翔卿头戴一顶褐色礼帽，身着一身黑色条纹西装，为了御寒，外面还穿了一件黑色大衣。季翔卿的穿着，宛如丧服，像是在预示自己的灭亡和军统的成功一样。就在季翔卿左脚刚刚踏上停在家门口的汽车的那一瞬间，两颗子弹飞驰而来，直指他的头部，一颗击中了他的太阳穴，另一颗击中了他的额头。季翔卿还未来得及呼喊，就倒在了地上。军统局的两名特工迅速上前，隐藏在纷乱的人群中，确认季翔卿已经死亡后，便迅速离去。

季翔卿的遇刺身亡，让汪精卫十分愤怒，他责令汪伪76号一定要抓住杀害季翔卿的凶手。

李士群虽然接受了汪精卫指派的抓捕刺杀季翔卿的凶手的任务，但李士群认为，这个任务几乎无法完成，因为季翔卿死时，没有目击证人，没人知道子弹从何而来，更没人知道凶手的样貌，唯一的线索，就是从季翔卿的伤口推断，凶手的枪法非常准，一定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特工杀手。那么嫌疑最大的，自然就是一直与汪伪76号针锋相对的军统局，然而，究竟是军统的哪个特务杀了季翔卿，谁也不知道，而且，即便是知道，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也很难实施抓捕。

季翔卿的死让李士群心烦不已，然而不到一个月，又发生了一件让李士群更加心烦的事情。

1941年2月20日上午10点左右，三名身着西装的男子走进上海“中央储备银行”的营业大厅，就在营业员准备走上前去，询问这三名顾客需要什么样的服务时，走在前面的一名男子，突然从皮包里掏出一枚手榴弹，向柜台内投掷。然而炸弹滚到了墙角，却没有爆炸。这名男子当即又掏出了另一枚手榴弹，扔向楼梯口，这一次，“呼”

的一声，手榴弹爆炸了，一阵烟雾腾起，营业员们吓得都趴在了地上。趁此时机，这三人中的一人，迅速向二楼业务处跑去，向二楼业务处内投掷了两枚没有拉开保险盖的手榴弹，随后，此人回到一楼，和同伴会合后，三人向大门外逃窜。此时，“中央储备银行”的守卫终于清醒了过来，挡住了这三个人的去路。这三名男子于是掏出了手枪，朝守卫的脚下开枪，冲出了银行。这三名男子的举动，并未造成人员伤亡，他们在“中央储备银行”里抛掷没有拉开保险盖的手榴弹，目的是恐吓前来这里办理业务以及在这里工作的有关人员。

这起事件，同样也是军统局的特工所为，这三名特工的恐吓举动，收到了不错的效果，许多投机分子、亲日分子听到这个消息后，再也不敢走进“中央储备银行”。“中央储备银行”里人心惶惶，工作人员们每天都提心吊胆的，甚至还有职员因为害怕会因为伪政府的银行里上班而招来杀身之祸，最终选择了辞职。

军统局的三名特工扔哑弹的目的达到了，他们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没有殃及无辜，还威慑了那些投机分子、亲日分子，达到了破坏中储券发行的目的。

军统不伤无辜的做法，与汪伪 76 号肆意射杀国民政府的银行员工的做法截然不同。

再回头说被汪伪 76 号于 1941 年 3 月，绑架的那些银行员工。

戴笠在惊闻中国银行的 129 名员工，在 1941 年 3 月集体被汪伪 76 号绑架后，勃然大怒，但为了保障这些人的安全，他不得不隐忍不发，压制火气，与汪伪 76 号谈判。直到 1941 年 4 月 16 日，被绑架的 129 名中国银行员工都被汪伪 76 号释放后，戴笠才命令军统局，对汪伪 76 号展开报复行动。

这一次，军统特工将目标瞄准了“中央储备银行”的会计科副主任张永纲，暗杀“中央储备银行”的会计科副主任，会对“中央储备银行”的运营造成严重的影响。可惜的是，这一次，军统特工并没有成功除杀张永纲，只是将其击伤。张永纲被击伤后，被送往大华医院医治。面对这样的结果，戴笠并不死心，派出了三名军统特工，前往大华医院再次刺杀张永纲。

周佛海听到张永纲被枪击的消息后，将这件事看作是国民政府对汪伪政府的挑衅，他迅速吩咐李士群，从4月16日晚放走的129名中国银行员工中，挑选三人，予以刺杀，以反击军统局对张永纲的刺杀行为。

李士群接到命令后，立刻指派汪伪76号的特务们，将之前曾经关押到汪伪76号的129名中国银行的员工又一次抓捕，关进了汪伪76号，这距离这些职员被放出汪伪76号还不到一周的时间。

在这129名职员被重新关进汪伪76号的当天晚上9点半，吴世宝就从这129人中选出了9名职位相对较高的职员，告知他们，汪伪76号要请他们这些职位相对较高的员工吃饭。这9个人闻听此言，面面相觑，满脸恐惧，不知道吴世宝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吴世宝于是奸笑一声，没有再卖关子，对他们说：“吃完饭后，要从你们9个人当中选3个人，为张永纲抵命。”

随后，吴世宝还将这9个人里姓张的职员都挑出来了，但是只有两个人姓张，眼看还差一个，面对这一人的空缺，吴世宝很随意地表示，由天做主。

吃饭时，吴世宝准备了一把“死亡椅子”，除了那两名姓张的职员，剩下的7个人，谁坐到那把“死亡椅子”，谁就是倒霉鬼，最后，一名姓曹名善庆的央行主任坐到了那把“死亡椅子”。

吴世宝见为张永纲偿命的三个人全部都选出来了，就让这9个人赶紧吃饭。饭后，吴世宝将其余6人遣送回汪伪76号的关押室，留下了两名姓张的职员和曹善庆。吴世宝在询问了这三人的年龄、姓名、籍贯等问题后，哄骗此三人，和颜悦色地说，刚才说要让他们偿命，不过是为了震慑其他人，其实他是要将他们送回中国银行员工宿舍，希望他们能够在中国银行内部，配合汪伪76号的工作。

这三个人看到吴世宝如此和颜悦色，便以为吴世宝开始所言，要他们为张永纲偿命，不过是玩笑而已，也就慢慢放松了警惕。最后，在吴世宝的巧言相劝下，上了汪伪76号的汽车。

吴世宝照旧把这三个人拉到了汪伪76号用来枪决所谓的“犯人”的中山北路的小树林里。到达小树林后，这三个人刚一下车，就愣住了，

这是哪里呢？可还没等这三人回头，身后的汪伪 76 号的特务，就朝他们开枪射击。曹善庆和一名张姓男子应声倒地，另一名张姓男子没有被击中，但他却被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傻了，见那二人齐齐倒下，吓得呆若木鸡，站在原地一动不敢动。汪伪 76 号的特务见还有一人没有倒地身亡，便又朝其开了一枪，这名男子随即倒地。汪伪 76 号的特务见三人统统倒下，便开车返回。曹善庆和那名头部中枪的张姓男子，因为都被击中了头部，所以都一命呜呼了，而最后那名张姓男子，非常幸运，仅仅被击中了腿部，在汪伪 76 号的特务撤离后，拼死爬了起来，逃出了小树林，捡回了一条命。

在汪伪 76 号特工处决中国银行三名中层职员第二天，文化汉奸胡兰成恬不知耻地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标题为《以三抵一，信守诺言》的文章，向日本政府、汪伪政府和汪伪 76 号献媚。在这片文章中，胡兰成以汪伪政府领导人的口气自居，严厉地警告国民政府和军统局，如果再不停止对中储券发行的破坏行动，日方和汪伪 76 号将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打击报复。

日本政府有关官员，看到《中华日报》上的这篇报道后很是得意，并以中国银行员工宿舍频频发生事故为由，接管了极司菲尔路 96 号，将里面居住的中国银行员工统统驱赶了出去。

大汉奸周佛海看到报道后，还不满意，他又一次下令李士群，继续报复国民政府的各大银行！

怎样继续报复国民政府的各大银行呢？

李士群想到了上次吴世宝错杀江苏农业银行员工一事，当时，李士群本来是派吴世宝去杀害中国农民银行的员工，但是吴世宝弄错了门牌号，杀错了人，因为江苏农业银行也是国民政府的银行，所以李士群也没有追究吴世宝的过错，而吴世宝此举，也算是对国民政府的银行起到了威慑作用。这次，不如就继续大开杀戒，去杀害中国农民银行的员工。

当夜，李士群就将汪伪 76 号特工队队长杨杰召到了会议室，命令杨杰带领一队特务，去射杀住在霞飞路 1412 弄的中国农业银行宿舍里的银行职员。

杨杰领命后，立刻带人来到霞飞路 1412 弄。为了防止有人在射杀过程中逃跑，杨杰命令特务将车横放在弄堂口，并留下两名携带机枪的特务守在弄堂口，专门负责射杀漏网之鱼。其余的特务，都集中到中国农民银行的员工宿舍的门前，这些特务连敲带砸，甚至直接用机枪将门锁打坏，闯进了员工宿舍。最后，汪伪 76 号的特工，将中国农民银行宿舍大楼里的所有员工，都赶到了大楼的楼下。

这些职员被突如其来的恐怖事件吓得瑟瑟发抖。杨杰确定楼内所有人员都被赶到了楼下后，命令这些银行职员排队站好。这些无辜的银行员工，刚刚排好队，便被汪伪 76 号的特务一阵疯狂的扫射，全部倒在了血泊之中。

汪伪 76 号的这次行动，残忍至极，在场的中国农民银行的员工，一个幸存者都没有，统统被汪伪 76 号的特务残忍杀害。

后来，法租界巡捕房的巡捕赶到现场，只看到数十人倒在血泊中，无一生还。

这场惨绝人寰的枪杀事件，让汪伪 76 号凶名远扬，也让整个上海滩人心惶惶，百姓提起汪伪 76 号，都心惊肉跳，唯恐哪一日，自己就撞上了汪伪 76 号的枪口，而上海各大银行的职员，更是时时刻刻胆战心惊。

第二节 军统变身“盗版商”，抢先发行中储券

汪伪 76 号制造的中国农民银行血案，使得整个银行界人心惶惶，中央银行为了防止汪伪 76 号再次制造惨绝人寰的枪杀案件，请法租界巡捕房派出了一辆铁甲车，日夜守护在四大银行门口。面对汪伪 76 号肆无忌惮的疯狂报复，军统局开始大力反击。

戴笠以牙还牙，“绑架”周佛海的亲人

除了中国四大银行受到影响外，国外的花旗银行、大通银行、友邦银行等银行在上海的业务，也因汪伪 76 号与军统局之间这场无止无休的

银行战争而大受影响，为了防止自己利益继续受损，这些外国银行纷纷向国民政府和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他们停止这种无谓的争斗。

事实上，即使这些外国银行对这场争斗不予理会，面对这场愈演愈烈的争斗，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也会想办法休战，因为他们各自都明白，如果继续斗下去，只会两败俱伤。

国民政府经过反复研究，一致认为，在上海地区，汪伪 76 号有日本军队做后盾，所以敢肆意行凶，而反观军统局，力量薄弱，只能一边坚守“阵地”、一边以租界为掩护，冒险出击。两方的力量对比悬殊，军统局若要在上海与汪伪 76 号硬碰硬，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虽然也能给对手惹来一身腥，但军统局要付出的代价极大。

而汪伪 76 号其实也没有太多精力去与军统局对决，李士群此时正在和与他势均力敌的汪伪汉奸罗君强，争夺“清乡”的领导权。

“清乡”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领区推行的一种政策，其具体内容是，驱除和消灭日军占领区内的革命力量和抗日武装，稳固日军在占领区内的统治地位。李士群在日本军队下发“清乡”令后，认定这是一个可以大发其财、笼络人员、充实力量的好时机，因此，李士群极力争取，欲将“清乡”的工作承揽下来，所以，他没有太多精力，再组织汪伪 76 号对国民政府的各大银行进行血腥的屠杀了。

后来，国民政府委托杜月笙出面调停这场银行之战。

杜月笙接到国民政府的指令后，认为此事事关重大，马上发电给自己的门徒，在上海极具影响力的“花会大王”高兰生，让他出面和汪伪 76 号商谈，调停此事。

高兰生收到杜月笙的电报后，片刻不敢耽搁，马上找到吴世宝，请吴世宝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各大银行的袭击。

吴世宝见高兰生亲自来找自己，颇感意外，毕竟高兰生在上海滩的地位，远比自己要高很多，但此事事关重大，不是他一个小小的汪伪 76 号的行动队长能决定的，不过他答应高兰生，一定劝说李士群同意调停此次争斗。尽管高兰生没有从吴世宝那里得到肯定答案，可他依然对吴世宝表示感谢，并表示事成之后，一定重谢吴世宝。

高兰生辞别后，吴世宝马上向李士群报告了此事，而李士群此时

也正有与军统局休战的打算，只是担心军统局不肯休战。吴世宝带来的消息正合他意，因此，李士群让吴世宝给高兰生回话，说汪伪 76 号同意调停。狡猾的李士群还让吴世宝专门派人到香港，给杜月笙回了个话，以表现汪伪 76 号的诚意。得到汪伪 76 号的回复后，戴笠当即命令军统局上海区停止一切行动，休养生息，自此，银行大战才算终结。

戴笠虽然让上海的军统特工停止了行动，但他却并不甘心，他一直在寻找报复汪伪 76 号的机会，不久，他就找到了一个机会。

戴笠回忆整个事件，周佛海下令汪伪 76 号打击军统局，汪伪 76 号绑架中国银行 129 名职员当作人质，戴笠于是决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戴笠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既然这场争斗的始作俑者是周佛海，那么戴笠就要给周佛海一个教训。

国民政府在惩治汉奸时，一向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也就是说，国民政府在刺杀汉奸时，绝不连带除杀汉奸的家人。正因如此，很多投靠汪伪政府、汪伪 76 号的大汉奸，并不担心自己的家人会遭到军统局的绑架或者刺杀。然而银行血案激怒了戴笠，想到那些手无寸铁、无辜受害的银行员工，戴笠决定抓捕周佛海的家人，让这些丧失人性、疯狂杀人的汉奸投鼠忌器，从此不敢再大开杀戒。

老奸巨猾的戴笠，派出军统特工，将周佛海的老母亲从湖南接到了贵州，还将周佛海的岳父也接到了贵州，戴笠请周家的这两个亲家，一同在军统“做客”。戴笠并没有虐待这两位老人，这两位老人，每天都能吃好住好，还有佣人随时侍奉在身边，可以说，戴笠这样对待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也算仁至义尽。

当然，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也不会天真地认为，戴笠将自己不远千里接来，为了给他们养老，周佛海在外的所作所为，他们多少也知道一点，为了表示自己的立场，他们也向戴笠要了笔和纸，当着戴笠的面，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信，信的大致意思为：不必做孝子，但要做忠臣。

戴笠将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接到贵州，其做法和汪伪 76 号劫持人质的做法相仿，当然，他也没有隐瞒周佛海，他就是要用这两位老人，要挟周佛海。

退一万步，就算周佛海不要自己的亲娘，他的妻子杨淑慧也不会不要自己的老父！如果周佛海不顾妻子的意愿，依旧一意孤行，那么他们夫妻感情必定会破裂。戴笠相信，周佛海的妻子如果和周佛海闹腾起来，周佛海肯定就没有心思关注军统局的行动了。

后来，戴笠派人将周佛海的母亲和岳父的亲笔信送到了周佛海的手里，周佛海和妻子杨淑慧看完信后，犹如斗败的公鸡，再也精神不起来了。杨淑慧看得出来，这封信的笔迹就是自己父亲的笔迹，周佛海也看得出来，这封信中说话的口吻，完全是自己母亲的口吻。两人只得感叹当下的戴笠，也算不择手段，竟然捅了他们的软肋，这下，周佛海再想针对国民政府采取任何行动，都会投鼠忌器，不敢再贸然行动了。

后来，周佛海给戴笠回了封信，表示自己今后会借机为军统提供便利，请求戴笠善待自己的母亲和岳父。

后来，周佛海的确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而戴笠在汪伪政府和汪伪 76 号内，也就有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大“鼯鼠”。有了这样一个王牌间谍，戴笠再也不愁了，他开始策划，如何运用这枚棋子，在军统局和汪伪 76 号的暗战中取得胜利。

日本政府和军统局的伪钞之战

在军统和汪伪 76 号以中储券为导火索，展开银行血战的同时，军统局酝酿了一场没有枪支弹药、没有流血伤亡的争斗。

这场争斗和日本政府发行的中储券有关，是一场关于纸币的争斗。

在日本政府发行中储券的初期，日本政府的造假手段十分粗糙，他们收集了一些已经废弃的中国纸币和外国纸币，随后经过简单加工，便企图继续使用，结果这样很容易就被百姓认出。后来，日本政府将这种纸币发给在中国战场作战的日本军人，要求这些军人使用这些纸币，利用武力胁迫商人将商品卖给他们，这样，日本政府就能不花一分钱，用这样的假币换到自己所需要的物资。日本政府这种做法和明抢差不多，不过是用中储券做遮羞布，遮掩自己的强盗行为而已。

日本政府利用废弃纸币掠夺中国物资的拙劣伎俩，随着战局的深

入，再难满足日本政府对物资的需求，然而，为了避免激起民愤，也为了避免在占领区引起中国百姓的公愤，日本政府没有丢掉自己的“遮羞布”，他们又出新招，开始伪造中国法币，并在国民政府的统治区内大量抛售这些假币，妄图利用假币疯狂敛取物资，破坏国民政府统治区的经济稳定，让国民政府未战先败，失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

1940年2月，日本政府伪造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钱币券总额高达500万元。1940年9月，日本政府伪造中国银行10元钱币券总额500万元，百元钱币券总额500万元，并伪造法币总额达3500万元。

日本政府将这些伪钞散发到了中国的土地上，全部兑换成了他们所需的物资，大量假币涌入中国市场，导致国民政府的金融体系几近崩溃。

国民政府自然不能对日本政府这种卑劣的做法坐视不理，戴笠第一个沉不住气，他向蒋介石毛遂自荐，要求蒋介石下令军统局，由他戴笠亲自出马，迅速遏制日军伪造假钞的势头。蒋介石见戴笠自动请缨，心中大喜，询问戴笠是否已有对策。戴笠的回答让蒋介石颇感兴奋，戴笠打算“以牙还牙”，既然日本政府用假钞换取国民政府的物资，那么戴笠就效仿日本政府的做法，也制造“假币”，套取日军所占领的沦陷区内的物资，以此来破坏沦陷区正常的金融秩序。

蒋介石虽然觉得戴笠的计划有趣而新颖，但他唯恐此举会加深国内的金融困境，于是蒋介石致电宋子文、贝祖贻等人，征询意见。没想到，大家均认为戴笠的计划可行，但需要英美方面的技术支持，才能制造出完美的“假币”。于是，蒋介石和英美两国大使取得了联系，在得到他们对戴笠的这一计划的认可后，求得了他们的技术支持。此后，蒋介石才放心地吩咐戴笠，放手去做。

戴笠虽然想到了对付日本政府的伪钞的方法，但具体如何实施，他还没有完全计划好，不过虽然整体计划还没有完全计划好，但第一步要做什么，戴笠还是很清楚的。戴笠首先吩咐军统局的特工，搜集了所有在中国境内作战的日本军队的军用钱币和日本政府发行的中储券的样本，然后把这些样本寄给了身在美国的宋子文。

宋子文与美国罗斯福总统会见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国民政府与

日本政府展开的伪币之战，并提出了国民政府的伪币计划。罗斯福认可国民政府的伪币计划，并请人带宋子文参观了美国一家专门印刷钞票的工厂。

随后，宋子文将戴笠寄来的钱币样本和中储券的样本送到了美国那家专门印刷钞票的印刷厂，请他们分析这些钞票是否可以仿制。印刷厂老板接到罗斯福总统的指示，协助中国国民政府印制钞票，因此对此事不敢有丝毫的怠慢，工厂在仔细鉴定了这些钞票样本后，认定可以仿制。

宋子文在美国紧张忙碌地印刷伪钞时，戴笠也没闲着，他绞尽脑汁策划运用这些伪钞的方法，如何才能让这些伪钞的价值最大化。经过深思熟虑，戴笠最终确定了五种方案：

① 在日军占领区的周边地区设立商号，将这些伪造的钞票换给商人，把商人兑换的法币收回，并要求商人们在进入日军占领的沦陷区后，用伪造的钞票购买物资，用这种方法回收法币和物资。

② 军统虽然是情报机构，却也有不少的游击队，这些游击队都深入敌腹，让游击队携带伪造的钞票，在沦陷区换取国民政府和军统局所需的物资。

③ 用军统局在汪伪政府和汪伪 76 号内安插的“鼯鼠”，发放伪钞，并用伪造的钞票在沦陷区内购买物资、换购法币。

④ 要求尚在沦陷区的军统成员，在沦陷区内开设商号，大量抛出伪造钱币，收取法币，并用伪造的中储券换取物资。

⑤ 遣军统成员，伪装成商贩，携带伪造钱币进入沦陷区，购买物品或到钱庄兑换法币。

戴笠制订好这五种方案后，于 1943 年 3 月，开始从重庆的中国银行，提取 46 包远渡重洋而来的伪造钱币，投入使用。

货币之战？货币之乱？

话说伪造的钱币远渡重洋到达重庆后，蒋介石便下令，将它们全部存放到中国银行，派人看守，严禁任何人未经他的同意，擅自使用这批伪造钞票。为了便于称呼，蒋介石将这批伪造钞票称为“特券”，

因为这些伪造钞票既不是国民政府使用的法币，也不是日本人制造的伪钞票中储券，而是伪造伪钞票的“伪钞”，所以，蒋介石给了它这样一个专属名称。

自第一批特券被运到重庆后，陆陆续续又有数千万的特券从美国运到了重庆。

蒋介石和戴笠经过研究，决定将这几千万的特券，全部投放到这场货币之战中，以破坏日伪货币的价值，并从沦陷区大量购买物品。同时，还用这些特券，来收买汪伪政府和汪伪 76 号的伪军。同时，戴笠还打算用这些特券收买伪军对付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协助沦陷区的军统局游击队发展。

由于这些特券的发行和使用纯属机密，蒋介石一再强调，行动时一定要保证“绝对统一，不能泄露半点机密”。为了确保特券能顺利进入沦陷区，发挥作用，蒋介石要求戴笠亲自负责此事，绝不能有半点疏漏。

在发放这些特券之前，戴笠琢磨了很久，他意识到，一旦特券开始使用，美国的供给特券的速度肯定不足以应对国内对特券的使用速度，如果不另想办法，必定会出现特券使用的空白期。为了避免特券使用的空白期出现，戴笠向蒋介石申请，同时在国内印刷特券，在蒋介石批准后，戴笠派人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家专门负责伪造日本钞票的印刷厂，昼夜不息地印刷特券，从而彻底解决了特券的供应问题。

戴笠发放特券，以河南洛阳为特券的中转站。戴笠将重庆的特券运送到洛阳，然后由军统局统计调查室主任张严佛亲自接收，然后张严佛再按照蒋介石和戴笠的命令，向全国各地运送特券。

戴笠之所以选择洛阳，就是因为张严佛在洛阳。张严佛在国民政府中的资历，比戴笠还要老。张严佛在军统中的地位，仅次于戴笠和毛人凤，是戴笠最信任的人之一。张严佛办事谨慎小心，从来没出过纰漏，将特券交给这样一个人，戴笠十分放心。

张严佛按照计划，将一批又一批的特券发放到沦陷区，只是他没想到，发行第一批特券时，特券的真伪，就被汪伪政府和汪伪 76 号辨别了出来。

特券流入沦陷区后，因为其使用者在购物、兑换时，使用的特券数量巨大，从而引起了汪伪政府的注意。汪伪 76 号的特务从商家那里搜集了一些“中储券”，经过对比，发现这些“中储券”的编码，和日本政府发行的中储券编码不一样。也就是说，这些中储券不是日本政府印刷的。而且这些特殊编码的中储券，无论是纸张质量还是印刷的精美程度，都超过了日本政府印刷的中储券。与这些中储券相比，日本政府印刷的中储券，更像仿造的。汪伪 76 号将这些纸张精良、印刷精美的中储券拿到中央储备银行去做鉴定，很快，鉴定结果就出来了，这不是日本政府印刷的钞票，那么，如果不是日本政府印刷的，这些中储券，又是谁印刷的呢？经过多方侦察，汪伪 76 号的特工认定，这批中储券是国民政府制造的伪钞。

李士群迅速将这个信息上报汪精卫，这个消息让汪精卫以及汪伪政府的众多汉奸都感觉有些错愕，他们没想到国民政府会使用这样的手段来对付中储券的发行。

为了避免沦陷区经济混乱，汪伪政府下令沦陷区的各个银行、商号，严防伪造中储券的流入，并将特券与中储券的不同之处刊登在报纸上。

以下为汪伪政府刊登在报纸上的，伪券（伪券即特券）与中储券的六点不同之处：

- ① 伪券正面的国父头像，右颊线条比中储券要简单、粗糙；
- ② 中储券钱币上的红绿色条纹是有规律地分布的，其位置和方向一致，伪券则是胡乱分布的；
- ③ 伪券大小要稍小于中储券，伪券中的图片也比中储券中的图片稍小；
- ④ 伪券上的总裁印鉴和副总裁印鉴相对中储券，显得模糊不清；
- ⑤ 伪券上的树木图像印刷比较模糊；
- ⑥ 伪券最大的特点，就是字头是 D/C、D/B、B/G、D/A、V/D、K/E、T/P、D/N、B/T 开头。

然而仅仅是口头上劝告百姓不使用、不收售伪钞，力度还是不够的，为了进一步控制特券在沦陷区的发行，汪伪政府按照自己一贯的血腥做法，制定了一份《战时伪造法币治罪暂行条例》，条例里明确规定：凡是制造特券者，被抓捕后一律处以无期徒刑或死刑；凡是帮助国民政府收集、运送、交易特券者，处以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凡是为国民政府提供特券交易场所、制造场所者，处以三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于人数众多的普通群众，伪政府还试图用蝇头小利将他们收买，规定检举使用特券者奖励 3 万元，抓获贩卖特券者奖励 5 万元，如果举报特券制造工厂，政府则奖励 10 万元以上的奖金。

汪伪政府威逼利诱双管并下的做法，让特券在沦陷区的流通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不过特券的发行量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其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

据统计，当时，在华中、华南、华北沦陷区，每 1 000 元中储券中就有 1 元特券，而截至 1945 年抗战结束，戴笠依然没有停止向沦陷区输送特券，在这几年里，国民政府投入沦陷区的特券总金额超过亿元。

特券的发行，给日本军队和伪政府带来了诸多的麻烦，由于国民政府使用特券大肆抢购沦陷区的黄金、药品、布匹、米粮等生活物资，加剧了沦陷区通货膨胀的速度，导致日军占领区的金融市场混乱不堪。

戴笠还动用了军统局隐藏在汪伪政府和汪伪 76 号内的“鼯鼠”，在汪伪政府内使用特券兑换物资，这一行为让日本政府对汪伪政府和汪伪 76 号产生了怀疑，从而使得这三方的合作不再亲密无间，日伪内部一片混乱。

发行特券这件事，在当时属于绝密事件，没有太多的文字记载，笔者只能从一些历史档案和参与者的口述实录中找到一些资料，所以了解的并不够全面，直至今日，国民政府发行特券的详情，依然有许多尘封的秘密尚未被揭开。

第六章 暗战中功绩卓著的美女特务们

古往今来，战争中经常出现的最出彩的战局，就是美人计，在军统局大力打击汪伪 76 号的同时，中统局也使出了绝妙的美人计，刺杀汪伪 76 号的大当家——丁默邨。而在这场中统、军统和汪伪 76 号的暗战中，有不少女将都功绩卓著，比如中统局的郑如萍，再比如军统局的姜毅英等人。

第一节 中统特务郑如萍色诱丁默邨

在军统局针对日伪政府、汪伪 76 号发行中储券，展开货币之战的同时，中统局积极展开了针对汪伪 76 号的暗战。中统局主任徐恩曾认为，擒贼先擒王，与其出动大批的特工暗杀汪伪 76 号中的小角色，不如直接击杀汉奸头子，一旦除杀了大汉奸，那些小汉奸也就群龙无首了，到那时，要想一网打尽汪伪汉奸，就易如反掌了。

中统特务郑如萍

中统局盯上的第一个大汉奸，就是汪伪 76 号的当家人丁默邨。

当时，国民政府里的许多官员都知道，丁默邨爱好美色，因此，中统投其所好，安排了一名年轻貌美的中统女特务接近丁默邨，欲利用美人计，除杀丁默邨。

这个年轻貌美的女特务，名叫郑如萍，她正是电影《色戒》中王

佳芝的原型，自然，易先生的原型就是丁默邨。当然，电影《色戒》里的王佳芝，并没有郑如萍那么坚定、果敢，电影《色戒》里的易先生，也比丁默邨帅气、儒雅得多。

郑如萍出生于1918年，父亲郑钺是一位意志坚定的老革命家，早年曾留学日本，并参加同盟会。回国后，郑钺为了报效祖国，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做了一名检察官。郑如萍的母亲是名日本女子，名为木村花子。花子的家族是日本非常著名的武士家族之一，就连日本天皇看到木村家的人，都要礼敬三分。木村一家都是亲中派，他们看不惯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但是在当时，木村家不能也不敢明目张胆地帮助中国对抗日本，毕竟日本是他们的祖国。木村花子嫁给郑钺后，追随丈夫来到中国，支持丈夫报效祖国，也教育女儿郑如萍热爱祖国。

郑如萍受父母影响，非常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痛恨日本侵略者蚕食祖国的领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立志要为解放中国而奋斗。

郑如萍长得非常漂亮，面容姣好，曾有人这样形容郑如萍：她的鹅蛋脸颇具中国特色，一头疏松的秀发，弯弯的柳叶眉，熠熠生辉的大眼睛，鼻翼高耸，迷人的酒窝，诱人的樱唇，见到她的人，总会忍不住想要多看上她几眼，一饱眼福。

这样一个容貌出色、家境优渥的女子，身上自然有一种天生的傲气，郑如萍清纯、骄傲，还有年轻女子应有的活力和激情。这些特质，让郑如萍在年仅19岁那年，就登上了中国销量最广、影响力最大的《良友》杂志，成为封面女郎。

当然，郑如萍能够登上《良友》杂志，除了与她自身条件有关外，还和她的家庭环境有关。郑如萍的父亲郑钺身居要职，时任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并兼任复旦大学教授，还是同盟会的一员。而郑如萍家住法租界吕班路万宜坊八十八号，万宜坊相当于今天的高档别墅区，在那里居住的人，无一不是上海滩上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可以说，那里是上海滩的精英们居住的地方。因此，郑如萍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媒体的宠儿。

郑钺一直希望自己的女儿郑如萍能成为一名巾帼英雄，而不是一个死读书、读死书的呆板女生。在父亲的教导下，郑如萍逐渐成长为

一名爱国爱家、民族至上的热血青年。

上海沦陷后，郑如萍的父亲介绍女儿郑如萍加入了国民党。由于郑如萍工作能力突出，为人爽朗大方，参加工作不久，就被中统局选中，进入了中统局，并且被中统局主任徐恩曾重用。

当时，中统局正在策划刺杀丁默邨一事，在他们的策划中，最重要的计划就是色诱丁默邨。要想色诱丁默邨，就一定要选择一名有足够分量，有胆有识的美女。一般女子，丁默邨这个色中恶鬼必定看不上眼；可是仅仅是漂亮，却没有几分巾帼英雄的豪气，恐怕也难以胜任这个任务。那么，既要漂亮，又要英勇，还要不会引起丁默邨的怀疑，谁才是最合适的人选呢？徐恩曾想到了郑如萍。

徐恩曾首先派中统局的心腹特务和郑如萍作了沟通，在了解了郑如萍对当前抗日时局的看法后，徐恩曾派去的心腹，竟然向徐恩曾汇报了这样一件事，这件事，令徐恩曾对郑如萍刮目相看。

郑如萍自上海法政学院夜校毕业后，曾经天真地策划过一起绑架案。

当时，战火连天，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嚣张无比。郑如萍痛恨日本侵略者，便生出了将日本赶出中国的想法。郑如萍苦思冥想后，想出一个自认为完美无缺的计划，这个计划就是：绑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的公子近卫文隆，用他来要挟近卫文麿，迫使日本军队撤出中国。正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个富有爱国之心，又充满激情和干劲的女孩郑如萍，真的就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了。

为了接近近卫文隆，并且不被怀疑，郑如萍没有直接与近卫文隆接触，而是凭借自己流利的日语和娴熟的交际手段，先结交了一大批日本军政要员，随后，通过他们，认识了近卫文隆。近卫文隆常常听身边的日本军政要员夸奖郑如萍，而在几次“偶遇”郑如萍后，又的确被这个年轻漂亮的女子所打动，因此，逐渐开始喜欢风情万种的郑如萍。

郑如萍在吸引了近卫文隆后，开始实施自己的计划。郑如萍虽然没有经历过太多的情爱之事，但也知道欲擒故纵是引起男人的最好方法，因此，她一边表现出自己对近卫文隆的好感，一边又刻意与近卫

文隆保持距离。近卫文隆果然上钩，被郑如萍迷得神魂颠倒，恨不得时时刻刻都在她身边。

当郑如萍认为时机成熟后，便以参加私人宴会为由，邀请近卫文隆做自己的男伴。近卫文隆自然欣然应允。结果，近卫文隆因此被“软禁”在一位国民党官员家长达48小时，让人惊奇的是，近卫文隆竟然不知道这是软禁，反而以为这是郑如萍的美意，意在和自己厮守在一起。而在这48小时里，郑如萍一直在思考，该怎样告知日本政府，自己绑架了近卫文隆，要求日本政府从中国的土地上撤军，然而，还没等郑如萍想好下一步该如何行动，“软禁”近卫文隆的国民党官员就命令郑如萍将近卫文隆送回了日本领事馆。

郑如萍虽然心有不甘，不愿意到嘴的鸭子就这么飞了，但却不得不将近卫文隆送回日本领事馆。

为什么“软禁”近卫文隆的国民党官员会要求郑如萍将近卫文隆送回日本领事馆？原来，郑如萍“绑架”近卫文隆后，日本同文书院很快就发现近卫文隆不见了，书院院长吓坏了，因为近卫文隆是在来同文书院的路上失踪的，于是，院长立刻将此事上报日本领事馆和日本特务机关。日本特务机关迅速派出日本宪兵队，四处寻找近卫文隆。

因此，“软禁”近卫文隆的国民党官员，综合考虑，为了避免酿成大祸，要求郑如萍将近卫文隆送回了日本领事馆。

虽然郑如萍的这次“绑架”因为考虑不周，行动不利，最终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经此一事，郑如萍增长了经验，而中统局也从此事，发现了她是个“可堪大用”的特工人才。

“色戒”——生死一线

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看上了郑如萍的美貌和勇气，便派心腹特工和她联络，询问她是否愿意接受一个严峻的任务，一个有利于百姓，有利于党国，有利于中国解放的任务。受家庭熏陶，郑如萍最大的愿望就是祖国早日解放、百姓免于战乱，如今能有一个报效祖国的好机会，郑如萍自然甘愿献身。在得到郑如萍的答复后，徐恩曾的心腹特工才将这个艰巨的任务告知郑如萍：“色诱”汪伪76号一把手丁默邨。

郑如萍听后，没有丝毫的犹豫，欣然接受。后来，郑如萍的父亲也知道了此事，不但没有阻止郑如萍色诱丁默邨，反而鼓励郑如萍，祝女儿郑如萍马到成功。

于是，郑如萍开始了色诱丁默邨的行动。

要想“色诱”丁默邨，首先就要寻找机会接触丁默邨，恰好郑如萍在民光中学读书时，丁默邨是该校校长，可以说，郑如萍和丁默邨有“师生之谊”。民国时期，民间普遍看重师生情谊，在政府部门中，大多高官要员的下属官员都是自己曾经的“学生”。如果不是过于注重师生情谊，身为军统“家长”的戴笠，在对待王天木和赵理君一事上，也不会有失偏颇，最终导致王天木出走了。所以，郑如萍打算以“师生之谊”为由，开始接触丁默邨。

为了与丁默邨“巧遇”，郑如萍开始频繁出入各种宴会、舞会，寻找机会与丁默邨接触。

一天晚上，郑如萍终于与自己的目标“巧遇”，舞会开始后，郑如萍来到了丁默邨面前，甜甜地一笑，对着丁默邨俏生生地叫了声“丁校长”。看到美丽的郑如萍，丁默邨这个色鬼眼前一亮，更让他欣喜的是，面前这位面色姣好、风姿婀娜、衣着时髦的年轻女孩居然是自己的学生，所以接下来的时间里，丁默邨忘记了自己此行的目的，而把整个心思都放在了在这个貌似涉世不深的小姑娘身上。

丁默邨频频邀请郑如萍跳舞，一曲又一曲之后，他还不肯放开郑如萍的手。郑如萍心里对丁默邨这个大汉奸唾弃不已，但脸上始终保持着微笑，为了让这条大鱼上钩，郑如萍不得不强压心头的厌恶和怒火。

丁默邨虽然也是特务出身，但面对这样一个对他有着致命诱惑的美少女，平时所有的警觉，都被他抛在了脑后，况且，丁默邨并不认为，自己会栽在如此年轻的女孩手里。

那次舞会之后，丁默邨便开始频频寻找机会接近郑如萍，郑如萍借机表示了自己对丁默邨的好感，二人的关系就这样渐入佳境。

丁默邨和郑如萍交往期间，李士群曾多次提醒丁默邨，要小心提防郑如萍。李士群已经查明，郑如萍的父亲是同盟会会员，又与国民

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身为郑钺的女儿，郑如萍很可能已经加入国民政府，所以李士群警告丁默邨，也许，郑如萍就是国民党安排在丁默邨身边的棋子。

丁默邨早已被郑如萍迷得神魂颠倒，根本就听不进李士群的话，反而认为李士群是在嫉妒自己拥有这样一位美丽动人、活力四射的情人，李士群劝自己提防郑如萍，无非是想让自己放弃这样一位十全十美的情人。于是丁默邨对于李士群的所有劝诫，只是敷衍地回答：“行了，我知道了，我会万事小心的，你放心吧。”

李士群见劝说无果，只能无奈地叹息，为防止发生意外，他派出汪伪 76 号的特务暗中保护丁默邨。

汪伪 76 号的特工在暗中保护丁默邨的过程中，一致认为，郑如萍对丁默邨并没有恶意，每次和丁默邨见面，郑如萍都像个女生一样一脸幸福地依偎在丁默邨身旁。并且，郑如萍也从没有向丁默邨打听过汪伪 76 号的事情，更没有劝说丁默邨“弃暗投明”。于是，汪伪 76 号的特工将调查结果报告给了李士群，李士群这才放心来，放松了警惕，不再派特务暗中保护丁默邨。

其实，郑如萍早就发现了暗中保护丁默邨的汪伪 76 号的特务，而在特务们不再暗中保护丁默邨后，郑如萍便将丁默邨的情况报告给了中统局，询问下一步该如何行动，中统局要求郑如萍继续和丁默邨交往，进一步消除丁默邨的防范之心，然后寻找时机刺杀丁默邨。

1939 年 12 月 21 日，丁默邨与朋友聚餐完毕后，突然十分想念郑如萍，便打电话约郑如萍见面，尽管他们分开还不足三天，但他却觉得他们就像分开了三年一样。郑如萍接到丁默邨的电话时，敏锐地察觉到，这将是一个刺杀丁默邨的好机会，于是她对丁默邨说，她要去西伯利亚皮货店买一件皮大衣，问丁默邨是否可以陪自己一起去。面对小情人的邀请，丁默邨想也没想就一口答应了下来。丁默邨以为，这正是个讨好小情人的好机会。

郑如萍挂断丁默邨的电话后，立刻和中统局取得了联系，中统局在得到郑如萍将带丁默邨到西伯利亚皮货店选购皮衣的消息后，迅速安排中统局特工埋伏在西伯利亚皮货店周围，打算在西伯利亚皮货店

刺杀丁默邨。

郑如萍和丁默邨在傍晚十分，来到了西伯利亚皮货店。走进皮货店后，郑如萍心不在焉地翻看着店里的皮货，而丁默邨则坐在店里的椅子上，百无聊赖地打量门外过往的行人。这一打量不要紧，还真让丁默邨发现了蛛丝马迹，在西伯利亚皮货店门口，有两个年轻男子，时不时地朝他这里张望。作为汪伪 76 号的一把手，丁默邨也算是一名老特务了，他迅速意识到门口的这两个人有问题，敏锐的直觉告诉他，这两人是冲自己来的。于是丁默邨立刻对郑如萍说：“你选吧，我先走了。”说完，丁默邨从怀中掏出一把钞票向上一扔，撒得满地都是，引得店里的客人们一阵骚乱，纷纷低头捡钱，而丁默邨本人，则趁着混乱迅速往店外跑去，门口的两名年轻男子还没有反应过来，丁默邨就已经跑出了西伯利亚皮货店，钻进了自己的汽车，疾驰而去。

郑如萍毕竟年轻，而且没有经过系统的特工培训，在这个关键时刻，郑如萍的应变能力还是欠缺，在丁默邨急急忙忙跑出去后，郑如萍愣了一下，跟着丁默邨往外跑，可跑了两步就停下来了，她以为门外的中统特工会朝丁默邨开枪射击。然而门外的两名中统特工居然半天都没有反应过来，等他们回过神来，发现丁默邨已经跑出了西伯利亚皮货店的大门，便慌了神，竟然快步去追丁默邨的汽车，但是他们刚追了几步，回头看到郑如萍停了下来，这两名中统特工竟然也停了下来。于是，丁默邨乘车绝尘而去。这两名特工见车开走了，才想起掏出手枪，对着丁默邨的防弹汽车连开了二十多枪，却没有一枪能伤到丁默邨分毫。

郑如萍被捕，命丧汪伪 76 号

那天，丁默邨狼狈不堪地回到了汪伪 76 号，惊魂未定的他，不敢将自己遇刺的事情大肆声张，唯恐此事被李士群当作排挤自己的把柄。

丁默邨将遭遇暗杀的经过仔细回想一遍，才逐渐意识到，自己身边有内鬼，而这个内鬼，十之八九就是自己视若珍宝的小情人郑如萍。显然，西伯利亚皮货店外面的那两名特工，是有备而来的，而知道自

己和郑如萍要去皮货店的人，除了天和地，就只有自己和郑如萍两人了。丁默邨又想起自己在跑向汽车时，恍惚间瞅见郑如萍冲店外的那两名男子招手，由此可见，郑如萍一定参与了此次刺杀事件。

丁默邨认定郑如萍参与了对自己的刺杀行动后，内心郁闷不已，然而，他对郑如萍还是心存幻想，认为郑如萍不过是被人利用而已，只要郑如萍心甘情愿地跟着自己，不再有别的心思，他还是能够对这件事情既往不咎的。不得不说，丁默邨也算是个情种，竟然为了美人，将自己被刺杀一事不动声色地压了下来，没有派出汪伪 76 号的特工抓捕郑如萍。

暗杀丁默邨失败后，郑如萍惴惴不安，她向中统局求救，希望能够通过中统局的帮助，迅速逃离上海。然而中统局却以为郑如萍可能还没有暴露，指示她继续潜伏在丁默邨身边，再次寻找机会暗杀丁默邨。正是中统局的这个继续潜伏的命令，断送了郑如萍的性命！

郑如萍收到中统局继续潜伏的命令后，虽然心里忐忑不安，却也觉得，丁默邨不一定会怀疑到自己头上。因此，郑如萍在暗杀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打电话给丁默邨，装作毫不知情地询问丁默邨有没有受伤。

老奸巨猾的丁默邨听到郑如萍故作关心的话语后，并没有暴露自己的心思，而是深情款款地对郑如萍说：“我没有受伤，你怎么样，是不是吓坏了？”

郑如萍听到丁默邨依旧如此关心自己，便认定丁默邨没有怀疑到自己的头上，便像往常一样开始向丁默邨撒娇，并与丁默邨约定了当晚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丁默邨刚挂上电话，李士群就走进了丁默邨的办公室，劝丁默邨不要去赴约，并且苦口婆心地说：“郑如萍已经暗杀了你一次，你这次再去赴约，恐怕还会陷入险地。”

丁默邨怎么也没有想到，李士群不仅知道了自己被暗杀一事，还监听了自己的电话，丁默邨心中虽有不满，却无力反驳，只好对李士群无奈地摇摇头，又点点头，最后叹了口气说：“我会小心的。”

李士群见丁默邨不理睬自己的劝诫，便叫来两名特务，让他们守

在丁默邨的门前，叮嘱他们，在自己没有回来之前，看好丁默邨，不许他离开房间半步。随后，李士群亲自带着一队特工，埋伏在丁默邨和郑如萍约好的见面地点。当晚，李士群逮捕了如期赴约的郑如萍，将其带进了汪伪 76 号。

当晚，丁默邨得知郑如萍被捕，本想和李士群商量，请李士群饶了郑如萍，让郑如萍继续做自己的小情人。可丁默邨万万没有想到，还没等自己开口，李士群就派汪伪 76 号的特工，将丁默邨和郑如萍交好一事告知了丁默邨的妻子，并说丁默邨的小情人已经被汪伪 76 号抓捕。

这下可热闹了，丁默邨和郑如萍的事情，迅速传遍了汪伪政府和汪伪 76 号，丁默邨的妻子、周佛海的妻子、李士群的妻子和吴世宝妻子都来了，她们都想见见这个魅惑男人的狐媚女人郑如萍。

这下乱套了，丁默邨再也无法开口替郑如萍求情，而这几位太太在见到郑如萍后，一起来到李士群和丁默邨面前，严厉声讨丁默邨后，坚决要求处死郑如萍。

汉奸太太们的要求，正中李士群的下怀，他装作无奈，向丁默邨表示，自己只能处死郑如萍。而丁默邨也无能为力，事已至此，再想留住郑如萍的性命也是不可能的了，否则，这些太太们就能把汪伪 76 号闹个天翻地覆，他丁默邨，也就只能任由一代美女香消玉殒了。

郑如萍在审讯中，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中统局的特工，她想出了另一套说辞，她承认在西伯利亚皮货店门口的两个人是自己请来教训丁默邨的，原因是她在和丁默邨交往期间，发现丁默邨还有其他情人，丁默邨对爱情的不忠让她十分气愤，所以她才请了两个人来教训丁默邨。然而事到临头，郑如萍想到丁默邨对自己的好，又有些不忍，所以，在紧要关头，她并没有跟随丁默邨一起跑出西伯利亚皮货店，而是试图制止那两名打手，但是制止无效，但正是由于郑如萍没有尾随丁默邨跑出皮货店，才让那两名打手一时间不清楚到底哪个是丁默邨，丁默邨才得以安全离开。

郑如萍的这番话自然无法取信李士群，李士群见郑如萍竟然如此冥顽不灵，便让吴世宝给郑如萍上了大刑。被鞭挞之后，郑如萍实在

难以承受，迷迷糊糊地承认自己是国民党中统局特工。李士群在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后，便将郑如萍交给特务林之江处置。

郑如萍逃出了大魔头吴世宝的手心，心里稍微松了一口气。为了保住性命，郑如萍对林之江极尽妩媚温存，林之江也一度为之意动，差点就带着郑如萍私奔。最终，林之江在三思后，理智地悬崖勒马，没有答应郑如萍相携私奔的请求。

几天后，李士群下令枪决郑如萍。林之江恋恋不舍地将郑如萍押送到中山路的小树林，准备执行枪决。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郑如萍轻叹一声，转过身，面带微笑，对林之江说：“之江，看在这段时间我们相处融洽的分上，恳求你一件事，不要毁掉我的脸，好吧？”

林之江面对这名从容、漂亮的女孩，颇有些不忍下手，他背过身，挥挥手，示意身旁其他的特务开枪射击，几声枪响过后，郑如萍香消玉殒。

郑如萍牺牲的时候还不到 23 岁，这个美丽的女孩，死于中统局错误的上层决策。如果徐恩曾不派没有受过专业特务训练的郑如萍去执行如此危险的刺杀任务，郑如萍就不会牺牲；如果在第一次暗杀丁默邨失败后，中统局就协助郑如萍撤离上海，郑如萍也不会牺牲。然而，历史不会重演，人生没有如果，郑如萍虽然勇敢，虽然美丽，虽然机智，最终还是死在了汪伪 76 号的枪口下。

第二节 情报战中的美女将军

抗日战场上，不仅有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男子汉，还有许多巾帼不让须眉的美女将军。当然，当时女性参战的人数较少，并且大多数女性都被安排在后方，负责后勤、医护和情报工作。这些女性也为抗日战争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就拿军统局来说，军统局里，就有许多大名鼎鼎的女特工，比如刺杀大汉奸殷汝耕的女特工向影心、抗日明星徐来、胡宗南的妻子叶霞翟和军统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她们都是抗日战场上的巾帼英雄。

江山帮里的美女情报员

军统局的女特工数量并不少，然而大多数女特工的军衔都很低，但却有一名女将军，她就是姜毅英，女将军姜毅英是军统局里最出色的女特工。那么为何姜毅英能够脱颖而出，升至将军军衔呢？这还要从姜毅英的性格、出身和功绩说起。

姜毅英原名姜鹤根，出生于浙江衢州江山县，和军统局局长戴笠是同乡。戴笠喜欢用老乡，总觉得自己老家江山县的人相对更值得信任些，所以当时，军统局里最受戴笠器重的就是江山帮，而姜毅英就是江山帮中的一员。军统江山帮，当时被称为中华民国时期浙江“四绝”之一，由戴笠创建，深受戴笠重视。戴笠十分信任江山帮的军统特工，认为这些人对自己最忠心，并且永远不会背叛自己，戴笠还经常派江山帮的特工监视军统内部的其他特工，有时候，为了防止别人偷听谈话内容，在交谈时，戴笠都会用江山话和江山帮的特工交流。

军统局有许多江山人，他们大都是戴笠招进军统局的。自从戴笠成为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后，偏居于浙江一带的江山人，听闻自己的同乡里有这么显赫的人物，便纷纷从江山县走出来，前来投奔戴笠，以求一个好的前程。戴笠对自己的同乡向来来者不拒，不论这个人资质好坏，能力高低，戴笠都愿意尽其所能，给同乡安排个合适的职位。戴笠的这种做法，使得国民政府中的江山人越来越多。在国民政府中，获得中校以上军衔的江山籍官员多达 70 余人，获得少将以上军衔的江山籍官员多达 20 多人。

在军统内部，最受戴笠信任的江山籍军统特工共有 14 人，军统内部将这 14 人称为“江山子弟兵”，军统外部将这 14 人称为戴笠的“十四亲信”。而姜毅英，就是这“十四亲信”中的一员。

姜毅英自小就和其他女孩不同，她不喜欢和女生一起玩，就喜欢和男孩一起玩，她和男孩一起下河游泳、上树掏鸟蛋。姜毅英从小就十分好强，不管在哪项游戏中，输给了自己的小伙伴，她都会在暗地里苦下功夫练习，直到自己在游戏中，能够获得第一名为止。也正因

为如此，她渐渐成为了这些孩子中的“大姐大”。

姜毅英从杭州第一高中毕业后，没有按照父母的期望进入女子大学读书，而是考进了杭州警察学校。在学校里，姜毅英不服输的性格一次又一次显现出来。

众所周知，女孩子的体能、力量都不如男孩。所以，初入杭州警察学校时，姜毅英在体能训练中，即便咬紧牙关拼尽全力，也只能位居男生之后，而每天的训练结束后，她常常累得一动也不想动。然而，姜毅英不服输，她看到那些男生们在训练后，依旧生龙活虎地在操场锻炼，她忍不住从床上爬起来，拖着两条灌了铅一样沉重的腿，到操场上跑步。

就这样，一段时间后，姜毅英的体能有了极大的提升，她在训练中越来越轻松，训练成绩也越来越好，最后，竟然常常雄居警校前三名。这让警校的老师 and 学生们对她不得不刮目相看。

戴笠在视察杭州警察学校时，听下属报告，警察学校里有一位好强、倔强的江山女生，戴笠心生好奇，暗地里观察姜毅英，竟然发现，姜毅英不仅十分符合自己心中江山美女的形象，而且还有男孩般的豪气和勇敢，当然，也不乏女孩应有的细心和坚强，戴笠暗自思量，这样一个女孩，如果好好培养，一定能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因此，戴笠叮嘱警察学校的老师，一定要好好培养姜毅英，不能埋没了这样一个好苗子。姜毅英自己却不知道，自己还没从警察学校毕业，就已经被戴笠关注很久了。

姜毅英从杭州警察学校毕业后，立刻被戴笠招入了军统局。戴笠将姜毅英安排在十分重要的译电部门，这个部门里，几乎全是江山人，由此可知这个部门在军统局的重要地位。戴笠还十分关照姜毅英，经常嘱咐译电部门的老特工，一定要认真教好姜毅英，尽快将姜毅英培养成出色的军统特工。

戴笠如此关心姜毅英，姜毅英自然也没有让戴笠失望。

很快，姜毅英便成为译电部数一数二的破译能手。随后，戴笠将姜毅英调至厦门电台，担任主任报务员，专门负责监测敌军情报工作，破译密码。

在厦门电台做主任报务员时，姜毅英遇到了有“军统电讯第一人”之称的魏大铭，并拜其为师。俗话说，名师出高徒，再加上姜毅英十分好学，不久，姜毅英就在情报工作中立下了奇功。

破译珍珠港密电

破译敌方电报密码，是每个特工组织都十分重视的工作，而电报破译工作的重要性，在特工工作当中也堪称第一。李士群曾经这样说过，破译了对方的电台等同于将对方的行动全部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译电工作是一项十分机密、十分重要的工作。戴笠对译电工作也非常重视，他特意向蒋介石申请，成立了军事委员会特种技术研究室，专门负责破译汪伪政府、汪伪 76 号的电讯密码。

这个研究室由“军统电讯第一人”魏大铭担任技术研究室主任，下属成员全部由魏大铭亲自挑选。魏大铭挑选了 30 多名在情报破译工作上极有天分的军统特工，进入军事委员会特种技术研究室工作。作为魏大铭的得意门徒，姜毅英自然也在这 30 多人之中。就在这间研究室里，姜毅英破译出一封震惊中外的无线电电报。

1941 年 12 月初，姜毅英截获了一份日本军部发出的无线电报。这封电报的发报手法与军统局以往截获的日军电报都不一样，姜毅英敏感地意识到，这封电报一定记载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于是，姜毅英立刻投入到对这份电报的破译工作中，经过几天几夜的研究，姜毅英终于找到了这份电报的破译密码，破译后，她发现这份无线电报的内容居然是：1941 年 12 月 7 日，日本军队将偷袭驻扎在珍珠港的美国海军。

姜毅英片刻不敢耽搁，立刻将这份电报上交戴笠，戴笠看后，意识到这份电报非常重要，便迅速将电报转交给蒋介石，蒋介石收到电报后，当即命人将此事通知美国政府。

戴笠在将电报内容告知蒋介石的同时，也将电报内容告知了军统美国站站长肖勃，肖勃立刻将这份电报的内容转达给美国五角大楼海军司令部。

然而，蒋介石和戴笠却怎么也想不到，他们视为珍宝的这份译电，

在美国人眼里居然一文不值。骄傲的美国人认为，连他们的情报机构，都没能截获日本军方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以中国目前的情报系统，不可能截获并破译出这样一份电报，所以，这封密电，一定是立功心切的军统情报员杜撰出来的。

很快，美国人为他们的骄傲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海军和海军航空兵突袭珍珠港，毫无防范的美国海军节节败退，珍珠港很快被日本军队占领。

日本军队成功偷袭珍珠港后，姜毅英又陆续截获了以下两份情报：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成功后，日本军部将派遣谍报员吉川少尉前往珍珠港查看偷袭效果。吉川少尉将化装为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外交人员，在日本军方开设的春潮阁餐厅与潜伏在珍珠港的美军内部的情报内线见面。

吉川少尉查看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结果如下：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炸毁潜艇120艘、飞机188架，击毙美国海军3000余人，美国海军除3艘航空母舰因没有返航幸免于难外，其余力量均受到严重打击，日军偷袭珍珠港，大获全胜。

戴笠将姜毅英破译的情报，源源不断地告知肖勃，肖勃无一遗漏，将这些情报统统转交给美国五角大楼海军司令部。

军统情报的准确性，让美国五角大楼海军指挥部颜面无光，也让美国军方不得不对国民政府军统局的情报工作刮目相看。在美国军方看来，美国破解情报的技术在全世界都已名列前茅，现在，国民政府的军统局破译了他们都破译不了的密电，这说明军统的情报技术已经超越了美国军方。于是，美国军方派准将梅乐斯与戴笠一起创办“中美情报合作所”，共同研究情报破译工作。

中美情报合作所成立，姜毅英荣升少将

“中美情报合作所”于1943年4月创办，美国在中国创办“中美情报合作所”的目的，就是歼灭从海上来犯的日本军队。美国军方认为，中国是为美军提供东南太平洋气象和军事情报的最佳地点，而中国的情报力量也足以满足美国的情报需求。在这次合作中，中国提

供人员，美国为中国提供技术、设备和枪支弹药。

中美情报合作所的创办涉及两个国家，为了双方的利益，蒋介石和罗斯福于1943年4月15日在美国华盛顿签订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为：

一、为求在中国沿海、中国沦陷地区及其他日敌各占领区，打击共同的敌人，特在中国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其目的是以中国战区为根据地，用美国物资及技术，协同作战，应对远东各地之日本海军、日本商船、日本空军，并对日军占领地区内的矿产、工厂、仓库以及其他军事设备予以有效的打击。

二、为便于业务之进行，美国愿无偿供给一切物资。本所设有远程空中侦察队，配有飞行器材及研议、判读、照相之人员。此队之目的，乃在中国沦陷地区及远东各个占领地区内，摄制并判读各项敌人活动之照片，使本所对凡能见到敌人之各项活动，保持确切之认识，以便实施种种打击。除驾驶员外，其摄制之人员大部以华方人员任之。

三、本所设宣传组，对中国沦陷地区及其他日本占领区内之敌人与人民，从事心理战争。其全部需用之器材，由美方供给。本所奉准指定之发报台，定期与中国境外之美国海军无线电台通报。本所所有其他各电台，则限制仅用于本所之相关各业务。

四、本所于重庆、华盛顿两地派驻人员，办理中美两国情报互换事宜。本所各种训练人员，除由美方派遣技术训练负责人及各种技术训练之设计、指导人员外，其他教员及学员均由华方选派。训练课程及其进度由主任、副主任商定。受训人员结业后之派遣，经考试及实际测验合格后，由主任、副主任决定分发之。

.....

由于协定内容较多，本文只截取其中一小部分。但从这一小部分即可看出，美国对中国情报破译技术甚为信任。由于中美情报技术合作所的成立，国民党军统局的设备更加精良，破译起日本军方和汪伪 76 号的情报来也更加得心应手。日本军方和汪伪 76 号的情报屡屡被破译后，日方在情报战中逐渐处于劣势。可以说，中美情报技术合作所的建立，使得中国的抗日战争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中美情报技术合作所成立后，戴笠没有忘记功臣姜毅英，因此他向蒋介石申请，将姜毅英提升为少校，以表彰她在情报工作中的突出表现。后来，姜毅英升至少将，成为军统局唯一的一名女将军。

美女少将姜毅英在抗战结束后，跟随国民政府到了台湾。毛人凤死后，姜毅英脱离了情报部门，出任了台北国立雨声小学校长。姜毅英之所以担任台北国立雨声小学校长，是因为戴笠字雨农，雨声小学的名字中也有个“雨”字，姜毅英感念戴笠的知遇之恩，在这所学校任教，能让她缅怀她所敬重的“家长”戴笠。后来，姜毅英把自己的余生都奉献给了台北国立雨声小学。

姜毅英和许多抗日战争中的巾帼英雄，虽然没有在战场上厮杀，也没有和日本军人面对面地作战，但她们却用自己的智慧、耐心和坚强，为抗日战争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第七章 败绩初显，汪伪 76 号人心动荡

中美情报技术合作所成立后，美国加大了对国民政府的支持力度，为其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极大地增强了国民政府的作战力量。而此时，日本政府既要加大在中国战场的作战投入，又要兼顾美国战场，军事力量明显不足，逐渐显露出败绩。此时，面对局面的转变，汪伪 76 号那些紧抱日本军方大腿的汉奸们，就各自打起了算盘。

第一节 汪伪 76 号头号杀手吴世宝之死

汪伪 76 号“魔窟”之所以凶名远播，可以说汪伪 76 号头号杀手吴世宝功不可没。在汪伪 76 号成立初期，吴世宝烧杀抢掠，干了不少坏事，然而，谁也想不到，这位对汪伪政府和汪伪 76 号来说“功勋卓著”的大汉奸吴世宝，最终还是死在了日本人手里，这是意料之外的，却也在情理之中，一切，都是吴世宝咎由自取。

抢劫日军金砖，吴世宝惹祸上身

在加入汪伪 76 号之前，吴世宝本是上海青帮头目季云卿手下的司机兼保镖。吴世宝在青帮期间，制毒贩毒、赌博勒索，挣了不少昧心钱，因此，当时吴世宝虽然社会地位不高，但生活却十分奢华糜烂。吴世宝刚加入汪伪 76 号时，还不敢太过放肆，后来，吴世宝在汪伪

76号站稳了脚跟，就开始疯狂敛财，胡作非为了。

吴世宝加入汪伪76号后，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相对提高了很多，许多他以前需仰视才见的大人物，现在对他都客客气气，这让吴世宝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但过惯了奢侈生活的他，握着汪伪76号发给特工们的少得可怜的工资，还是心生不满，于是，他逐渐生出了一些罪恶的想法。

对于金钱，吴世宝一直坚信：只会花钱不会赚钱的是败家子，只会赚钱不会花钱的是呆子。于是身在汪伪76号的吴世宝，开始寻找发财之路。

吴世宝想赚钱，却不愿意踏踏实实地开工厂、开商店。吴世宝认为，开店耗费时间，还不一定能赚到钱，要赚就赚得轻松愉快，快捷开心。思来想去，吴世宝把目光放在了投机生意上。众所周知，投机生意来钱快，但风险大，可对于吴世宝来说，风险却全然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他坚信只要他去做，就一定会赚钱。

吴世宝有这么大把握，并不是无的放矢，他倚仗的就是他强大的“背景”。当时，吴世宝每天都会买很多债券，每天也都会将自己前一天买的债券卖出。如果债券涨价了，吴世宝就会吹嘘自己眼光独到。而如果债券降价了，债券交易所的经纪人就要倒霉了，吴世宝就会带上几个汪伪76号的特务去交易所，持枪逼迫经纪人，高价回购他所持债券，价钱到底多高，那就得看他吴世宝是否满意了。

吴世宝仗着汪伪76号的势力，几乎涉猎了所有赚钱多、赚钱快的所谓的“生意”。表面上看，吴世宝是在做生意，但明眼人都看得出，吴世宝根本就是在抢钱。在吴世宝做投机生意的那段时间，债券交易所被他搅成了一潭浑水，为了减少损失，经纪人们暗箱操作，哄抬债券的价格或者刻意压低债券的价格，以致投资者们怨声载道。

吴世宝的钱来得太快、太容易，因此他根本不珍惜。为了讨好上司、妻子和情人，吴世宝经常够买价值不菲的商品来送礼；为了拉拢自己的手下，吴世宝经常带着汪伪76号的特务们花天酒地。时间一长，吴世宝渐渐入不敷出，为了能维持自己奢华糜烂的生活，吴世宝迫切想要得到更多的金钱。

对金钱的渴望，让吴世宝失去了理智，他竟然把主意打到了日本银行的头上，这便为他招来了杀身之祸。

1942年年底，日本政府从中国江海县搜刮到大量金砖，并决定秘密地将这批金砖运往日本正金银行上海分行。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被吴世宝的徒弟张国震知道了。为了讨好吴世宝，张国震将这个�息告诉了吴世宝。听到这个消息，吴世宝异常兴奋，他立刻组织人马，准备劫持这批金砖。

为什么吴世宝敢劫持自己主子——日本政府的黄金呢？难道他想抢到这些黄金后，立刻离开上海，永远不再返回上海，踏入汪伪76号？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做汪伪76号的头号杀手，这种威风八面的感觉，他吴世宝还没有享受够呢，又怎么会舍得离开汪伪76号？

吴世宝之所以敢劫持日本政府的黄金，是因为他准备将劫持黄金一事，嫁祸给一直与汪伪76号为敌的军统局。

众所周知，军统局一直与日本军方为敌，除了刺杀汉奸和日本军官外，还炸毁日本炮舰、偷袭日本银行，所以，吴世宝认为，将抢劫黄金的脏水泼到军统局身上，日本政府肯定会相信。

江海县和上海距离并不远，由于这批黄金是日本军方从江海抢过来的，所以日本军队不敢光明正大地将这批金砖运送到日本正金银行。为了避人耳目，日本军方将这批金砖装进铁甲车，找了一条偏僻的小路，绕远送往正金银行，而这也正好给吴世宝留出了充分的准备时间和抢劫时机。

吴世宝派张国震等人埋伏在四川路、汉口路的拐角处，在装黄金的铁甲车经过时，吴世宝等人将预先准备好的汽车横挡在铁甲车的前面，迫使铁甲车停了下来，然后张国震等人马上包围了铁甲车，准备抢劫车内的黄金。

当时，铁甲车司机看到一辆车突然冲出来，挡在了自己的车前，就知道有人要抢金砖，他赶忙关了油门，拔掉车钥匙就跑，在张国震等人围上来前，司机就钻进人群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张国震经验不足，他认为司机逃跑，并无大碍，甚至还觉得这名司机还算识相，不用汪伪76号的特务们动手，就弃金而逃了，因此

也没有派人去追捕司机。但是，当张国震得意扬扬地爬上铁甲车，准备将这辆满载金砖的车开走时，才发现根本找不到车钥匙，而牢固的铁甲车，也根本就砸不开。而与此同时，街上传来了日本宪兵队警车的鸣笛声，无奈之下，张国震只能放弃即将到手的黄金，弃车而逃。

日本宪兵队来到现场后，迅速处理了相关事宜，便上报了日本军方。日本军方见自己管辖的上海租界内，居然有如此胆大妄为的小贼，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劫日本军队的铁甲车，不觉恼火至极，勒令日本宪兵队立刻侦破这起黄金抢劫案。在日本军方的巨大压力下，日本宪兵队迅速展开调查，经过多方探查，日本军方最终查到，抢劫铁甲车的，是汪伪 76 号头号杀手吴世宝的手下张国震。

张国震被捕，供出吴世宝

日本宪兵队查出抢劫铁甲车的主犯是汪伪 76 号的特务张国震后，下令李士群交出张国震。李士群在了解了详情后，迅速找到了吴世宝，李士群当然明白，张国震绝不会独自去抢日军的金砖，张国震背后，必定有吴世宝的指使，否则，张国震也没有抢劫日本军队的黄金的胆量。

李士群找到吴世宝，让他交出张国震，并且告诉他，现在日本宪兵队已经查明是张国震抢劫了日军的铁甲车，如果不交出张国震，日本军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到时候，参与这场抢劫案的每一个人，都性命难保。李士群话中藏话，其实是告诉吴世宝，不交出张国震，你吴世宝恐怕也在劫难逃。

吴世宝听后非常紧张，心中暗自后悔，看来自己这次真的是打错了算盘，如今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张国震肯定是要交出去了，但怎么让张国震咬紧牙关，不供出自己，这对吴世宝来说，却是个难题。

无奈之下，吴世宝只得先找到张国震，安慰张国震，让他放心去日本宪兵队，他吴世宝保证会找李士群为他求情，不让日本宪兵队为难张国震。于是，张国震就在吴世宝的陪伴下，硬着头皮来见李士群。为了宽慰张国震，李士群还特意叫来心腹夏仲明，让他陪同张国震到日本宪兵队去领罪。

到了宪兵队后，一切就由不得张国震了，他先是遭到了一顿毒打，随后就被日本宪兵队收押审讯。张国震看这阵势，明白自己这次恐怕是有来无回了，心里恨极了吴世宝，如果不是吴世宝策划了这起抢劫案，他张国震也不会落到如此的田地；而如果吴世宝没有劝他投案自首，他现在恐怕早已离开了上海，也根本不会深陷牢狱。恨极了吴世宝的张国震，干脆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将吴世宝策划这起黄金抢劫案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招了出来。

当张国震供出吴世宝后，日本军方震怒了，日本军方怎么也想不到，汪伪 76 号的特务，居然会将主意打到自己身上，震怒之下，日本宪兵队通缉了吴世宝，并下令汪伪政府以“破坏和平”为由，一起通缉吴世宝。吴世宝一听到风声，就藏了起来。抓不到吴世宝，日本军方更加恼火，他们命令李士群，一定要将吴世宝交出来，否则，就要严惩李士群。

这一次，李士群倒是很冤枉，他并没有唆使吴世宝抢劫日本军方的黄金，这件事，他开始一直毫不知情，所以，此事与他李士群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却无端被吴世宝牵连。无奈，为了自保，李士群只得交出吴世宝，但是现在吴世宝不知所踪，李士群也找不到他。

为了避免成为替罪羊，李士群和妻子叶吉卿来到吴世宝的家中，企图劝说吴世宝的妻子余爱珍说出吴世宝的下落。李士群对余爱珍说，如果吴世宝自首，他李士群一定担保吴世宝性命无忧。余爱珍信以为真，便将丈夫吴世宝的藏身地点告诉了李士群。

得知吴世宝的藏身之所后，李士群不敢耽搁片刻，派人前往抓捕吴世宝，李士群生怕余爱珍突然变卦，通知吴世宝逃走，那么再想抓捕吴世宝，就难如登天了。

李士群抓到吴世宝后，亲自将其送到了日本宪兵队，交给了日本特高课课长，并当着吴世宝的面，请求日本军方从轻发落吴世宝。

吴世宝被日本宪兵队关押后，李士群就接到了日本特高课课长的指示，迅速冻结吴世宝的资产。李士群立刻打电话给马啸天，吩咐马啸天负责办理此事。马啸天首先冻结了吴世宝的银行账户，随后又带着汪伪 76 号的特务们，来到吴世宝家中清点吴世宝的家财。吴世宝

的妻子余爱珍不得已，只得按照马啸天的吩咐，清点家中保险箱里价值不菲的钻石、翡翠和金条等物，随后，将这些财宝装进了一个箱子，当着众人的面，将箱子交给了马啸天。

其实，马啸天在赶往吴世宝家之前，就已经派人悄悄通知了余爱珍，所以余爱珍其实早有准备，她将大部分财产都藏了起来。而在马啸天赶到，将余爱珍没有藏起来的财产查封后，余爱珍还邀请前来查抄的特务到饭店大吃了一顿，还送了很多的香烟、糖果和美酒给这些特务，于是汪伪 76 号的特务也都没有为难余爱珍。

马啸天从吴世宝家回到汪伪 76 号后，如实将情况报告给李士群，李士群听后，茅塞顿开，他由余爱珍的做法，想找到了让吴世宝少吃些苦头的办法。

李士群效仿余爱珍，用钱财贿赂了日本宪兵队的队长和日本特高课的课长，请他们尽量不要严刑拷打吴世宝。李士群之所以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安抚汪伪 76 号那些曾经在吴世宝手下的特务，也是为了避免吴世宝在严刑拷打下，将他和李士群所做的事全盘托出。这个办法很快就见效了，吴世宝在日本宪兵队非但没有受到刑罚，还常常有酒喝，有肉吃。

“主子”下毒，吴世宝丧命

1942 年初，李士群、汪曼云和唐生明，为了吴世宝一事聚集在了一起。李士群当着两个拜把子兄弟的面，毫不遮掩地说：“吴世宝这个野蛮人，别说是日本人恨他，我都恨透他了，恨不得他能早点死在日本人手里。”

汪曼云却慢悠悠地说：“吴世宝虽然犯了不可饶恕的过错，但在外人面前，他总还是你手下的一员猛将。如果你任由日本人处置他，对你的影响可比吴世宝拆了你的家还要严重。你别忘了，现在你的手下众多，他们若是看到你连保护自己手下的能力都没有，谁还会忠心于你？你不如将吴世宝从日本人手里要过来，再暗地里将吴世宝杀了，这样，不仅吴世宝会感激你，你还能在你的众多手下面前树立威信，岂不一举两得。”

汪曼云的话，让李士群眼睛一亮，李士群非常赞同汪曼云的意见，他认为用吴世宝这个“弃子”来树立他李士群在汪伪 76 号的威信，是个绝妙的好主意。

因此，为了救出吴世宝，李士群请汪伪政府高级顾问影佐祯昭与日本宪兵队周旋，最终，日本宪兵队答应李士群，将吴世宝和张国震二人放出，但他们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放出后，这两个人绝对不能活着走出上海。李士群听后，一口答应下来。

张国震被释放后，李士群按照日本宪兵队的要求，随便找了个借口，便将张国震带到中山北路的小树林里枪毙了。随后，李士群告诉吴世宝，自己虽然救出了他，但是为了敷衍日本军方，答应了日本军方软禁吴世宝三年的要求，所以不得不先将吴世宝送到自己在苏州的一座宅邸，软禁起来，做个样子给日本军方看。吴世宝听后，不仅表示理解，而且非常感激，他没想到自己的性命居然真的保住了，甚至没受一点刑罚，他非常感激李士群，并且对李士群说，自己誓死效忠李士群。

但是，就在吴世宝抵达苏州的第二天，他却突然得病身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日本军方和李士群所谓软禁吴世宝三年的约定，不过是演给外人看的，日本军方和李士群早就商量好了，要置吴世宝于死地。所以，在吴世宝出狱的前一晚，日本宪兵队给他送来了一份丰盛的晚餐，美名其曰庆祝他出狱。吴世宝没有质疑，兴高采烈地吃掉了那些食物，丝毫没有察觉日本宪兵队队员眼中隐约透露出的怜悯的目光。

第二天，李士群来接吴世宝出狱，看到活蹦乱跳的吴世宝，李士群担心昨晚饭菜里的毒药分量不够，便以不舍得吴世宝离开自己前往苏州为由，主动提出亲自将吴世宝送到苏州。到苏州后，李士群特意宴请吴世宝吃饭，精神甚好的吴世宝感激不已，不仅没有防备，反而痛快地饮下了李士群给自己准备的毒酒。结果当晚，吴世宝就毒发身亡。

吴世宝这个作恶多端的大汉奸终于死了，他的死，完全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但他死在自己的主子——日本军方和李士群的手中，

未免有些让人唏嘘。在汪伪 76 号中，只有利益，没有真情。对日本政府而言，所有没有了利用价值的人，最终都会像“垃圾”一样被丢掉。

第二节 军统完美反间，李士群自食恶果

李士群仗着有日本人撑腰，做了许多丧尽天良的事情，为了向日本军方表忠，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他甚至亲手杀害了汪伪 76 号的王牌杀手吴世宝。但李士群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也没能躲过日本军方的猜疑，最终，同样命丧日本军方之手。

军统巧用反间计，日方猜疑李士群

日军偷袭珍珠港后，日本与美国的战斗拉开了帷幕，日军在美国战场上，一直与美国军队僵持不下。同时要兼顾中国战场和美国战场，应接不暇的日军在这两方战场上都渐呈败象，这样的局面，让那些投靠日军的汉奸开始忧心自己的前程，为了防止日本战败后，自己被国民政府制裁，一些汉奸开始与国民政府联络，请求国民政府给他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这些汉奸的请求，对于国民政府来讲，无异于困了正好来了个枕头，蒋介石答应了一些汉奸的请求，允许他们反水，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一些贡献，以减轻他们的罪行。

再说李士群，他虽然也看出了日本的败象，但他并没有向国民政府示好。事实上，他也想像那些汉奸一样，向国民政府示好，但他明白，自己罪孽深重，即使向国民政府摇尾乞怜，军统局和中统局也不会接受他。他李士群残害了那么多的军统、中统特工，他与国民政府之间早就结下了血海深仇，根本没有化干戈为玉帛的可能。所以即便希望渺茫，李士群也只能寄希望于日本政府，祈求日本能在中日战争中取得胜利，这样，他李士群就能继续作威作福了。

在投靠日本的汉奸中，有两个人气焰十分嚣张，一个是周佛海，另一个就是李士群。虽然二人在汪伪政府的不同部门掌权，但为了在

日本军方面前邀功，二人常常明争暗斗。本来二人势均力敌，但因为李士群手下有汪伪 76 号的一帮特务，所以李士群总是处于优势，而周佛海总是处于劣势，渐渐地，周佛海与李士群之间的积怨越来越深，这也为李士群的死，埋下了伏笔。

周佛海求得军统庇护后，戴笠提出，要周佛海协助制裁两个人，第一个是汪精卫，第二个就是让周佛海恨得咬牙切齿的李士群。

汪精卫身边的守卫力量太过严密，因此制裁汪精卫一事需从长计议。但李士群就不一样了，自从吴世宝抢劫了日本军方装载黄金的铁甲车之后，日本军方就对李士群生出了戒心。

戴笠与日本特务机关交恶已久，深知日本军方对待中国汉奸的态度：在日本人眼中，投靠他们的中国人只是他们的棋子，如果棋子脱离了他们的掌控，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利用这一点，戴笠要求周佛海在日本军方有关官员面前挑拨离间日本军方和李士群之间的关系，让日本军方意识到李士群已经过于嚣张，并让日本军方认为，李士群已经脱离了他们的掌控。周佛海为了彰显李士群的嚣张，一次次在日本官员面前吹捧李士群。而这样的举动，却被李士群误认为是周佛海的退让和讨好。

其实，李士群不过是汪伪 76 号的特务头子，论职权，远远不如汪曼云、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但他却从未将这些人放在眼里，李士群为何敢如此嚣张呢？其中的原因，在他和汪曼云的谈话中曾经不经意地泄露过。

当时，因吴世宝一事，汪曼云提醒李士群，如果李士群再不收敛锋芒，一定会招来更多的政敌，阻碍他的仕途发展，因此，汪曼云劝李士群韬光养晦。李士群见汪曼云如此真心劝告自己，内心十分感激，但是他却没有丝毫的收敛，反而对汪曼云说：“汪兄，你不用担心，就算是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等人都来找我麻烦，我也不怕。”

汪曼云见李士群语气轻松，便知自己是杞人忧天。见李士群口气如此狂妄，便打趣道：“难道你认为汪精卫会为了你，舍弃自己的夫人陈璧君吗？”

李士群摇摇头，神秘地一笑，说道：“汪兄此言差矣。你别看汪

精卫是国家元首，但是除了咱们和日本军方，根本没有人承认他是国家元首。如果不是日本政府给他撑腰，他又算是什么呢。即便他是国家元首，但在他之上，还有日本政府这个‘太上皇’，所以只要我有日本政府撑腰，我没有什么好畏惧的。”

听到此处，读者是不是要问，为什么日本政府要给李士群撑腰？这要从汪伪 76 号的归属问题说起。

曾经，丁默邨和李士群为了警政部长一职争执不下，丁默邨宁可把警政部长的位置让给已经忙得不可开交的周佛海，都不愿意交给李士群，导致李士群与丁默邨的关系愈发恶化。后来，李士群咽不下这口气，就找到了日本政府，声称自己宁死也不愿再回汪伪 76 号。日本政府问其原因，李士群大诉苦水，说自己的工作性质让百姓厌恶，让国民政府厌恶，就连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也只支持丁默邨，不支持自己，自己还有什么干劲。日本政府很清楚，汪伪 76 号的实权，其实都在李士群手里，所以为了安抚李士群，日本政府就与李士群订了一个君子协定，即日本政府在政治方面尽力支持李士群。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协定，李士群才敢如此嚣张，不再惧怕任何人。

汪曼云对此事也有些了解，然而他提醒李士群：“你不怕日本政府只是说说而已吗？”

李士群得意地回答：“日本政府毕竟还要靠我为他们铲除异己，在我还有利用价值时，他们肯定会支持我的。再说，清乡工作也证明我与日本政府的协议确实有效。当时，汪精卫准备将清乡工作交给罗君强去做，我便对日本特高课课长说汪伪 76 号更适合清乡工作，日本政府就将清乡工作从罗君强手中接了过来，交到了我的手上。”

然而汪曼云依然为李士群感到忧心，他劝李士群一定要少树政敌。

李士群听后只是微微一笑，却不在意。

然而清乡工作结束后，日本政府却对李士群非常不满，日本政府发现，在清乡活动期间，李士群将日本宪兵队通缉的余祥琴秘密送往了重庆，这让日本政府愈发觉得，李士群已经逐渐脱离了自己的掌控。为了避免日后出现麻烦，日本政府有意铲除李士群。

就在周佛海为了继续挑拨李士群与日本政府的关系而绞尽脑汁之

时，周佛海竟然发觉，日本政府竟在暗地里，悄悄地削弱李士群以及汪伪 76 号的势力。周佛海敏锐地察觉到，日本政府要对李士群下手了。周佛海有意推波助澜，便假心假意地对汪曼云说：“曼云，你见到李士群后，千万劝他不要再乱来了，收敛一点，否则日本政府恐怕就要收拾他了。”对于周佛海的这番话语，汪曼云很是疑惑，毕竟谁都知道，周佛海和李士群一向面和心不和。见汪曼云一脸疑惑，周佛海连忙解释，虽然自己和李士群有私人恩怨，但他们毕竟都是汉奸，也算是一条船上的人，日本政府要置李士群于死地，他自然不能坐视不管。

虽然汪曼云怀疑周佛海另有所图，但周佛海的话却确实在理，因此，汪曼云便将周佛海的话转述给了李士群。

不出周佛海所料，李士群对周佛海的劝告不屑一顾，甚至认为这是周佛海的诡计，想挑拨他和日本政府之间的关系。

于是，李士群毫无收敛，继续带着汪伪 76 号的特务为非作歹。

一张牛肉饼，要了李士群的小命

李士群的嚣张，使得他频频树敌，然而他的张狂，却让日本政府的有关官员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他们认为，照这样的态势发展，即使他们不杀死李士群，也会有人动手除掉得意忘形的李士群。

1942 年，李士群的后台老板，日本特高课课长晴气庆胤被调回了日本，柴山中将接替了晴气庆胤在中国的职位。柴山中将接任后发现，李士群对他的命令经常阳奉阴违。面对不听话的李士群，柴山中将产生了除掉李士群的想法。

柴山中将曾经命令日本特务机构的特务，伪装成军统特工，去行刺李士群，但李士群家中防备森严，他们没能得手。

最后，柴山中将决定用下毒的办法杀死李士群。

1943 年 9 月 6 日，冈村少佐邀请李士群到家里做客。李士群深知自己树敌众多，唯恐有人暗中加害自己，因此一直很少赴宴。然而此次，日本少佐设宴邀请，他难以推辞，便硬着头皮来到了冈村的家里。

到了冈村少佐家中，李士群见汪伪政府的官员熊剑东、夏仲明二人都在，心里才稍稍松了一口气，不过李士群依然没有放松警惕。

落座后，冈村少佐的太太将一道道日本风味菜肴端上了桌子，冈村少佐热情地请大家品尝太太做的菜肴，并不停地吹嘘自己的太太手艺绝佳，并说，等会儿一定要让大家尝尝夫人的拿手绝活——美味牛肉饼。

席间，特工头子李士群非常谨慎，他一边笑着和大家谈话，一边观察别人都吃了哪些菜。李士群在夹菜时，只夹那些别人尝过的菜肴，而且每道菜都只是尝尝而已，绝不肯多吃一口。

最后，冈村少佐的太太端上了一碟牛肉饼。冈村少佐特意接过这碟牛肉饼，双手端起，亲自放在了李士群面前，并对李士群说：“李先生，你是今晚的贵客，我特意让夫人做了这道拿手菜，请你品尝，日后，大日本帝国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倚仗李君来完成。”

冈村少佐的话虽然听着十分受用，但牛肉饼只有一碟，这让李士群心里起疑。他不敢贸然吃下这碟牛肉饼，因此，笑着将牛肉饼推到了熊剑东面前，说：“我一直非常敬佩熊先生，您的身份比我尊贵得多，所以这盘牛肉饼，理应您来品尝。”熊剑东自然也不肯吃，便又将牛肉饼推到了李士群面前，笑着说：“哪里哪里，今天李部长可是冈村先生的贵客，这是冈村夫人专门为李部长做的，我绝不敢率先品尝啊。”

李士群刚想继续推辞，就见冈村夫人又端上来三碟牛肉饼，分别放在了冈村、熊剑东和夏仲明面前。

冈村少佐这才解释道：“日本招待贵客以单数为敬，今天咱们席上一共有四个人，所以我的夫人才将这四碟牛肉饼分为一、三，两次上席，以此来表示众位都是我冈村的贵客。如果你给日本人送礼，也是以单数为敬，即便你只送一件，我们日本人都会非常高兴，但要是你送双数的礼物，我们就会非常不高兴，认为你不重视我们，说不定还会因此跟你断绝来往呢。”

李士群对于日本送礼讲究单数的习俗也早有耳闻，听到冈村这么一解释，也就放松了警惕。看到其他三人将牛肉饼吃得干干净净后，李士群不再多虑，将面前的牛肉饼吃掉了近三分之一。在冈村劝说李士群吃掉剩下的牛肉饼时，李士群以自己身体不适，胃口不佳为由拒绝了。

酒足饭饱后，冈村和李士群等人坐下聊天。

那晚，直到晚上 10 点，冈村才意犹未尽地结束了这次饭局。

然而，李士群回到家后，想来想去，还是心中不安，便直奔卫生间，把手伸进喉咙，企图将在冈村家吃的食物全都吐出来，但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他什么都没有吐出来。

两天后，李士群忽然感到身体不适，先是腹痛难忍，随后又吐又泻，症状像是得了霍乱。

叶吉卿将李士群送进医院抢救，经过检查，医生发现，李士群体内有一种名为阿米巴菌的病毒。这种病毒一旦进入人体，便会以每 11 分钟繁殖一倍的速度进行繁殖。最恐怖的是，在这种病毒繁殖时，携带病毒的人不会有任何感觉。而三十六小时以后，阿米巴菌的繁殖达到饱和，无法在人体内继续繁殖下去，于是各种病症就会突然爆发，此时，携带病毒之人便已无药可救。而且这种病毒十分霸道，它爆发后，会将人体内所有的水分，通过吐泻的方式排除殆尽，携带了这种病毒的人，注定无药可救，最后，只能在煎熬中等待死亡，死亡过程非常痛苦。

李士群夫妇还从医生那里得知，这种病毒，是日本军方研制出来的，并且目前，只有日本军方才拥有这种病毒活菌。

李士群和叶吉卿听后，当即明白，这次，李士群是栽在了冈村少佐的手里，李士群在感叹“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同时，交代叶吉卿，自己死后，叶吉卿一定要带着孩子，尽快离开上海。

李士群死后，叶吉卿向汪精卫提出了四个要求：首先，她认为李士群是为国捐躯，因此希望汪精卫能够将李士群“国葬”；其次，叶吉卿要求汪精卫派汪伪政府的重量级人物前往苏州至祭；第三，叶吉卿要求汪精卫送已故的李士群一件纪念品作为陪葬；最后，叶吉卿要求汪精卫亲自为李士群题写墓碑。

除了国葬被汪精卫改为“公葬”外，叶吉卿其他的要求，汪精卫都照做了。

李士群下葬当晚，日本宪兵队的有关官员和叶吉卿、汪精卫以及汪伪 76 号的几名大汉奸，都在李士群的家中凭悼李士群，当日本宪

兵队的有关官员听说，有人认为李士群是被日本官员下毒害死的，这几名日本宪兵队的官员愤怒不已，他们叫嚷这是国民政府制造的谣言，意在栽赃陷害日本官员。

后来，为了澄清所谓的事实，日本宪兵队开始着手调查李士群中毒一事。

几日后，日本官方公布调查结果：李士群的妻子和人通奸，担心被李士群发现，因此与奸夫一起，合谋将李士群毒死了。

叶吉卿见日本官方不仅不承认下毒害死李士群一事，居然还倒打一耙，将自己的丑事公诸于众，叶吉卿一时间又羞又怒，却无力反驳，只能到汪精卫面前去号啕大哭。

日本官方还表示：他们还会继续调查此事，但因此事有损李士群的颜面，所以望知情人不要声张。日本官方还知会叶吉卿，表示对叶吉卿所犯的错误，他们可以原谅，但前提是不允许任何人造谣，不允许任何人声称是日本宪兵队的官员毒害了李士群。

数日后，日本官员拿着一张声明，找到了汪精卫和叶吉卿。声明中强调，李士群是因病身亡，日本官员要求汪精卫、叶吉卿等人在声明上签名，并向汪精卫和叶吉卿保证，只要他们签了名，日本政府就不再追究此事。

汪精卫因害怕日本政府将什么莫须有的罪名安在自己头上，选择明哲保身，在声明上签了字。汪精卫和其他汉奸，为了讨好日本政府，竟然还劝叶吉卿在声明上签字。叶吉卿见此情形，明白自己再说什么也没用了，便边哭边在声明上签了字。

这个结局，可谓是“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最好诠释。李士群不遗余力地为日本政府卖命，结果却落得个命丧黄泉，众叛亲离的下场，虽然可怜，但却是他自作自受，罪有应得！

万里浪被枪决，最终死不见尸

李士群死后，万里浪接任了汪伪政府政治保卫局局长一职，重权在握，掌控汪伪 76 号。

1945 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万里浪没了日本政府做靠山，便找

到了军统局老特务毛森，请他为自己与戴笠牵线搭桥，万里浪表示，自己愿意戴罪立功，服务于军统局，只求免除一死。

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军统局、中统局的特务们，就接到了国民政府关于接受投降的日伪特务的有关指示，即安抚前来投降的日伪特务和大小汉奸，监视他们的行动，随时等待抓捕命令，抓捕这些投降的日伪特务和大小汉奸。因此，万里浪找到毛森时，毛森并没有立即抓捕他，而是要求他待在家里，闭门思过。后来，毛森还向万里浪转达了戴笠的回复，即如有适当机会，便让万里浪戴罪立功，将功补过。

万里浪听闻戴笠愿意让自己将功补过，便认为国民政府已经原谅了自己的汉奸行径，自己已无性命之忧，便安心待在家中，等待毛森的指令。而在之后的军统肃奸行动中，万里浪为了将功补过，也的确为军统锄奸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情报。

然而，万里浪真的能将功补过吗？国民政府会这样轻易地放过出卖国家、残害同胞的汉奸万里浪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而且即便国民政府答应饶恕万里浪，人民也不会答应。

1946年8月15日下午3时，万里浪被拉到江湾刑场，与其他15个汉奸一起被军统局枪决了。

在执行枪决的过程中，还有这样一个小插曲。

当时，在负责押送万里浪的军统特工中，有一位是万里浪的老相识，军统特别行动队的特工魏桂龙。

魏桂龙与万里浪结怨很深，由于种种原因，他对万里浪恨之入骨，恨不得将万里浪碎尸万段。在万里浪被军统局抓捕之后，魏桂龙从犯人名册中看到了万里浪的名字，就打听清楚万里浪被关押的地点，然后就来到了关押万里浪的房间。

在见到万里浪后，魏桂龙情绪十分激动，他大声质问万里浪：“万里浪，你还认识我吗？”

万里浪闻声，抬头看了魏桂龙一眼，便低下了头。

后来，魏桂龙痛斥了万里浪很久，却还觉得难解心头的恨意，于是，魏桂龙向军统局军法处处长申请，要求由自己来实施对万里浪的枪决。军法处处长在了解魏桂龙和万里浪的恩怨后，批准了魏桂龙的申请。

1946年8月15日，行刑前，魏桂龙和曾经被万里浪迫害的军统特工的家属们，一起准备了很多香火，在刑场上祭奠了被万里浪害死的亲人们。

随后，魏桂龙将万里浪绑在了柱子上，恶狠狠地对万里浪说：“你曾经扎我一刀，如今，我还你一枪。”

后来，魏桂龙朝万里浪连开数枪，枪枪打中万里浪，却又枪枪都避开万里浪的致命部位，身中数枪的万里浪，因为疼痛颤抖不已，一旁围观的曾经被万里浪迫害的军统特工们的家属都连连拍手叫好，最后，魏桂龙朝万里浪的头部开了一枪，万里浪才一命呜呼。

万里浪死后第三天，万里浪的妻子找到毛森，哭哭啼啼地说万里浪的尸体被人掉包了。原来，在万里浪死后第二天，她接到通知，通知她去江湾领取万里浪的尸棺，但在她将万里浪的尸棺运到殡仪馆后，开棺验尸，却发现里面的尸体，并不是万里浪本人的尸体。

在来找毛森之前，万里浪的妻子也找过负责装殓尸体的有关人员，询问他们是否有可能装错了尸体，但这些人都不说可能，并且声称当天行刑完毕，他们就将尸体入棺了，为了确保不出错，他们最后还特意核对了一遍。

事实上，入错棺的可能性非常大，当天处决的16人，全都是汉奸，负责装殓的人员都是军统局的特工，他们对这些汉奸恨之入骨，所以在为其装棺时，根本不会多认真。在这些装殓人员看来，这些该死的汉奸，死后能有一口棺木容身，已经算是军统局法外开恩，因此根本不会有人去认真核实有没有装错，在仓促中弄错人，也算是很正常的。

那么，棺中的人既然不是万里浪的尸体，那么万里浪的尸体又在哪儿呢？

为了找到万里浪的尸体，万里浪的妻子接受了一位军统局行刑人员的建议，到与万里浪一同被枪决的其他15名汉奸家中挨个询问。但因为已经时隔数日，许多家属已经将尸体下葬或是火化，所以根本无从查清。并且，当万里浪的妻子请他们去辨认一下，装着并不是万里浪的尸体的万里浪的棺材里，装的死人是不是他们的亲人时，这些家属也都不愿意去，他们生怕又生出事端来，毕竟他们死亡的家属是

汉奸，他们也怕再殃及自己。

后来，经过万里浪的妻子再三劝说，一家原棺土葬的家属终于愿意去殡仪馆辨认。巧合的是，棺材里躺的死人，居然就是他们的亲人。于是，这家人便将这口棺材抬走了，把已经下葬的那口棺材交给了万里浪的妻子。万里浪的妻子开棺验尸，却发现棺材里的尸体已经腐烂，根本看不清尸体的容貌特征了。面对这具看不出容貌的身体，万里浪的妻子坚称这不是她的丈夫万里浪，并表示要继续寻找丈夫的尸体。见万里浪的妻子还要寻找万里浪的尸首，军统局的有关特务便劝她：别再找了，即使你再找到一具尸体，看到的也是腐烂发臭的尸体了。后来，经过大家的百般劝说，万里浪的妻子决定不再继续寻找万里浪的尸首，把这副棺材里的尸首当作万里浪的尸体，草草地下葬了。

直至今日，万里浪的尸首身在何处依然是个谜，这死不见尸的下场，正是万里浪作恶多端应得的报应！

贪看湖上风景，丁默邨命丧黄泉

李士群死后，丁默邨也没能再次接手汪伪 76 号，他被汪精卫流放到汪伪政府一个没有多少油水的官位上，在汪伪政府里混起了日子，此时的丁默邨，已经不再是那个一心争权夺势的丁默邨了，与李士群争夺汪伪 76 号控制权的过程中，丁默邨逐渐厌倦了官场上的钩心斗角，在一个没有多少纷争的平淡职位上，过平淡的日子，倒也合丁默邨的心意。然而好景不长，1944 年 11 月 10 日，汪精卫因病在日本去世，消息传来，丁默邨傻眼了，分析了形势，认为是该为自己寻找退路的时候了。

1945 年初，丁默邨千方百计地与军统局的戴笠和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取得了联系，对他们表达了自己想要戴罪立功的意愿，并信誓旦旦地保证，自己能将浙江以原貌归还国民政府，绝对不会让浙江落到中国共产党的手中。

当时，国民政府唯恐浙江落到中国共产党的手中，因此，在丁默邨信誓旦旦的保证后，戴笠率先回复了丁默邨。戴笠安抚丁默邨，要他不要担心自己的前途，并请他维护好浙江地区的治安，防止中国共

产党扰乱浙江地区的安定。紧接着，中统局的陈立夫也回复了丁默邨，陈立夫的回复，可以用六个字概括：行不行，看表现。陈立夫承诺，如果丁默邨表现良好，他就会将丁默邨的表现转告蒋介石，以此来减免丁默邨所应受到的刑罚。

丁默邨得到戴笠和陈立夫二人的回复后很是高兴，马上按照戴笠的指令行事，以“浙江省军委员”的身份，率领部队“剿匪”，将占领浙江一半面积的中国共产党的部队驱逐出了浙江，为国民政府顺利接收浙江奠定了基础。

1946年，就在丁默邨以为已经抱上了军统局和中统局的大腿，再无后顾之忧时，戴笠乘坐的飞机撞到了岱山上，戴笠就此身亡。随后，国民政府将丁默邨软禁在了重庆白公馆，后来，又决定将丁默邨押解到南京。

丁默邨听闻国民政府要将自己押解到南京，心中焦灼，连忙叫妻子去请旧友，国民政府的要员赵冰谷帮忙周旋。丁默邨的妻子还没有去找赵冰谷，赵冰谷就不请自来了。

赵冰谷一进门就说道：“丁兄，我听说国民政府要将你押送到南京，这事有玄机啊。”

丁默邨听后垂头丧气，叹息一声说：“不瞒你说，我也觉得此事不妙。我本想让妻子去找你帮忙呢。你在国民政府里认识的人多，看看能不能帮我疏通一下，不要让我去南京，就软禁在重庆这里。”

赵冰谷闻言，马上拍着自己的胸脯表示，会竭尽全力为丁默邨解决这件事情。赵冰谷的慨然应允，让丁默邨和他的妻子赵慧敏感动不已。为了表示感谢，丁默邨将自己多年来搜刮的钱财全部送给了赵冰谷。赵慧敏担心这些钱不够用，还将自己的私房钱和首饰拿出来，交给了赵冰谷，请赵冰谷一定要尽力为丁默邨疏通。

赵冰谷看丁默邨夫妇如此大方，心里乐不可支，表面上却不动声色，他还向丁默邨保证，自己一定会帮忙保住丁默邨的性命。

此时的丁默邨，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了赵冰谷身上，全然不知他的这个知交好友，其实是在趁火打劫。赵冰谷此番前来，只是想以疏通关系为由，私吞丁默邨的家产，并无解救丁默邨之意。

1946年9月25日，国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开庭审理了丁默邨一案，在法庭上，丁默邨为求自保百般辩解，甚至还搬出了自己和陈立夫、戴笠的约定，将自己为国民政府顺利接收浙江地区所做的事情，作为功劳陈诉出来，并在法庭上忏悔，检讨自己当初卖国投敌的行为，把自己主动加入汪伪76号说成是受日本人和李士群的胁迫。丁默邨企图将自己说成受害者，以博得法官对自己的同情，以期免除自己的死刑。

丁默邨的这些辩解，并没有改变国民政府对他的态度。虽然国民政府承认丁默邨确实有功，但是功不抵过，他的这些功劳，不足以抵销他在抗日战争时期犯下的过错。

事实上，国民政府对丁默邨已经算是优待了。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后，国民政府肃奸的态度十分坚定，汉奸被判处死刑后，大多在十天左右就执行枪决，即使有个别延后现象，也不会超过一个月。但是对待丁默邨就不一样，自1946年9月，丁默邨一案第一次开庭，到1947年2月8日，以汉奸罪的罪名判处丁默邨死刑，再到1947年7月5日，正式处死丁默邨，期间经历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这与国民政府平日里快捷而迅速的锄奸作风完全不符，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国民政府最初并没有打算处死丁默邨，那为何后来，国民政府还是决定枪决丁默邨呢？

对此，国民党中统大佬陈立夫在他的回忆录《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中做了详细的记录。

陈立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丁默邨本来可以不死的，但有一天他生病，从狱中保出去看医生，从南京拘留所出来，便顺便游览了玄武湖……这个消息被蒋委员长看到以后，蒋委员长很生气地说：“生病怎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

（摘自正中书局1994年6月版《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作者陈立夫）

表面上看，丁默邨是因为游玄武湖丧命，但与其说丁默邨因贪看湖上风光误送性命，不如说是蒋介石借题发挥。毕竟丁默邨有病是事实，他患有肺病，身体羸弱，最后那段时间，似乎一阵风吹过来，就能将他吹倒，因此国民政府才同意了他保外就医的申请。丁默邨被关押在监狱里有一段时间了，出来之后，贪恋外面的风光，也是人之常情，想来这些蒋介石不会不知道，可他偏偏就是用这样拙劣的借口，下令枪决丁默邨。如果丁默邨知道自己会因为贪看玄武湖的风光而断送性命，不知道他还会不会选择保外就医？

当然，不管丁默邨是因何种理由被判处死刑的，总之，这个外号“丁屠夫”，让“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分子”，终于为他犯下的滔天罪行买了单，被国民政府枪决了！

第八章 日薄西山，三大特工组织的穷途末路

军统、中统以及汪伪 76 号这三个组织，在抗日战争时期人尽皆知，甚至让百姓谈之色变。后来，戴笠的死亡，预示了军统局的没落；国民党败走台湾，注定了中统局的落魄；而日本的无条件投降，则预言了汪伪 76 号的覆灭。这三大特工组织的下场悲催，其实全是咎由自取。

第一节 日暮之时，军统再三改组

戴笠的突然离世，让军统局失去了灵魂，虽然后来，军统局的组织系统也得到了一定的保存和发展，但是却始终无法再像戴笠在位时那样辉煌。而军统局经过多次改组，也早已不再是戴笠领导的那个爱国锄奸和血腥镇压性质兼具的特工组织，而是彻底转变为负责维护国民政府的安全的特工部门。

军统势力过大，蒋介石戒心重重

当年，周恩来总理在中国共产党的某次会议上曾经这样说过：戴笠一死，革命胜利可以提前十年完成了。这句话彰显了戴笠超群的领导能力和行动能力。

戴笠是一名情报高手，他训练出来的军统特工各个都能独当一面，军统局对情报的破译水平，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在当时还十分落后的中国，也算是个奇迹。而戴笠的性格和他的工作性质，注定他

要成为一个人人憎恨的“恶魔”。

国民政府统治时期，戴笠被他的政敌和同僚们称为“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希姆莱”、“中国最神秘人物”，对于这些称呼，戴笠听后都只是付之一笑，他并不计较这些“外号”，事实上，戴笠百分之八十的精力，都用在如何讨好蒋介石，做好军统局的工作上，而剩下百分之二十的精力，则都用在了寻找各色美女上。

戴笠的家庭条件并不好，但他处世圆滑，能抓住机会与贵人结交，这就为他在日后成为情报界数一数二的人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戴笠能爬上军统局局长的位置，并不是靠运气，为了升官，戴笠付出了比别人多出数倍的艰辛和汗水。

在成为蒋介石的心腹后，戴笠事必躬亲。与戴笠曾经共过事的国民党军官，都称戴笠为怪物，一个不知疲倦和痛苦的怪物，戴笠对工作的狂热，不是一般人可以比拟的，他对蒋介石的忠心，也是很多人无法超越的。

戴笠担任军统局局长长达八年，但戴笠始终不是一名国民党党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其实，这是戴笠为了讨好蒋介石，有意而为之。

1938年3月，国民党召开中央委员会临时全体大会。在大会前夕，蒋介石找到戴笠，对戴笠说，自己准备提拔他担任中央委员。戴笠听后，立刻对蒋介石说：“此事不可。”这是戴笠第一次对蒋介石说不，戴笠破天荒地拒绝了蒋介石的好意，这让蒋介石颇感好奇，便询问戴笠为何不可。戴笠于是解释道：“自己并不是国民党党员，如果担任中央委员，名不正言不顺，会让许多国民政府的官员误以为蒋介石用人不当。”

蒋介石听后十分惊奇，问戴笠：“你怎么可能不是国民党党员呢？你在黄埔军校学习过，又参加复兴社多年，为国民政府服务了这么多年，怎么可能到现在还不是国民党党员？”

戴笠回答道：“我一心追随校长，甘愿成为校长手中的利剑，校长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自从追随校长后，我衣食无忧，前途光明，入党不入党对于学生我来讲，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只要能在校长分忧，学生就感到无比荣幸了。”

戴笠这番话，在外人看来，摆明就是阿谀奉承，但蒋介石听后却非常受用，他认为戴笠所言基本属实。自从戴笠和自己相识后，戴笠的整个人生似乎都是为他蒋介石而活，不管自己让戴笠做多么艰险、多么卑微的工作，戴笠都用一百二十分的精力将它做好，并且毫无怨言，而且面对自己的责骂，戴笠从来逆来顺受，从来也没有顶撞过自己，想到这里，蒋介石觉得，自己似乎亏欠了戴笠很多。于是，当时，蒋介石写了一张字条递给戴笠。

据说，戴笠接过字条一看，字条上只有 15 个大字，但就是这 15 个字，让戴笠顿时热泪盈眶。

戴笠深吸了一口气，像是发誓一般，对蒋介石说：“我戴笠愿一生只做校长的学生，不当中央委员，校长的信任，就是我的无上荣光！”

究竟是怎样的 15 个字，让见过大风大浪的戴笠都无法平静对待呢？这 15 个大字就是“蒋中正介绍戴笠为中国国民党党员”。

1945 年国民党召开“六大”，大会前夕，蒋介石又找到戴笠，称要将他定为中央委员的候选人，但戴笠依然推辞，表示自己只愿做“校长的佩剑”，不愿做中央委员，“入党”、“升官”，对他戴笠来讲并不重要。蒋介石见戴笠坚持，便没有勉强他，只是从此，更加信任戴笠。

戴笠如此忠心，最终还是没能逃过蒋介石的猜忌。起因就是军统局在十周年大会中所展示的实力，着实让蒋介石感到心惊，直到那时，蒋介石才发现，戴笠手中的权力和实力，都已经发展到可以与自己抗衡的程度了，这让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瞬间转变为猜疑和防备。

蒋介石的态度转变自然也逃不过戴笠的眼睛，他分析蒋介石转变态度的原因，准备从源头扼杀蒋介石的猜疑。

分析人的心理，对特工出身的戴笠来说，十分容易，再加上分析对象是自己已经追随多年的蒋介石，所以，戴笠很快就发现了其中的关键，因此马上着手控制军统局的发展，以表自己对蒋介石的忠心，企图消除蒋介石的猜忌之心。

除此之外，戴笠还做了另一手准备，他在私下里增强了和蒋介石的妻子宋美龄、小舅子宋子文之间的联系，拉拢蒋介石的亲近之人，

希望蒋介石的家人，能在蒋介石面前为自己说些好话。

戴笠的这些举动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并没有完全消除蒋介石的猜忌，这可从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对各中心城市警察局的安排窥见一斑。

按照以往惯例，各城市警察局都是由军统局管理，蒋介石从没将警察局交给其他派系管理过，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亲自任命了上海、南京、北京三大城市的警察局局长，并且这三个人都是素来与戴笠不合之人。

除了中心城市警察局的控制权外，蒋介石还想将肃奸大权从戴笠手中夺过来，但由于戴笠在抗日战争时期，大肆开展锄奸行动，以至于掌控了大汉奸周佛海、丁默邨和许多伪国民政府的高层，几乎将整个汪伪政府的大汉奸囊括军统局名下，所以面对实力如此强大的军统局，蒋介石一时间很难夺走军统局的肃奸大权，为了不影响国民政府的整体运作，蒋介石也只能让戴笠继续掌握肃奸大权。

后来，蒋介石忧心忡忡，他认为自己已经无法完全控制戴笠了，他担心有朝一日，戴笠被策反，万一那样，国民政府必将面临巨大的灾难。

再后来，戴笠手中的权力一日不除，蒋介石就一日不能安心。

为了防止戴笠造反，蒋介石秘密成立了由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四人组成的监督小组，专门负责监视戴笠的一举一动。

蒋介石选择钱大钧、胡宗南、唐纵、宣铁吾四人组成监督小组，是有缘由的。时任上海警察局局长的宣铁吾，与戴笠一直是死对头，而他所任职的上海警察局，则可以全面监控军统特工的行动。唐纵则是蒋介石安插在戴笠身边的眼线，在军统局，唐纵负责协调全国各地的军统特务组织，实际上，也是监视军统局的行动，一旦军统特工有大幅度的异常调动，他便能够在第一时间通知蒋介石。钱大钧曾经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人脉非常广，认识许多戴笠都不认识的能人，这为他监视戴笠、了解戴笠的思想动态创造了便利条件。至于胡宗南，蒋介石很清楚，胡宗南和戴笠只是表面交好，实际上二人只是相互利用罢了，胡宗南要想继续拥有现有的权力，在仕途上步步高升，

就必须牢牢抓住蒋介石这棵大树，一旦蒋介石将他弃之不用，不要说做当下的“西北王”，就是他胡宗南当下拥有的财富，也都会变成过眼云烟。蒋介石成立监督小组，足见蒋介石对戴笠的戒心何其重也！

戴笠察觉到蒋介石对自己的防备后，既伤心又失望，心中突感悲凉，戴笠自觉自己没有任何对不起蒋介石的地方，并且他已经开始控制军统势力的发展了，难道蒋介石没有看到自己的努力吗？难道他戴笠的退让还不够吗？于是戴笠开始担心，自己将来恐怕不是死在中国共产党的手中，而是死在蒋介石的手中。不过尽管如此，戴笠依然没有反对蒋介石的念头，他只是加强了自身防卫，以防蒋介石在他身边安插特工，但戴笠的不反抗，并没有消除蒋介石的戒心，蒋介石还是打算逐步消除戴笠手中的权力。

军统化整为零，戴笠岱山毙命

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和毛泽东经过长达43天的谈判，签订了《会谈纪要》，此次谈判，双方针对国民党军统、中统的去留问题，达成了协议，即“取消特务机关，严禁司法和警察之外的其他任何机关有拘捕、审讯和处罚人民的权利”。

其实，蒋介石并非真心想要取消国民政府的特务机构，而且他也绝对不会放弃对特务机构的掌控。蒋介石之所以会同意签署这样的文件，只是因为他想利用这一条约，分解戴笠的权力，抑制军统的发展。

因此，《会谈纪要》签订后，蒋介石就立刻命令戴笠将军统势力化整为零。

蒋介石的这一命令，不止是为了抑制军统局的发展，他还有更深层的考虑：

第一，蒋介石是按照“双十协定”的要求将军统撤销的，这样，不仅戴笠及国民党其他要员无话可说，舆论大众也会因此信任自己，不再一边倒地倾向共产党；

第二，将军统化整为零，便于蒋介石顺利地将自己的

亲信安插到分解后的军统局的各个部门，加强了蒋介石对各部门的控制，这样，将来如有需要，蒋介石就能迅速将这些部门整合起来，形成一个比军统局更加强大的特务机关。

其实，戴笠非常清楚蒋介石的用意，他深知，如果撤销军统局，他戴笠在国民政府中恐怕就难以自保了，更不要说立足了。于是，戴笠决定先下手为强。

戴笠首先掌控了军令部二厅和内政部警政司，然后将军统的核心部门——情报部和稽查部，调入军令部二厅，接着，将特工警察、忠义救国军、特务团、别动军和交警总队，全部调入警政司，这样，戴笠就至少还掌握着原军统局70%—80%的人马。

戴笠此举虽然能够保住军统局的大部分人马，但他自己却在军统局撤销后，面临无处可去的下场，届时，戴笠的政敌们定会来为难他，在戴笠眼中，他那些政敌，不过是些跳梁小丑，他才不怕，但“虱子”多了，也是件非常麻烦的事情。为了保住自身的地位并避免陷入不利的境地，戴笠决定依靠美国政府的势力，夺取国民政府海军司令一职。

戴笠曾因建立中美情报技术合作所，与美国军方建立起密切的关系，所以，当戴笠找到美国驻津司令部师长，说明自己的来意后，美国驻津司令部师长当即拍着胸脯向戴笠保证，他一定会全力支持戴笠夺取海军司令一职。此时的蒋介石，依然一心想要清剿共产党，一心想要依靠美国等海外力量统一中国，因此，美国政府对戴笠的支持，让蒋介石看到，戴笠还有能量。也就是说，戴笠还是有利用价值的，至少戴笠还能够帮助自己疏通和美国军方的关系。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1946年3月17日，戴笠为了获得美国政府的支持，决定飞往上海与美国政府的有关官员会见。

1946年3月17日上午11点45分，戴笠登上了飞机，飞机起飞后不久，突遇大雾，机长立刻向戴笠报告，这样恶劣的天气，无法继续飞行，一定要先找个安全的地点降落才行。戴笠沉思后，决定在南京降落。

1946年3月17日下午1点06分，飞机飞抵南京岱山上空，因为雨雾迷蒙，能见度较低，飞机撞在了岱山上，机上14人全部遇难，天才特工戴笠的传奇一生，也就这样潦草收场。

戴笠之死原因不明，是非春秋待后人说

戴笠的死，在局外人看来，完全是一场意外，然而这对于蒋介石来讲，却无疑是一件称心如意的“意外”。戴笠以这样的方式毙命，很让蒋介石满意，蒋介石再也不用担心戴笠手中的权力过大，也不用担心有人怀疑自己暗杀戴笠，从而使得自己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了。而且，戴笠以这种方式死去，也不会给国民政府的官员们造成任何的心理恐慌。

随后，蒋介石为了证明自己与戴笠的死亡没有任何关系，下令彻查戴笠的死因，可由于飞机失事，所有线索都在飞机爆炸时消灭殆尽，所以无据可查，戴笠也就只能被认定是死于飞机失事。

1946年3月21日，对戴笠之死一直心存怀疑的沈醉，在岱山附近追查戴笠的死亡原因时，意外地从当地老百姓手中得到一把没有剑鞘的宝剑，沈醉看到这把宝剑后不禁惊呼：“九龙宝剑！”

此剑一出，沈醉对戴笠的死，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那就是，戴笠之死，很可能是马汉三所为。

说起这把九龙宝剑，话就长了。

这把九龙宝剑，原是戴笠在抗日战争时期交给马汉三保管的，然而抗日战争胜利后，戴笠却从日本女间谍川岛芳子的家中搜出了这把宝剑，当马汉三再次从戴笠手中看到这把九龙宝剑后，深怕自己做过汉奸的事情已被戴笠知道，马汉三担心受到军统局的惩罚，整日提心吊胆，可奇怪的是，戴笠却从未就此事质问过马汉三，对他反而比之前更加器重了。

这些事情沈醉也是知道的，因此，他根据九龙宝剑和这陈年往事推断，马汉三害死了戴笠。

也就是说，当时，戴笠反常的表现，让马汉三更加心慌，他总觉得戴笠是在下一盘大棋，准备在自己毫无防备的时候，再置自己于死

地，于是马汉三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下手，将戴笠杀死！

于是，马汉三在得知戴笠准备去往青岛后，便派人在戴笠乘坐的飞机上安装了定时炸弹。正是这颗炸弹爆炸，才导致飞机跌落在岱山上，一代天才特工戴笠由此死于非命。

沈醉觉得自己的推测颇有些道理，于是，将自己的推测告知了蒋介石，蒋介石听罢，心情大为不快。刚刚失去戴笠时，蒋介石的确开心了一阵子，但兴奋过后，蒋介石却觉得内心空落落的，回想戴笠对自己的忠心耿耿，回想这些年来戴笠为自己立下的汗马功劳，蒋介石难免觉得遗憾，感叹国民政府里，再难有像戴笠一样懂他心思，对他忠心不二的属下了。因此，蒋介石听到沈醉重提戴笠之死，就决定为戴笠举行一个隆重的追悼会。

1946年4月1日，军统局在重庆为戴笠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蒋介石亲自主祭，他首先陈述了戴笠一生的功绩，然后，嘱咐军统局要完成戴笠的遗愿，继续做好特工工作。最后，蒋介石悲从心来，难以自己地落下了眼泪。

从1946年4月中旬开始，蒋介石命令全国各大城市，为戴笠举行公祭，他还亲自赠送了一个花圈给戴笠的家属，上书“碧血千秋，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迹，奇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这副挽联，多少表达出蒋介石后来为失去戴笠而感到的遗憾和痛楚。

在各界名流为戴笠所写的挽联中，以章士钊先生所写的挽联最为概括，这副挽联是这样写的：“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1946年6月12日，蒋介石身着特级上将军服，亲自护送戴笠的灵柩，从南京中山路357号军统办事处一路送至钟山灵谷寺志公殿。

在戴笠的葬礼上，蒋介石为戴笠诵读祭文，在祭文结束后，蒋介石悲痛难忍地说：“唯君之死，不可补偿！”

戴笠的一生，有功亦有过，无论功过，都已成为历史，是非成败当由后人评说。正如章士钊所写的挽联一样“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军统四面楚歌，被迫再三改组

戴笠死后，军统局四面楚歌，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首的中统局，想方设法打压军统局的势力。而军统局的元老贺衷寒、康泽等人，则想对军统局进行裁员，以巩固各自在军统局乃至国民政府内的地位。民主党派对军统局更是深恶痛绝，恨不能早日解散军统局。面对这种情况，唐纵、郑介民、毛人凤等军统大佬商定，既然军统局的金字招牌已经不在，不如换个名字，将军统更名为保密局，挂靠在国防部，以保自身周全。

1947年7月，军统局正式更名为保密局，依靠抗战时期收缴的现金和钱财独立运营，为了预防另一个戴笠的出现，蒋介石派出他的亲信毛庆祥与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四人组成委员会，共同管理保密局。

然而，毛庆祥、郑介民、唐纵、毛人凤四个人来共同管理保密局，固然能够起到相互牵制的作用，但是没过多久，弊端也就渐渐地凸显。四人共同管理，难免出现权力争斗。支持郑介民的军统成员，大部分是广东籍的特工和留苏学生；而浙江籍和原军统训练班的精英们，则更愿意服从与戴笠关系良好，同为浙江江山人的毛人凤的领导；湖南籍的特工，以及其他对毛人凤不满的特工，则更倾向于服从唐纵的领导。于是，郑介民、毛人凤、唐纵各领人马开展工作，而毛庆祥则是中间的调停人，负责调解三人之间的矛盾。

更为糟糕的是，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人，对保密局的工作持不同的态度。

郑介民将保密局当成了取信于蒋介石的工具，如果不是为了让蒋介石更加信任自己，从而获得更好的前途，郑介民是根本看不上保密局的，更不想当特工头子。

唐纵和郑介民一样，从心眼里看不起保密局的特工，认为这份工作既见不得光又总是得罪人，而且这些特工大多数都是市井流氓，根本没什么知识，郑介民非常不屑于与这些特工打交道，要不是蒋介石十分重视特工工作，唐纵才不会屈就于此。

和郑介民、唐纵二人相比，毛人凤没有那么高的学历，也没有那

么大的野心。戴笠活着时，毛人凤一心帮戴笠搞好军统，认真完成戴笠交代的事情；戴笠死后，他只想保住戴笠辛苦打下的家业，不让外人夺去军统局的掌控权。毛人凤认为，只有继续为军统局效力，才不枉和戴笠相交一场。

然而蒋介石对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三人相互制约的态势，却非常满意，不过他们对他们三人的工作成绩颇感不满。在蒋介石看来，不论是郑介民、唐纵还是一直跟在戴笠身边的毛人凤，都没有戴笠那么能干。戴笠强大的组织能力、控制能力和情报能力，无人能及，甚至郑介民、毛人凤和唐纵三人的工作成绩加起来，都不及戴笠一人领导军统时取得的成绩。

1949年初，毛人凤见国民政府的败势已成定局，于是丧心病狂，决定反攻中国共产党。毛人凤安排保密局的特工潜伏在各个城市，伺机阻挠全国解放的步伐，同时，毛人凤命令保密局的大部分特工，在各大城市疯狂搜捕中国共产党党员及进步人士。为了阻挡中国共产党解放中国的脚步，激起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仇恨，毛人凤还命令保密局的特工破坏各大城市的水电、桥梁等设施，给百姓的生活制造麻烦。

1949年9月上旬，毛人凤派保密局的特务将抗日爱国将领杨虎城全家暗杀于松林坡。

重庆解放前夕，毛人凤又对关押在渣滓洞的一百多人进行了血腥的屠杀，最终，仅有15人幸存。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毛人凤将保密局一部分人留在了大陆，命令他们继续暗杀中国共产党党员和进步人士，窃取中国共产党的情报，并伺机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各项计划。这些原军统成员在大陆肆意破坏，对国家的安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才将毛人凤留在大陆的特工彻底肃清。

话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留守大陆的原军统特工，在大陆的日子也不好过。然而，毛人凤却继续培养特工，意欲有朝一日，重回大陆，为非作歹。1950年，保密局在台北市士林区芝山岩成立保密局本部，继续培养特工，从事情报搜集工作。

1952年，蒋介石对特务机构进行进一步改组，撤销“革命行动委员会”，增设两个特务机构，专门负责大陆的“敌后建党”、“心理作战”等特务活动。

1955年，保密局被改组为国防情报部，由毛人凤负责管理，此时的情报部门，专门负责战略预警收集和保防侦察工作。

此后，原“军统局”又经过多次调整，1958年，蒋介石将国防部二厅改组为“特情处”；1961年5月，又扩编为“特情室”；1972年5月，蒋介石又将“特情室”第三组和第六组合并为国民党中央海外工作委员会；1985年7月，情报局与“特情室”合并，成立军事情报局。

第二节 陈氏兄弟失宠，中统淡出历史

抗战时期，蒋介石旗下有两大特工组织：一个是戴笠领导的军统局，主要负责对日本军队、日伪政府的监视、绑架和暗杀工作，以及情报收集工作；另一个特工组织是中统局，主要负责维护军队、警察局等军事部门以外的政府部门的安全。身为国民政府两大特务机关的中统，除了以上述工作为重心外，还疯狂打击中国共产党，监督打击社会上出现的反对国民党的媒体舆论和思想言论。

前面，笔者多次提到中统局，中统局的全称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统计调查处，由陈果夫、陈立夫二人担任局长，徐恩曾任副局长，然而二陈并不热衷于政治斗争，也不热衷于情报工作，他们一心只想当甩手掌柜，因此，中统局的所有工作，都由徐恩曾处理，包括策划中统特工的工作重点，列清剿名单等重要工作。

中统局的建立先于军统，但其势力一直不如军统局，这让野心勃勃的徐恩曾心生不甘。徐恩曾曾经想尽办法提高中统局在国民政府的地位，排挤戴笠的军统局，在戴笠因势力过于强大，遭到蒋介石怀疑时，徐恩曾还曾落井下石，联合国民政府部分官员，一起弹劾戴笠，揭露在抗日战争时期，戴笠对国民政府官员的诸多不敬之事。当时的蒋介石

石，正在发愁用何种理由削减戴笠手中的权力，徐恩曾的揭发，正中蒋介石的下怀，因此蒋介石默许徐恩曾和其他国民党官员，在1946年3月的国民政府六届全会上，集体抨击戴笠。

徐恩曾掌握中统这么多年，早就成了人精，从蒋介石对戴笠的态度中，徐恩曾看出，戴笠今后的日子必定不会好过，对此，徐恩曾心里颇为高兴，当然，他并没有在蒋介石面前表现出自己的幸灾乐祸，而是信誓旦旦地向蒋介石保证，中统局必定会尽全力清剿中国共产党，维护国民政府的安全。

1945年，蒋介石和毛泽东签订了《会谈纪要》，其中关于特务机构的约定，不仅影响到军统局，也影响到了中统局。

由于中统局的势力没有超出蒋介石的掌控范围，因此蒋介石没有拿中统局开刀，而是下令撤销军统局，将军统局化整为零。蒋介石这样做，一方面想要堵住中国共产党的嘴，另一方面想要减少戴笠对自己的威胁。军统局撤销后，中统局依然保留，中统局所拥有的权力和义务都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是以保卫国民党党政机关的内部安全，清剿中国共产党地下党为主要工作重心，兼引导社会舆论和思想言论的发展方向，散步中国共产党危害国家与人民的谣言。

其实，中统发展的速度，比蒋介石预想的要缓慢得多，中统局本是先于军统局成立的，当时，蒋介石担心中统局权力过大，会出现权高震主的现象，因此又成立了军统局。然而想不到，戴笠无比强势，而徐恩曾却非常没用，在军统局与中统局的权力争斗中，徐恩曾总是节节败退。因此，中统局的发展，曾经让蒋介石颇感挫败，不过这一切，都已经随着戴笠的死亡而烟消云散了。

对于蒋介石来说，没有了戴笠的军统局，再也不是为惧，而徐恩曾在抗日时期的表现，也让蒋介石清楚，徐恩曾没有能力对他的统治地位造成威胁，因此，蒋介石没有将中统局改组，而且依然让徐恩曾领导中统局的特务工作。

然而，1947年4月，蒋介石还是将中统局改组为中央党员通讯局，由叶秀峰担任局长，由郭子俊和季源薄二人担任副局长。

既然蒋介石并不担心徐恩曾功高盖主，那么为什么仅仅一年之后，

蒋介石就换掉了中统局的所有当家人呢？而且，作为陈果夫和陈立夫二人的“蒋三叔”的蒋介石，为什么要撤掉陈果夫和陈立夫中统局局长的名头，并将对自己毫无威胁的徐恩曾，也一并撤职了呢？

原来，自“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就对陈果夫、陈立夫两兄弟深感不满，原因是这两兄弟在“西安事变”时，主张将张学良杀死，当时，他们虽然没有置蒋介石于死地的心思，但在蒋介石看来，这两兄弟居然连自己的死活都不顾，一意孤行，非要杀死张学良。但当时正值用人之际，蒋介石手下暂时还没人能替代此二人，所以，为了巩固自己在国民政府中的地位，为了维护国民政府在中国的绝对统治，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后，并没有表现出对这两兄弟的不满，而是依然重用他们。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政府的官员中，逐渐出现一些后起之秀，经过几年的战争洗礼，很多国民党官员都成长了起来。因此，蒋介石便迫不及待地陈氏兄弟从重要岗位上拉了下来，把自己的亲信，安排到国民政府的各个岗位上去。徐恩曾被撤职，也算是受陈氏兄弟牵连。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当时，在国民党内部流传这样一句话，“蒋家天下陈家党”，所有人都将国民政府失败的原因，加在了陈氏兄弟身上，他们成了内战失败的替罪羊，蒋介石也认定，是陈氏兄弟导致他统治全国的梦想破灭，因此，蒋介石对陈氏兄弟充满了怨恨，被失败蒙蔽了双眼的蒋介石，早就已经忘了陈立夫、陈果夫二人为国民政府立下的汗马功劳。

而陈氏兄弟也从蒋介石的态度中，嗅到了一丝危险，他们明白，这时的“蒋三叔”，已经不再信任他们，甚至有些厌恶他们了。为了避免惹恼蒋介石，陈果夫以身体不适为由，退出了政坛，迁居台中。而陈立夫则被迫离开台湾。

后来，陈氏兄弟的生活逐渐拮据起来，就连哥哥陈果夫病重，陈立夫、陈果夫两家人都凑不齐陈果夫的医药费。

后来，百般无奈的陈立夫为了谋求生路，不得不背井离乡，远走美国。

到了美国后，陈立夫开过养鸡场，做过皮蛋生意、豆腐乳生意、粽子生意等。

昔日高高在上的陈氏兄弟，最终落得晚景凄凉。

1954年10月，中统局被改组为“司法行政部”调查局，专门负责管理监狱、劳教犯人、管理律师、法律援助和人民调解等司法方面的行政事务，与情报工作、安全工作再也没有了一丝的关联，后来，“司法行政部”调查局又被改组为“法务部调查局”，昔日的中统局不复存在。

第三节 树倒猢猻散，汪伪 76 号群奸落网

再说暗战的第三个主角，汪伪 76 号的结局。

李士群被日本军方用牛肉饼毒杀后，汪伪 76 号的特务为了争夺领导权，制造了一场又一场的厮杀。

1945年，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汪伪 76 号自然也就树倒猢猻散了。

汪伪 76 号解散后，汪伪 76 号的特务，一时间不知该何去何从，他们十分担心被国民政府制裁，惶惶不安。

1945年9月下旬，戴笠制订了彻底肃奸的计划。戴笠先编了一本厚厚的“汉奸提名录”，然后将这本名录公之于众，并利用广播、报纸等方式，在各大城市宣传汉奸自首的好处，引导汉奸自首。然后，戴笠又派出特工，搜捕汪伪 76 号的汉奸中的漏网之鱼，将抓捕到的汉奸集中关押到监狱里。

被关进监狱的汪伪 76 号的汉奸，提心吊胆地等待着军统局的制裁，但是过了好久，军统局都没有对这些汉奸进行处置，这让汪伪 76 号的特务更加忐忑不安，很多特务甚至要求将他们处死，他们宁愿早早死去，也不愿每天都活在对死亡的恐惧之中。

在惩治汪伪 76 号的特务的同时，戴笠加紧惩治那些尚在牢狱之外的汪伪 76 号以及汪伪政府的大汉奸。

1945年12月5日，军统局在兵马司胡同一号，原伪华北政委会

经济总署督办兼联合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的宅邸内设宴，将群奸请到了这里。

群奸们惴惴不安地来到兵马司胡同一号，竟然发现，军统居然为他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宴。

看到这些美味的食物，自日本投降后，一直惶惶如丧家之犬的大汉奸们，不由自主地吞了吞口水，算起来，他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过这么丰盛的饭菜了。

然而，看着满桌的菜肴，汉奸们却没有一个人敢动筷子，他们都担心，这是他们最后的晚餐，内心十分惶恐。

后来，戴笠走了进来，和颜悦色地对在场的群奸说：

“国民政府知道大家做汉奸也是迫不得已，每个人都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理由，这段时间，国民政府也看到了大家的不安和后悔。大家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吃好、喝好、睡好了吧？国民政府特别命我代表中央，请大家吃一顿丰盛的晚宴，庆祝大家脱离汉奸的队伍。”

戴笠的话，让这些大汉奸松了一口气。于是，这些汉奸开始大吃大喝。

当这些汉奸吃饱喝足后，戴笠又对他们说：“今天饭菜准备得匆忙，明天我会准备更加丰盛的好酒好菜招待大家，希望大家明天能将今天没有来的其他汉奸带过来，大家一起弃暗投明。”

第二天晚上8点，昨晚前来的大汉奸们，以及听到消息赶来的其他汉奸，准时来到汪时璟的豪宅，但是到达之后，却发现院中并没有再次摆放宴桌，汉奸们在院中惶恐地等待戴笠的到来。

没一会儿，戴笠就带着军统局的特工走进了豪宅，然后，关上了豪宅的大门。随后，戴笠将这些汉奸统统抓捕，送进了国民政府的监狱。

群奸被捕后，被关押在国民政府的大牢里，等待他们的，是法庭的审判。

王克敏、陈公博、殷汝耕等大汉奸最终被判处死刑。

其他的汉奸，根据罪行轻重，根据国民政府1938年制定的《惩治汉奸条例》，以及1945年国民政府根据《惩治汉奸条例》公布的《处理汉奸条例》，被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有期徒刑。

至此，汪伪76号彻底灭亡，汉奸统统得到了应有的惩治。

